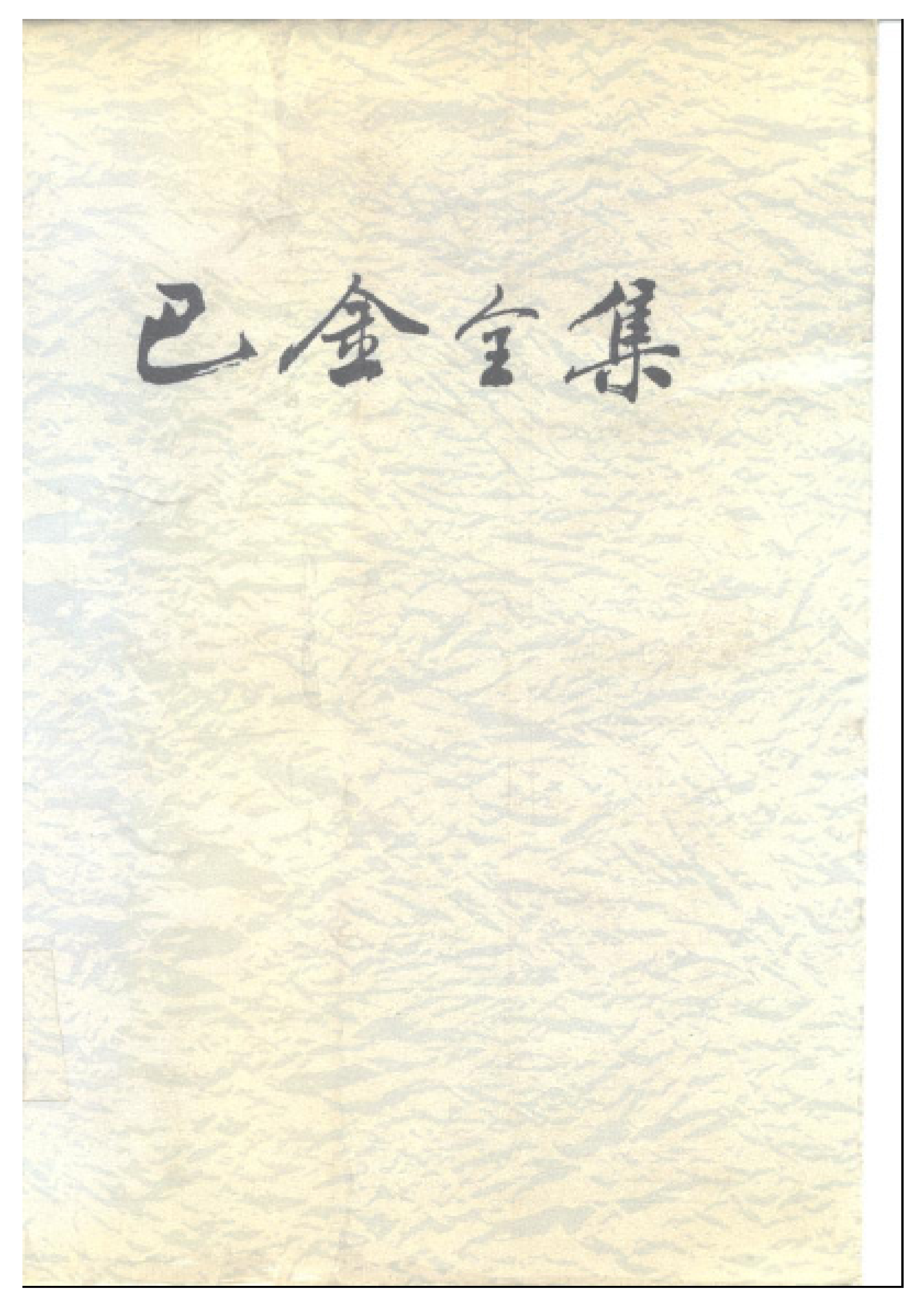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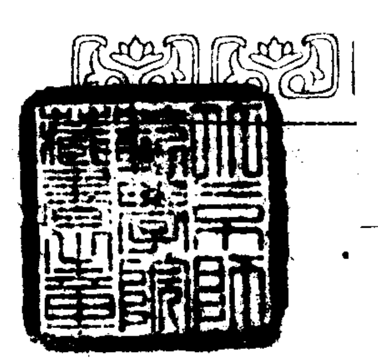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第十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巴金全集

（第十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北京第1版
1990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923—9/Z·1
定价 8.05 元

目　录

短简

序 …… 3
我的幼年 …… 4
我的几个先生 …… 13
关于《家》(存目，文见第一卷)
我的故事 …… 20
关于《春》 …… 26
我的路 …… 28
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 …… 35
给一个孩子 …… 39
答一个“陌生的孩子” …… 45
给一个中学青年 …… 47
家 …… 51
关于《发的故事》(存目，文见第十一卷)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 57
病 …… 62
《雷雨》在东京 …… 68
给日本友人(存目，文见第十二卷)

梦与醉

序……75
死……77
梦……90
醉……95
路……101
生……104
关于《何为》(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关于《死之忏悔》(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关于《生人妻》(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纪念一个友人(存目)
春月之死(译文，存目)
忆春月(译文，存目)
一个英雄的葬仪(译文，存目)

旅途通讯

前记……113
香港行……115
在广州……117
广州在轰炸中……123
在轰炸中过的日子……126
从广州到乐昌……130
广武道上……150
汉口短简……159
广州在包围中……161

广州的最后一晚……165
从广州出来……169
梧州五日……182
民富渡上……199
石龙——柳州……205
在柳州……209
桂林的受难……212
桂林的微雨……218

感想

前记……227
感想(一)……228
感想(二)……231
第一次听见那炮声……234
失败主义者……237
国家主义者……240
最后胜利主义者……244
公式主义者……247
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253
和平主义者……261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265

黑土

前记……277
黑土……278
南国的梦……284

在广州 …………………………………………………………… 292
卢骚与罗伯斯庇尔(存目)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存目)
无 题
前记 ……………………………………………………………… 303
无题 ……………………………………………………………… 304
先死者 …………………………………………………………… 309
静寂的园子……………………………………………………… 311
大黄狗 …………………………………………………………… 315
轰炸中 …………………………………………………………… 318
十月十七日……………………………………………………… 321
在泸县 …………………………………………………………… 325
做一个战士……………………………………………………… 330
“重进罗马”的精神 …………………………………………… 333
悼鲁迅先生……………………………………………………… 336
感激的泪 ………………………………………………………… 339
写给读者(一)(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写给读者(二)(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逃荒》(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地上的一角》(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雨夕》(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荒》(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三月天》(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鱼儿坳》(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龙·虎·狗

序 …… 343

静寂的园子(存目)

大黄狗(存目)

爱尔克的灯光 …… 345

悼范兄(存目)

风 …… 350

云 …… 352

雷 …… 355

雨 …… 358

日 …… 360

月 …… 361

星 …… 362

狗 …… 364

猪 …… 366

虎 …… 369

龙 …… 371

死去 …… 377

伤害 …… 382

祝福 …… 386

撇弃 …… 388

醉 …… 392

生 …… 394

梦 …… 397

死……………………………………………………………… 399
附录 关于《雷雨》…………………………………………… 401
关于小说中描写的意见(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废园外

废园外 ……………………………………………………… 407
火……………………………………………………………… 410
怀念(存目)
长夜 ………………………………………………………… 414
寻梦 ………………………………………………………… 422
灯……………………………………………………………… 426
给山川均先生(存目,文见第十二卷)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存目)
后记 ………………………………………………………… 430

旅途杂记

前记 ………………………………………………………… 435
无题(存目)
先死者(存目)
轰炸中(存目)
十月十七日(存目)
在泸县(存目)
废园外(存目)
火(存目)
别桂林及其它……………………………………………… 437
邮政车中…………………………………………………… 446

贵阳短简……451
筑渝道上……455
成渝路上……460
从南京回上海(存目,文见第十二卷)

怀 念

前记……469
纪念友人世弥……471
悼范兄……475
怀念……484
纪念憾翁……490
写给彦兄……496
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500
纪念我的哥哥……519
忆施居甫……529
怀陆圣泉……533

静夜的悲剧

无题……541
黑土(存目)
南国的梦(存目)
月夜鬼哭……544
卢骚与罗伯斯庇尔……549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556
静夜的悲剧……569
后记……581

短　简

《短简》，一九三七年三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一九四五年五月再版（其间一九四三年七月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印行一版）。

一九四九年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排印一版。

序

近一年来有许多不认识的年轻朋友写信给我，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知己友人看待，告诉我许多事情，甚至把他们的渴望和苦恼也毫不隐瞒地讲出来了，这些都是我应该知道，而且应该寄与同情的。我感激他们。但是我惭愧我缺少行动的力量，我没有丰富的经验，我缺乏广博的学识。对于那些怀着求助的心情来找我的年轻人，我不能帮一点忙。我说过："倘使我还有一点点力量，我也要拿来给年轻的心添一点温暖。"然而事实永远跟我的希望相反。我只有责备自己的无力，不过我不敢因此放弃我的责任。我也曾尽我微弱的力量回答那些充满信任与热情的来信。'我的话都是十分平凡。但我写的全是我所真实地感到的，全是我知道得最清楚的，全是从我的狭隘的经验里得来的。我纵然不能给那些纯白的年轻心灵以安慰和鼓舞，我纵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难题，但是我的"短简"也毕竟告诉了他们一些事情，一些关于生活的事情，这对于他们也许会有一点点用处。我的长途旅行最近就要开始，我和年轻朋友间的通信也将因而暂时中断。所以我毫不惭愧地把过去写给朋友们的一部分的"短简"编成这本小书，我把它献给我的年轻朋友们作为表示感激的礼物。

巴　金 1937年2月28日之夜。

我的幼年*

窗外落着大雨，屋檐上的水槽早坏了，这些时候都不曾修理过，雨水就沿着窗户从缝隙浸入屋里，又从窗台流到了地板上。

我的书桌的一端正靠在窗台下面，一部分的雨水就滴在书桌上，把堆在那一角的书、信和稿件全打湿了。

我已经躺在床上，听见滴水的声音才慌忙地爬起来，扭燃电灯。啊，地板上积了那么一大滩水！我一个人吃力地把书桌移开，使它离窗台远一些。我又搬开了那些水湿的书籍，这时候我无意间发见了你的信。

你那整齐的字迹和信封上的香港邮票吸引了我的眼光，我拿起信封抽出了那四张西式信笺。我才记起四个月以前我在怎样的心情下面收到你的来信。我那时没有写什么话，就把你的信放在书堆里，以后也就忘记了它。直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雨夜，你的信又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朋友，你想，这时候我还能够把它放在一边，自己安静地躺回到床上闭着眼睛睡觉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一期。

为了这书，我曾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还经过三个冷僻荒凉的墓场。那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三夜，我去香港，无意中见到这书，便把袋中仅有的钱拿来买了。这钱我原本打算留来坐 bus 回鸭巴甸的。

在你的信里我读到这样的话。它们在四个月以前曾经感动了我。就在今天我第二次读到它们，我还仿佛跟着你在黑暗中走路，走过那些荒凉的墓场。你得把我看做你的一个同伴，因为我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人，而且我也有过和这类似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我确实有的太多了。从你的话里我看到了一个时期的我的面影。年光在我的面前倒流过去，你的话使我又落在一些回忆里面了。

你说，你希望能够更深切地了解我。你奇怪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朋友，这并不是什么可惊奇的事，因为我一生过的是"极平凡的生活"。我说过，我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但这样简单的话是不够的。我说过我从小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的。但这样简单的话也还是不够的。我写出了一部分的回忆，但我同时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忆。我应该写出的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

界，我的天堂。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然而死在我的面前走过了。我的母亲闭着眼睛让人把她封在棺材里。从此我的生活里缺少了一样东西。父亲的房间突然变得空阔了。我常常在几间屋子里跑进跑出，唤着“妈”这个亲爱的字。我的声音白白地被寂寞吞食了，墙壁上母亲的照片也不看我一眼。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上投下了阴影。我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恐怖和悲痛的意义了。

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爱思想的孩子。但是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记，我不会整天垂泪。我依旧带笑带吵地过日子。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它要飞，飞，只想飞往广阔的天空去。

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小鸟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网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却被人关在一个铁丝笼里。家庭如今换上了一个面目，它就是阻碍我飞翔的囚笼。

然而孩子的心是不怕碰壁的。它不知道绝望，它不知道困难，一次做失败的事情，还要接二连三地重做。铁丝的坚硬并不能够毁灭小鸟的雄心。经过几次的碰壁以后，连安静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

同时在狭小的马房里，我躺在那些病弱的轿夫的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悲痛的经历；或者在寒冷的门房里，傍着黯淡的清油灯光，听衰老的仆人绝望地倾诉他们的胸怀。那些没

有希望只是忍受苦刑般地生活着的人的故事，在我的心上投下了第二个阴影。而且我的眼睛还看得见周围的一切。一个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做了乞丐，每逢过年过节，偷偷地跑来，躲在公馆门前石狮子旁边，等着机会央求一个从前的同事向旧主人讨一点赏钱，后来终于冻馁地死在街头。老仆人袁成在外面烟馆里被警察接连捉去两次，关了几天才放出来。另一个老仆人病死在门房里。我看见他的瘦得像一捆柴的身子躺在大门外石板上，盖着一张破席。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家里做看门人，因为别人硬说他偷东西，便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用了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内。当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发生的时候，我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反抗的思想鼓舞着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鸟用力往上面飞，要冲破那个铁丝网。但铁丝网并不是软弱的翅膀所能够冲破的。碰壁的次数更多了。这其间我失掉了第二个爱我的人——父亲。

我悲痛我的不能补偿的损失。但是我的生活使我没有时间专为个人的损失悲哀了，因为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争斗掀开平静的表面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威权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

"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

年轻的灵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运的。我开始觉得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但是别人并不了解我。我只有在书本上去找寻朋友。

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大哥渐渐地现出了疯狂的倾向。我的房间离大厅很近，在静夜，大厅里的任何微弱的声音我也可以听见。大厅里放着五六乘轿子，其中有一乘是大哥的。这些时候大哥常常一个人深夜跑到大厅上，坐到他的轿子里面去，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因为读书睡得很晚，这类声音我不会错过。我一听见玻璃破碎声，我的心就因为痛苦和愤怒痛起来了。我不能够再把心关在书上，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涂写一些愤怒的字眼，或者捏紧拳头在桌上捶。

后来我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那本书后面附印着一些警句，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但是不久，我就不能以"闭门读禁书"为满足了。我需要

活动来发散我的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我的理想。我想做点事情，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地开头去做。没有人引导我。我反复地翻阅那本小册子，译者的名字是真民，书上又没有出版者的地址。不过给我这本小册子的人告诉我可以写信到上海新青年社去打听。我把新青年社的地址抄了下来，晚上我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信。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信发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机会来牺牲自己，来消耗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终没有来。我并不抱怨别人，我想或者是我还不配做这种事情。然而我的心并不曾死掉，我看见上海报纸上载有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便寄了邮票去。在我的记忆还不曾淡去时，书来了，是一个剧本。我形容不出这本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

大概在两月以后，我读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在那上面我看见一篇《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这是转载的文章。那意见和那组织正是我朝夕所梦想的。我读完了它，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安静下去。两种冲突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争斗了一些时候。到夜深，我听见大哥的脚步声在大厅上响了，我不能自主地取出信纸摊在桌上，一面听着玻璃打碎的声音，一面写着愿意加入“适社”的信给那个《半月》

的编辑，要求他作我的介绍人。

这信是第二天发出的，第三天回信就来了。一个姓章的编辑亲自送了回信来，他约我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到他的家里去谈话。我毫不迟疑地去了。在那里我会见了三四个青年，他们谈话的态度和我家里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充满了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我把我的胸怀，我的痛苦，我的渴望完全吐露给他们。作为回答，他们给我友情，给我信任，给我勇气。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知己朋友。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适社"是重庆的团体，但是他们也想在这里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他们答应将来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告辞的时候，他们送给我几本"适社"出版的宣传册子，并且写了信介绍我给那边的负责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许不会是这么简单，这个时候人对人也许不会这么轻易地相信，然而在当时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这个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两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昂扬，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里。就在这天的夜里，我怀着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给"适社"的负责人写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我和那几个青年结了亲密的友谊。我做了那个半月刊的同人，后来也做了编辑。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团体：均社。我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团体成立以后就来了工作。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都是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

开秘密会议，时间是夜里，地点总是在僻静的街道，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大家都是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赴会的。每次我一个人或者和一个朋友故意东弯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许多路，听厌了单调的狗叫和树叶飘动声，以后走到作为会议地点的朋友的家，看见那些紧张的亲切的面孔，我们相对微微地一笑，那时候我的心真要从口腔里跳了出来。我感动得几乎不觉到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开放了花朵。

但这样的会议是不常举行的，一个月也不过召集两三次，会议之后是工作。我们先后办了几种刊物，印了几本小册子。我们抄写了许多地址，亲手把刊物或小册子一一地包卷起来，然后几个人捧着它们到邮局去寄发。五一节来到的时候，我们印了一种传单，派定几个人到各处去散发。那一天天气很好，我挟了一大卷传单，在离我们公馆很远的一带街巷里走来走去，直到把它们散发光了，又在街上闲步一回，知道自己没有被人跟着，才放心地到约定集合的地方去。每个人愉快地叙述各自的经验。这一天我们就像在过节。又有一次我们为了一件事情印了传单攻击当时统治省城的某军阀。这传单应该贴在几条大街的墙壁上。我分得一大卷传单回到家里。晚上我悄悄地叫一个小听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浆糊。我挟了一卷传单，我们看见墙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传单贴上去。没有人干涉我们。有几次我们贴完传单走开了，回头看时，一两个黑影子站在那里读我们刚才贴上去的东西。我相信在夜里他们要一字一字地读完它，并不是容易的

事情。

《半月》是一种公开的刊物，社员比较多而复杂。但主持的仍是我们几个人。白天我们中间有的人要上学，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们才有空聚在一起。每天晚上我总要走过几条黑暗的街巷到“半月社”去，那是在一个商场的楼上。我们四五个人到了那里就忙着卸下铺板，打扫房间，回答一些读者的信件，办理种种的杂事，等候那些来借阅书报的人，因为我们预备了一批新书报免费借给读者。我们期待着忙碌的生活，宁愿忙得透不过气来。共同的牺牲的渴望把我们大家如此坚牢地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只等着一个机会来交出我们个人的一切，而且相信在这样的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这样的幻梦固然带着孩子气，但这是多么美丽的幻梦啊！

我就是这样地开始了我的社会生活的。从那时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埋葬了。……

窗外刮起大风，关着的窗门突然大开了。雨点跟着飘了进来。我面前的信笺上也溅了水。写好的信笺被风吹起，散落在四处。我不能够继续写下去了，虽然我还有许多话没有向你吐露。我想，我不久还有机会给你写信，叙述那些未说到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上面的话能不能够帮助你更了解我。但是我应该感谢你，因为你的信给我唤起了这许多可宝贵的回忆。那么就让这风把我的祝福带给你罢。现在我也该躺一会儿了。

1936年8月深夜。

我的几个先生*

我接到了你的信函，这的确是意外的，然而它使我更高兴。不过要请你原谅我，我失掉了你的通信地址，没法直接寄信给你，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回答你几句，我相信你能够看见它们。

那天我站在开明书店的货摊旁边翻看刚出版的《中流》半月刊创刊号，你走过来问我一两件事，你的话很短，但是那急促而颤抖的声音却达到了我的心的深处。我和你谈了几句话，我买了一本《中流》，你也买了一本。我看见你到柜上去付钱，我又看见你匆匆地走出书店，我的眼前还现着你的诚恳的面貌。我后来才想起我忘记问你的姓名，我又因为这件事情而懊恼了。

第二天意外地来了你的信，你一开头就提起《我的幼年》这篇文章，你说了一些令人感动的话。朋友，我将怎样回答你呢？我的话对你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我的一番话并不能够解除谁的苦闷；我的一封信也不能够给谁带来光明。我不能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二期。

光。”① 因为我是一个平凡到极点的人。

朋友，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叫你马上去交出生命。你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当然知道我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难却在如何使这生命像落红一样化着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花朵。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光明，那就是问题了。这一点你一定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会找到。这些都用不着我来告诉你。但是对于你的来信我觉得我仍然应该写几句回答的话。你谈起我的幼年，你以为你比从前更了解我，你说我说出了你很久就想说而未说出的话，你告诉我你读我的《家》读了一个通夜，你在书里见到你自己的面影——你说了那许多话。你现在完全知道我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长成的了。你的环境和我的差不多，所以你容易了解我。

我可以坦白地说，《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实的东西。然而它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它不过是一篇长的作品的第一段。我想写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拙劣的笔却只许我写出这么一点点。我是那么仓卒地把它结束了的。现在我应该利用给你写信的机会接着写下去。我要来对你谈谈关于我的先生的话，因为你在来信里隐约地问起“是些什么人把你教育成了这样的”。

① 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

在给香港朋友的信里，我说明了“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现在我应该接着来回答“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成了这样的”这个问题了。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识字读书的教书先生，也不是在学校里授给我新知识的教员。我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所以我很快地忘记了他们。给了我较大影响的还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没有他们，我也许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① 但是母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

① 《家》里面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话，还是从大哥给我的信里摘录下来的：“她又含着眼泪把她嫁到我们家来做媳妇所受的气一一告诉我。……爹以过班知县的身份进京引见去了。她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这时爹在北京因验看被驳，陷居京城。消息传来，爷爷时常发气，家里的人也不时揶揄。妈心里非常难过。……她每接到爹的信总要流一两天的眼泪。”

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因为我有这样的母亲，我才能够得到允许（而且有这种习惯）和仆人、轿夫们一起生活。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一个轿夫。

轿夫住在马房里，那里从前养过马，后来就专门住人。有三四间窄小的屋子。没有窗，是用竹篱笆隔成的，有一段缝隙，可以透进一点阳光，每间房里只能放一张床，还留一小块地方做过道。轿夫们白天在外面奔跑，晚上回来在破席上摆了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挨着鬼火似的灯光慢慢地烧烟泡。起初在马房里抽大烟的轿夫有好几个，后来渐渐地少了。公馆里的轿夫时常更换。新来的年轻人不抽烟，境遇较好的便到烟馆里去，只有那个年老瘦弱的老周还留在马房里。我喜欢这个人，我常常到马房里去，躺在他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的故事。他有一段虽是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也走过不少的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他的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上。他孤零零的活着，在这个公馆里他比谁更知道社会，而且受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但是他并不憎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这“忠心”并不是指

奴隶般地服从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话和我的母亲的话完全两样。他告诉我的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爱”字教我。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或者叙说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经历以后，就说教似地劝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一面听他这一类的话，一面看他的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我看见他用力从烟斗里挖出烧过两次的烟灰去拌新的烟膏，我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以后禁不住想是什么力量使他到了这样的境地还说出这种话来！

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厅，也就是他们的厨房。那里有两个柴灶。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常常跑去帮忙他们烧火。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我起初不会烧火，看看要把火弄灭了，老周便把我拉开，他用火钳在灶孔里弄几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确，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样的话。

我从这个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点社会情况。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还有所谓社会，而且他还传给我他那种生活态度。日子一天一天像流星似地过去。我渐渐地长大起来。我的脚终于跨出了家庭的门限。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我也有了新的经历，在这些朋友中间我找到了我的第三个先生。

我在一篇题作《家庭的环境》的回忆里，曾经提到对于我

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那就是我的大哥和一个表哥。我跟表哥学过三年的英文；大哥买了不少的新书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它们。但是我现在不把他们列在我的先生里面，因为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在生活态度上（不是知识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的人。

在《我的幼年》里，我叙说过我怎样认识那些青年朋友。这位先生就是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是《半月》的一个编辑，我们举行会议时总有他在场；我们每天晚上在商场楼上半月报社办事的时候，他又是最热心的一个。他还是我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同学，班次比我高。我刚进去不久，他就中途辍了学。他辍学的原因是要到裁缝店去当学徒。他的家境虽不宽裕，可是还有钱供他读书。但是他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说“劳动是神圣的事”①。他为了使他的言行一致，毅然脱离了学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缝店规规矩矩地行了拜师礼，订了当徒弟的契约。每天他坐在裁缝铺里勤苦地学着做衣服，傍晚下工后才到报社来服务。他是一个近视眼，又是初学手艺，所以每晚他到报社来的时候，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满是针眼。他自己倒高兴，毫不在乎地带着笑容向我们叙述他这一天的有趣的经历。我们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这样，同时还实行素食。我们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苦行，但是他实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却使我们齐声赞美。

他还做过一件使我们十分感动的事，我曾把它写进了我

① 他很喜欢当时一个流行的标语：“人的道德为劳动与互助：唯劳动乃能生活；唯互助乃能进化。”

的小说《家》。事情是这样的：他是《半月》的四个创办人之一，他担负大部分的经费。刊物每期销一千册，收回的钱很少。同时我们又另外筹钱刊印别的小册子，他也得捐一笔钱。这两笔款子都是应当按期缴纳不能拖延的。他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许他"乱用"钱。他找不到钱就只好拿衣服去押当，或是当棉袍，或是当皮袍。他怕他姐姐知道这件事，他出去时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了当铺以后才脱下来。当了钱就拿去缴月捐。他常常这样办，所以他闹过热天穿棉袍的笑话，也有过冬天穿夹袍的事情。

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信仰所开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毅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朋友，我把我的三个先生都简略地告诉你了。你现在大概可以明白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到现在这个样子的罢。我自己相当高兴，我毕竟告诉了你一些事情，这封信不算是白白地写了。

1936年9月。

我的故事*

我在大太阳下面跑了半天的路，登了五十级楼梯，到了一个地方①，刚刚揩了额上的汗珠坐下，你的信就映入我的眼帘。我拆开信封，你那陌生而古怪的笔迹刺着我的眼睛。我看了几个字，把信笺放回到信封里；我又去拆第二封信。……我把别的几封信都匆忙地读了，同你的信一起放在衣袋里。我和这个地方的人说了几句话，便又匆匆地走下五十级楼梯，跑到街心去了。刚好前面停着一辆无轨电车，我一口气跑了过去。车子正要开动，我连忙跳了上去。车厢里人很少，我占着宽敞的座位。过了一会儿，我的心的跳动渐渐地恢复了常态，我可以把思想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了，我便取出你的信来，仔细地但很费力地读了一遍，我不曾遗漏一个字，甚至写在你的名字下面的日期。那么一个悲痛的日子②！我不会把它忘掉。在你的名字上面写着的“一个小孩子”五个字，更使我深深地感动。

电车到了一个站头，我下了车。我半跑半走地到了另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大公报·文艺》。

① 一个地方：指当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号三楼。

② 悲痛的日子：指九月十八日。

个地方，又登上几十级楼梯，在一个窄小的编辑室①里坐下来，我开始校对一篇我的稿子，就是关于那个悲痛的日子的文章②。关于那个日子我应该写一篇有力的东西。但是文句从我的笔下流到纸上，却变成多么软弱的句子了。生在这个时代，连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舌头都似乎被什么东西钳住了似的，然而我们却尽管昂着头得意地走在街上说我们是自由的人！我校完那篇短文，我望着镶在它四周的宽黑边，一阵暗云在我的眼前飞过，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甚至那油墨印出的字迹也在对着我哭泣了。我不能够忍耐。我反抗地把校样折起发回给排字工人，我反抗地做出笑脸，对朋友们说了好几句话。于是有人来通知说，一个从乡下来的朋友在下面等着见我。我便走了下去。

四年的分别使我几乎不认识那个年轻友人了。四年前我和他有过一次谈话的机会。后来他托一位朋友转给我一只剥制过的小鳄鱼。那个热带动物至今还爬在我的书架上。它的尾巴被一个朋友的小孩折断了一节，但是它的口还凶恶地大大张开。我每次望着它那个好像要把我吞下去的大嘴，就想起了南国灿烂的阳光、明亮的河流、长春的树木，尤其是那些展示了生命之丰富与美丽的大树。我的寒冷的房间因此渐渐地暖起来。这温暖也曾帮助我写成一些文章。我感谢那个朋友，但是我却没有机会向他表示谢忱。这一天我见到他。我

---

① 编辑室：指当时在北四川路的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室。

② 文章：指《文季月刊》（良友公司发行）一九三六年九月号的《卷头语》。

们到附近一个咖啡店① 里去谈了一个多钟头。他是从炎热的南洋来的，在那边他每天都喝咖啡，可是现在他说他不大喝它了。我从前看见他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健谈的人，如今他却不大开口了。每一次我闭了嘴看他，他的眼光停在我的脸上，他脸上的肌肉微微地动着，嘴也微微地动着，他似乎有许多不寻常的话要说出来。但是他只说了三四句寻常的话又沉默了。我很了解他：他不愿意回到守旧的乡村，想在都市里找到一个职业，只求能够简单地生活下去，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为自己求得更多的学识。他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找职业，要求并不高，但是这个社会上到处都是墙壁，没有一道门为他开过半扇。我后来问过一个朋友，得到的回答是："大学毕业生，不敢碰。"别人以为"小事情不敢请大学生屈就"，而大事情却又被有势力的人"捷足先登"了。这是一个普遍的悲剧。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要个别地找到个人的出路，似乎很艰难。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勉强做出笑容，对这位朋友说了不少安慰和鼓励的话。他好像渐渐地兴奋起来了。但是从咖啡店出来，我和他在街口握手告别的时候，我仔细地回想到刚才对他说的那些话，我又有一种痛苦不安的感觉。我的那些话对他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我不是白白地浪费了他的光阴么？

我回到编辑室，看见写字桌上有一封从北方来的信，也是一个不认识的朋友写的，我拆开信，取出那几张作为信笺的稿纸，我忽然胆怯起来，我不敢看它们，我就把它们揣在怀里。

① 咖啡店：指街角的"安乐园"。当时有人找我或靳以谈话，我们常常约他或她在那里见面。

过了一阵一个电话打来，要我再到我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有人在那里等我。我匆忙地走到无轨电车的站头。无轨电车又把我带到先前来过的地方。我又登了五十级楼梯走到三层楼上。在这里我和不曾约定而无意间碰在一起的几个朋友，谈了将近一个多钟头的闲话。我又应该回到一点多钟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因为那边还有朋友等着我一道吃饭，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了。我从这里邀了一个朋友和我同去。

我们到了一家广东饭馆①，另一个朋友②交了一封信给我。一位患着肺病而不得不在南京一个机关里当小职员的友人③用快信告诉我，他的太太死了。一个影子在我的眼前掠过。我恍惚地看见了死的面影。我的心变得沉重了。我和这位友人两年多不通信了，和他的太太分别还是四年前的事。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平的一个秋天的傍晚，那位脸颊红红的年轻太太，从她的母家小心翼翼地抱了新缝的铺盖到公寓里来，那情景还非常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这一对病弱的夫妇给了我不少的友情的温暖。我更不能忘记他们送我到车站的情景，那一天我们谈了许多话，但以后这些都成了春梦。我离开了他们，飘游了不少的地方，回到上海住了将近一年以后，在这个上海的秋天的傍晚，却意外地得到他的信，知道他的太太"在上月二十五日傍晚已经死去了，她想挣扎再也不能挣扎地向生活永诀了"。那位朋友接着还说："她临死的时候还说：她

① 广东饭馆：指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的"新雅"。

② 另一个朋友：指靳以(1909—1959)。

③ 友人：指缪崇群(1907—1945)。

死，我将是世界上一个最飘泊的人。我飘泊到什么地方去，又为什么要飘泊，她就没有给我接说，连我也不知道！”

我反复地读着信，我几乎当着几个朋友的面流下眼泪来，但是我终于用绝大的努力忍住了。我甚至开始大声说笑话。我似乎完全忘记了朋友的事情。然而在我的眼前还不时晃动着那两片红红的脸颊，和那一张苍白色的瘦削的脸。

我们在饭馆里坐了一个多钟头，安静地走出来，看见街上飞驰的兵车和惊慌的行人，才知道一个重大的“事件”突然发生了。一些市街在“友邦”军队①的警戒下断绝了交通。我看见了不少的枪刺，绕了不少的圈子，并且靠了一个黄包车夫的帮助，才回到了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那个北方青年朋友的使人感动的信函。我也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他写了回信②。我还继续写我的长篇小说③。这些时候外面静得如在一座古城，只有一些兵车的声音来打破这窒息人的沉寂。我一直写到凌晨四点多钟。

朋友，你看，对于你那两页信笺我所能答复的就只是这最后的两行。（你说：“我很愿意知道你现在的情形，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故事罢。那么我们中间会了解的。”）我只能够简略地告诉你一点点我的生活情形。你看我是一个多么软弱无力的人，而且我过的又是多么平凡的生活啊！

你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你说：“你给

---

① “友邦”军队：指日本海军陆战队。

② 回信：见《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

③ 长篇小说：指《春》，当时在《文季月刊》上连载。

了我生活的勇气。你给了我战斗的力量。”朋友，你把我过分地看重了。倘使你真的有那勇气，真的有那力量，那么应该说是社会把你磨练出来的。你这个“陌生的十几岁的女孩”，你想不到现在是你给了我勇气，使我写出上面那些事情的。那么让我来感谢你罢。

1936年9月。

关于《春》*

我自己是爱《春》的。你奇怪为什么会有那许多懦弱的人？你问我为什么要“残酷地把他们表现在纸上”？我看见的那样的人太多了。我的兄弟姊妹中大半都是这样的。唯其懦弱，才会被人逼着做了不必要的牺牲。那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到现在还不能从我的心上消去，然而他们早已灭亡了。我看得很清楚。他们是不该牺牲、不必牺牲，而终于做了不必要的牺牲的。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这在前几年还是很普通的事实。甚至前几天我还收到一个年轻人从内地寄来的长信，叙述着和这相类的事。

我在《忆》里面写过：“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的灵魂。……黑影渐渐扩大起来，跟着它就来了许多事情。一个打击之上又加上第二个。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最后就是悲剧的结局。一个一个的青年的生命横遭摧残，有的离开了这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忆给别人；有的就陷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那许多的生命，那许多被我爱过的生命在我的心上刻了深的迹印。我能够把他们完全忘掉么？我把这一切已经埋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青年界》第十一卷第一号。

葬了这么多的年月，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这样长的梦？这样痛苦的梦？甚至使我在今天还提笔来写《春》……”为了这些年轻的生命，我应该写一部小说，以后我就把他们完全掩埋了。

1936年11月。

我 的 路*

朋友，想不到我在《大公报·双十特刊》上发表的文章这么快就得到了你的"响应"。你的短短的信函很使我感动。我应该感谢你，因为我的确需要一些在暗中监督我的朋友，何况现在写这信来的又是我素来佩服的你。

的确我不应该用伤感的调子来叙述《我的故事》，我不应该用这么软弱的信来回答一个充满着热情和勇气的孩子。我的那文章的结尾本来应该照下面的样子写的：

> 你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你又说："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你给了我战斗的力量。"朋友，你把我过分地看重了。倘使你真的有那勇气，真的有那力量，那么应该说是社会把你磨炼出来的。你这个"陌生的十几岁的女孩"。倒是你说了正确的话："去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把我鼓舞起来，使我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路途！在这半年的战斗中我得着不少的活知识与宝贵的经验。我抛弃了个人主义的孤立状态而走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流》第一卷第四期。

集体的生活当中。我爱群众，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是的，我要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劳苦大众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献给他们。”你看，现在是你来给我勇气使我写出上面的那些事情的。那么让我来感谢你罢。

朋友，你知道我，我的文章全是在匆忙中写成的。我常常连修改的余裕也没有，所以我往往不能够把我的意见解释明白，以致为人误解。最近居然有人在小报上大谈我的“悲哀”了，据说我“永远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一线的光明”。而说这话的人却似乎是永远生活在光明里面的。

朋友，你不要惊奇，的确有人说过了那样的话。不但这样，连我自己前些时候也还在一封信函里写过：“有许多不认识的青年朋友写过信给我，他们把我当作一个诚实的朋友看待，告诉我许多事情，甚至把他们的渴望，他们的苦恼也都告诉了我，但不幸的是我并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话语是没有力量的。……”在答另一个朋友的信里我又说：“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叫你马上去交出生命。”而且在《激流·总序》里我还明白地宣言：“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

我说的确实都是真话。我的意思也不能够说是十分隐晦的。但是它到了另一种人的耳边眼底却变成另外一种意思了。他们居然从这里看出了我的绝望和悲哀。而且他们很有把握地断定我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到光明的路。……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驳倒了我。还有几位京派学者和革命家在我的

文章里看出了许多流泪的地方，就断定说我是一个找不到光明而终日悲哀的人。

朋友，你看，这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把文章写得更显明一点，使别人不会误解我。你知道我并不是悲观论者。固然我往往在文章里提过流泪的事，而且我小说的主人公也常常含着眼泪去贡献种种的牺牲。但这样的流泪不是绝望的哭泣。头脑清楚的人在绝望中不会落泪的，只有小孩遇着悲痛的事情才放声大哭。我知道许多人，他们在被感动的时候往往会淌出眼泪来。我自己看见了别人的慷慨的牺牲或任何大量的行为也会因为感激而下泪。在那种时候我一点也不绝望。我看见的倒是一线光明，而不是无边黑暗。

我自己是有了一条路的，而且我始终相信着这一条路。这十多年来我看见了不少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在路上倒毙了，有的掉转身子朝另外的方向走去。我自己从来不曾走过一步回头路。我也曾见过不少的事情；我也会运用我的思维。倘使我永远在黑暗中摸索，我决不会像这样的活到现在。

历史绝不是骗人的东西。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近百年来种种的进步很显明地给我们指示了道路。道路是有的，而且很显明地摆在我们的眼前。我还不曾近视到把德国元首和意国首相看作世界的唯一救星的地步。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社会的进步有快有慢，这是事实；这进步有时明显，有时却也潜伏不现。除非人类日趋绝灭，或者社会的演进停止，否则我的路永不错误。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路，这是所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的路。这也是人

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路。有人把路分为两条：一条通自由，一条向专制，但后一条并非必经的。事实上我也给人指出了一条趋向自由的路，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到尽头，那却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但那条到自由的路不会在我的眼中脑里变成模糊，却是我可以断言的。

我曾经在几篇文章里重复地用过“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句话。这是事实，许多人都感觉到的。自然那些爱说漂亮话信口乱谈别人的悲哀的人会把黑暗当作光明，将一条窄巷看为康庄大道，向专制的路上去找自由，在封建的空气里做解放的梦，写几则文坛消息便自夸为服务了劳苦大众。但我们不会去管他们。社会必然会撇开他们而径自走它的发展的道路。漂亮的话是经不了时间磨洗的，时间犹如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许多人的原形。真的，在今天谁还可以拿起笔，大言不惭地对所有的人说“我面前就是那条唯一的到光明去的路，你们都跟我来”呢？

我自然没有这样做过。我没有这胆量。我的良心不许我这样做。说一句话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但重要的却在知道这样的话会生出什么样的影响。在我的全部作品里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我的路。事实上我的确把路放在读者的眼前。我对一些青年朋友说，我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明确的路，这只是半句话，下半句的意义更是重要。主要点乃在我不愿叫他们“马上交出生命”，也不想自己去贡献巨大的牺牲。

我自己说得很明白：“从这里走到那黎明的将来，这其间是需要着许多许多人的牺牲做代价的。”我又说过：“把个体的

生命连系在群体的生命上，在社会发展繁荣的进程中决不有个人的灭亡。”在这时代是没有个人的出路的。要整个社会、民族、人类走上了康庄大道以后，个人的一切问题才能够得着适当的解决。我说过社会的进步不会停止。它永远沿着曲折的路走向光明。但是我们可以推动它，在可能范围内使它早日达到目标。倘使一个青年来要求我指一条路，那么我就应该叫他把自己的一切拿去贡献给为社会、为民族、为人类的工作。这就是说牺牲。牺牲是一定有效果的。但这效果在将来，也许我们一生也见不到。求自由的人常常是得不到自由的。得到自由的当是后一代的人。所以那个女孩子说得好：“我要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劳苦大众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献给他们。”这是一条很明确的路。我至今还坚决地相信着。

但是朋友，你知道我，你想，当一个纯洁的孩子怀着温柔的心来向我叙说他或她的苦闷的时候，我能够严肃地回答说：“去，把你所有的一切全交出来。把你的青春和生命都去牺牲！”虽然这是唯一的明确的路。但我望着可爱的无邪的面庞，我的口究竟说不出这种话，当我回答一个朋友说：“你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或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时候我的苦痛是别人所想象不到的。话语很平凡，但是每个字都有严重的意义。在今天要交出生命的确是太容易了。只要多说两句话也可以使自己变作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也有过许多经验，我也知道许多事情。要叫一个年轻人牺牲生命，

这是谁都可以做到的事。这二三十年来中国的祭坛上不知道接受了若干万的年轻的牺牲！但是我太软弱了。我爱惜他们，因为我自己也还是一个青年。即使轮着每个青年都必须到这祭坛前来贡献牺牲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使我们的生命"像落红一样化作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花朵"。所以我虽然不曾叫我的年轻朋友去交出生命，但我也并没有带着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光明。就在一个月前我还坦白地对一个朋友说过：

> 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面前。……那路你自己也会找。

我自己并不曾在黑暗中悲泣。在许多篇文章里我都明白地说我瞥见了一线的光明。横贯着我的全作品的就是那条到光明、到自由的路。走这条路是需要着大的勇气和牺牲的。我如此真实地告诉了我的年轻的读者。我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去决定。我绝对不是青年的导师。我只是一个和他们站在同等地位的友人。

朋友，我要结束这信函了。我手边一个抽屉里还有那么高的一叠信件。我应该把它们一封一封地翻开来回答。我现在随意地抽出一张信笺，一颗可爱的青年的心在纸上跳跃着。朋友，我抄一段话让你看罢：

> 我们有一个同学，不幸在大考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同时她嫌她的家庭太官僚派，她已经到广东去了。她不会再回来的。但她写信来说，她过得很快活。她勇敢地去

做一切。不要一点同情与怜恤。现在她带出去的钱快完了。但是她来信说："在我没有饭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快乐地发笑的。"我们不知道她在哪里。信是由别人转。您说这样是不是青年人所适合的？

朋友，你看这也是苦恼着我们的青年的一个问题呢！

我休息一下，还要来回答这一个青年朋友的信函。我们再会罢。

1936年10月。

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

朋友，你一定想不到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面读了你的来信的。那天晚上我和三个朋友从一家饭馆里出来，走在一条热闹的街上。行人非常拥挤，一些人带着张惶的颜色匆匆地走过，一些人用激动的声音谈话。一辆一辆的大卡车载了说着异邦语言的兵士①向前飞驰去了，留在我眼前的是发亮的枪刺。我不知道这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朋友们走过了两条马路，便轮到我跟他们分别的时候了。我一个人坐上了黄包车，年轻的车夫拉着我朝我每天经过的马路跑去。但是前面的枪刺把我和车夫拦住了。我们折了回来，绕一个弯，但是在另一个街口我们又给阻挡了。一辆大卡车停在一个建筑物的门前，一队全武装的兵正忙着出发，沿着那条冷静的街道有三个兵士带跑带走地装置军用电话。我们绕到第三个街口，远远地就听见人们嘈杂地说：前面通不过。我已经绝望了，但是车夫还没有失掉勇气。他拖着车绕了一个大圈子，跟着那些装电话的兵士跑了一大段路。沿途只有寒冷的风和急促的皮鞋声。我看不见其他的人影！我冷清清地坐在车上，看见这些使人疑心是梦的景象，我不由得想起了许多事情。然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三期。

① 说着异邦语言的兵士：指日本兵。

而这一次我们意外地通过了枪刺的中间，并没有受到留难。我终于安全地到了家。我应该感谢那个车夫，倘使没有他，我一定找不到这条回家的路。

到了家，坐在我的亭子间里，我从衣袋里摸出你的来信，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它。你说：

> 这里的事太多了……我家附近有三家土药店（公卖大烟），两家高丽人的白面房子——里边的人公然敢将马路上的小孩子抱进去叫他家大人拿钱来赎。伙计将铺子的图章偷偷地拿到他们那里盖个印，他们便声明这铺子欠他们多少债……太多了，太多了。

你又说：

> 他们用了科举式的办法笼络年轻人的心。许多青年忘了隐在那般人身后的皮鞭，很高兴地一帮帮入了圈套，一个个挺了胸脯把证章在人前显耀着。……那般人巧妙地用读经社的名义来收买喽罗，只要赞成读经，每星期做早课似地转一遭，那你的职业很容易地就解决了。这样也收去了一部分自命风雅的人。他们现在学做七言诗，学填词，学写什么柳体赵体字；学校里也竭力提倡文言。我真不明白他们那般人居心要把青年送到什么地方去！……

朋友，你还看不清楚他们是企图来把所有的青年全变成古董么？古董是点缀太平的东西。然而我们已经不是处在可

以搬出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我们民族的光荣的时代了。朋友，你也该想得到你的话何等强烈地引起了我心里的共鸣！

但是在你来信的末尾我读到了这样的一段话：

> 你去上海之后，对于你的行动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不过显然有一种倾向：要搅入无谓的笔战里。北方的青年很为这件事忧愁过。这里连话都不准说，在上海的人却在嚼舌头，内争，内争，有什么好争，北方读者读到那些文字心更凉了些。……

这一段话是我料不到的。可是我读到它，我几乎要落泪了。这时候窗外正响着兵车的隆隆声，一个不可知的奇怪的命运在前面等着我们。也许明天我和这周围的一切都不会存在了，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个我并没有一点害怕。但是一想到和我同时代的无数的年轻的心，我总有一点留恋。朋友，甚至在最后的一刻，倘使我还有一点点力量，我也要拿来给年轻的心添一点温暖。所以我无论如何要静下心来给你写这封信。

朋友，你得相信我，虽然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还不曾有过见面的机会，但你总多少知道一点我的为人。你想在这种时候我还有心肠来从事无谓的笔战么？……

朋友，你们北方的青年可能对上海文艺界的情形不大了解。我自己并没有参加最近的文艺论争，但我得说一句公平话，这绝不是无谓的笔战，更不能说是“内争”。这论争对于新

文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有许多问题是要经过几次的论战后，才逐渐地明朗化而终于会得到解决的。倘使没有一切过去的论争，我们的新文学还能够发展到目前的这个阶段么?然而我并不曾写过关于这种论争的文章……

朋友，现在已是三点一刻了，外面静寂得如在一座古城。兵车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明天的事情怎样，我不能够知道。然而你对于甚至在这种时候还拿起笔给你写信的我将怎样地说话呢？你还忍心责备我在嚼舌头么？但是，朋友，请原谅我，我绝不想做一件使你们忧愁、使你们心凉的事情。

朋友，我要结束这封短信了。我手边一个抽屉里还有那么高的一叠信件。我应该把它们一封一封地检出来重读后写回信。我现在随意地抽出一张信笺，一颗多么可爱的年轻的心在纸上跳动。朋友，我抄一段话给你看罢：

> 我们有一个同学，不幸在大考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同时她嫌她的家庭太官僚派，她已经到广东去了。她不会再回来的。但她写信来说，她过得很快活。她勇敢地去做一切。不要一点同情与怜恤。现在她带出去的钱快完了。但是她来信说："在我没有饭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快乐地发笑的。"我们不知道她在哪里。信是由别人转。您说这样是不是青年人所适合的?

朋友，你看这也是一个苦恼着我们青年的问题！请你想想看，我应当怎样回答这个南方青年朋友的信呢?

1936年9月。

给一个孩子*

一

我很早就答应了给你写这一封信，却没有料到一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提笔，我不说什么求你原谅的话，因为我想这是多余的，你一定可以了解我，虽然环境、教养，甚至年龄在我们中间画了一道鸿沟，但是有时候我也可以跨过那样的距离，在你们的境界里逗留片刻。我和别的人一样，我也曾做过孩子。我知道你们的渴望和苦恼，所以我可以坦白地对你谈话。

你对我谈起你那个同学的事情。你说她因为“大考时有门功课不及格，同时又嫌她的家庭太官僚派”，便毅然离开家庭和学校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你说她来信告诉你“她过得很快活，她勇敢地去做一切”，不要同情与怜悯。你说她带去的钱现在快完了，但是她来信还说：“在我没有饭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快乐地发笑的。”你告诉了我这些事情，你问起我的意见。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回答，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已经在你的心海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涛。你的狭隘的经验不能够安定你的心。你如今站在十字街头了。从你那两页来信里，我读出了你并未告诉我的话。我知道一个希望引诱你在思想上走了长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中流》第一卷第十期。

远的路。但是我还不明白你如今停脚在何处。你也许已经走到一个交界的地方，要是你有充足的勇气，你甚至会从理想一步就跳到实行。你会像你的同学那样，不找别人商量，一下子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只凭着一点热情和勇气，冲进这个五光十色的社会里面，并不计较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倘使我的推测不错，那么我觉得就应该给你一个警告了。但是你不要误会，不要以为我就赞成现在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不要以为我就偏爱大家庭。我绝对不会。我只想提醒你，使你把周围的情形看得更清楚一点。我说过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在羽毛还未丰满的时候，一只小鸟是不能够远走高飞的。天空固然广阔，但到处躲着那些凶猛的老鹰，它们具有尖锐的眼睛和锋利的嘴爪，准备着捕食一只迷途的幼禽。

我说的全是平凡的话，我知道这是年轻的孩子所不愿听的。最近我劝阻过一个十七岁的孩子逃出家庭。她坦白地对我说，她料不到我也会说这种平凡的话。这使我痛苦：我说了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但是我仍然不得不这样说。这是可悲的真实。然而我还可以说这并不是完全绝望的。

那个孩子终于没有离开家庭，并不是我的话发生了效力，主要的是环境阻止了她。她有两只手、一个聪明的脑子和一个强健的身体，她还有勇气做任何繁重的工作。但是她找不到一个可以工作的地方。现在她自己也知道倘使事前没有准备，也不曾得到别人适当的援助，那么在这茫茫的社会中她究竟逃向何处去！美妙的幻梦在现实的无情的打击下渐渐地破

碎了。

但是记住，我说过事情并不是完全绝望的。这现实的环境也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那个孩子虽然放弃了她的出走的计划，可是她对于自由与活动的渴望还是像火一般地炽热，她留在那个被她看作“狭的笼”的家庭，并不是她甘愿从此做一个屈服的奴隶或者没有意志的玩偶。不，我劝阻她的本意也绝不是这样。我说她应该像一只小鸟，永远怀着冲进自由的天空里去的雄心，只等着羽毛丰满的时候的到来。我劝她：目前应该忍耐。是的，我说出了连我自己也害怕的这两个字。我恨我自己没有力量。但是要改变现实的环境，一个人的力量也很微弱。那就要靠集体的力量了。我讨厌“忍耐”，然而有时候我却不得不劝别人忍耐。这个意思很容易被人误会。不过我还可以相信自己。我说忍耐，并不是指长久的屈服。我的意思却在于“对于未来胜利的准备”。无益的牺牲是必须避免的。我们应该留着这生命和精力来贡献给更大的事业。既然我们有志向要做一两件有益于社会、民族和人类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得想到未来的长久的岁月。不要把一切的希望都付托给一时热情的冲动，决定一个计划还得靠一副冷静的头脑。倘使某一个女孩在家庭以外就没有可以信任的朋友，她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又是完全陌生，或者她已经进了学校，在学校里她自然会认识一些同学，这些孩子也许都不能够给她帮忙，那么要是有一天她忽然被什么事情感动，睁开了眼睛，再不然她因为一时的气愤，或者一时感情的冲动，她觉得她不能够再在家庭里和学校内住下去了。她不愿意再过那种寄生的生活，

她不愿意再留在顽固的父亲的威权下面过日子，她要跑进那个广大的世界里去，靠着自己两只洁白的手和一个正直的灵魂，建立一种合理的新生活。她的眼光是正确的，她的志向是伟大的。我们绝不能够在这个孩子的热情上浇一瓢冷水。于是她实行了她的计划，她带走了一点钱，够维持她一两个月的生活，就像你的同学那样。她走进了这个陌生的社会，她遇见了一些陌生的人，她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工作。她带走的钱不久就用完了，却没有做出一件有益的事情，而且甚至不曾遇到一个指路的人。自然在这个社会里可以帮忙她给她指路的人是有的，但是他们连她的名字也不会知道，她更无法找到他们。她更有机会遇见一些骗子。这时候，你想她应该怎么办？固然你那个同学说得好："在我没有饭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快乐地发笑的。"但是她不会笑多久，只要饿上三天，她就不会笑了。以后她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落在更悲惨的境地里，就是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去。这种事情是真正发生过的，我见过，我听说过，报纸上也记载过。我还记得某一个男孩的不幸的遭遇，这是三四年前的《申报》告诉我的。我还看见几个朋友起初从反抗现社会制度的路出发，而终于走到拥护现社会制度的路上去。他们缺乏冷静的头脑，缺乏坚强的信仰，只凭着一时的热情要去冲破现社会的藩篱，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壁以后，他们便厌倦了，认为自己的理想错误，索性走到守旧的路上，让生活的担子压倒他们。他们并未曾改造社会，反而被社会改造了他们。这是很可悲的，但又是真实的事。他们归罪于理想，而其实应该责备的却是他们自己。他们当初

如果看清楚一点，脚步走稳一点，也许就有更好的结果。一件重大的事情要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才能够有成就。要先下了种，然后才有收获，我以为做一件事情，也应该有步骤，有方法。一座大厦绝不能在一天里面造成，我们也无法只花一天的功夫就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目。要获取一个人的自由，也不是一天的功夫就可以做到，所以尽管我自己常常不能够忍耐，有时候我也拿“忍耐”来劝人，倘使那个人除了忍耐，在目前就没有出路的话。我说的“忍耐”是准备，不是劝人苟且偷安或者坐等机会，而是劝人自己去造机会。自然，要是一个人遇到了再也不能够忍受的情形，那么纵然是孤注一掷，我也只得由他或者她冒险去试一试。这尝试有时也会得到意外的成功。即使得到的会是失败，但轮到必须贡献牺牲的时候，一个人是不应该踌躇的。同样，倘使我们还可以用更好的方法获得更好的结果，我们就应当采用更好的方法。我翻译过一篇真实的故事，叙述六十年前一个俄罗斯女孩子怎样获得了知识与自由①。这个十六岁的女孩从守旧的家庭里逃出来，走了七十里以后，终于被父亲找回去了。这自然是一个大的失败。但是那个松尼亚并没有绝望。她忍耐地住在家里，设法找到了帮助她的人，商量好另外一个办法，最后她靠着这个办法安全地离开了家庭。自然年代、地域和风俗等等的差异使我们的孩子不能袭用那种办法，但这个事实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

① 见英国 J.Prelooker 著《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收在我翻译的《门槛》内（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版）。

啊，我记起来了，你最近来信告诉我，你那个同学到了她姐姐那里，得到姐姐的帮助，进了另一个学校。自然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这也许并不是她的本意，也许后一个学校并不比前一个学校好多少。但这究竟是一个好消息。她免得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庭去受更严厉的拘束了！有时候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形里也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但那是偶然又偶然的了。我们不能够轻易和“偶然”打赌。我们更不应该劝人这样做。我们应该采用的却是那些更有效、更有把握的办法。

我为你写了这许多话，这些话不是对大家说的，因为对大家它们就不适用了。这些话是对个人说的，是对你们这些孩子说的。所以我愿意说得实在些，但也不免杂乱些。这样的话我已经对五六个人说过了，我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效力。我想你也许会明白它们。那么我愿意知道你对它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倘使你以为我说错了话，那么也请你记住，我说这些话也是出于好意。是的，我觉得我的揣测有错误了，我重读你最近寄来的一封信，从那封信里我看出来你并没有步你同学的后尘的意思。那么请你原谅我。

1936年11月。

答一个“陌生的孩子”*

你不把地址和姓名告诉我，却指定要我在某一个刊物上写几句回答的话。现在我在这里拉杂地给你写几句。我占了《中流》半月刊“补白栏”的地位，我应该请编者和读者原谅。

你看见我《给一个孩子》的那封信吗？对你我也不想再说那些话。你要知道你们前面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你们前面还有无穷尽的岁月。你今年才十六岁，那么你应该想到你会活到六七十岁。所以你还有五六十年留给你自己来处理。譬如说要为将来建造那一座高塔，你就得一级一级地从底层建造到上面去。这也许会花费几十年的功夫，但不要紧，反正你还有充分的时间。不要因为一天里做不出需要几十年功夫做成的事情就灰心：一个十六岁孩子的手腕也做不出应该由壮年人来做的事业。黑暗和寒冷只是一时的现象。你记住在这以后便是光明和温暖。现在是冬天，我刚才从外面回来，还被一阵冷风割着脸发痛。但是春天不久就会到来的，我相信春天会到来的。我曾经在暴风雨下面走过十多里路，我一身的衣服全淋湿了，我的脚也很疲乏；前面是一片雨水，我望不见一个避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中流》第一卷第十一期。

雨的地方，我咬紧牙关不顾一切，一步一步忍耐地走着。我相信我一定会达到目的地，后来我终于达到目的地了。那场雨很可怕，但是我不让它迷了我的眼睛。你的同学们不得不把她们心爱的小说烧掉，然而新的书报又会来到她们的手里。你不能够编副刊并不是损失，因为你更应该把时间用来体验生活和研究学问，或者做点更有意义的事。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所知道的究竟有限。我不愿意你做一个“神童”，我却希望你成为健全的人。在报纸副刊的编辑室里，你一个还在初中读书的学生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或者给别人一些什么呢？你在这样的年纪就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选稿校稿”，你就不为将来着想么？我们姑且把人生比作一个战场，那么你这一个兵士，你把什么武器带到战地去呢？无论如何你总应该带点武器去攻击敌人、防卫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正确的知识，便是最好的武器。但是你还得从别处找来这样的武器，况且你现在又有很多的机会。你要明白我不是在压抑你的热情，我也不想在你的头上浇冷水。我只想安慰你、劝导你，你要用生活的经验和正确的知识来指导你的热情。

关于我的生活，我不想告诉你们什么。谢谢你们大家的关心，我更感谢你的祝福。你问，你应该拿什么话去转告你那些朋友，那么你对他们说，我活得很平凡，活得很好，而且活得很硬。

1937年2月。

给一个中学青年*

一

我接到了你的信。我很能够了解你的心情。在这些日子里我的悲愤和你的是同样地大。你不久会读到我的一首题作《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①的诗。我居然写了那样的东西！我虽然还不曾读到你所写的那些，但是我想和我写的也不会有两样。你看，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了。

然而我把你的信反复地读过几遍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压下我的激情，用冷静的头脑来对你讲几句话。

生在这个时代中我们没有悲观的理由，而且也没有悲观的权利。生活的路很长，我们却只走了开头的一小段，我们还要经历更惨苦的岁月和更艰难的日子。但是我们一定会经历了这一切而活下去。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作为一件奢侈品来点缀太平，我们是作为一个劳动者来辛勤地工作，在荆棘中开辟一条平坦的路。正因为有荆棘，才需要我们来开路，表现我们的工作能力。只要我们有能力、有毅力来工作，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中学生》第二十一号。

① 见《全集》第十二卷。

荆棘便不会是我们的危险的仇敌，因为我们可以克服它。同理，这个黑暗时代正给我们一个奋斗的机会，一个可以表现我们的力量的机会。显然的，在黑暗的后面便隐藏着光明，只要我们能够把黑暗扫去，我们就可以看见光明时代的来临。所以在目前我们应该快活起来，以快活的心情从事工作。

我们的面前横着一条路。我们的确是有路可走的。这条路太明显了，我们只要把迷住我们眼睛的烟雾扫开，我们就可看见它。我们现在应当注意的是不要让烟雾迷住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眼前的烟雾太多了。

的确我们是有热情而未经世故的孩子，所以我们过于相信别人，结果是我们常常受了骗。我们现在应当走我们自己的路，不要盲目地跟着别人走。

我们的年纪太轻了，我们在生活里也还应该有些享受，至少这读书的权利我们是应该有的，因为知识是人人应有的东西。假如时代真不容许我们有些微的享受，目前的时势真要逼着我们去牺牲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去的地方也并不是东北的战场，如某一些人所说的；那里应当让人民供养的军队去。我们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民间，在那里有千千万万的人需要我们的帮助，只有他们才是最痛苦的。那些在洪水、旱灾、兵祸下苟延残喘的人的悲惨的生存是没有人顾念到的。要是我们能够走入中国的腹地去看看那些人的生活啊！然而我们并没有去看过。而更可悲的是他们实际上负担了我们的生活费用。

总之，如果目前的时势真正逼迫着我们放弃读书的权利

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并不是去向军阀请愿出兵和跟买办阶级商量经济绝交。我们的工作是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农村。在那里，在那些真正负担着整个中国的生存的人民中间，我们会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的幸福怎样才可以获得。他们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他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那就是我们的路。如果他们还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人过问，那么中国是绝不会得救的。

1931年9月。

二

五年了！这五年来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面过日子，我们记得很清楚。我们绝不是健忘的人。不仅白山黑水、广漠的原野、浓密的松林、肥沃的土地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且在那边铁蹄下面挣扎的我们兄弟们的呻吟和呼号，依旧洪亮地响在我们的耳边。我们不会辨别不出兄弟们的声音，我们更不会听见他们的声音而不感动！这几年来我们的确含着眼泪、怀着热血大声疾呼地响应过了。

五年了，我们的呼喊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效果。而那个威胁着我们民族的危机却是更加紧迫了。一只魔手紧紧地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浓黑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个沦亡的命运摆在我们的眼前。到处都听得见徬徨的呼号。这五年来我们似乎一天一天地往一个无底的深渊里沉落下

去了。

但是，甚至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我们依旧没有失掉我们的自信力。在今天抗敌图存的呼声比在任何时候都更响亮了。便是在最辽远荒僻的地方，也有一些兄弟们像赴盛筵一般地参加抗战。这一次我们用事实证明我们还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我们的集合的努力可以将我们的命运改变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五年前我们就说过，那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的确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我们已经流了够多的眼泪，现在我们应当来笑了。我们笑，不是因为我们快乐，而是因为我们需要快乐。我们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所从事的斗争是需要着众多的牺牲的。但是痛哭流涕、慷慨悲歌不一定就有利于艰苦的工作和伟大的斗争。真正的战士便是在就义的时候也还谈笑自若。我们这民族素来以坚忍沉静著称，那么即使轮着我们来交出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勇敢地大笑几声么？

五年了！这五年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忘记。血的创伤不能够让时间磨洗掉，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笑一次。我们的笑声要飘到白山黑水那边，飘到广漠的原野、浓密的松林、肥沃的土地那边，飘到我们的兄弟们的耳边。让他们听见他们所熟习的亲爱的兄弟们的声音而得到安慰和鼓舞罢。让他们也跟着我们痛快地笑一次罢。这五年来我们让他们在铁蹄下面过够惨苦的日子了。

1936年9月。

家*

隔壁房间里的挂钟敲过两点了。夜很静。亭子间里只有闷热，甚至在这时候也没有一股凉风吹进来。我的窗户大开着，可是房里桌上连那些散乱的原稿纸也不动一下。窗外隔一堵矮墙便是市街，这街如今也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了。忽然楼下起了响动，一阵轻快的脚步沿着楼梯溜上来。有谁来看我么？我刚刚侧耳倾听，一只猫的叫声在屋顶上响了。

朋友，你会奇怪为什么在这时候我还不睡觉？在这夜深我还坐在书桌前面做什么呢？朋友，你大概想不到我在读你那《旅行之书》罢！

五个月前我在一篇短文里曾提到你们的小刊物，我说："那刊物我每期都非常热爱地读过，我甚至在那些平常的字句间看出了我十多年前的面影来。这时候我好像受着一次祝福。"这并不是虚伪的话，你们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也有过一些疑惑不安的日子，而在那些日子里我还从你们的信函中得过安慰和鼓舞。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作家》第一卷第五期。发表时题为《短简》。

你该不会忘记罢，——我知道你的心并不曾忘记，因为你在《旅行之书》里面还提起了《南国的梦》，——三年前我在日光岩下的旅舍里含着眼泪给你们写了怎样的一封信。那事情对于我就像在昨天发生的一般。我和洪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那地方狭小而闷热。触鼻的臭味从四面送过来，桌面上涂着一层油腻，有一两处还积了污水。苍蝇在我的头上飞舞。我们要的菜饭许久不来。在等待的时间中我们一面揩拭额上的汗珠，一面谈论着你们的事情。渐渐地我忘了肚饥，忘了这一天长途的奔波，忘了前面的新的路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一种力量把我突然抓住了。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身体内满溢着，膨胀着。我的全身发起热来。我不能够控制自己，我的话语成了断续。泪水迸出我的眼腔，又流下我的脸颊，我并不去揩拭它们，而且我也想不到去揩拭了。我们匆忙地吃了饭，急急走回旅馆。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无论如何不能够静下来。我忍耐不住又谈起你们，话语不能够使我满足了。这一次我拿起了笔给你们七个人写信。在落笔的时候我常常看不清楚我的字迹，是泪水迷了我的眼睛，我畅快地哭了。我的这种眼泪是那般以“捧”和“骂”两件法宝来“服务文坛”的人所不能了解的。他们看见“哭”字马上就想到了“泪人儿”，甚至想到了“灰色”、“感伤”、“绝望”。因为他们一生就没有机会来知道还有另一种感情使得人哭的事情，虽然他们会说什么“斗争”，什么“集体的行动”一类漂亮的话。但你们不是这类的人，——请原谅我，我不该在你面前提起这一类人——你们是了解我的眼泪的。在那封信里我说在你们中间的一个星期的生活就

像是一个美丽的梦。我说我实在不愿意离开我所敬爱的人去过那种所谓文人的生活。我说，白纸上写黑字算得什么，我的血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儿热气！我说，我愿意做你们的一个渺小的忠实的信徒，我一定要你们知道我这时候的感激的心情。我说，我的心还在你们那里，我愿意把我的心放在你们的脚下给你们做一个柔软的脚垫，免得你们的脚太费力。

倘使没有仁来，我这封信不晓得会到什么时候才完结。但是仁毕竟来了；他的来使我们又有了愉快的谈话。我把信托他带给你们。第二天我就和洪往更远的地方走了。

一个月以后我一个人又回到日光岩下面来，却没有机会和你们相见。我在公园里浪费了半天的光阴。直到动身前四五个钟头天和另一个朋友才找着了我。这一次我们攀登了日光岩，在那顶上眺望着美丽的海，把荔枝壳一粒一粒地抛到下面海滩上去。我这时候又谈起你们，我们整整谈了两个钟头。然而时间不容许我再在这里逗留了。我怀着苦痛的心情到了船上。在一次的紧紧的握手以后，我还站在栏干前面，望着他们的坐在划子上的背影。我痴痴地望了许久，忽然一个“家”字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我想他们是回“家”去了。一阵寂寞和留恋的感情压倒了我。我仿佛是一个被充军到异域去的人，现在永离他的家乡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便是三年。如今在三年以后巧合地我在你的《旅行之书》里找到了那个“家”字，还找到了这样的话：“相思树，那些在路旁、田畔、山岗——各处呈现着哀愁缄默的形容的相思树清晰地映入我们的眼帘来，我们便不由

得想起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句，于是我们中有些人更是沉默了起来。……”朋友，你说你们看见那些树林时便想到了我的那本书，因此又使你们——想到了家。你甚至说：“待到车轮转动的当儿我们真不知是情何所依了。”我读到这样的语句时那强烈的渴望的火又把我的心熬煎起来。三年的变动的生活并不曾使我的渴慕减轻几许。我的心依旧系在你们那边。我这个游子任是走遍天涯地角，我的心还是依恋着家。而且只有想到家时，我才有勇气活下去！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呢？你不知道我这时是多么地羡慕你们呵！

猫早跑去了别处。街上有一辆汽车轻轻地驰过。但很快地一切又复归于静寂，而且落在更深沉的静寂里去了。在我的面前摊开着你的《旅行之书》。亭子间里的陈设慢慢地隐去。代替它们的是那些相思树，在路旁、田畔、山岗——茂盛的生长着的相思树。我的心跟着你们的脚步走。但是我愈走离家愈远了。怎么？我又回到江南来！而且又巧合地找到了下面的话：

> 走了长远高低的路，出了满身的汗，费了许多力，我们终于找到了师复墓，我们找到了师复墓，是如何地欣慰呵！
>
> 落叶掩埋了一切，树枝遮蔽了天空。除了背后石壁上的“师复墓”三个绿字尚可辨认外，壁上的中文碑文和坟面的世界语碑文都模糊难辨了。墓身也受了风雨的浸损，我们看到这荒凉的情景我们的心有些沉重了。我们

拍了三张照片，大家就坐在墓头沉默起来。云满天，雨欲来，这已是午后五点多钟了。

一个人，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为人类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如今在这里睡了二十多年了。没有人晓得他是什么人，也没有人来看他，他在这里应是如何地寂寞呵……

夜催我们离开坟地，雨迫我们离开坟地，在暮色中我们只得沐着雨走下山来。

……"这三年来他该不会太寂寞罢，每年都有孩子们来望坟的"……

朋友，这又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巧合呵，你说出了我心里的话，是的，那个人是不会太寂寞的，我们这里每年也有人去望坟呢！我们都不会忘记他的，三个多月前我们也是在一个落雨的日子到了那个地方。我们也是怀了沉重的心看着那荒凉的情景。而且我们也是沐着雨在暮色中匆忙地走下山来，当我最后一次回头去望那坟头时，我还在心里祷祝似地说："你是不会死的，你活在我们心里。而且将来有一天你还会活在我们的行动上罢。"

你说得不错："我们在湖上跑，以到此为最快心的了：在这里他给了我们一面生活的镜子。我们今朝是得见自己的面容了。于是我们不能不爱惜自己，我们也不能不咒诅自己——'死者长已矣，生者仍苟活。'唉，我们呵！"

但是，朋友，你且莫咒诅罢。你难道就忘记了另一个活着的人？那个将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线系起来，要在这废墟上重

建起九重宝塔的被我们称为“耶稣”的人，不是同样值得我们的敬爱么：他的病怎样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难。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爱惜他罢，比爱自己还多地爱这个人罢。我相信你们，我知道你们是能够爱他的。

1936年8月。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朋友，你要我告诉你关于那个老人的最后的事情。我现在不想说什么话，实在我也不能够说什么。我只给你写下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在万国殡仪馆里面，我和一些年纪差不多的朋友，过了四天严肃而悲痛的日子。灵堂中静静地躺着那个老人，每天从早到晚，许许多多的人到这里来，一个一个地或者五六个人站成一排地向他致最深的敬礼。我立在旁边，我的眼睛把这一切全看进去了。

一个秃顶的老人刚走进来站了一下，忽然埋下头低声哭了。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已经走出了灵堂，却还把头伸进帷幔里面来，红着眼圈哀求道："让我再看一下罢，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灵堂里灯光不够亮。一群小学生恭敬地排成前后两列，一齐抬起头，痴痴地望着那张放大的照片。忽然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埋下头鞠躬了。其余的人马上低下头来。有的在第三次鞠躬以后，还留恋地把他们的头频频点着。孩子们的心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五期。发表时题为《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

是最真挚的。他们知道如今失掉一个爱护他们的友人了。"救救孩子"，我的耳边还仿佛响着那个老人的声音。

我所认识的一个杂志社的工友意外地来了。他红着脸在灵堂的一角站了片刻，孩子似地恭恭敬敬行了三个礼，然后悄悄地走开了。

我还看见一个盲人，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把一只手扶在另一个穿长衫的人的肩头，慢慢地从外面走进来。到了灵前那个引路人站住了。盲人从引路人的肩上缩回了手，向前移动一步，端端正正地立着，抬起他那看不见的眼睛茫然望了望前面，于是低下头，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他又伸出手，扶在引路人的肩上默默地退去了。

两个穿和服的太太埋着头，闭着眼睛，默默地合掌祷告了一会儿。我给她们拉帷幔的时候，我看见了她们脸上的泪痕，然后在帷幔外面响起了悲痛的哭声。

我的耳朵是不会误听的，像这样的哭声我每天至少要听到几次。我的眼泪也常常被它引了出来。

我的眼睛也是不会受骗的。我看见了穿粗布短衫的劳动者，我看见了抱着课本的男女学生，我也看见了绿衣的邮差、黄衣的童子军，还有小商人、小店员，以及国籍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种各类的人。在这无数不同的人的脸上，我看见了一种相同的悲戚的表情。这一切的人都是被这一颗心从远近的地方牵引到这里来的。

在这些时候我常常想：这个被我们大家敬爱着的老人，他真的就死去了？我不能够相信。但是这些悲戚的面容，这些

悲痛的哭泣却明白地告诉我，这个老人绝不会再坐起来，带着温和的笑容和我们交谈了。

二十一日夜里，已经过了十一点钟，我和几个朋友准备动身回家。灵堂里很静。我一个人走到灵柩前面，静静地站了四五分钟的光景。我借着黯淡的灯光，透过了那玻璃棺盖，痴痴地望着我们所熟习的那张脸：眼睛紧紧地闭着，嘴也紧紧地闭着。一种温和的表情笼罩在这张脸上。没有死的恐怖。仿佛这个老人就落在深沉的睡眠里。这四周都是鲜花扎成的花圈和花篮，晚香玉的馥郁的香气一股一股地沁入我的心肺。我不禁想着：这难道不是梦？我又想：倘使这个老人一翻身坐起来呢？

但是一个沉重的声音在我的心上叫起来：死了的不能够复活了。

死者的遗体是在这天下午入殓的。我跟着许多朋友行了礼以后，站在人丛中，等着遗体入殓。前面一片哭声刺痛我的心。我忍不下去了，含着眼泪回过头来，无意地看见那个高身材的朋友① 红着眼睛，伸出手拚命在另一个朋友②的肩头上抓。我看见他心里难过，自己心里也更难受了。在这一刻满屋子人的心都是相同的，都有一样东西，这就是——死者的纪念。

出殡的日子我和一个朋友③早晨七点半钟到了殡仪馆。别的朋友忙着在外面做事情。我一个人绕着灵柩走了一周，

---

① 高身材的朋友：指郑振铎（1898—1958）。

②③ 朋友：指靳以。

以后又站了片刻。我的眼前仍旧是那酣睡中的慈和的面颜，空气里依旧弥漫着浓郁的晚香玉的芬芳。我又一次想起来：这也许是梦罢，倘使他真的坐起来呢？

朋友，这不是梦。我们大家所敬爱的导师，这十年来我一直崇拜着的那位老人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旁边花圈上一条白绸带写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上的缺口却是永远不能填补的了。

我不能够这样地久站下去。瞻仰遗容的人开始接连地来。有的甚至是从远方赶来看他们所敬爱的老人最初的也就是最后的一面。“让我们多看几眼罢，”我伸手拉帏幔的时候，常常有人用眼睛这样地恳求。但地方是这样狭小，后面等着的人又有那么一长列，别的朋友也在催促。我怎么能够使每个人都多看他几眼呢？

下午两点钟，灵柩离开了殡仪馆，送葬的行列是很有秩序的。许多人悲痛地唱着挽歌。此外便是严肃的沉默。

到了墓地，举行了仪式以后，十三四个人抬起了灵柩。那个刚刚在纪念堂上读了哀词的朋友①，突然从人丛中跑出来，把他的手掌也放在灵柩下面。我感动地想：在这一刻所有的心都被躺在灵柩中的老人连接在一起了。

在往墓穴去的途中，灵柩愈来愈重了。那个押柩车来的西洋人跑来感动地用英语问道：“我可以帮忙吗？”我点了点头。他默默地把手伸到灵柩下面去。

---

① 读哀词的朋友：指胡愈之（1896—1986）。

到了墓穴已经是傍晚了，大家把灵柩放下。一个架子上绑着两根带子，灵柩就放在带子上面。带子往下坠，灵柩也跟着缓缓地落下去。人们悲声低唱安息歌。在暮色苍茫中，我只看见白底黑字的旗子“民族魂”渐渐地往下沉，等它完全停住不动时，人们就把水门汀的墓盖抬了来。一下子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安息罢，安息罢……”这简直是一片哭声。

仪式完毕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出来。没有灯光。在阴暗中群众像退潮似地开始散去。……

夜晚十点钟我疲倦地回到家里，接到了一个朋友[①]的来信，他说：

> ……我如果不是让功课绊住，很想到殡仪馆去吊周先生。人死了，一切都成为神圣的了。他的人格实在伟大。他的文章实在深刻……

事实上，写信的人今天正午还到殡仪馆来过。我那时看见他，却不知道他已经寄发了这样的信。

我的书桌上摆了一本《中流》。我读了信，随手把刊物翻开，我见到这样的一句话，便大声念了出来：

> 他的垂老不变的青年的热情，到死不屈的战士的精神，将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

朋友，我请你也记住这一句话。这是十分真实的。

1936年10月22日。

① 写信的朋友：指李健吾（1906—1982）。

病*

我失了信，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星期，没有打个电话给你。你也许会怪我，但是你得知道在这些时候我究竟怎样地过着日子。我告诉过你我的朋友很多，你似乎不相信。这并不是一句假话，可是在这些日子里，很少有人来看我，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躺在这里。有两三个朋友是知道的，然而他们都是有繁忙的职务的人，而且我也不愿把他们有用的时间白白地花在我这里，所以在医院里我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这里的生活是很寂寞、很单调的。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不能够动弹。每天早晚有医生带着笑脸来问病，有看护小姐带着没有表情的面孔来验温度，有侍役来送饭，有看护小姐来喂饭，来铺床，还有一个看护长每天早晨匆匆走进来带笑地问一句“好吗？”，这些就像一本小学教科书的书页，一页一页照例地翻过去。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意外地有一点点，这变化也是很单调的。那就像时局的变化逼着当局来修改教科书了。

这寂寞，这单调，真叫人难忍受下去。但是我都忍受了。我始终没有给任何朋友打过电话。我没有向任何人表示我也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文艺》。

和常人一样需要安慰。我每天静静地躺在床上咬紧牙齿读书：觉得疲倦时我放下书，有了精神便又把它读下去。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一个女医生给我取血来验的时候，我看见她把针刺进我的血管。等到她取出针来，把我的血装进一只试管里，我才看见我的血也是一样的鲜红的血。这两天我还听见从对面大病室里送来的病重的人的哀号，真是可以撕碎人心的叫声，我不知道那个人生什么病，但是他整整地叫了三天。听见这样的叫声我不能不激动。但是书帮助了我。我沉醉在未来社会的美丽的远景里，暂时忘记了四周的一切。医生来问我的病痛，我总是淡漠地答道"好"。开刀以后我整整痛了大半天，甚至在那时候医生来问我觉得怎样，我也咬紧牙关说："不痛。"

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在你或者别的人看来的确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古怪的生物，所以无怪乎你会说我这个人"很难对付"。而且你会在我和你中间看见一堵墙（这墙还有几个人也看见过）了。……

我还记得那一个早晨的情形：我睡在担架上，一床厚的铺盖裹住我，一个看护小姐给我打了针，于是两个侍役把我抬了出去。我似梦非梦地躺着，不知道他们抬着我经过了一些什么地方。我只觉得一阵冷气向我的脸扑来。但是不久我的眼前就阴暗了。我知道他们已经把我抬进房里，而且正在上楼。进了手术间，他们就把我放在手术台上，房里有两三个看护小姐，她们似乎在忙着预备什么东西，不时地走进走出。我依旧似梦非梦地躺在那里，像一只等人宰割的猪羊。一盏异常明

亮的电灯正对着我的脸部垂下来。我用手腕遮住了强烈的亮光。

医生没有来。这等待是很痛苦的，而且我心里又难过。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也许没有这么久，几个人的脚步声响起来，有人在说英国话。我知道医生来了。于是悬垂在我的胸部和脚部上面的电灯也亮了起来。我的头给罩上了布套，我的两手也被束在台上。医生的工作就这样地开始了……

在手术台上我过了一些似梦非梦的时刻。但是麻醉药在我的身上并不曾有多大的效力。我的脑子渐渐地清晰了。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医生的刀子在我的身上动。我起初只觉难受，后来又觉得痛。我的两只手不能动，就紧紧抓住垫被；我咬紧了牙关，极力不要发出叫声；我的眼睛给布套盖住了，就只能看见灯光。我忍受不住时就接连把头往左右偏动，同时急促地呼吸起来。在这时候我的确是清醒的，而且这痛苦使我变得愈加清醒了。在这短时间里，大概不过半个钟头罢，我确实忘记了一切，生与死中间的栏栅似乎已经倒了。在这时候我虽然咬紧牙关，可是我心里却不断地默念着两个字："明天。"甚至在这时候我还相信着明天，我还有勇气要征服这一切而活到明天。

但是我也得感谢一位看护小姐，我连她的面貌也没有看见，可是她的一句话救了我。有一次我忍不住无意地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叫喊，她却在旁边说："有什么痛，还没有割着呢！"这句话使我很感到惭愧，同时也给了我勇气。我对自己暗暗地说："我要忍耐到底，不应该发出痛苦的叫声。"

手术完毕以后，我的衣服完全给汗浸透了，看护小姐给我另外换了一件，便让侍役把我抬回到担架上去。我这时已经不感到痛，却只有疲倦，又沉入似梦非梦的境地中了。两个侍役抬起担架，等候看护小姐写好牌子，然后抬着我走下楼。等到又是一阵冷气微微扑在我的脸上时，我听见押着担架的看护小姐说："怎么落雪了！"一个侍役回答道："小姐，你冷，你没有披件绒线衫出来。你在里面倒不知道落雪。"另一个侍役接口催促道："走快点！"，于是担架动得更厉害了。很快地他们就把我抬回到病房。

我躺在病床上，身子没有一点力气，心里很难受，伤口又时时发痛。我不想吃任何东西。我不能够闭上眼睛安睡片刻。这状态一直继续到夜间。这其间我没有发过一声呻吟。看护小姐来验温度时问我，我也只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好"。甚至在这时候我也没有失掉对于明天的信仰。我在心里还默默地念着那两个可以安慰一切、拯救一切的字：明天。

一直到这一天，还没有朋友来看过我，是我不让他们来的，他们以为我还是活泼地到处跑。即使知道我进医院的人，也不过揣想我在医院里找几天安静的休息。所以这天傍晚一个朋友派人送水果饼干来时，他甚至没有吩咐听差问两句话。但是我却对听差表示我很好。其实这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古怪的人，倔强的人。只有那些和我在一起生活过、奋斗过的朋友，知道我的内心的生活。倘说这倔强是虚伪，他们便会宽恕这虚伪；倘说这古怪是弱点，他

们便会了解这弱点。在他们的面前我是无法辩解的。你得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骄傲自满的人。……

我现在快写完第七张原稿纸了，你看，我就全在写关于我自己的话。原谅我，我不应该絮絮地向人诉说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跟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我能够看见什么呢？能够想到什么呢？你要我把同房的病人的故事告诉你吗？不，我不能够，那全是一些惨痛的故事。丈夫的呻吟、妻子的眼泪、母亲的哭……这且不说了。甚至在这里我也看出我们社会组织的缺陷来。我到这里后已经看见好些人出院了，他们出去时脸上还带愁容，他们是不等到病完全好就出院的。他们都向医生表示过生活的负担使他们连治病的时间也没有。我尤其耽心一个患肺病的人，我恐怕他活不过三年了。

我的话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我还没有写完呢。在夜晚病房里倒很清静，不过有时也有些响动，因为夜间还有事情。我们这个房间八点钟就关了灯。但是我整夜都不能够闭眼，我心里难受。第二天晚上我向医生要了安眠药片吞服了，算是睡了六个钟头。然而尽做些噩梦，在梦里我好几次发出恐怖的叫声，说着大声的梦话，惊扰了同房的病人。你想不到在梦中我会变作一个健康的人，而且甚至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啊，我真羡慕那梦中的我啊。

以后安眠药片也失掉效用了。我整夜不能够睡眠。我闭上眼睛，心里就很烦躁；睁开眼睛，墙壁上又现出梦中的图画。有一夜我就完全没有闭过眼，我的眼光穿过黑暗，停留在墙壁上，那时候热情的熬煎比手术台上的挣扎更叫人难受。自己

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旁观着那样激动人心的壮剧，这情形我实在受不了。

在这时候，有一样东西救了我：信仰，就是对于明天信仰。为了它我要忍耐这一切，而且我要经历过这一切而活到明天。

现在八点钟敲了。看护小姐要给我送安眠药来，医生今天答应给我另外一种有效的药，我相信医生。我今晚一定可以好好地睡一觉。那么再见罢。而且我的两只膀子已经酸痛到极点了，你可以想象到我写这封信是如何的困难，我在这里连吃饭都是要人来喂的。

我现在要放下我的自来水笔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看见你和别的朋友，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是我不去管它。这痛苦、寂寞和单调可以折磨我，任凭它们拿我怎样煎熬，但是我不害怕。甚至在这个时候我还想起了这样的话：

> 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新约·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四节）

我还有勇气说：

> 信我的人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二十六节）

你看，我太狂妄了罢。像我这样的人的确是很难了解的。要打破我们中间的墙，自然不容易。但是你真的相信我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吗？那么撇弃我罢。我仍然祝福你。

1935年12月。

《雷雨》在东京*

朋友，我今天第一次看见《雷雨》的上演了。

我——我应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周围接连地起了哄笑声。我在什么地方？

> 在剧场厅子里坐满了观客，四周都是笑话和吵闹。这时候他的心就会感到剧痛，他会感到沙漠上似的寂寞。在这热闹的人群中似乎就只有他一个孤寂的人，他的渴望，他的苦痛是完全和那些人不相关联的。

在一篇小说里我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并不是我的自白，我是在描写一个朋友，这你是知道的，然而告诉你如今我自己也有这感觉，这经验了。

我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剧场，和我那朋友一样。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是来看那热闹的人群吗？我是来听那轻松的哄笑声吗？

不，绝对不。我是来看一幕人生的悲剧。不错，正在舞台上开演的《雷雨》是一幕人生的大悲剧。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九期。署名余一。

我几乎不能够相信我的耳朵了，我的耳边响着的确是一些和玩具的汽球一般的一撞就破的哄笑声，而且叫人想到发这种声音的就只会是一些影子。笑声在我的耳边碎了，一个一个地碎了。

在舞台上一个被开除了的公馆里的听差，在他的贫穷的家中对着他的同样被开除了的儿女，诉说着他的苦恼。他的每一句话都会使大部分的观众发出轻松的笑声。为什么呢？难道那个演员把那听差演成了一个可笑的人物吗？不，不！自然我得承认这晚上演员们都不曾有过成功的表演，导演们也没有尽他们的职务，甚至剧本也有一些小缺点。但是舞台上的听差却和真实听差没有大的差别。舞台上的确表现了一个被践踏被侮辱的所谓下人的一生的悲剧。发出轻松的哄笑声的大部分观众是些什么人呢？那自然是我们的留学生。

“戏已经做完了，再没有可做的了，”第二幕还未演完，我旁边一位穿着学生服的专家就骄傲地发言了，他做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而且时时和坐在他前一排的三个女朋友说些轻松的笑话，那些小姐们是观众中最爱发笑的分子。

不错，我认得这位专家是上海某中学的毕业生。自然他不认识我。他为什么要认识我呢？他是一位专家。他在第二幕后休息时间里对我说：“这剧本简直不合戏剧原理。”呵，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了。这位专家懂得什么戏剧原理？他大概看过几次在中国上演的话剧罢。我便回答他：“作者从事话剧运动也有好几年的历史了。我知道他写这剧本就花了三年以上的功夫。”“那么为什么我以前就没有听见过曹禺这个名字？

也许他是一个演文明戏的戏子罢。”

朋友，不要责备我，说老实话，我这时候真想给他一记耳光！我不再理他了。我和他说话是我的一种耻辱。这种人只配去听鹤见祐辅的《河马》的讲演的。

大部分的听众仍然哄笑着。

舞台上的悲剧慢慢地展开了。一个受尽了践踏和侮辱的贫穷的母亲不愿意她的女儿再去走她的错误的路，她要那天真活泼的女孩给她一个约言，不再见那富家的情人。这女儿在两种爱中间挣扎着，而且甚至她，甚至在这时候她也能够看见社会制度在她母亲一家和她情人一家中间所掘的鸿沟，和她情人一家对她母亲一家所做过的不义的行为，同时也能够感到因这而起的仇恨。但是她究竟太年轻了，爱情在她身上究竟还有着不可抗拒的绝大的力量，所以当这女儿怀着牺牲的决心终于应允了母亲不再和情人见面时，这景象纵使由不熟练的演员来表演，也应该是一幕撕裂人心的悲剧。我的心起了痛楚，一个朋友几乎淌出了眼泪，而那位专家呢：他似乎又要发什么议论了。

女儿应允了母亲以后却忍不住哭出声来扑倒在母亲身上。还不能了解女儿心理的母亲流着眼泪向女儿道歉，她说她太爱女儿了，不忍心眼看着女儿受人欺负……我悲痛地掉开了头。

出乎我意料之外，观众中又起了一阵轻松的哄笑。我再看舞台，那个惹人笑的听差又出现了。他的举动是那种人所惯有的，并没有一点可笑的地方。然而少爷小姐们笑了，轻松

地笑了。一阵愤怒袭击了我。在愤怒中我听见了一阵"齿！齿！"的声音，这是对那些笑声的反抗，不，这是对那些笑声表示轻蔑，表示憎厌。原来在这里还有一些人不是来寻开心的，不是来看笑话的。还有一些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想知道一点什么，为了想看见我们这社会内部的一角。

舞台上动作继续着。于是从托尔斯太的《复活》里脱胎来的① 那个场面展开了。"这毫无意思！"专家武断地自语说，他现了瞌睡的样子。我不知道专家的戏剧原理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疑心专家没有看过《复活》。我读《复活》到那一段时很受感动。我以前读《雷雨》到这一段也很受感动。女的在房里喝酒，对着一盏煤油灯哭，把头俯倒在桌子上。男的在外面敲窗。女的跑去阻拦他，不让他进来……这和什么样的戏剧原理不合呢？倘使专家责备说，在这一点作者把四凤那婢女写成了一个斯拉夫的女性。这还有点道理，我觉得四凤不大像一个中国婢女。但这一层专家是不会懂得的。

第三幕完了，休息二十分钟以后，第四幕开始了。这一幕演得最失败，因为演员们临时受到警察署干涉不得不把时间缩短，场面缩短，结果第四幕只演出原剧的一半，而且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无怪乎爱笑的观众会发出更多的哄笑了。

这些哄笑好几次引起了那个穷苦的老婆子的笑容。观众们责备那个脚色"笑台"。而其实她的笑容，使得这悲剧受了

---

① 这只是我的猜想。

大的损害的笑容，对于这个，观众们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朋友，第一夜的《雷雨》就这样完结了，对于导演和演员们的失败，我不能说一句责备的话，我反而佩服他们的热心。

走出剧场，我望着拥挤的观众的背影，我奇怪他们究竟来这里干什么，这一想我的心就猛烈地痛起来了。

《雷雨》就这样完结了。我并不失望。不管它有着一些缺点，我爱它，我了解它，这并不是因为我认识那作者，事实上我自己就是在中国的旧家庭里面长大的。倘使我把我的见闻全部写出来，我在出版了《家》以后也还可以写出一本《雷雨》，虽然，我缺乏《雷雨》作者的那种卓越的才能。

但是写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倘使写了剧本上演出来就只给那般发出轻松的哄笑声的人看！

1935年5月。

梦 与 醉

《梦与醉》，一九三八年九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共印行十一版(次)。

序*

从九层楼房的窗户看下面，街道静静地睡着了，一些灯火像星子似地嵌在昏黑里。就在这同样的地方，三个月以前，我怀着兴奋和感动的心情看过那盛大的火炬游行。那雄壮的歌声就像要把浓黑的天幕突破似的。千万道亮光聚在一起像一条火龙在摆动。每个人激动地挥着手唱歌，以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没有迟疑，没有畏缩。一个对于未来的信仰把这上万的人连接在一起。我先前也曾在这行列旁边走过，跟着他们走了好些条街。这些人于我应该是陌生的，我还不熟习他们的方言。但是我却觉得我是在自己最熟习的亲人中间，我甚至忘记了自己与别人的界限。后来我告诉人说那时候我是极其快活的。

但是如今一切都改变了。横在下面的是死沉沉地睡去了的街市。没有歌声。没有火炬。不时在我的眼前摇晃的只是一些残肢断臂，遭难者的血和残破的房屋。我仿佛还躲在骑楼下静静地倾听轰炸机在上面寻找目标、掷弹，和低飞扫射的声音，等候一种残暴的力量来结束我的生命。这并不是幻景。我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见闻》第一期。发表时题为《在广州》。

有过的经验的确很多了。我不相信我的生命是不能毁灭的。反之，我在二十天前还说过："我们的生命犹如庭园中花树间的蛛网，随时都会被暴风雨打断。"现在活着的人说不定明天就会躺在瓦砾堆里。今天早晨飞机还在市区投过弹。我不能够断定炸弹的碎片明天就不会碰到我的身上！我明夜要离开这个城市，可是我明天还要在市区内奔走一天。我办事地方的附近十天前落过一个炸弹，没有爆炸。要是明天遇到大轰炸，我们也许不会再有那样的幸运了。

然而我现在还活着。我的眼睛还能够注视，我的手还能够挥动。此刻我还可以自由处置我的时间。因此我要做完我的一些未了的事情。事情是很多的。我只能一件一件地做去。答应给书店的一本散文集，也应该在这时候整理好交出，我怕将来再没有机会做这种事情。爱惜自己的作品，在这种时候还念念不忘地想把它们整理出版，这许是"书生"的本色罢。我望着堆在手边的原稿，对自己也起了憎厌之感了。

广州静静地睡去了。我在这里住了两个半月。我爱这个地方和这里的居民。经过了三个星期的大轰炸以后，这个城市还是一样地坚定沉着，没有一种威胁能够改变它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暂别了，可爱的城市，炸不断的海珠桥，血染不赤的珠江，杀不尽的倔强的人民。我在这时候离开你们，我感到留恋和惭愧。只有一个思想可以稍微安慰我：我下一个月还要回来。我希望我回来时能够在这里见到伟大的壮剧。

巴　金 1938年6月22日在广州。

死*

像斯芬克司①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死。

想了解这个字的意义，感觉到这个字的重量，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我如果从忙碌的生活中逃出来，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静静地思索片刻，像一个旁观者似地回溯我的过去，便发见在一九二八年我的日记的断片中，有两段关于死的话。一段的大意是：忽然想到死，觉得死逼近了，但自己却不甘心这样年轻就死去。自己用了最大的努力跟死挣扎，后来终于把死战胜了。另一段的大意是：今天一个人在树林中散步，忽然瞥见了死，心中非常安静，觉得死也不过如此。……我那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话？当时的心情经过八九年岁月的磨洗，已经成了模糊的一片。我记得的是那时过着秋水似的平静的生活，地方是法国玛伦河畔的一个小城镇。在那里我不会看见惊心动魄的惨剧。我所指的"死"多半是幻象。

幻象有时也许比我所看见的情景更真切。我自小就见过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文丛》第一卷第二号。

① 希腊神话：斯芬克司是狮身女面、有双翼的怪物，常常坐在路旁岩石上，拦住行人，要他们猜一个难解的谜，猜不中的人便会给她弄死。

一些人死。有的是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给我留下的却是同样的不曾被人回答的疑问：死究竟是什么？我常常好奇地想着我要来探求这个秘密。然而结果我仍是一无所得。没有一个死去的人能够回来告诉我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有时我一个人关在房里，夜晚不点灯，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注意地望着黑暗。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依旧注意地望着。我也不用思想。这时死自然地来了，但也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于是它又飘飘然走了。死并不可怕。自然死也不能引诱人。死是有点寂寞的。岂止有点寂寞，简直是十分寂寞。

我那时的确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孩子（以后自然也是）。我把死看作一个奇异的所在。我一两次大胆地伸了头在那半掩着的门前一望。门里是一片漆黑。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这探求似乎是徒然的。

有一次我和死似乎隔得很近。那是在成都发生巷战的时候。其实说巷战，还不恰当，因为另一方面的军队是在城外。城外军队用大炮攻城，炮弹大半落在我们家里，好几间房屋毁坏了，到处都是尘土，我们时时听见大炮声、屋瓦震落声与家人惊叫声。一家人散在四处，无法聚在一起，也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我记得清楚，那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阴历），也就是所谓“花朝”（百花生日），午前十一点钟的光景。我起初还在大厅上踱着，后来听说家里的人大半都躲到后面新花园里去了，我便跑到书房里去。教书先生在那里，不过没有学生读书。不久三哥也来了。我们都不说话，静静地听着炮声。窗

外是花园，从玻璃窗望出去，玉兰花刚开放，满树满枝的白玉花朵已经引不起我们的注意。他们垂着头坐在书桌前面。我躺在床上，头靠着床背后的板壁。炮弹带着春雷似的巨响从屋顶上飞过。我想，这一次它会落到我的头上来罢。只要一瞬的功夫，我便会落在黑暗里，从此人和我隔了一个世界，留给我的将是无穷的寂寞。……这时我的确感到很大的痛苦。死并不使我害怕。可怕的是徘徊在生死之间的那种不定的情形。我后来想，倘使那时真有一个炮弹打穿屋顶，向着我的头落下来，我会叫一声“完了”，就放心地闭上了眼睛，不会有别的念头。我用了“放心地”三个字，别人也许觉得奇怪。但实际上紧张的心情突然松弛了，什么留恋、耽心、恐怖、悔恨、希望，一刹那间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那时心中确实是空无一物。爱德华·加本特在他的一本研究爱与死的书里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中，它(指死)是和平的，安静的，还带着一种深的放心的感觉，”[1]这是很有理由的。

我还见过一次简单的死。川、黔军在成都城内巷战的时候，对门公馆里的一个轿夫(或者是马弁，因为那家的主人是什么参议、顾问之类)站在我家门前的太平缸旁边，跟人谈闲话。一颗子弹落在街心，再飞起来，打进了那个人的胸膛。他轻轻叫了一声，把手抚着胸倒在地上。什么惊人的动作也没有。他完结了，这么快，这么容易。这一点也不可怕，我又想起加本特的话来了。他说死人的脸上有时还会闪着一种忘我的

① 见英国作家爱·加本特(1844—1929)的《爱与死的戏剧》。

光辉，好像新的生命已经预先投下它的光辉来了。他甚至在战地遗尸的脸上见过这样的表情。他以为死是生命的变形内的生命的解脱。

据说加本特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但是“死”这个谜到现在为止似乎还不曾得到一个确定的解答。我更爱下面的一种说法：死是“我”的扩大。死去同时也就是新生，那时这个“我”渗透了全宇宙和其它的一切东西。山、海、星、树都成了这个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这一个人的心灵和所有的生物的心灵接触了。这种经验是多么伟大，多么光辉，在它的面前一切小的问题和疑惑都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休息。

这自然是可能的。我有时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毕竟太美丽了。而且我不曾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想到“死”的时候，从没有联想到这一个死法。我看见的是黑的门、黑的影子。倒是有一两次任何事情都不去想的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傍晚的天空和模糊的山影、树影，我觉得自己并不存在了，我与周围的一切合在一起变成了一样东西。然而这感觉很快地就消失了。要把它捉回来，简直不可能。但这和死完全没有关系，并不能证实前面的那种说法。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在前面说过没有一个死了的人能够回来告诉我关于死的事情。对于这句话我应该加以更正。我有一个朋友患伤寒症曾经死过几小时，后来被一位名医救活了。在国外的几个友人还为他开过一个追悼会。他后来对我谈起他的死，他说他那时没有一点知觉，死就等于无梦的睡眠。加本特认识一位太太，她患重病死了两三个钟头，家人正

要给她举办丧事，她忽然活转来了。此后她又活了三四年。据说她对于死也没有什么清晰的感觉。但有一点她和我那位朋友不同。她是一个意志力极坚强的女人，她十分爱她的儿女，她不能舍弃他们，所以甚至在这无梦的睡眠中她还保持着她的“求生的意志”。这意志居然战胜了死，使她多活了几年。诗人常说“爱征服死”。爱的确可以征服死，这里便是一个证据。若就我那位朋友的情形来说，那却是“科学把死征服”了。

像这样的事情倒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然而从死过的人的口里我们却不曾听过一句关于死的恐怖的话。许多人在垂危的病中挣扎地叫着“我不要死”，可是等到死真的来了时，他（或她）又顺服地闭了眼睛。的确这无梦的睡眠，永久的安息，是一点也不可怕的。可怕的倒是等死。而且还是周围那些活着的人使“死”成为可怕的东西。那些眼泪，那些哭声，那些悲戚的面容……使人觉得死是一个极大的灾祸。而天堂地狱等等的传说更在“死”上面罩了一个可怕的阴影。我在小孩时代就学会了怕死。别的许多人的遭遇和我的不会相差多远。

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怕死甘愿低头去做种种违背良心的事情。真正视死如归的勇士是不多见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布鲁诺上火柱①……像这样毫不踌躇地为信仰牺牲生命的，古今来能有几人！

人怕死，就因为他不知道死，同时也因为不知道他自己。

---

① 不用说，这是指旧社会中说的。乔·布鲁诺是意大利伟大的思想家，因传播无神论，批评宗教和教皇的特权等等受到宗教的审判，一六〇〇年在罗马受火刑，活活地被烧死在火柱上。

其实他所害怕的并不是死，我读过一部通俗小说①，写一个被百口称作懦夫的人怎样变成勇敢的壮士。这是一个临阵脱逃的军官。别人说他怕死，他自己也以为他怕死。后来为环境所迫，他才发见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怕的却是"怕死"的"怕"字。他害怕自己到了死的时候会现出怯懦的样子，所以他逃避了。后来他真正和死对面时却没有丝毫的畏惧。许多人的情形大概都和这个军官的类似。真正怕死的人恐怕也是很少很少的罢。倘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那么遍天下皆是勇士了。

"死"不仅是不可怕，它有时倒是值得愿望的，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休息，那才是永久的和平。正如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所说："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来毁掉，"一些人从"死"那里得到了拯救。拉吉穴夫自己就是服毒而死的（在一八〇二年）。还有俄罗斯的女革命家，"五十人案"中的女英雄苏菲·包婷娜后来得了不治之病，知道没有恢复健康的希望了，她不愿意做一个靠朋友生活的废人，便用手枪自杀。那是一八八三年的事情。去年夏天《狱中记》②的作者柏克曼在法国尼斯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患着重病，又为医生所误，两次的手术都没有用。他的目力也坏了。他不能够像残废者那样地过着日子。所以有一次在他发病的时候，他的女友出去为他请医生，躺在病床上的他却趁这个机会拿手枪打了自己。四十四年前他的枪弹不曾打死美国资本家亨利·福利克，这一次

① 通俗小说：指《四羽毛》，这是一本宣扬英帝国主义"功绩"的坏书。

② 《狱中记》：这是一个年轻人在美国监狱中十四年生活的记录。

却很容易地杀死了他自己。在他留下的短短的遗书里依旧充满着爱和信仰。他这个人虽然只活了六十几岁，但他确实是知道怎样生，知道怎样死的。

在这样的行为里面，我们看不见一点可怕或者可悲的地方。死好像只是一件极平常、极容易、极自然的事情。甚至在所谓“卡拉监狱的悲剧”①里，也没有令人恐怖的场面。我们且看下面的记载：

> ……波波何夫与加留席利二人都吞了三倍多的吗啡，很快地就失了知觉。夜里波波何夫还醒过一次。他听见加留席利喉鸣，他想把加留席利唤醒。他抱着他的朋友，在这个朋友的脸上狂吻了许久。后来他看见这个朋友不会再醒了，他又抓了一把鸦片烟吞下去，睡倒在加留席利的身边，永闭了眼睛。

谁会以为这是一个令人伤心断肠的悲剧呢？多么容易，多么平常(不过对于生者当然是很难堪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在美国内战的时期，曾在战地医院里服务，他一定见过许多人死，据他说在许多场合中“死”的到来是十分简单的，好像是日常生活里一件极普通的事情，“就像用你的早餐一样。”

关于“死”的事情我写了八张原稿纸，我把问题整个地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多少懂得了一点“死”。其实我果真懂得“死”

① “卡拉监狱的悲剧”：这是为了给一个女囚人雪耻的同盟自杀，参加者女囚人三个(先死)，男囚人十四个。事情发生于一八八九年。雷翁·独意奇的《西伯利亚的十六年》中有详细的记载。

吗？我自己也没有胆量来下一个断语。我的眼光正在书堆中旅行，它忽然落到了一本日文书上面停住了。我看书脊上的字：

死之忏悔　古田大次郎①

我不觉吃了一惊，贯串着这一本将近五百页的巨著的，不就是同样的一个"死"字么？

"死究竟是什么呢？"

那个年轻的作者反复地问道。他的态度和我的是不相同的。他不是一个作家，此外也不曾写过什么东西。其实他也不能够再写什么东西，这部书是他在死囚牢中写的日记，等原稿送到外面印成书时，作者已经死在绞刑台上了。我见过一张作者的照片，是死后照的。是安静的面貌，一点恐怖的表情也没有。不像是死，好像是无梦的睡眠。看见这照像就想到作者的话："一切都完了。然而我心里并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很平静的。像江口君的话，既然到了那个地步，不管是苦，不管是烦闷，我只有安然等候那死的到临。"这个副词"安然"用得没有一点夸张。他的确是安然死去的。他上绞刑台的时候，怀里揣着他妹妹寄给他的一片树叶，和他生前所喜欢的一只狗和一只猫的照片。这样地怀着爱之心而死，就像一个人带着宽慰的心情静静地睡去似的。这安然的死应该说是作者的最后胜利。

---

① 《死之忏悔》：日本东京春秋社出版（一九二六年）。

然而我读了这两百多天的日记①，我想到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狱中等死的情形，我在字句间看出了一个人的内心的激斗，看出了血和泪的交流。差不多每一页，每一段上都留着挣扎的痕迹。作者能够达到那最后的胜利，的确不是容易的事。

> 我感着生的倦怠么？不！
>
> 对于死的恐怖呢？曾经很厉害地感着。现在有时感到，有时感不到。把死忘记了的时候居多。只是死的瞬间的痛苦还是有点可怕。

作者这样坦白地承认着。他常常在写下了对于死的畏惧以后，又因为发觉自己的懦弱而说些责备自己的话。然而在另一处他却欣喜地发见：

> 死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也是伟大的。……

① 《死之忏悔》中的日记到九月十七日为止，作者于十月十五日受绞刑。日记原稿共三十三册。作者自己说只有第三十三册才是"真正的死刑囚的狱中记"，那是判决死刑以后的日记。据古田生前的辩护律师布施辰治在序文中说，这一册日记当局不许拿出去发表。然而后来它终于被领出来而且秘密出版了。我得到一册，曾读过一遍。书名是《死刑囚的回忆》，但在一·二八的沪战中被炮弹打毁了。这一册的内容和以前的三十二册差不多，不过调子有点不同。写以前的三十二册时作者已经知道死刑是无可避免的了。然而判决究竟不曾确定。死虽然就在他的眼前，希望纵然极其微弱，却也不曾完全消失。所以那时有疑惑，有挣扎，有呻吟，有眼泪。作者当时还不大认识死的面目。最后临到了写第三十三册，一切都决定了，从此再没有从前那种不安定，从前那种苦苦的挣扎。的确如布施辰治所说，确定了舍弃生命以后，心境和态度都是更为沉静，真有超越生死之概。因此无怪乎有人会以为这一册"真正的死刑囚的狱中记"反不及以前的三

后来作者又疑惑地问道：

> 死果然是一切的终结吗？死果然会赔偿一切吗？我为什么要怕死呢？

“死并不可怕，只是非常寂寞。我为什么憎厌临死的痛苦呢？我想那样的痛苦是不会有的罢。”作者又这样地想道。

“我想保持着年轻的身体而死去，”这是作者的希望。

我不想再引下去了。作者是那样的一个厚于人情的青年，他有慈祥的父亲，又有可爱的妹妹，还有许多忠诚的友人。要他把这一切决然抛弃，安然攀登绞刑台，走入那寂寞的永恒里，这的确不是片刻的功夫所能做到的。这两百多天的日记里充满着情感的波动。我们只看见那一起一伏，一潮一汐。倘使我们不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追随作者的笔，我们就不能了解作者的心情。

只有二十六岁的年纪。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而又不得不离开。不想死，而被判决了死刑。一天天在铁窗里面计算

十二册中文笔之清丽和表现之沉痛了。

古田大次郎自称为一个恐怖主义者。倘使把他的日记当作一个恐怖主义者的心理分析的记录看倒很适当。或者把它看作一个人的最真挚的自白看也无不可。所以加藤一夫读了它，就“觉得我的灵魂被净化了。我真的由于他的这记录而加深了我对于生活的态度”。加藤一夫称古田为一个“真诚的，真实的而又充满温情的纯真的灵魂”。他说《死之忏悔》是一本“非宗教的宗教书”。……

我读完这本书，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但是我不能不有一种惋惜的感觉。像古田那样的人不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上面，却选取了恐怖主义的路，在恐怖主义的境地中去探求真理，终于身死在绞刑台上。这的确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

日子，等着死的到来。在等死的期间想象着那个未知的东西的面目，想象着它会把他带到什么样的境界去。在这种情形下写成的《死之忏悔》，我们可以用一个“死”字来包括。他谈死，他想了解死，他感觉到死的重量。他的文字是充满着血和泪的。在那本五百页的大书里作者古田提出许多疑问，写出许多揣想，作者无一处不论到死，或者暗示到死。然而我却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一个结论。

其实这个答案，这个结论是有的，却不在这本书里面，这就是作者的死。这个死给他解答了一切的问题，也给我解答了一切的问题。

古田大次郎为爱而杀人，而被杀，以自己的血偿还别人的血，以自己的痛苦报偿别人的痛苦。他以一颗清纯的心毫不犹豫地攀登了绞刑台。死赔偿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

我想："他的永眠一定是安适而美满的罢。"我突然想起五十年前支加哥劳工领袖阿·帕尔森司[1]上绞刑台前作的诗了：

到我的墓前不要带来你们的悲伤，

也不要带来眼泪和凄惶，

---

① 帕尔森司(1848—1887)：美国支加哥劳工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支加哥干草市场发生炸弹事件。帕尔森司是当日群众大会的一个演说者，因此被法庭悬赏五千元通缉。六月二十一日他到法庭自首。第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同志司皮司、斐失儿、恩格尔同受绞刑。一八九三年伊里诺斯省新省长就职，重查此案，发见真相，遂发出理由书，宣告法官枉法，并替帕尔森司等洗去罪名。这是帕尔森司上绞刑台前数小时内写成的诗。

更不要带来惊惧和恐慌；
我的嘴唇已经闭了时，
我不愿你们这样来到我的坟场。

我不要送葬的马车排列成行，
我不要送丧的马队
头上羽毛飘动荡漾；
我静静地放我的手在胸上，
且让我和平地安息在墓场。

不要用你们的怜悯来侮辱我的死灰，
要知道你们还留在荒凉的彼岸，
你们还要活着忍受灾祸与苦辛。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里面，
只有我才应该来怜悯你们。

人世的烦愁再不能萦绕我的心，
我也不会再有困苦和悲痛的感情，
一切苦难都已消去无影。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内，
我如今只有神的光荣。

可怜的东西，这样惧怕黑暗，
对于将临的惨祸又十分胆寒。

看我是何等从容地回到家园！
不要再敲你们的丧钟，
我现在已意足心满。

这篇短文并不是“死之礼赞”。我虽然写了种种关于“死”的话，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坦白地承认：

“我还想活！”因为我正如小说《朝影》中的青年奈司拉莫夫所说：“我爱阳光、天空，和春光、秋景；我爱青春，以及自然母亲所给与我们的和平与欢乐。……”

1937年3月在上海。

梦*

我常常把梦当作我唯一的安慰。只有在梦里我才得到片刻的安宁。我的生活里找不到“宁静”这个名词。烦忧和困难笼罩着我的全个心灵，没有一刻离开我。然而我一进到梦的世界，它们马上远远地避开了。在梦的世界里我每每忘了自己。我不知道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做过什么样的事。梦中的我常常是一个头脑单纯的青年，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没有烦忧，也没有困难。我只有一个现在，我只有一条简单的路，我只有一个单纯的信仰。我不知道这信仰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在梦中我也不会去考究它。但信仰永远是同一的信仰，而且和我在生活里的信仰完全一样。只有这信仰是生了根的，我永远不能把它去掉或者改变。甚至在梦里我忘了自己、忘了过去的时候，这信仰还像太白星那样地放射光芒。所以我每次从梦中睁开眼睛，躺在床上半糊涂地望四周的景物，那时候还是靠了这信仰我才马上记起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把梦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连结起来的就只有这信仰。所以在梦里我纵然忘了自己，我也不会做一件我平日所反对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文丛》第一卷第三号。

的事情。

我刚才说过我只有在梦中才得着安宁。我在生活里找不到安宁，因此才到梦中去找，其实不能说去找，梦中的安宁原是自己来的。然而有时候甚至在梦中我也得不到安宁。我也做过一些所谓噩梦，醒来时两只眼睛茫然望着白色墙壁，还不能断定是梦是真，是活是死；只有心的猛跳是切实地感觉到的。但是等到心跳渐渐地平静下去，这梦景也就像一股淡烟不知飘散到哪里去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真实的我。

最近我却做了一个不能忘记的梦。现在我居然还能够记下它来。梦景是这样的：

我忽然被判决死刑，应该到一个岛上去登断头台。我自动地投到那个岛上。伴着我去的是一个不大熟识的友人。我们到了那里，我即刻被投入地牢。那是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墙壁上整天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地上是一片水泥。在不远的地方时时响起来囚人的哀叫，还有那建筑断头台的声音从早晨到夜晚就没有一刻停止。除了每天两次给我送饭来的禁卒外，我整天看不见一个人影。也没有谁来向我问话。我不知道那位朋友的下落，我甚至忘记了她。在地牢里我只有等待。等断头台早日修好，以便结束我这一生。我并没有悲痛和悔恨，好像这是我的自然的结局。于是有一天早晨禁卒来把我带出去，经过一条走廊到了天井前面。天井里绞刑架已经建立起来了，是那么丑陋的东西！它居然会取去我的生命！我带着憎恨的眼光去看它。但是我的眼光触到了另一个人的眼光。原来那位朋友站在走廊口。她惊恐地叫我的名字，

只叫了一声。她的眼里包着满眶的泪水。我的心先前一刻还像一块石头，这时却突然熔化了。这是第一个人为我的缘故流眼泪。在这个世界里我居然看见了一个关心我的人。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瞥，我也似乎受到了一次祝福。我没有别的话，只短短地说了"不要紧"三个字，一面感激地对她微笑。这时我心中十分明白，我觉得就这样了结我的一生，我也没有遗憾了。我安静地走上了绞刑架。下面没有几个人，但是不远处有一对含泪的眼睛。这对眼睛在我的眼前晃动。然而人把我的头蒙住了。我什么也看不见。

以后我忽然发觉我坐在绞刑架上，那位朋友坐在我身边。周围再没有别的人。我正在惊疑间，朋友简单地告诉我："你的事情已经了结。现在情形变更，所以他们把你放了。"我侧头看她的眼睛，眼里已经没有泪珠。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就跟着她走出监牢。门前有一架飞机在等候我们。我们刚坐上去，飞机就动了。

飞机离开孤岛的时候，离水面不高，我回头看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海上平静无波。深黄色的堡垒抹上了一层带红色的日光，凸出在一望无际的蓝色海面上，像一幅图画。

后来回到了我们住的那个城市，我跟着朋友到了她的家，刚走进天井，忽然听见房里有人在问："巴金怎样了？有遗嘱吗？"我知道这是她哥哥的声音。

"他没有死，我把他带回来了，"她在外面高兴地大声答道。接着她的哥哥惊喜地从房里跳了出来。在这一刻我确实

感到了生的喜悦。但是后来我们三人在一起谈论这件事情时，我就发表了“倒不如这次死在绞刑架上痛快”的议论。……

这只是一场梦。春夜的梦常常很荒唐。我的想象走得太远了。但是我却希望那梦景能成为真实。我并非盼望真有一个“她”来把我从绞刑架上救出去。我想的倒是那痛快的死。这个在生活里我得不到，所以我的想象在梦中把它给我争取了来。但是在梦里它也只是昙花一现，而我依旧被“带回来了”。

这是我的不幸。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只有这个才是消灭我的矛盾的唯一的方法。然而我偏偏不能够采用它。人的确是脆弱的东西。我常常严酷无情地分析我自己，所以我深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时我的眼光越过了生死的界限，将人世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去探求那赤裸裸的真理；但有时我对生活里的一切都感到留恋，甚至用全部精力去做一件细小的事情。在《关于〈家〉》的结尾我说过“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在《死》的最后我嚷着“我还要活”。但是在梦里我却说了“倒不如死在绞刑架上痛快”的话。梦中的我已经把生死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能抱定舍弃一切的决心坦然站在绞刑架上，真实的我对于一切却是十分执著，所以终于陷在繁琐和苦恼的泥淖里而不能自拔。到现在为止的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是被浪费了的。

有一个年轻朋友读了我的《死》，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想到这许多关于死的话”。她寄了一张海上日出的照片来鼓舞我，安慰我。现在她读到我的这篇短文大概会明白我的本意罢。

我接到那张照片，很感谢她的好意。然而我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弱者。我这一生横竖是浪费了的。那么就让我把这一生作为一个试验，看一个弱者怎样在重重的矛盾中苦斗罢。也许有一天我会克服了种种的矛盾，成为一个强者而达到生之完成的。那时梦中的我和真实的我就会完全合而为一人了。

1937年4月在上海。

醉*

我不会喝酒，但我有时也尝到醉的滋味。醉的时候我每每忘记自己。然而醉和梦毕竟不同。我常常做着荒唐的梦。这些梦跟现实离得很远，把梦景和现实的世界连接起来就只靠我那个信仰。所以在梦里我没有做过跟我的信仰违背的事情。

我从前说我只有在梦中得到安宁，这句话并不对。真正使我的心安宁的还是醉。进到了醉的世界，一切个人的打算，生活里的矛盾和烦忧都消失了，消失在众人的“事业”里。这个“事业”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东西，或者就像一块吸铁石把许多颗心都紧紧吸到它身边去。在这时候个人的感情完全溶化在众人的感情里面。甚至轮到个人去牺牲自己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孤独。他所看见的只是群体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灭亡。

将个人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这就是我的所谓“醉”。自然这所谓群体的范围有大有小，但“事业”则是一个。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文丛》第一卷第四号。

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的沉醉。那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然而在我的脑子里还是十分鲜明。那时我是个孩子。我参加一个团体的集会。我从来没有像那样地感动过。谈笑、友谊、热诚、信任……从不曾表现得这么美丽。我曾经借了第三者的口吻叙述我当时的心情：这次十几个青年的茶会简直是一个友爱的家庭的聚会。但这个家庭里的人并不是因血统关系、家产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结合他们的是同一的好心和同一的理想。在这个环境里他只感到心与心的接触，都是赤诚的心，完全脱离了利害关系的束缚。他觉得在这里他不是一个陌生的人，孤独的人。他爱着周围的人，也为他周围的人所爱。他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他。他信任他们，他们也信任他①。……

这是醉。第一次的沉醉以后又继之以第二次、第三次……这醉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希望，使我一个幼稚的孩子可以站起来向旧礼教挑战，使我坚决地相信光明，信任未来。不仅是我，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都是这样地成长的。而且我相信每个时代的青年都会在这种沉醉中饮到鼓舞的琼浆。

时间是骎骎地驰过去了。醉的次数也渐渐地多起来。每一次的沉醉都在我的心上留下一点痕迹。有一两次我也走过那黑门②，我的手还在门上停了一下。但是我们并没有机会得到那痛快的壮烈的最后。这是事实。一个人沉醉的时候，他会去干一些勇敢的事情，至少他会有这样的渴望。我们那

① 见长篇小说《家》第二十九章。

② 黑门：指死。

时也就处在这样的境地。南国的芳香沁入我们的心灵，火把给我们照亮黑暗的窄巷。一堵墙、一扇门关不住我们的心。一个广场容纳不了我们的热情。或者一二十个孩子聚在一个小房间里，大家拥挤地坐在地上；或者四五个人走着泥泞的乡间道路。静夜里，石板路上响着我们的脚步声。在温暖的白昼，清脆的笑语又充满了古庙。没有寂寞，没有苦闷，没有悲哀。有的只是一个光明的希望。每个人的胸膛里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心。

这是无上的“沉醉”，这是莫大的“狂喜”，它使我们每个人“都消失在完全的忘我里面”。所以我们也曾夸大地立下誓言：要用我们的血来灌溉人类的幸福，用我们的死来使人类繁荣。要把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人类的生命上面。人类生命的连续广延永远不会中断，没有一种阻力可以毁坏它。我们所看见的只有人类的繁昌，并没有个人的死亡。

我不能否认我们的狂妄，但是我应该承认我们的真挚。我们中间也有少数人实行了他们的约言。剩下的多数却让严肃的工作消蚀他们的生命。拿起笔的只有我一个。我不甘心就看着我的精力被一些方块字消磨干净，所以我责备自己是一个弱者。但是这个意思也很明显；这里并没有悲观，也没有绝望。若有人因此说我“在黑暗中哭泣”，那是他自己看错了文章。我们从没有过哭泣的时候。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甚至跟一个亲密的朋友死别，我们也只有暗暗地吞几滴眼泪。我们自然不能否认黑暗的存在。然而即使在黑暗的夜里，我们也看见在远方闪耀的不灭的光明，那是“醉”给我们带来的。

我常常用我自己的事情做例子，也许别人会把这篇《醉》看作我的自白。其实《死》和《梦》都不是我的自白，《醉》也不是。我可以举出另一些例子。我手边恰恰有几封信，我现在从里面引出几段，我让那些比我更年轻的人向读者说话：

> 那天夜里，正是我异常兴奋的一天。在学校里我们开了一个野火会。天空非常地黑沉，人们的影子在操场上移动着，呼喊着。它的声波冲破这沉寂的天空！
>
> 一堆烈火盛燃起来了。那光亮的红舌头照亮了每个人的脸，我们围绕着火堆唱歌。我们唱《自由神》、《示威》等等，这个兴奋的会一直到火熄灭了为止。

这不也是“醉”么？

> 在十二月××日，一个温暖的北方天气，阳光是那么明亮，又那么温暖，在这天我们学生跑到××（一个小乡村）去举行扩大行军。这项新鲜而又兴奋的工作弄得我一夜都没有睡好。
>
> 大概八点钟罢。我们起程了，空着肚子，悄悄地离开了学校。我们经过了热闹的街市、吵嚷的人群，快到十点的时候才踏进乡村的境界。
>
> 一条黄土道，向来是静寂得怕人，今天却有些改变了。一群学生穿着蓝布衫、白帆布球鞋，脸上露出神秘而又兴奋的微笑，拖着大步踏着这条黄土道。“一～～·二～～一”不知道是谁这样喊着，我们下意识地跑起来。
>
> 到那里已是晌午了。我们群集在一个墓地里，后面

是一带大树林，前面有几间小茅屋。农夫们停止了工作都出来看望。啊，是那么活跃着的一群青年！行军的号筒响了，雄壮的声音提起了每个人的勇气。我们真的像上了战场一样。

战斗的演习继续到三点钟才完毕。因为环境不允许，我们的座谈会没有举行，就整队回校了。一路上唱着歌，喊着热烈的口号。

这是“醉”，令人永不能忘记的“沉醉”。它把无数青年的心连结在一起了。还有：

的确我不会是寂寞，我不会是孤独。我们永久是热情的，那么多被愤怒的火焰狂炽着的心永久会紧紧连系在一起的。啊，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真不能够忘记。就是在去年下半年我们从先生的口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情形，而激起了我们的请愿的动机。那时在深夜里我们悄悄的计划着，我们紧紧的携着手，在黑暗中祝福第二天背着校方的请愿成功。我们一点也不怕的在微弱的电筒光下写着旗子和施行的步骤。我们一夜没有睡。当天将亮的时候，我和另一个同学轻轻的在每一个寝室的玻璃窗上敲了两下，于是同学们都起来了。我们整齐了队伍，在微雨的早晨走出了校门。在出发的时候，我因为走得太忙，跌了一个斤斗，一个高一班的同学拉了我起来，我们无言的亲密的对笑着。一群孩子如一条粗长的铁链冲出了学校。虽然最后我们失败

了。但那粗长的铁链使我们相信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会寂寞，怎会孤独呢？

这是年轻的中国的呼声。我们的青年就这样地慢慢成长了。——那个“孩子”说得不错，在这样的沉醉中他们是不会感到寂寞和孤独的。让我在这里祝福他们。

1937年5月在上海。

路*

我最近在《文丛》上发表过三篇短文（另有一篇《醉》也快要发表了），有人论到它们，说是“一些纠缠不清的自白”。其实这并不是。固然我说明我怎样写了那部题作《家》的小说，我谈梦谈死，但谈的并不全是自己的事。倘使我常常拿我自己或者与我自己有关的事情作例子，那只是因为我想写得更真实，更亲切。我知道我不是在写论文。那位批评者在我这三篇文章里看出我的“苦闷”，“徬徨”，“懦弱”。我觉得很奇怪。我的面前就摆着我的三篇文章，在《关于〈家〉》里，我吐露了我对于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积愤，为那些被逼着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可爱的生命叫一声冤屈。在《死》里我说明“死”并不可怕，指出人为了怕死甘愿低头去做种种违背良心的事情。我赞美真正视死如归的勇士。在《梦》里我说我要“在重重的矛盾中苦斗”，我希望我会“克服种种矛盾成为一个强者而达到生之完成”。这些话我至今还觉得没有说错。这里并没有“徬徨”和“懦弱”。我对于自己的路始终没有怀疑过。在那篇短短的《梦》里或许有招人误解的地方，因为我说过“我盼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文丛》第一卷第五号。

望的倒是那痛快的死”。但是愿望也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有两三次我走过那“黑门”，我的手还在门上停留一下。但是我没有机会得到那痛快的最后。这是事实。然而正和我说“倒不如死在绞刑架上痛快”时一样，这并不是我“对自己的路始终怀疑”，也不是在表现我的“懦弱”。为谋人群的幸福牺牲一己的生命，这是每个革命者的志愿。古今来有不少志士仁人跟着刑场上的露水一起消失。没有人能够说自己比他们更勇敢。我常常侈说寻求人群的幸福，不能找到从容就义的机会，却在纸笔上消磨我的岁月，那是我的无能。但这并不证明我的路就和大众的路相背驰。我的路不是我自己发明的。那是许多人已走过而且正走着的路。我也从没有在这条路之外寻找别的所谓个人的路。

“每个不愿做奴隶的人都起来”，这不错。但大众的路还不是如此简单，走大众的路的人不仅自己不愿意做奴隶，同时还要使别人也不做奴隶。使自己不做奴隶，这倒不太难，但使别人同时也不做奴隶就不容易了。这道理不一定要在创作中才能够表现出来，写一篇短文也可以说得十分明白。

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保全我们这民族的独立，维持我们的生存，这用不着我来解说，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也不是一个盲人。我的眼光从不敢离开现实。我和别的人一样，我也看得明白目前威胁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危机是日益紧迫了，而且也知道这个危机并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的。它有它的远因和近因，它有它的发展的道路。下什么种子就有什么收获。国际形势的变化，离不了因果关系。要等

到兵临城下才叫出抗敌的口号，那倒是近视的人了。

我从没有怀疑过“抗×”[1]的路。我早就相信这是我们目前的出路。我所看见的大众的路里就包含着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此外我再没有个人的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众人的利益里面，怎么还能有所谓个人的路？但是大众的路也并非简单的“抗×”二字所能包括。单提出“抗×”而不去想以后——怎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且把“抗×”比作一道门，我们要寻到自由和生存，我们要走向光明，第一就得跨进这道门。但跨进门以后我们还得走路。关于那个时候的步骤，目前也该有所准备了。因为我们谁都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者，而且近年来欧洲大陆已经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例子。

我以前的态度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若说我不会写文章，我不想辩解。倘使断定我“为自己的路而彷徨苦闷”，那是说话的人自己弄不清楚。

路也许很长。但是走的人很多，而且远远的还有那一线亮光。每个人都看得见那亮光。在这时候谁还会怀疑自己面前的这条道路呢！

1937年6月在上海。

① “抗×”：即“抗日”。

生*

死是谜。有人把生也看作一个谜。

许多人希望知道生，更甚于愿意知道死。而我则不然。我常常想了解死，却没有一次对于生起过疑惑。

世间有不少的人喜欢拿"生是什么"、"为什么生"的问题折磨自己，结果总是得不到解答而悒郁地死去。

真正知道生的人大概是有的；虽然有，也不会多。人不了解生，但是人依旧活着。而且有不少的人贪恋生，甚至做着永生的大梦：有的乞灵于仙药与术士，有的求助于宗教与迷信；或则希望白日羽化，或则祷祝上登天堂。在活着的时候为非作歹，或者茹苦含辛以积来世之福——这样的人也是常有的。

每个人都努力在建造"长生塔"，塔的样式自然不同，有大有小，有的有形，有的无形。有人想为子孙树立万世不灭的基业；有人愿去理想的天堂中做一位自由的神仙。然而不到多久这一切都变成过去的陈迹而做了后人凭吊唏嘘的资料了。没有一座沙上建筑的楼阁能够稳立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文丛》月刊第一卷第六号。

一百四十几年前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学者让·龚多塞不顾死刑的威胁，躲在巴黎卢森堡附近的一间顶楼上忙碌地写他的最后的著作，这是历史和科学的著作。据他说历史和科学就是反对死的斗争。他的书也是为征服死而著述的。所以在写下最后两句话以后，他便离开了隐匿的地方。他那两句遗言是："科学要征服死，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死了。"

他不梦想天堂，也不寻求个人的永生。他要用科学征服死，为人类带来长生的幸福。这样，他虽然吞下毒药，永离此世，他却比谁都更了解生。

科学会征服死。这并不是梦想。龚多塞企图建造一座为大众享用的长生塔，他用的并不是平民的血肉，像我的童话里所描写的那样。他却用了科学。他没有成功。可是他给那座塔奠了基石。

这座塔到现在还只有那么几块零落的基石，不要想看见它的轮廓！没有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定在什么时候会看见它的完成。但有一件事实则是十分确定的：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于这座高塔的建造。这些人是科学家。

生物是必死的。从没有人怀疑过这天经地义般的话。但是如今却有少数生物学者出来企图证明单细胞动物可以长生不死了。德国的怀司曼甚至宣言："死亡并不是永远和生物相关联的。"因为单细胞动物在养料充足的适宜的环境里便能够继续营养和生存。它的身体长大到某一定限度无可再长的时候，便分裂为二，成了两个子体。它们又自己营养、生长，后来又能自己分裂以繁殖其族系，只要不受空间和营养的限制，

它们可以永远继续繁殖、长生不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当然没有死亡。

拿草履虫为例，两个生物学者美国的吴特拉夫和俄国的梅塔尼科夫对于草履虫的精密的研究给我们证明：从前人以为分裂二百次、便现出衰老状态而逼近死亡的草履虫，如今却可以分裂到一万三千次以上，就是说它能够活到二十几年。这已经比它的平常的寿命多过七十倍了。有些人因此断定说这些草履虫经过这么多代不死，便不会死了。但这也只是一个假定。不过生命的延长却是无可否认的。

关于高等动物，也有学者作了研究。现在鸡的、别的一些动物的、甚至人的组织(tissue)已经可以用人工培养了。这证明：多细胞动物体的细胞可以离开个体，而在适当的环境里生活下去，也许可以做到长生不死的地步。这研究的结果离真正的长生术还远得很，但是可以说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步。在最近的将来，延长寿命这一层，大概是可以办到的。科学家居然在显微镜下的小小天地中看出了解决人间大问题——生之谜的一把钥匙。过去无数的人在冥想里把光阴白白地浪费了。

我并不是生物学者，不过偶尔从一位研究生物学的朋友那里学得一点点那方面的常识。但这只是零碎地学来的，而且我时学时忘。所以我不能详征博引。然而单是这一点点零碎的知识已经使我相信龚多塞的遗言不是一句空话了。他的企图并不是梦想。将来有一天科学真正会把死征服。那时对于我们，生就不再是谜了。

然而我们这一代(恐怕还有以后的几代)和我们的祖先一样，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我们带着新的力量来到世间，我们又会发挥尽力量而归于尘土。这个世界映在一个婴孩的眼里是五光十色；一切全是陌生。我们慢慢地活下去。我们举起一杯一杯的生之酒尽情地饮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我们全尝到了。新奇的变为平常，陌生的成为熟习。但宇宙是这么广大，世界是这么复杂，一个人看不见、享不到的是太多了。我们仿佛走一条无尽长的路程，游一所无穷大的园林，对于我们就永无止境。“死”只是一个碍障，或者是疲乏时的休息。有勇气、有精力的人是不需要休息的，尤其在胜景当前的时候。所以人应该憎恨“死”，不愿意跟“死”接近。贪恋“生”并不是一个罪过。每个生物都有生的欲望。蚱蜢饥饿时甚至吃掉自己的腿以维持生存。这种愚蠢的举动是无可非笑的，因为这里有的是严肃。

俄罗斯民粹派革命家妃格念尔“感激以金色光芒洗浴田野的太阳，感激夜间照耀在花园天空的明星”，但是她终于让沙皇专制政府将她在席吕谢尔堡中活埋了二十年。为了革命思想而被烧死在美国电椅上的鞋匠沙珂还告诉他的六岁女儿：“夏天我们都在家里，我坐在橡树的浓荫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教你读书写字，或者看你在绿的田野上跳荡、欢笑、唱歌，摘取树上的花朵，从这一株树跑到那一株，从清朗、活泼的溪流跑到你母亲的怀里。我梦想我们一家人能够过这样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贫苦人家的小孩能够快乐地同他们的父母过这种生活。”

"生"的确是美丽的，乐"生"是人的本分。前面那些杀身成仁的志士勇敢地戴上荆棘的王冠，将生命视作敝屣，他们并非对于生已感到厌倦，相反的，他们倒是乐生的人。所以奈司拉莫夫① 坦白地说："我不愿意死。"但是当他被问到为什么去舍身就义时，他却昂然回答："多半是因为我爱'生'过于热烈，所以我不忍让别人将它摧残。"他们是为了保持"生"的美丽，维持多数人的生存，而毅然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这样深的爱！甚至那躯壳化为泥土，这爱也还笼罩世间，跟着太阳和明星永久闪耀。这是"生"的美丽之最高的体现。

"长生塔"虽未建成，长生术虽未发见，但这些视死如归但求速朽的人却也能长存在后代子孙的心里。这就是不朽。这就是永生。而那般含垢忍辱积来世福或者梦想死后天堂的"芸芸众生"却早已被人忘记，连埋骨之所也无人知道了。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里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会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满溢的生命。正如青年早逝的法国哲学家居友所说："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个人的

① 奈司拉莫夫：中篇小说《朝影》中的一个人物。

生命应该为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牺牲。……这牺牲就是真实生命的第一个条件。”我相信居友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的干枯。居友接着说：“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似的，纵然开花以后便会继之以死亡，它仍旧不得不开花。”

从在一滴水的小世界中怡然自得的草履虫到在地球上飞腾活跃的“芸芸众生”，没有一个生物是不乐生的，而且这中间有一个法则支配着，这就是生的法则。社会的进化、民族的盛衰、人类的繁荣都是依据这个法则而行的。这个法则是“互助”，是“团结”。人类靠了这个才能够不为大自然的力量所摧毁，反而把它征服，才建立了今日的文明；一个民族靠了这个才能够抵抗他民族的侵略而维持自己的生存。

维持生存的权利是每个生物、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这正是顺着生之法则。侵略则是违反了生的法则的。所以我们说抗战是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神圣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可以否认。

这次的战争乃是一个民族维持生存的战争。民族的生存里包含着个人的生存，犹如人类的生存里包含着民族的生存一样。人类不会灭亡，民族也可以活得很久，个人的生命则是十分短促。所以每个人应该遵守生的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亦何尝不可以说是永生。

在科学还未能把“死”完全征服、真正的长生塔还未建立起来以前，这倒是唯一可靠的长生术了。

我觉得生并不是一个谜，至少不是一个难解的谜。

我爱生，所以我愿像一个狂信者那样投身到生命的海里去。

1937年8月在上海。

旅 途 通 讯

《旅途通讯》，原为上下二册，分别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二年六月，共印行三版(次)。

前　　记

这些都不是可以传世的文章，它们只是去年下半年中间我在各地写给朋友们的长长短短的信(最后一篇应该不是信，但是我仍然把它当作信函寄给朋友们看过了的)。我写它们的时候，我只是像平日和朋友们谈闲话似地写下我的真实的见闻。也只有我的朋友们会从这些没有修饰的文句中看出一个珍爱友情的人的感激。

这些全是平凡的信函。但是每一封信都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写成的。这些天来，早晨我见到阳光就疑惑晚上我会睡到什么地方。也许把眼睛一闭，我便会进入“永恒”。

我知道个人的存亡没有请求被重视的理由。但是轮到我来交出一切，我对人世还不能没有留恋。牵系着我的心的是友情，因为我有无数散处在各地的朋友。甚至在这些日子里，我还想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对朋友们的感激的心情让大家知道。

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在受到绝望的打击以后，我的心常常迷失了道路，落在急流的水里，在此时将我引到彼岸的正是这友情。它

救了我，犹如飞马星座救了北极探险途中的麦克米伦。①

我不会说假话，这些信函便是明证。甚至敌机在我的头上盘旋、整个城市在焚烧的时候，我还感到友情的温暖。是这温暖给了我勇气，使我能够以平静的心境经历了信中描写的那些艰苦的日子。我有过勇气，我也还会有勇气，因为我有着无数的好心的朋友。

同这本小书一块儿，我献上我的祝福和感激。

巴　金 1939年2月14日在桂林。

① 杜·巴·麦克米伦（1874—？）：美国北极探险家。他在北极探险途中在冰块上迷了路的时候，就靠着飞马星座辨认了方向，脱离了危险。

香 港 行*

今天早晨船到汕头，我把写好的信寄发了。今晚似乎有船去上海，我的信想必按时到达你们的手中。我第一次到汕头，所以去各处看了一下。这里情形还好，不过前些时候给敌机炸了一次，居民大都迁走了。许多商店至今关着门。饮食店也少见。电灯厂被炸毁，夜间无电灯。天热。市内有大小公园两处，大公园内有一半地方挂着“游客止步”的牌子。小公园倒好，这是工人歇脚之所。我们在小公园内坐了半天，因为这里离码头近，我们不怕会赶脱船。晚上六时开船，算是“准时”。新装活猪数百头，把统舱客人赶到别处去了，满甲板都是臭气。大猪小猪啼叫不已，吵得客人不能睡觉，使人觉得猪贵人贱，并非笑话。房里闷热，颇似蒸笼。电风扇开了，并无风。打开房门便有厨房的热气从外面送进。到甲板走走，不小心又会踏在猪身上。有汕头小贩偷带鸡蛋一万枚，分盛二十篓，被外国大副发见，督率部下将十余篓掷入海里，有三四篓被人藏过，但又让海员们趁火打劫了。船明天下午到香港，据说特等、头等舱的客人在船停后一小时即可登岸，其余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六日《少年读物》第二号。

的客人要在船上住二十四小时，等候检疫工作完毕才能离船。这又是想不到的事。钱毕竟有用处。差一点我就要在船上多住一天了，因为我起初打算买普通舱票。余话后谈。诸友均此不另写信了。寄这封信用的是你[①]给我的香港邮票。到香港下船便可投邮。否则不会有这样快。

7月19日在太古海轮上。

---

① 你：指散文作家陆蠡（1908—1942）。他当时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少年读物》半月刊。这封短信曾发表在《少年读物》第二期上。以后的信也是为这个刊物写的。可是刊物出到第七期，就被"法租界"当局禁止了。后来又改出"少年读物小丛刊"。《旅途通讯》作为"小丛刊"的第六种和第七种，分上下两册，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出版（一九三九年）。

在 广 州*

我已经到了广州。

我在前一封信里说了些什么话，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我似乎说到猪和人的事情。

在船上我和猪为伍，而且有余裕写那样的信。在这里我常见的却是另一种东西。那是死。死仿佛就成了我们随处可以碰到的熟朋友。“他”随意地来随意地去，“他”来的次数太多了，因此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虽然“他”有时也在散布恐怖的种子。

昨天下午，我又多了一个奇怪的经验。当时我摊开信纸打算给你写信，一个从东战场归来的年轻朋友忽然来找我谈话。我放下刚拿起的笔，坐到他的对面，回答他的问话。飞机的摩托声突然在我的耳边很清晰地响了起来。一个朋友在窗前惊讶地叫道：“飞机！”我们并不注意，因为先前没有听到警报（其实是发过紧急警报的）。我们仍旧在谈话。但是高射炮响了。街上有人在跑。门口一个年轻人指着天空低声叫着“飞机！”，我和那位新朋友走到门口去看。三架飞机在对面屋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少年读物》第三号。

顶上飞，飞得很高，看起来比我们屋子里挂的玩具的飞机还小。飞机向着我们这面飞来，三架之后又是三架。于是轧轧声大响，高射炮也连珠似地放起来。高射炮似乎没有效力，轧轧声越来越近了。我想大概要落弹了罢。并不要我们等待。一阵恐怖的"飒飒"声就压倒了摩托的响声。这声音自上而下，由远而近，像一簇簇树叶从天空落下来。我仿佛看见一颗炸弹在空中旋转而下，我知道它会在不远处爆炸，甚至会落在我们的头上。我在这里度过不少轰炸的日子。可是这种声音我只听见过一次。今年六月六日三颗炸弹在我们住的巷口附近爆炸时，我在事前听见了那奇怪的声音。

飒飒声一起，一些陌生的人(还有邻舍那位太太带了小孩)疯狂地涌进我们的屋子里来。他们带着轻微的惊呼，一齐往地上蹲伏。炸弹爆炸了，声音不大，似乎落在很远的地方。我觉得奇怪。但是第二次"飒飒"声又起了。仍旧只听见小的爆炸声。大家略为安心。可是飞机还在上空盘旋。在第三次的"飒飒"声响起之后，一个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这间屋子。我在这里用"震撼"二字自然不恰当，因为房间不过微微摇动一下，我还觉得一股风吹到我的腿上，别的就没有什么了。然而在那巨声刚起的时候，我和别的人都以为这颗炸弹一定在我们的头上爆炸。我们的办事处是在楼下，头上还有三层洋房，倘使是一颗小炸弹，我们在下面还有活命的希望。我坐在藤椅上没有动一下，头埋着，眼光固定在一堆校样上面。我微微张开口，我想要是这里被炸，我还能活的话，为了不使耳膜震破，我应当将口张开。

我们定了神，静悄悄地看看四处，眼前还是一个和平的世界。轧轧声消失了。房里没有一点改变。桌上多了一层灰。蹲下的人站起来，慢慢地走出房去。紧张的空气松弛了。我看朋友们的脸，那些脸上好像蒙了一张白纸。可惜我看不见自己的脸色。

飞机去了以后，我们还听见炸弹在远处爆炸。这一次却没有飒飒声。飞机的确去远了。于是先前中断了的事情又继续做起来。那位青年战士也就告辞走了。

一个朋友从印刷局回来，他说在路上看见炸弹落下，以为我们这里被炸了。后来我们知道了被炸的是些什么地方。我想去看林老先生，因为在他住处后面落了三个弹。恰恰在这时林老先生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后面一个防空壕的空地上落了两颗炸弹。虽说是在他住处的后面，却也隔了三四条巷子。

警报还未解除，我约林老先生出去喝茶。我们刚走出巷口，看见前面街上有许多人在奔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件。林老先生问旁边一个书店伙计，那个年轻人说："大概是飞机又来了。你们可以到隔壁去躲一下。"我们没有听见飞机飞近的声音，便不去躲，却穿过街口，往前面那个咖啡店走去。

咖啡店门前是防空壕，有沙包木板保护，所以骑楼下聚了不少的人。我们穿过人丛，进了咖啡店。楼下人太多，大半是避难的。楼梯上也坐了好些人。我们便走上二楼。那里很空。茶房们正闲着。有两三桌人在喝茶饮冰。我们在这里谈了大半个钟头。警报解除了。

我们从咖啡店出来，约好去看“灾区”。我先回到办事地方转一下，一个小孩骑着自行车送校样来了。想不到刚刚经过了大轰炸，印刷工人还在工作，这倒是难得的事情。现在进步了！以前有一家印局在六月六日的大轰炸后就关了门，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四处探讯，才找到我的一部译稿，那还是五月十日左右交去的。

后来林老先生陪我去看“灾区”。我们经过一条大树掩映下的小巷，跨过短墙的缺口，到了一片空地。在那里我们看见炸弹的遗迹。一块土地被搅翻了，成了一个很浅的坑，面积不过一张圆桌面大小。另一处也是同样的情形。一点也不可怕。原来头两颗炸弹就落在这个地方，所以声音不大。这个空地旁边的一所公厕也炸毁了。地上凌乱地堆着砖块。一块木板还竖着，写上“小便处”的木牌也还钉在那里。

我们再往前面走，走进××路。不觉惊愕地站住了。那条街好像经过了激烈的巷战似的，显出十分凌乱的样子。马路上盖着一层白灰。电线落在街心。房屋坍了好几间，一道写着“××里”金字的门墙还立在瓦砾堆中。再过去，一座四层楼的大洋房被炸去了一半，屋顶完全坍下来，四层压在三层上，三层压在二层上，只剩了一个七歪八倒的空架子。此外就是砖块。

一个女人站在对面骑楼下向行人叙说被炸的经过。这对面房屋也受到了炸弹的恩泽。玻璃震破了，坚实的窗架震断了，楼板也落下几块。房里的陈设大都破碎了。好几所房屋都被炸弹的威力扫空了。有人在贴封条。街心有几个壮丁在

维持秩序，但秩序本来就很好。

我们听说法国礼拜堂前面也落了炸弹，死伤的人更多。这一天共有二十多卡车的受伤者送到中山医院去，有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他说有些小孩在卡车上痛苦地哭叫。但是另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故事却更悲惨：一个人从地上爬起来拾起自己的断臂接在伤口上托着跑；一个坐在地上的母亲只剩了半边脸，手里还抱着她的无头的婴儿。

晚上有月亮，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夜袭。但是大家若无其事地到号称广州四大酒家之一的“大三元”去吃饭。我们愉快地谈笑，把白天的经历当作一场怪梦。长堤安静地躺在我们下面。夜市依旧像平时那样地热闹。人在广州学会了镇静，学会了不怕死。我们常常说到玛德里，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想这里的情形和那边的不会有大的差别。

这封信应该在昨天写好，但是昨天没有写。今天早晨八点钟飞机又来炸过好几个地方。一共来两次，直到下午三点才解除警报。飞机来投弹时街上并没有行人，只有几个壮丁维持秩序。飞机一走，警报解除，街上的情形又跟平时完全一样了。

今夜月色很好，我沿着长堤散步，珠江的水面沐着月光，十分明亮。长堤上摆满了小贩的担子。在两次大轰炸以后还能够看见这样热闹的夜市，这是我万想不到的！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一星期前看见的。正南路一条街被炸光了。在仅仅留着的一间残破的楼上我看见一个人的住房。那位衣冠整齐的居住者穿过了瓦砾堆，安闲地经过

破烂的楼梯，登上那间缺少一面墙壁的住房。一个人住在瓦砾堆里，还能够如此从容，这的确是别处很少见的事。它可以说明这里居民的倔强了。

今夜没有“夜袭”。但愿明天早晨飞机不要来打扰我的睡眠，今天上午飞机投弹时我还在睡梦中，我是被警报惊醒以后而又沉沉地睡去了的。

以上的话你们住在上海的人大概不会了解，把它当作故事看也好。

8月9日夜一点钟写完。

广州在轰炸中

朋友，你来信问起这个城市的情形和我的近况，你不知道这里的人在轰炸中怎样过日子，所以你劝我立刻躲避到所谓安全地带去。你以为这里已经成了死城，或者变做了地狱，你还误把我看作死守危城的壮士。其实都不是，我在这里和无数的普通的人一样，过着很平凡的生活。朋友，你应该知道在这里还有数十万和平的居民。

这里也许和你们那里不同。在这里没有勇敢，也没有怯懦。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它来拜访，就让它进来。它走了，左邻右舍也不因此惊扰。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甚至断头折臂也不是悲惨的命运。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倘使轮到自己闭上眼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一个人看见“死”太多，他对“死”便不感到惊奇；一个人有“死”的机会太多，他就不怕“死”。他用不着去思索“死”，他会

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对付“生”的事情。他做事更努力，更负责。这便是我在广州得到的一个教训。

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被炸死的机会，没有谁能够做一个铜头铁臂的人，炸弹的威力不是肉体所能抵挡的。然而甚至五百磅炸弹的乱投也不能使人胆寒。每天敌机飞进市空投弹的时候，许多工作依旧照常地进行。“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我并不是在这里阐明我的什么理论，我只叙述事实。我可以随便举出一些例子，譬如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失；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屋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甘冒危险去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金的热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在灯火管制中也还有大队的群众立在每个献金台下狂呼口号，或者静听台上男女青年高唱救亡歌曲。一切都照着预定计划进行，敌机的威胁也不能使它们改变。倘使一颗炸弹在献金台前落下，自然会有成千的死伤。但是献金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因为吝惜牺牲就让它失败。所以“八·一三”那天早晨敌机已经进了市空，而通常被视作危险地带的永汉分局和第一公园两处献金

台上的负责人员还是照常工作不肯撤退。所以到今天献金台能够良好地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在这里的人看来，这都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

我在这里还是一个陌生者，但是我已经看见了不少的事情。以后我会向你详细叙述它们。至于这里的居民，我不说他们勇敢，我想称赞他们“结实”；对于这种“结实”的人，敌机的威胁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一种暴力能够使他们屈服。

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我会获得不少有益的教训，请你不必为我耽心。

8月15日在广州。

在轰炸中过的日子*

回到这个城市，我又记起许多事情。这里的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不能忘记。我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平淡地过日子，不悲观，也不过于乐观，只靠着一个信念指导我。

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在我都会感到喜悦。在这里我特别想多做事，只是因为我害怕第二天这种喜悦就完全消失。这种害怕并不是“杞忧”，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常来的熟朋友。惨死并不是意外的不幸，我们看见断头残肢的尸首太多了。前几天还和我谈过几句话的某人在一个清早竟然倒插在地上，头埋入土中地完结了他的生命。有一次警报来时我看见十几个壮丁立在树下，十分钟以后在那里只剩下几堆血肉。有一个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过了一刻钟那里就躺着一个肚肠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个地方放了三口棺材，棺前三支蜡烛的微光凄惨地摇晃。一个中年妇人在棺前哀哭。

我们过了一些这样的日子。在那些时候我们白天做事常常受到阻碍。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下降，投弹，上升，或者用机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关枪扫射。房屋震动了，土地震动了。有人在门口叫。有人蹲在地上。我们书店的楼下办事处也成了临时避难室。要在那里继续做我们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一回我听见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目标，听见机关枪的密放，听见炸弹在不远处爆炸，我还埋头写我的那篇题作《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文章，我写下我相信拥护正义的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的话。我并非有意夸耀我的镇静，我承认我是用了绝大的努力，才镇压住感情的波动。所以写完文章我便感到十分疲倦。这样的事我只做过一次。平常飞机来投弹的时候，我在家里，便躺在床上睡觉(后来炸得太厉害了，我便到楼下去躲避)；在办事处，则坐在藤椅上和同事讲几句闲话。有两三次我和朋友在哥伦布咖啡店吃早点，给关在里面不能出来，旁边一条街被炸了，我在咖啡店里看不见什么，玻璃窗给木板遮了大半，外面是防空壕，机关枪弹一排一排地在附近飞过，许多人连忙伏在地上。我不能够忍受这种紧张的空气，便翻开手里的书，为的是不要想任何的事情，却以一颗安静的心来接受死。这时我的确没有想什么。我不愿意死，但是如果枪弹飞进来，炸弹在前面爆炸，我也只好死去。我没有愤怒；愤怒和憎恨倒是在敌机去了以后，我看见炸死同胞的惨状和炸伤的同胞的痛苦而起的。我若不能逃脱，则死也无憾，因为我的尸体也会同样地激起别人的愤怒和憎恨。

敌机去了以后，我们自然继续工作。两个刊物①的出版

① 两个刊物：指靳以编的《文丛》半月刊和我编的《烽火》旬刊。

期又近了。稿子编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样送来就得赶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应当打电话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样。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册。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大半数寄到各地去。于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连一个朋友的九岁孩子也要来帮一点小忙。此外我们还答应汉口一个书店的要求，把大批的书寄到那边，希望在武汉大会战之前从那里再散布到内地去。这类事情都得在夜间空闲的时候做。大家挥着汗忙碌工作，一直到十一点钟，才从办事处出来。我们多做好一件事情觉得心情畅快，于是兴高彩烈地往咖啡店或茶室去坐一个钟点，然后回家睡觉，等待第二天的炸弹来粉碎我们的肉体。

在这样的夜里我有的是无梦的睡眠。人仿佛成了钟表一类的东西。发条开满就走，走完便停。我们好像变成了制造刊物和小书的机器。每天在办事处忙的是这种事情。机器还未损坏，当然要转动。机器一旦被毁，则我也无责任了。我有时就拿这种思想安慰自己。

但是刊物终于由旬刊，变成了无定期刊。印刷局不肯继续排印，以加价要挟，连已经打好纸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出版；至于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书，则因为那个印局的关门，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这其间我去过两个地方。这是六月六日以后我第三次回到广州了。我再见不到六月六日、十三日和二十二日所见的那些景象。六月十三日我走过几条街就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几乎连一个小饭店也找不到。我现在看见的依然是热闹的街市和扰攘的人群。有几处炸毁的

房屋已经被朴素的新屋代替了。炸断的老树上生出了新芽。这个城市的确是炸不死的。它给了我不少的勇气。这个城市便是对我们保证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的一个信物。我能够在这里做我的工作，我太满意了。……

8月16日在广州。

从广州到乐昌*

这是我的第五封信了。

我记不清楚在前一信里我有没有和你们谈过我要去武汉的事，也许我忘记提说，但是这次的旅行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了。在那边的朋友曾经打电报要我去一趟，以后还来过航空信。可是等我把这里的事情料理好、准备动身的时候，粤汉路又意外地给炸断了（这条铁路一年来不曾断过五天以上）。在候车的期间，我接到了从武昌寄来的阻止我到那边去的航空信。

在这时候似乎没有去武汉的必要了。但是困难和阻碍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去看看大会战前夕的武汉，我要到那个大城市和那里的同胞们在一起过些令人兴奋的日子，我要把个人的情感溶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面，纵然只能够在那里住一天，我也要去！于是在前天上午我和两个朋友一道离开了广州。

同行的两个朋友中一个是上海人，另一个是广东人。广东朋友对于广东各地的情形相当熟习。他为了安排旅行和决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十一月一日《少年读物》第四、五号。

定路线，曾经到各处去打听了一天。坐船去清远，再由那里坐汽车到银盏坳去搭火车，这是我们最后的决定。

到清远去的船很小，比省港小火轮小得多，设备自然不好。舱房窄小，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不少的帆布椅，但都已坐了人或者放了行李。我们找茶房交涉了一会儿，他答应在一个角落里为我们添上两张帆布椅。那个广东朋友便回到岸上去搬运行李。等他再来时船上汽笛已经在叫了。

船一开，有些外省客人惊扰起来，据说有同伴上岸去吃饭，没有回来。我们旁边一个广东听差，替三个外省客人占了座位，这时还不见客人来，有些着急。不过现在还只十二点钟，离预定开船的时间尚早。有人知道船是开往太冲口的码头去，在那里停到下午两点钟才开。这样一说，船中的惊扰便平息下去。不久，船果然在一个码头停泊了，还有客人从这个码头上船来。但是广东听差等候的主人始终不见影子。那个相貌不大聪明的听差失掉了耐心，他忽然叫了一只船把行李匆匆忙忙地搬了下去。他占的三个座位空了出来，立刻被人抢去坐了。广东朋友也抢到一个，他欣慰地笑道："今晚上可以舒服地睡一夜了。"其实那三个座位的主人是来过的，那是三个穿制服的女子。她们在岸上慢慢地吃过饭到船上来，才知道行李已经搬回到岸上去了，只得匆匆地走开，说是第二天再来搭船。

船上地方小，客人多，开了船还使人觉得闷热，但又没有甲板可以让我们散步。舱门口也坐着不少的人，要去外面似乎也需要"杀出重围"的勇气，我只好躺在帆布椅上看书，后来

居然沉沉地睡去了。

晚上到了三水，上来的客人更多。差不多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舱里更闷热，有些人开始唉声叹气。也有人在埋怨受不了这种苦。于是什么人高声说话了："是日本人使我们到这里来吃苦的。我们只有努力奋斗，用不着埋怨谁。"他这么一说，埋怨的声音倒立刻停止了。但是外面忽然传说添了一只驳船，要没有座位的人搬到那边去。这个传说后来证实了。许多人都离开了我们这个舱房。剩下来的人也因此略略感到舒畅。

我经过一道小扶梯走到船边，扶着铁栏杆慢慢地走到厕所。灯光暗，天空漆黑，我看不见前面，一个不小心，碰着两个蹲在船边乘凉的人，我几乎失手跌到江里去。从厕所出来，我站在船边，紧紧捏住铁栏杆，举头四顾，凉风迎面吹来，远远地闪耀着一些灯火。江面很宽，在我的周围似乎只有黑的水和黑的天。船早已离开三水了。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们就到了清远。两个强健的女挑夫把我们的行李搬下去，领我们走到旅馆。同船的人大半都到旅馆去休息。这个小城里旅馆不多，都在一条街上，而且都很小。我们走遍各处，找不到一个空房间。我们站在一家新亚旅馆的门前，广东朋友去打听汽车的消息。一个相貌老实的船夫走来向我"兜生意"。我和他随便谈了两三句话，广东朋友回来了，说是汽车下午五点半钟开往银盏坳。我们没有去处，便决定租下这只小船，讲好划到下午五点，并且划过对岸送我们到汽车站去。租钱是一元毫洋。船夫很高兴地把我

们的行李拿起来，我们自己每人也提了一只箱子跟着他走上新亚旅馆的二楼，穿过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才看见一块楼板已经揭起来了，下面有一段很简陋的楼梯，楼梯脚下是江水，那里泊着几只小木船。行李搬到船上，一个中年女人一件一件地接过去放好。船板上铺了很干净的凉席，我们脱了皮鞋睡下去。广东朋友又拿出一元毫洋叫船夫买菜做饭。

船夫刚买了菜回来，警报来了。我们看见岸上有人在跑。左边的警察局门口挂出了红旗。船夫问我们要不要把船开到江心去躲一下，不过他说这里并不要紧，飞机还没有在这个小城投过弹。被炸的地方是银盏坳，飞机差不多天天去，爆炸声连这里也听得清楚。我们觉得没有躲避的必要，便让船夫先做饭。吃过饭我们躺在船上睡觉，听见几声爆炸，也并不注意，便坐起来写信。过了半点多钟警报解除了。我们上岸去寄信，行李全放在船上，也不留一个人看守。

我们到邮局去寄了信，又到各处走了一转。这个城市虽小，倒还十分整洁。我们走倦了，便到一家小茶楼吃一点东西。在那里遇见了好几个同船从广州来的上海人，大概都是要到武汉去的。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他们跟这里的茶房吵起来了，那个短小精悍的中年人气恼地向我们诉苦说："做茶房的人本来该活五十岁的，也只能够活到四十！"

我们从新亚旅馆走下江边，那只小船横在我们的脚下，船夫含笑向我们点头，招呼我们到船上去。我们坐了一会儿，看时间不早了，便要船夫开船。他们夫妇划起桨，船慢慢地往江心流去。船离对岸还有一半的路程，天忽然落起雨来。雨点

很大，我们不好意思逼着船夫划桨，但又不能不着急，怕赶不上汽车，又得在这里多住一天。幸好过了三四十分钟雨点渐渐地小下去。我们知道有天晴的希望了。船夫又用力划桨，使我们居然在五点钟以前到了汽车站。

广东朋友先跳上岸去买车票，我和上海朋友招呼船夫搬行李。行李还未搬完，广东朋友匆忙地跑回来说汽车票已经卖光了，还有些空车子也被人包了去，我们今天恐怕走不成了。大家正在商量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忽然听见旁边两个人在谈论包车的事情。广东朋友便走过去找他们谈话，居然意外地得到允许搭他们的包车，不过没有座位，代价是国币七角，比通常票价贵了两角。然而我们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少耽搁一天。船夫帮我们把行李搬到车上。别的包车都开走了。我们搭的这一辆因为等人，到五点半钟才开出了车站。

公路很好，车子走得相当平稳，我坐在自己的箱子上也不大觉得颠簸。走到半途，车不能前进了，前面有一辆车"抛了锚"，横在途中，堵塞了路。那一车的乘客大都是伤兵。他们因为车子坏了嚷着要将司机打死，后来经一个军官劝阻，却把司机吓跑了。他们没有办法，便把车子横放在路中，使后来的车不能前进。我们的司机下车去找他们交涉了一阵，还没有结果。幸好这时从前面开回来两部空车，伤兵们高兴地上了那两部车子。我们的司机和别的人便把坏车推开，让出一条路，于是车子又往前进了。

到了银盏坳，天还没有黑。我们先把行李搬到月台上，叫上海朋友看守着。我和广东朋友便到售票处去买车票。办事

人回答我们：晚上十二点钟有通车开，可以直达武昌，九点钟才卖票。我们很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海朋友。月台上已经堆满了皮箱、网篮和铺盖卷，许多乘客就坐在皮箱和铺盖卷上面。我们在广州，常常在报纸上看见银盏坳被炸的记载。卖晚报的小孩不断地叫着："敌机轰炸银盏坳！"现在我们到了这里，才知道炸得如何厉害。在这里长住的人自然会知道何处是新伤，何处是旧痕。每一颗炸弹都会留下一个不灭的伤疤。然而我们这些陌生的眼睛看见的却只是一片断瓦颓垣。红砖砌的车站房屋全炸毁了，到处是碎砖断瓦。石阶倾斜陷塌，往南往北都有几个大坑。路牌寂寞地立在瓦砾堆中，"银盏坳"的"银"字被机关枪弹削去了一个角。售票处是临时搭起的草棚，旁边还有一间茅棚是车站职员办公的地方。另一间大约是候车室，只有一个架子，屋顶还不曾盖上。售票处后边的一片空地变成了临时的市场，一大群卖饮食的小贩挤在那里。

广东朋友先去吃了一点东西。后来我也在临时市场里走了一转，正想吃一碗红薯汤，广东朋友忽然跑进来找我，说飞机要来了，站长叫乘客们往各处躲避一下。我们也只得拿起轻便的皮包，往轨道旁边的一条小径走去，一些人跟着走来。前面是一个小树林，有几个人就把行李放在草地上，人也坐下。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在一个农家门前站了片刻，并没有听见机声，看见天色已晚，知道敌机不会来炸车站，便转身回去。到了月台，我们听见人说：刚才有两架敌机在中山县飞过，站长接到电话，虽未发出警报，却也叫乘客疏散，免得临时

发生事故，后来飞机折回去了。月台上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从北面开来了一列火车，这是工程车，只有二节，车上站满了工人。车一停止，他们便跳下车来，有的手里还拿着工具，马上往各处散开。在临时市场后面，汽车不断地从清远开来。我们听见喇叭声，又看见人挑着行李来到月台上。行李愈积愈多。我们在轮船上、在汽车站上遇见的客人差不多全到这里来了。有各种口音和各式的服装。夜幕终于盖了下来。立刻在各处燃起了灯，有汽灯和煤油灯，照亮了月台和临时市场。轨道上还是阴暗的，那里有无数的影子在晃动。我们才注意到许多穿黑衣服的小工不断地从北面走来，其中有一部分是女人，肩上还挑着土。临时市场很热闹，那里有小饭铺，有米粉担，有粥摊。一角小洋吃一碗烧肉饭，五个小铜板喝一碗红豆粥，四个小铜板喝一碗红薯汤。生意真好，后来的人往往站了许久才拿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为了吃一碗牛肉粥往返了三次，才捧到手里，卖红豆粥的担子前也围了一群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地方几点钟以前连一个人也看不见，而且十几小时以后又会是一片荒墟。但是明天晚上它又会活起来，而且像今晚一样地热闹。

铁路上的工作开始了。好几处都有人拿了汽灯照着工人掉换枕木。铁锤敲着钉子发出铛铛的声音。另一些小工挑着土走来走去。未完成的候车室里点着煤油灯，好几个工人用葵叶在盖屋顶。地上放下一大堆葵叶，有人爬上梯子把它们陆续递上去。“今晚上盖得好吗？”一个北方客人自语似地在问。“一定盖得好，”上海的客人这样回答。工人们并没有注意

这些话。他们仍旧严肃地、毫无疑惑地努力工作，和修轨道的工人一样。我想：也许铁轨明天又会炸断，房屋明天又会成为灰烬，但是这样的工作精神是不会消灭的。水永远向前流，山永远青绿，这些人的工作，也永远存在。他们没有悲观，也没有乐观。他们只知道沉默地、不屈不挠地埋头工作。几十架飞机一年来接连不断的轰炸，甚至不能够阻挠这一个小站的工作。在这里我看出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里我们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得到了更有力的保证。

通车还不见来。有人传出话：今晚有两班车，除了通车外还有一班开往乐昌的慢车。过一会儿又有人来说：通车没有了，只有慢车。到售票处去问也得不到确定的回答，我们只好等候着。旁边三个大学生忽然谈起坐汽车吃亏的事。他们三个人一共花了三元半大洋，包车由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人经管，包车费不过十八元小洋，一辆车却坐了二十多个客人。包车的人不但坐车免费，反而赚到一笔钱。一个上海的女客也过来讲她花了国币一元搭车的事。她遇见的包车者是穿军服的政治工作人员。她和别人搭车时还说了好些哀求的话，想不到却让那位"慈善家"赚了钱。她诉苦道："在上海别人把我们当作难民赒济我们。现在他反倒在我们身上赚钱。"她鼓动那三个大学生去向包车者交涉退还余款。其中有两个果然去了。我看见他们和穿童子军制服的人讲了许多话，却听不见一个字。后来他们回来，我才知道交涉失败了。包车者说他把多余的钱送给汽车公司了，可是拿不出什么证据。至于那位女客是否向她的包车者要回钱来，我就不知道了。

这时一个湖南伤兵和一个广东兵因语言误会在旁边吵了起来，广东兵的连长走过去劝解，误被湖南兵用竹竿打破了眼镜，于是广东兵大声喊“打”，几个人走过去把湖南兵吓跑了。湖南兵跑进了黑暗里，前面却发出几声枪响。月台上的人又惊愕，又愤慨，以为广东兵开枪打湖南兵了。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的是守路的兵。他看见人跑，又看见后面有人追赶，以为逃的是小偷或者汉奸之类，要那个人站住，那个人却只顾往前面跑，所以他放了枪，幸好并没有伤人。以后湖南伤兵也回去了，由路警把两方找去谈判一番，结果湖南伤兵赔广东连长眼镜费二元了事。

火车来不来，还没有消息。上海朋友在行李堆上睡着了。广东朋友站在旁边和别人谈论语言误会的事。我闷得很，便去临时市场喝了一碗红豆粥，一个人在后面散步了一会儿。天空落下了细雨。我连忙回到月台上去，正看见广东朋友和别的人都拿了葵叶来盖在行李上面，我也就放心了。

雨立刻停止了。到了十一点钟还不见开始卖票，我也倚在广东朋友的大铺盖卷上打盹。我觉得很闷，好像有什么东西贴住我的咽喉似的，仿佛又在做噩梦。十二点钟到了。月台上很静，许多人都把葵叶垫在地上睡下去。但是过了半点多钟，一个可怕的消息来了：今晚没有车，南下的车到了连江口，就折回去了。明晚才有一班开乐昌的慢车。这个消息在月台上引起了大的骚动。广东朋友去问站长，证实了这个消息。一些客人气愤地埋怨着，跑去向站长交涉。广东朋友也去了的。过了一刻钟，他们听见站长向各处打电话都没有结果。这时

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五个小时以后敌机就会来这里轰炸。车站上有这么多的客人，谁不害怕这个悲惨的命运！连站长也因为责任的重大而惊惶起来。他临时打电话到清远去叫了七部大汽车来，把一部分客人送回清远。再让另一部分客人搭工程车去前面两三站躲避飞机。我们决定回清远，便把行李搬到我先前散步的地方去等候汽车。

快要到两点钟的光景，第一部大汽车来了。我们连忙挤上去。车内没有电灯。门口已经被客人的身体堵塞了。广东朋友提着两件行李没法挤上车去。上海朋友也已消失在人堆中。我在后面看守其余的行李，等得不耐烦了，便拿起一个皮包从侧面攻击，居然被人推上了汽车，但是已经找不到座位了。广东朋友从窗口把行李运进来。我们三个人都在汽车里面了。上海朋友坐在箱子上，广东朋友站在车门边，我站在车内。里面是一片黑暗，外面有微暗的灯光。站在门边的广东朋友大声叫起来：“开车，热死人呀！”别的人也这么叫了两声。但是没有用。卖票的说要先卖票，可是票子又没有带来。在车里等一分钟也使人觉得有一点钟那样长久。闷热、黑暗、恐怖，……未知的前途……谁都不能够忍耐了。大家逼着司机开车，司机还是要等着卖票的吩咐。有几个客人先前坚持着不买票，这时也愿意出几个钱以便早点找到一个地方休息。过了一些不安的时刻，卖票的带来了一种临时的车票。到清远的票价是国币五角，但是只有三分之二的客人买了票。车内太拥挤，卖票的也无法清查。于是汽车开动了。车子走的全是来时的路。不过车头那一线灯光使我们看不清楚周围的

景物。我们只听见车轮转动声。车身颠簸得很厉害，我几乎站不住了，一个兵士占了两个座位，这时便缩回他的伸直的脚，让了一个角给我。我刚坐下，车一动，别人的皮箱又碰到了我的膝头。可是广东朋友连这样的一个座位也找不到！

车终于到达小市汽车站。我们又回到清远来了。在拥挤中勉强把行李搬到地上，我们看表，才知道已是两点多钟了。广东朋友先出去，想在这附近找个旅馆，免得深夜过江。这里果然有一家旅馆，但是地方小，而且没有空房间。我们只得雇了一只小船把我们连人带行李一起载过江去。

夜色渐渐地淡了，天空灰白，山、树、房屋静静地蹲伏在一边。船夫划起桨，船缓缓地离开了岸。我们坐在舱内，"活活"的水声催眠着我们的疲倦的脑筋。我没有精力再想以后的路程。我垂着头打盹。船走得很慢，过了许久才到了对岸。依旧是广东朋友上岸去找旅馆。我照料着把行李搬到岸边。广东朋友一去就不见回来。船夫等得发急了，催促我们走。我没法对付他们，只得吩咐他们把行李搬到清江旅社去。我盼望广东朋友能在那里找到一个房间。但是我们跟着船夫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耽心我们是否会因为找不到旅馆而睡在街头。

我们进了旅馆，一切的疑虑都消失了。广东朋友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有两张床，一天的房租是一元七角小洋。我们刚把行李搬进房去，就听见外面走廊上有人讲普通话："我们还要二十五号。"二十五号便是我们住的这一间。那几个客人原先住在这里，也因为去银盏坳搭火车才退了房间走

的。现在他们回到清远来，比我们迟一部汽车，因此来迟了。

这时已是三点多钟，我非常疲倦，就倒在床上睡了。上海朋友也占了一张床，广东朋友愿意摊开被褥睡在地上。我睡得很好，直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景，才被广东朋友叫醒，他告诉我：飞机来了，下面街上有许多人在跑。我侧耳倾听，果然有轻微的机声自远而近。我对朋友说，敌机不会炸这个地方，它们一定是飞往银盏坳去的。我们用不着躲避。以后我又闭上眼睛睡去了，一直睡到吃午饭的时候。

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又到了对岸的汽车站。在那里遇见不少的人，都是昨天在银盏坳火车站月台上看见过的。今天还没有开出一部车子。办事人说要等到银盏坳火车站有电话来才决定卖不卖票。有几个多忧虑的客人便扬言今天又不会有北上的火车。一些外省客人听见这样的话又烦恼地发出了怨言。广东朋友爱说话，喜欢出主意，说普通话也还流利，因此被那些人推举做代表，去向汽车公司办事人交涉。他到售票处去了一会儿，似乎并没有结果。过了半点多钟，大家正聚在站内空地上失望地谈论的时候，忽然有人来说开始卖票了。起初我们还不相信。但也有几个人跑去买票。我们看见他们拿了票子回来，才知道今晚真的有车。

我们买好车票，便提了行李到车棚里去上车。别人叫我们到第二号车上去。我们走到第二号车门口，却被一个说四川话的军官（其实是一个政治工作人员）拦住了。他不让我们上车，说里面没有地方。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车里还有几个空座位。我们不顾他的拦阻硬把行李搬了上去。他喃喃地说着

抱怨的话，一个人下车去了。我们在车上找到了位子坐下。广东朋友上来较迟，只得站在门边。四川“军官”已经搬了两次行李上车。最后他押送一只大箱子上来。这时车上除了我后面一位女客多占一个位子、她对面那位穿制服梳两根辫子的女人给四川“军官”留着一个座位外，就再没有空地了。广东朋友站在门边，他的存在使得大箱子不能再往前移动一步。可是四川“军官”又无法使我的朋友消灭。他只得叽哩咕噜地抱怨着。我后面那位女客是和“军官”一起的，她慷慨地发言，要广东朋友坐到她身边去。广东朋友听说有人让坐，便高兴地“爬”进来。他原先站的地方就被大箱子占据了。广东朋友道了谢坐下。四川“军官”又下车去，他那个穿制服的女友要他快点回来。他的一只脚已经离了踏板，他还掉过头来得意地说：“我不来，他敢开车吗？”这时又上来一个穿长衫的客人，他和“军官”问答了两三句。我后面那位女客看见他上车，便伸长颈项高声唤他。他费力地“爬”了过来。可是并没有座位。女客坦然叫广东朋友站起来，她说这个位子是她留下的。广东朋友的头差不多和那位客人的碰在一起了。他不知道应该把身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才好，便说：“你们要我搬到什么地方去？”那位女客也生气地说：“这个位子明明是我占了的。”男客自然随声附和。广东朋友愤愤不平地向男客分辩道：“不是我自己坐下的。是你的朋友叫我坐的。”男客听见这句话勃然作色道：“什么朋友！她是我的太太。”这声明并不能使车中乘客对那位有太太的人表示敬意，反而激起了人们的反感。我听见了冷笑声，有人出来说话了。对于太太和朋友的问题谁

都不感到兴趣。后面一个客人把行李移开一点，让出一块空地位给广东朋友。广东朋友虽然心里不大高兴，但也就挤过去勉强坐下，不再跟那位有太太的人争论了。

司机上来准备开车，众人的心稍微安静一点，以为车子开动后，车中的闷热就会被凉风吹散。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汽车的马达发生了问题，司机下车去修理，也不见效。乘客们不得不下来改搭另一部车。这次我们跑得快。居然在另一部已经有了半车乘客的车子里找到三个立脚的地方。司机看见车中装满乘客，并不等那位“军官”把他的大箱子搬来就大胆地把车开走了。

车走到中途，忽然现出疲乏的样子，好像立刻就要停下来了。乘客中有人开始耽心车子会在半路抛锚，更害怕会因此搭不上今晚的火车，一路上抱怨着汽车公司。但是司机仍然镇静地勉强开着车子前进。汽车并不了解乘客们的焦虑，它似乎故意在跟他们为难，它不但愈走愈慢，而且走了一段路就索性站住不走了。司机捺着性子下车去修理了一会儿，使它喘着气慢慢地继续走这一段路程。

这时谁都不敢相信车子会把我们载到银盏坳，可是大家除了在车上安静地等待外又没有别的办法。阳光慢慢地消失，周围的景物在我们的眼前逐渐隐匿。夜来了，我们还不曾走完三分之二的路程。每次车子剧烈地颠动，我就以为它会停下来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不愿意想象这以后的情形，却保持着坦然的心境，把一切交给这辆破旧的汽车去决定。

我们对这辆车子已经不存一点希望了，它却意外地鼓起

最后的勇气赶到了银盏坳。仅仅隔了一天，银盏坳车站又改换了面目。我几乎不认识它了。昨天我散步的地方落了一颗弹，在地上炸出一个大坑，拦住了汽车的路。车子仓卒地停下来。我们搬下行李，给一个挑夫挑着。广东朋友用电筒照亮路，我们慢慢地踏着隆起的土堆绕到前面去。也有人害怕跌倒就俯下身子爬行。我们到了月台，火车已经停在那里了。广东朋友去买了三张票回来，才知道这还是开往乐昌的慢车。靠月台有三辆客车，连门也被人和行李封住了，我们无法挤上去。再过去就只看见货车，车内没有一盏灯。前面似乎还有不少的车皮，但是我们不能断定有没有客车。挑夫不愿意再走，他劝我们暂时把行李搬上货车去。我们不相信前面就没有一辆客车，所以坚持着要看清楚最后一辆车皮。挑夫也只好跟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终于找到了三四辆客车，里面似乎很空，不过没有电灯，又不干净。但是我们也管不了这许多，就让挑夫把行李全搬了上去。

广东朋友用电筒把车内各处照了一下，才发见车厢很小，而且破旧不堪。地上到处都是尘垢，连坐的长凳也被人拆去了两排。我们在残留的凳上找到空位坐下以后，一股霉气就扑进我的鼻端来。广东朋友对这个车厢并不满意，后来又听见旁边一位福州口音的退伍军人不停地跟一个河南乡下人开玩笑，他不能忍耐了，拿起电筒到前面车厢去了一趟，回来就劝我们搬到前面一辆车里去，说是那里空得很。我们靠着电筒的一圈亮光照路，分三次把行李搬了过去。那是一辆“守车”，里面只有靠右一排长凳。没有窗户。一个从胶济路撤退

下来的铁路职员把他的箱子、包袱堆在长凳上，自己却在地上摊开被褥睡下了。他劝我们在右边的一角约占全车厢四分之一的地位，安置了床铺，用我们带的四口箱子做界石。一个人睡在长凳上面，两个人睡在地上。我们躺下以后，便和那个铁路职员在黑暗中闲谈起来。他是北平人，原先在胶济路机车上烧火，现在被调在粤汉路服务。这次他到衡阳去。他对于每个火车头都很熟习，就像是一个一个的老朋友。一听见叫声，他便知道那是从第几号车头发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铁路上的事情，大半是关于火车头的。譬如某号车头撤退到什么地方，某路车头因为来不及南下，而开到黄河里去了。正太、同蒲两路因为路轨窄小，工人没法把车头开出山西境外，只得用炸药将它们炸毁。他知道的事情真多，但是他并不晓得这列车今晚什么时候从银盏坳开出。

我们觉得肚饥，广东朋友想下车去买点饮食，但是这里离“临时市场”远，道路崎岖不平，又没有路灯，开车时间也不知道，他害怕回来赶不上火车，所以迟疑半晌，终于忍住饿不下车了。

前面还有一辆车，是给车长住的。车长还没有来。一个小工提了灯上车，就挂在车内。过了一会儿查票员上车了。他很客气地和我们谈了许多话。我手边有一本汉口印的《日寇暴行实录》画册，是广州友人给我的。这本书虽是宣传册子，但是见到的人并不多。我因为查票员谈起他在广州轰炸下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愤慨，便把这本书借给他看。他拿去在“车长车”里把一幅一幅的图画仔细看过了，回来用颤抖的声音对我

说："多谢你，看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仇恨我不会忘记的。"我感动地接过了画册。

一小时以后才开车。车快开时又上来几个客人。有两个广东少妇，在我们的"界石"外面铺一床凉席坐下了。我渐渐地瞌睡了，终于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不知在什么时候我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只听见人在叫："起来，起来！你晓得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吗？"我连忙坐起来，用手揩眼睛。眼前一片亮光刺得眼睛发痛。那个烧火的北平人马上收了被褥站起来，那番话是对他说的。他笑着回答道："我晓得，这是邮政车，我让你们就是了。"别人不理他，却忙着把一件一件的邮袋搬上车来。广东少妇在抽烟，受到了邮局人员的干涉，他们还要她们也让出地方，这时一个男人出来说她们是站长的亲戚，因此别人也就不说话了。

车里尽是灰尘，一粒尘土进了我的左眼，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我仰卧着用力揉眼睛，最后好容易才把尘土弄了出来。邮局人员没有注意到我们，让我们安静地睡去。邮袋堆得高高的，占了全车的一半的地位。我仿佛听见人说这些邮袋是从广州运来的。我还看见"上海邮局"的字样。

第二天一早，车到连江口，我才睁开眼睛，慢慢地坐起来，看见自己一身衣服差不多变成了黑色，又看车内装满了邮袋，邮袋中间夹杂着好几个人，觉得好笑，但也没有笑出声来。正好下面有老太婆提着面盆卖脸水，我们买了水洗过脸。我睁起眼睛躺在地上，不想下车去看看。车开了。后来到了英德，这是一个大站，我们都跳下去，在站上吃了一角钱一碗的烧肉

饭，喝了一个铜元一碗的冷茶。月台上十分热闹，不像在战争时期，我们也未见到轰炸的痕迹。

车在这里停了许久。没有警报。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离开英德以后火车头似乎出了毛病，愈走愈慢起来。有一回车忽然在中途停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说："要躲警报了，"却又不见动静。后来才知道还是火车头出了事，走不动。但是不久车又动了。快到沙口时，车终于停了下来。沙口车站就在前面，看得见却走不到。有人焦急地抱怨道，要是这时来了敌机，全车的人一定死尽。车长没有办法，只得差一个人到沙口车站去，要那边派一个火车头过来。那个人去了许久不见回来。众人的焦灼跟着时间增加。我不住地淌汗，一件衬衫全湿了。车上热得叫人难受。幸好没有警报。火车头意外地在前面叫了。那个烧火的北平人马上报告开来的是第几号车头。他的报告是不会错的。以前火车头在后面推着车动。这次火车头却走在前面拖着列车进行了。

这以后列车的前进再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只是在每一个车站停靠的时间太久。在韶关站上我们还遇见从武昌开来的通车，说是开往连江口为止。车上有不少的乘客。到了晚上九点钟，我们才看见受过多次空袭只剩下断瓦颓垣的乐昌车站。乘客们忙着下车，在黑暗中摸索着搬运行李。广东朋友主张我们留在车上看行李，让他先下去打听通车的消息。照他的意思，要是今晚没有车，我们不妨就在这个车厢里睡一夜，这是邮政车，不会开到别处去的。我和上海朋友都没有不同的意见。广东朋友便跳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别的人都走了，广东朋友还不来。邮袋开始被人搬下车去，我们在车上过夜的好梦打破了。邮袋搬空以后，我不能够再忍耐了。列车随时会开走的，我们应该马上把行李弄下车，否则我们会被它载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一想我着急起来，连忙和上海朋友合作在黑暗里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搬到车厢口，恰好广东朋友打着电筒来了。行李下车以后，广东朋友告诉我们“广武通车”明天上午开到这里（从连江口开回来），停二三十分钟开车，我们今晚可以在乐昌城里找个旅馆过一夜。我们商量了一会儿，仍由广东朋友去找了一个挑夫来，将我们的行李捆好挑进城去。

我们走出车站。连石级也被炸成东一段西一块的，它们绊住我们的脚。我们不认识路，而且看不清楚街道，但也只得移动着疲倦的身子糊里糊涂地跟着挑夫走。有几次我不大注意，几乎把脚踩进水荡里面去。大约走了半点钟光景，我们到了粤汉酒店的门前。但是这个旅馆已经客满了。我们又去另一个较大的旅舍，也吃了闭门羹。我想今晚上要是没有一家旅馆容纳我们，我们就回到车站去，在月台上睡觉也是好的。不过广东朋友还有勇气到别处去问，这勇气终于不曾使他失望。他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房间，而且是这个旅馆中最好的一间，在二楼，有一排临街的窗户。房价只合大洋七角多一点。这个城里还没有电灯，我们房中方桌上放着一盏破旧的煤油灯，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的“陈货”了。

我们到了乐昌，旅程算是告了一个小小的段落。明天上了通车，我们就可以安稳地睡在车上，让“铁马”把我们一直载

到武昌去。离开广州后走了四天，现在脚迹还是在广东境内，这不能不说是“太慢”。但是这“太慢”并不能使我们灰心。我们一步一步地逼近目的地，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明天，新的旅程要开始了。我知道，以后走的一定是坦途，这以前的可以说是崎岖的山道。朋友，请你们为我庆幸，我是一步一步地逼近那个吸引着全世界目光的武汉三镇了。

9月下旬在广州追记。

广武道上*

听见了好几次鸡叫，我们才起身。茶房提着水桶送洗脸水上楼来。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旅馆的人都说湖南话，我听起来十分明白。我们付了账，便要茶房去给我们雇人力车，因为我从临街的窗户望下面，街上还很清静，店铺关着门，行人极少，只有几辆空着的人力车慢慢地拖了过去。

过了片刻，茶房回来说人力车夫要价不对，还是雇挑夫好。我们觉得他的话不错，便请他代雇了两个挑夫。挑夫挑着我们的行李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随，还是走昨天来的那条原路。渐渐地看见行人多起来了。在路上遇见几个熟人，都是在银盏坳和清远小市两个车站上认识的。大家相对笑了笑，又往前走了。挑夫走得很快，我们也只得加快脚步追上他。这条路白天走起来比在夜间容易得多，并不要多少功夫，我们就看见轰炸后车站的废墟从稀疏的树木中露了出来。在废墟上新的葵叶作屋顶的竹篱茅舍傲然耸立着，似乎在向敌机挑战。月台上堆满了箱笼，不少的人坐在行李上。火车还没有开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少年读物》第七号。

我们知道来得并不迟，便不着急了，安详地向车站走去。对面是炸后倾陷的石阶，但是从那石阶上下的人还是很多。阶下两边路上摆着不少卖饮食的担子和摊子。生意都是非常好，每一处有几个人围在那里，一面吃喝，一面谈话，大半是外省的口音。我们先把行李放到月台上，自然也是经过那石级走上去的。上海朋友看守行李，我和广东朋友去买车票。

售票处已经跟着全部车站的建筑物化为灰烬了。现在的临时售票处只是一个简单的茅棚，但是人们在那里面仍旧照常尽职地办事。工作很忙，两个职员手不停挥地劳动。我们应该等候我们的轮值。广东朋友要我先去吃点东西，以便过一会儿跟他替换地看守行李。我把票价交给他，就走出月台，下了石级到外面卖饮食的地方去了。

我在一个卖绿豆粥的担子上吃了两碗粥，作为早饭，只花去铜板十六枚。看行李的上海朋友也来了(看行李的职务现在交给了广东朋友，他买好车票回来了)，吃了一碗馄饨面。我连忙跑进月台去跟广东朋友换班，使他也有吃饭的功夫。

我坐在铺盖卷上，看着前前后后无数的客人和行李，很奇怪这许多人和这许多东西昨晚上藏在什么地方？乐昌城里几家小小的旅馆容纳不下这许多人和箱笼，况且我们进城时好几家旅馆早已客满了。旅馆街一带停着好些军用车，这里已经成了交通要道，公路的运输一定很繁忙。那么旅客的众多也是很自然的了。但粤汉路的炸断，乐昌站的换车却是近日发生的意外事，好些天来凭空添了这许多过路的客人，他们在什么地方歇脚呢？我这个疑问不久便得到了回答，有人告诉

我他们就在车站上过夜。我相信这是真话。我想昨晚上我们如果找不到旅馆，恐怕也会回到车站来过夜罢。

吃馄饨的上海友人回来了，我刚刚站起把铺盖卷让给他坐，火车意外地开到了。月台上立刻骚动起来。列车喘着气向我们逼近，它还挣扎着不肯停下，但是终于吐出最后一口气站住不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上车。窄小的车门被人和行李堵塞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痛快地走上去，大半是挣扎了多时才被后面的人连推带挤地送上车去了的。

我们买了二等车票，打算坐卧车，但是车厢离这里远。广东朋友也没有回来。我恐怕迟了找不到卧铺，不能够再等他，便跑进里面去叫他出来。他正坐在一个饭摊前面，手里端了一碗白饭，桌上放着一碟油鸡。他只吃了两口饭，听见我唤他，连忙放下碗付了钱跟我走了。

我们把行李提到前面去。我先走。我第一个上了二等卧车，看见里面有空房间连忙占住，又和茶房讲好了。两个朋友把别的行李也搬上来。我们三个人坐在这个舒适的房间里，想起昨天在邮政车中的生活，仿佛做了一场梦。

这列车是从连江口开来的，昨天傍晚我们的慢车到韶关时，我们在那个车站上遇见了它。它只开到连江口，便掉头往武昌开去，现在才到了乐昌车站。它在这里停不多久，又得往前面走了。

乐昌前面的大站是坪石，过了坪石便是湖南省的土地。从乐昌到坪石，这一段铁路的修筑一定费了很大的工程。一条曲折的河蜿蜒地在两边的高山中间爬行。铁轨就沿着这河

流弯弯曲曲地伸出去。群山连接着，似乎就没有尽头。这里有的是崇山峻岭，上面全盖着密层层的绿树。从车窗望出去，可以说是一碧无际。修路时，劈了山，凿了洞（这一带有不少的山洞），而且路轨跟着山与河不断地转弯，这工程确实是伟大的。我们坐在中部的车厢里伸出头去，可以看见车头和车尾，还看得见车子怎样转弯，车头怎样钻进山洞，和车尾怎样从山洞里出来。我们又看见河水缓缓地向前流着，一些木船（在车上看来它们真是小得和玩具一样）顺着水势毫不费力地淌了过去，另一些船逆流而上，却被流水无情地拦住，靠着那些拉纤人（他们在沙滩上走，真像是《格列佛游记》[1] 中小人国里的百姓！）的力气，它们才勉强前进了几步。我们也看见两只沉没的船覆在河边水浅的地方。我们还看见对面山脚下的稀落的房屋和庙宇。

火车还没有到坪石，出了某一个山洞不过十分钟的光景，忽然在中途停了下来，但是马上又开动了，这次却是向后走的。我们正在惊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想也许是有了警报，可是又不能断定。过一会儿，列车进了后面那个山洞，马上停了。车厢里亮起电灯。走廊上有人谈话，那是茶房的声音，好像在讲停车的事情。我们便把茶房叫来询问。这是一个很和气的北方青年。他告诉我们火车停在山洞里躲警报，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开车。

山洞里很闷热，空气带了煤臭，昏暗的电灯光使我看不清

① 《格列佛游记》：英国讽刺作家乔·司威夫特(J. Swift, 1667—1745)的著名小说。

楚用五号字排印的书。这样长的等待折磨着我们的心。我们只好躺在铺位上昏昏沉沉地睡去。可怖的梦魇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在梦中挣扎……挣扎……

车开了。清凉、新鲜的风从半开的窗户送进来，救了我。我醒来了。依旧是雄伟的山岭与曲折的河流，孕育着无穷的生命的绿色覆盖了我的梦景。风吹散了记忆。高爽的蓝空里没有云翳，我的心里也没有。我欣慰地微微笑了……

列车到了坪石，车站上红花盛开，带有西洋风味的建筑物是完好的。这里没有一点战争的痕迹。车停下来。铁路上的工人忙着上水。我下车在月台上走了几步，又昂头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觉得十分畅快。我拿在银盏坳候车时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以及在山洞里闷热空气中渴望解除警报时的心情来跟这时的心情相比，真可以说是“苦尽甘来”了。

晚上到了衡阳，我想下车去看看这个抗战的未来的重镇，但是茶房害怕军人上车占据位置，等着这里的客人上下车后，便把车门锁上。我听见兵在外面动气似地打过门，后来也就寂然无声了。我终于没有下车。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半钟的光景，火车在开往长沙的途中忽然停下来，接着又往后退。我耽心这是因为警报。果然火车完全停了。茶房来通知：现在有警报，要客人都下车去躲避。行李不会遗失，他要把房门锁上。我们没有别话可说，便穿好衣服出了房间，经过走廊，走到门口，然后跳下车去。

我们沿着田畔一条小路走去，不少的人走在我们前面，后面也有人，连成了一条线。但是经过一个水塘，人们便分散

了，有的人一直往前走，有的人朝右面转了弯，有的就在塘畔蹲下来。还有一部分（应该说是大部分）乘客则朝跟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去。在二等卧车中服务的两个茶房也都来了。他们每人拿了一床毛毯，颜色和泥土一样。他们就在塘畔斜坡上坐下，把毯子放在身边。我随口问他们把毯子带来做什么用。他们说等着飞机来时他们把毯子盖在身上，飞行员就不会看出他们。这里坡上有一条小径，道旁有一排树木，的确是一个躲避飞机的好地方。然而据我的一个有经验的朋友说，敌机每次袭击我们的火车，总不忘在水塘树林附近投弹和用机关枪扫射。我的一个弟弟今年六月里在广州西村车站附近遇到一次这样的事情。他看见水塘里落了弹，炸伤五个在旁边避难的客人，他们刚从汉口来，因警报下车躲避，却遇到了这样的灾祸。从这事实看来，水塘和树林都是不大可靠的。但是我也不想再往前面走了。反正我们没有听见飞机的声音。它们会不会到这里来，还不知道。

我们三个人又走了几步，拣了一个干燥的地方坐下，一面看山，一面看水，并不紧张，不像在避难的样子。但是广东朋友坐不惯，忽然站起来，独自往树林（其实只有稀落的一些树木）中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叫我们也到里面去，说那里有人家可以让我们歇脚，又有茶给我们喝。他还说那家的主人对他非常客气，还和他谈过一些话。我们听见他讲得起劲，也感到了兴趣，同时我又觉得口渴，想喝茶，便站起来，跟着广东朋友走上坡去。我们走了两三步，便看见那家主人出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点头微笑，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坐。我们说了两

三句谦虚话，也就跟着他向房屋走去。一条黄狗走过来惊奇地看了我们两眼，但又和平地摇着尾巴走了。

这是一所旧式的瓦房。我们上了石阶跟着主人跨过门槛进去，进的是“堂屋”，还算高大，看得见画着太极图的横梁。靠壁还立着神龛。墙壁上贴了四张辛亥革命时的宣传品，是用木板刷出来的。一张方桌，几根板凳，两把竹椅。一个肥胖的老太婆坐在竹椅上摇着葵扇。主人指着方桌上放的几个盛了茶的杯子，要我们自己随意吃茶。我们喝了茶，他又让我们在板凳上坐下。然后一个小姑娘来依次地给我们三个人打了洗脸水。主人说这里离长沙还有三十多里路。他是商务印书馆工厂里的印刷工人，最近请了两个月假，回来在家里做点事情。他又说这里不大要紧，飞机常常经过，还不曾投过弹。长沙却炸得厉害。他姓罗，但是我们从横梁和神龛上知道这家主人姓陈，广东朋友也是姓这个姓，所以他热心地追问陈姓的去处。我们听说这里原是陈姓的祠堂，后来才租给罗家住的。

这时一个年老而精神健旺的农人从外面进来，蓝布衫的两袖挽到肘边，手里捏着一支旱烟袋，赤脚上穿了草鞋。主人给我们介绍，我们才知道他有几个儿子，一个已经从法国毕业回来做事了，还有两个在清华大学读书，而他自己却始终过着农人的生活。我们正在谈话间，飞机来了，发动机的声音非常响亮。在外面叫嚷的三个小孩，立刻静下来。一个穿白衣的剪发少妇跑到阶上，刚刚站住喘一口气，却被主人喊进堂屋里来了。“穿白衣服的出去不得！”主人严肃地说。我是穿着白色西装的。

大家静静地倾听机声，机声愈来愈近，就像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一样。站在外面的人都走进来。没有人说话。只有主人挥着手低声重复地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它看不见什么，不会丢炸弹的。"其实没有人注意他的话。

飞机的声音渐渐地小了。有几个穿深色衣服的人便跑出去看飞机。主人说："一定是去炸长沙。"他的经验果然不错。不久高射炮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听得见两颗炸弹的爆炸声。"又在投弹了！"广东朋友愤怒地说，他就跳出门槛去。这时意外地在我们的头上又响起了马达声。"又来了，"主人用低沉的声音自语道。没有人答话。外面的人似乎也并不害怕。等到机声完全消失，只有林中的鸟语经过寂静的空气送到我们的耳里时，广东朋友才高兴地跑进来报告：一架中国飞机飞过去追赶了。

以后也没有再听见飞机的声音。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不等警报解除，便告辞走了。临走时广东朋友拿出两角钱递在小孩的手里。主人起初还不肯让小孩接受，后来也就不推辞了。

我们走下斜坡，经过水塘，看见前面不少的客人从各方面回到火车去。我们还以为警报解除了。但是走到车窗下，看见茶房从走廊上伸出头来，我便问他：警报解除没有？又，什么时候开车？他回答说：警报没有解除；至于什么时候开车，连他也不知道。这时已经有一部分乘客上了车。广东朋友也跳上车去。我和上海朋友嫌车里闷热，就站在下面；但是下面阳光太强烈，晒得人头脑发昏。要散步，又没有地方可走：近

处没有荫凉地；走远了又怕火车开时赶不上。后来我们也只得回到车上房间里去。

敌机终于没有再来，先前的那一批往另一条路走了。它们不会走原路，因为它们害怕在中途被中国飞机袭击。

我们在车上吃好饭，火车才开动。下午三点多钟列车到了长沙车站。我们从车窗里看见只剩下空架子的六国饭店。听说这是最近炸毁的。从前交通旅馆被炸的时候，有两对夫妇在那里举行结婚典礼。但是炸弹毁了青春的美梦：一对中的新郎死了，另一对则失去了新娘。此外还死去不少的贺客。现在长沙的车站还是很拥挤的。搭车的客人似乎比其它地方多得多。他们被三道栅门拦阻了，等到栅门打开，众人便奔命似地向列车扑来。在一阵骚动之后他们全给塞进车厢里了。然而月台上还是很拥挤的。工人们忙着做“上水”的工作。“交通服务队”认真地维持秩序。……停了半个钟头以后列车又往前开走了。

此后我们就再没有遇到困难，更不曾碰到意外的事情。晚上我放心地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光景，我们便到了武昌。

第一个车站是武昌总站，这里炸得很厉害。以后就是徐家棚车站（东站）。没有警报。我们从容地押着行李走出车站，跟着大群的客人去搭往汉口的轮渡。在码头上我看见了红绿颜色纸张的标语，里面有一个是：“动员民众保卫大武汉”。

9月下旬在广州追记。

汉口短简

我在汉口已经住上半个月了，还没有向你们报告武汉的情形。我觉得至少需要一篇一万多字的长信。可是我目前没有这样的余裕，同时也不能使我的激动的心宁静下来。在这里谈话容易，做事容易。然而要我端端正正地坐着拿起笔写字，那就太难了。你们要知道敌人的军队已经向武汉三镇逼近了，他们只要坐四个钟点的汽车就可以赶到这里来。

在这里法租界的四周已经竖起了铁丝网，特三区也装上了铁门，江边依着堤筑好了工事。在武昌蛇山上我还看见了战壕。马路上常常走过唱着保卫大武汉歌曲的青年男女的小队伍。武汉似乎很危急了。但是武汉还是很安全的。我住在这里就仿佛住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晚上总有好些朋友到我住的旅馆里来，谈论保卫大武汉的事情，和他们的种种计划。我这个房间仿佛成了他们聚会的地方。还有些多年不见的朋友也在这里出现了。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不会感到寂寞的。我没有一刻不是和三个以上的朋友在一起。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房间里也有五六个人。一张不够长的长沙发使我的颈项睡得麻木了。但是五六小时的睡眠并不曾使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感到疲乏。在这里我们过的是兴

奋的日子。

在这里我参加过宴会，我游过东湖，我看过电影，我坐过咖啡店。这里也有热闹的市面，也有歌舞升平的景象。我住的旅馆并不在租界里，但是附近的店铺到晚上还是灯烛辉煌。人走在这些街上，不能相信四小时汽车路程以外的激烈战争。在法比瑞同学会的餐室里我们喝着咖啡，看见侧面窗外巷子里躺着两个新运到的受伤的俘虏，我走到窗前伸着颈项去望，一个俘虏坐起来做手势，但是没有人懂他的话。

这里也有空袭，时间在早晨或者下午。警报发出以后，街上军警立即出动，禁止行人。人们都往江边或者特三区跑，躲在大建筑物的门前。等到机声听得见时，街中已经阒无一人了。的确，连一点声息也没有。

我下一次再详细地告诉你们关于武汉空袭的事，和在这里的其它许多事情。现在我很忙，因为我就要动身回广州了。

9月在汉口扬子江饭店。

广州在包围中*

诸友：本来想写一点关于武汉空袭的事，因为在上一封信里我告诉你们我平安地到了武昌，我应该让你们知道一些武汉的情形。仅仅一封《汉口短简》是不够的。然而目前的环境不容许我写。而且我应该先写别的事。

广州是在敌人的包围中了。

昨天我和几个朋友在哥伦布咖啡店二楼看了全市壮丁的火炬游行(这个城市是指广州市，因为我已经回到广州来了)。这个晚上八万名壮丁在河南宣誓以后，便列队向汉民路进行，他们经过海珠桥的时候，火炬带着熊熊的烈火在黑暗中晃动。有人对我说，这真像一条火龙。广州在怒吼了。到处都在唱保卫大广东的歌曲。

这些天每夜在九点钟以前(有时还要迟)，市内都没有电灯，这只是为了省煤。我一个人从惠福东路步行到惠福西路。没有一点亮光。连天空的星星也被交柯的树木遮盖了。车轮的声音在我的旁边响起来，我才知道侧身让路。手电筒的白光迎面射过来，连模糊的陌生的面孔也变成亲切的了。"莫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少年读物》第六号。发表时题为《最后的消息》。

怪，"人们彼此抱歉地说。

还不到四牌楼，我又看见经过另一个街口的游行队伍了。火炬在燃烧，好像心也在燃烧。在黑暗中感到的恐怖都给这烈火赶走了。

我摸索地走过了四牌楼，慢慢地进了那个不熟习的巷子。不平坦的石板差一点把我摔下去。我终于走到那个类似上海弄堂的惠园。铁门已经上了锁，但裂开一个缝隙，让我侧着身子勉强挤进。我摸索着一直向里走去。我的眼睛连什么也看不见了。恰好这时救星似地闪过来一道白光。一个穿白色学生服的人客气地问我是不是到九号去，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答应了他。他又问楼下姓卢的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他失望地去了。我却借着他的手电筒的亮光走到了九号门口。我站在下面唤朋友的名字。朋友慢慢地拿着洋烛走下楼来。刚才穿学生服的人看见烛光，便走回来，把问过我的话向朋友再问一次。朋友说姓卢的已经搬走了。他又问到住在四楼的人。朋友告诉他四楼的人也搬到别处去了。他才失望地说句"莫怪"，然后没精打彩地走了。这几天走的人真不少。有许多人走得很狼狈。但是也有许多人走得很从容。譬如我们书店对面楼上那位军官太太，在十三日早晨，忽然打扮得很漂亮，站在洋台上不住地往街上看，好像在等什么人似的。后来她的丈夫驾着一部机器脚踏车来了。他下车走上楼去。两个人在房里停留了片刻，于是锁上门一同坐上车子扬长地去了。

还有一些人毫不惊恐地照常工作。他们好像不知道前线

军事吃紧似的。他们相信着敌人打不到广州来。他们不搬家，或者不作任何的准备。昨晚听见一个朋友说，许多人走都不带东西，有的只打算把家眷送走就回来。有的还打算等敌人进来时参加巷战。

我后来又去哥伦布，和另外的两个朋友见面。哥伦布的客人和平时的完全不同了。再看不到艳装的女客。客人中大半都穿军服；穿便衣的人屁股后面也插了一支手枪。那位中山大学的音乐教授也是全副武装地坐在这里。我们并不认识（我听他唱过《黄花岗纪念歌》），但是他找我谈起话来。他说他不是军人，然而，现在不高兴教书了，他愿意来做保卫广州的工作。

十点钟我回到家里，街上比平日静得多了。广州市仿佛进入了睡乡。电灯已经亮了半个钟点。但是许多街道仍然很黑暗。十二点钟我校完稿子走到晒台上去。上面是满天的星星，周围却是一片黑暗。只有大新公司里面还有电灯光。公司的货物差不多全搬走了。夜真是静得很。谁也想不到在这附近就有战争。谁也想不到这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在耽心广州市的命运。我心里真不好过。我的出版计划在一个星期里面就被人打破了。两个刊物排好放在印局，也无法同读者见面，因为印刷工人走掉，而各书店也都陆续撤退了。但这是很小很小的事。值得系念的倒是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几十万人的命运。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保卫自己。

今天替一个朋友到银行去汇钱；上海银行门口悬出告白牌，说是已迁往香港了。去交通银行，门开着，两个警察在那

里守卫，门前也有告白："警报期间，停止营业。"但是近一星期来广州市整天都是在警报中——从上午五点一直继续到下午五点。我再一追问，又说是暂停汇兑了。

现在我在家里，飞机还在我们的头上飞。大新公司楼上的高射炮响了，声音真大。有了这高射炮，炸弹便不会在这里落下来，我也用不着去管它。

因为怕你们耽心我的安全，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你们应该记住这里还有几十万人，他们准备着勇敢地保卫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命运倒是值得关心的。至于我，我这个陌生的外省人，我在这里不过做一点摇旗呐喊的工作，而且在必要时候我也会撤退的。目前不会有什么危险临到我的头上。

10月18日在广州。

广州的最后一晚

——十月十九夜

眼前是一片黑，远近都没有声音。我站在四层楼的露台上，一股风吹来，我感到寒意了。我不相信这个城市里就完全没有亮光，我掉眼往四处找寻，在对面大新公司九楼的两扇窗户内我见到灯光了。我仿佛得到一点温暖。我走到栏杆前，埋头看下面，石板道像一根白带横在那里，没有脚步踏破静寂。一切和往常一样。我又举头看天空，看对面的景物。阴暗中耸立着浓黑的东西，我认得那些高大的建筑物，那是新亚酒店，在它的旁边是新华酒店的礼堂，再过去在新华的后面是爱群酒店的十三层大厦。在白天我还可以看见那两个大的金字“爱群”。现在连它们也都静静地睡了。我痴痴地望着它们，好像在找寻什么遗失的东西。但是映入我的眼睛里的只是模糊的轮廓。我忽然记起了大新，我再转头往右边看，那两扇窗里的灯光也不知在什么时候灭了。这应该是平日的大新公司罢，今早晨我还站在这里，看见它屋顶上的高射炮对着敌机射击，那怒吼声把附近的地面都震动了。不久以前每天每晚从“游乐场”送过来锣鼓声，我在露台上可以望见游客接连不断地经过八九楼的楼梯上下。但是如今也只剩了静寂。听不见

锣鼓声也已经四五天了。昨夜我在楼下售货部里看见职员们忙碌地把货物装箱。二楼上全是大的木箱，没有一件精致的物品陈列了。

广州市静静地睡了。但这不会是安适的睡眠罢。可怖的梦魇压迫着它。它一定会在睡梦中痛苦地挣扎。这时大概是两点多钟。五点钟以前敌机便会飞来的。这几天来凄厉的警报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时，我用手擦一下朦胧的睡眼便转过头去看窗户，总看不见白日的亮光。接着是紧急警报。我并不去理它。这声音我已经习惯了。然而它会把别的许多人唤起来的。并且明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傍晚警察挨门挨户来通知说，敌机明天要来大轰炸，劝人民离开市区。那么在两个多钟头以后广州市又会骚动起来了。我可以想到那一切恐怖和骚乱的景象。

是的，明天一定是一个混乱的日子。今天下午警察到处敲门，高叫"疏散人口"，连街旁摆摊的小贩也全被他们赶走了，并不说明理由，好像敌人就要进城一般。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虽然本地报纸每天照例刊载战事顺利的消息，可是我们知道敌人早已越过博罗进犯增城，连增城今天是否还在我们的手里也成了疑问。倘使当局准备放弃广州，敌人的确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以进城。这个城市的命运如何，我们固然料不到，但是已经引起不少友人的焦虑了。我也开始为它耽心，虽然我看见这里还有少数安居乐业若无其事的人。其实这些人的命运倒是更值得关心的。

明天，在这个城市里会有一个可怖的大变动罢。我不知

道在这里还有多少居民。离开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像汉民路那样的繁盛街道上，店铺差不多全关了门。然而走不了的人还是很多的，西濠口一带到今天仍旧十分拥挤，到处都可以看见衣服整齐的妇孺。这一晚不会有够多的交通工具运走他们。我关心他们怎样可以安全地度过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

明天！听说过了明天，全城的日报都要停版了。以后连陈旧的消息也见不到了。……只有一个星期的功夫，这么短的时间！事情变化得多么快！我有点像在做梦。但这不是梦。而且明天我也应该设法走了。我准备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倘使我能够找到交通工具的话。

夜还是很静。全个城市似乎没有一点声音，和平时一样地静，不，比任何时候都更静。谁立在这里绝对想不到在若干里以外会有激烈的战争和即将到来的可怖的骚乱。一切都是梦魇罢，明天早晨醒起来的还是那繁荣的、生气勃勃的大都市罢。我这样想着。我爱这个城市。的确这个城市是可爱的，甚至在这个时候它还是十分可爱。在我的脑子里浮现了炸不断的海珠桥和血染不红的珠江。我知道在这附近就横着那座桥，流着那江水。但是明天那一道桥还能连接两岸，那一江水还能不染一点血迹么？

三点，四点，五点，无音的钟在我的心上敲着。我凝视东方，东方没有亮光。但是明天，明天的太阳会升起来的。明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呢？

我问我自己：害怕吗？不，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愤慨。我在这里看不见别人向我预许过的（我自

己也期待了许久的）壮剧，我的愤慨是很大的，敌人的铁骑果然会踏进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么？我耽心这会成为事实。那么就让我们和敌人一起永远埋葬在黑夜里罢，把明天留给我们的后一代人。

10月19日深夜在广州。

从广州出来*

一

我们正耽心着今天又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了，忽然听见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朋友来通知我们上船的时间。

匆忙地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同搬来的友人的行李放在一起。等到挑夫来把它们挑出门时，我又留恋地跑上楼去，没有目的地看看空的屋子、空的床和橱。在这个地方我还只住了三个星期呢！我不想离开这里，可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我推走了。

我们的行李搬到了邮政局门口(我们的住处离邮局很近)，这是那个朋友和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才不过四点多钟，邮局的大门就已经关上了。七八个人拿着信件到这里来，看见紧闭的门，脸上立刻露出失望的颜色，惊讶地抱怨一两句，终于悄然地走了。

广州市从这天早晨五点钟起便在警报中，和前几天的情形一样；不过今天高射炮在我们的附近大声吼起来了。敌机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十四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已经到了我们的头上，我才听见发第一次警报。像这样的事，以前还不曾有过。这并不是好的兆头。暴风雨不久便要来了罢，我焦虑地想着。然而我不愿意把这个忧虑传染给别人，我还安慰同行的几个朋友说："用不着把东西全带走，我们不久便会回来的。"其实，今天的情形比昨天的更坏，连卖菜的人也逃走了。这时在我们面前经过的都是些面色张皇的步行者。要找到一辆人力车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警报没有解除。天气还有点炎热，街上尘土飞扬。我觉得仿佛有一只手扼住我的喉管。我站了许久，手里抱着的那个大皮包总是往下面坠。我站得有点吃力了。朋友中有三个人坐在邮局门前的石阶上。我后来也坐了下去。码头就在我们的眼前。岸边有好些人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或者吵吵闹闹地搬运行李。水上有几只船离了岸，众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它们，好像它们都是开往幸福的国土去的。

我们等待的友人来了，四辆人力车把他们送到我们的面前，却不曾带来一件行李。他们的行李是用小车运来的，由杂志社的一个同事押着。二十分钟以后，那个人堂堂皇皇地坐在许多箱笼上面被车夫推到码头上来了。

他们的行李都堆在码头上，等着小艇来搬运。那个替我们雇船的年轻的广东朋友还没有来。警报也没有解除。敌机今天逗留的时间更长！现在应该是五点半钟了。替我们雇船的年轻朋友，忽然从后面伸手来拍我的左肩。我掉过头去，他的清瘦的脸上露出苦笑。"今天走了，"他痛苦地说。我问他："你呢？"

"还没有这么快罢，"他摇摇头答道；"我要等到城里筑起工事的时候才走。"他的家在广东的石龙。我知道他已经和他的哥哥约好将来去参加那个地方的游击队。他是准备徒步走到那里去的。

"我看是不会久的了，"另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插进来说。"你还是早点走罢。"可是连这个朋友也决不会想到日本兵明天就会踏进这个大都市来的！

那个石龙的年轻朋友也不再谈下去。他还带了一个伙计来，这时到码头雇小船去了。他和另一个广东朋友也到岸边去。我们要搭的货船泊在太古仓河面上，从这里应该雇一只小艇把我们载到那里去。

他们去了许久，一直没有消息。我等得不耐烦了，便跑过去看，他们正在和一个船夫论价，双方的意见差得很远。我看这次交涉很难有成功的希望，那个船夫讨价太高了。雇一只小艇过江要花二十块毫洋，这是谁也不肯答应的。可是没有小艇我们却不能够转到货船上，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就在邮局门前过一个夜晚，白白地让那只货船沿着西江开走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在夜色完全掩盖这个城市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小艇。

几个朋友都为小艇的事情感到不安，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催促两个广东朋友多方设法，并且劝他们对船夫提出的条件略为让步。后来经过几次交涉，他们将二十元毫洋的船价改为十二元，居然得到了一个船夫的承诺。

然而我们还不能够立刻上船，因为我们雇的小艇并不靠

在这附近。等船夫把小艇划到这里来，又得花费不少的时间。这其间解除警报的汽笛响了。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经过了这几天的紧张的生活以后，人已经没有心思去管敌机轰炸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也都有这同样的感觉：广州市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那个陷坑，它的陷落只是时间的问题，至于完整或者破碎，早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了。这种感觉是奇怪的，然而它却是十分真实的。我们爱这个地方，但是离开它时就好像永远不能够和它再见。我故意留下一些破旧的书，让我自己临别时想到我不久便可以回来，而且准备着随时回来，这种心情也许是别人不易了解的罢。

二

我们先把行李搬上小船，然后自己跳下去。石龙的朋友要送我们上货船。另一个广东朋友要回去照料书店。他的家乡是新会的一个小乡村，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回到那边去做些更重要的工作。他在岸上对我们挥手，我把头伸到窗外，不住地向岸上招手，我用力大声说："你要小心啊，到该走的时候就走！"船渐渐地跟码头离远了，我不知道他这时是否还听得见我的话。

船沿着沙面缓缓地流去，它走得慢，好像不忍跟岸边一带高大的建筑物分离。景物开始变为模糊了。我用留恋的眼光最后一次看那些熟习的街道和熟习的房屋，我觉得我好像在梦里，眼前的一切皆是假象。明天早晨我睁开眼睛，紧急警报

的汽笛声仍然会送到我的耳边，我仍然能够在这个可爱的城市里继续做我的工作。

但是广州市终于在我的眼前退去了。连沙面的茂盛的树木、树旁堆的沙袋、沙袋旁站岗的西洋兵士也都跟着消失了。夜已经降临。暮色覆盖了一切。水面上亮起灯火。水声和桨声寂寞地起落，起落。远远地响起唤人的声音，有女人在高声讲话。在一个地方许多小艇一排几十艘地泊在那里，没有灯光，没有人声。河面更宽，水上微微发光。一切于我都是陌生的。我更疑心真是踏入了梦境。

货船泊在河面哪一段，石龙的朋友也不大清楚。小艇上的人把一只电船误认作我们要搭的货船，多划了一段水程，到了那边仔细一问，才知道货船还在后面，便回转来划到一个黑影前面，和那边的人问答了几句，把小艇往黑影那边靠去。

小艇停了，我走出舱外，看见一只大木船横卧在面前。石龙的朋友和他带来的伙计最先跳上木船，一面指挥船上人和小艇上的人合作来搬运行李。别的朋友都到木船上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小艇上等着行李搬完才到木船去。

木船上灯光昏暗，每个人在我的眼前都只剩下一个黑影。我突然觉得冷，觉得疲乏。石龙的朋友为我们忙了一天，现在把我们送到开往梧州的船上，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责任，这时应该回去了。小艇在旁边等候他。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来送别他的胞妹和她的男友。他家里有一位患着不治之疾的母亲，他无法将她移往别处，也不能抛撇她独自寻找生路。他好像落进一个深渊，无力挣扎，等待命运来将他推到渊底。他送走

他的妹妹，仿佛送一个希望到活的世界去。我在旁边听见他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地去生活罢。你们这样出去，我也就放心了。"我刚刚跟石龙的朋友握手告了别。我看见石龙的朋友已经上了小艇，害怕小艇立即开走，便催促那位做哥哥的人回去。我们搭的舱在上层，由一个短梯上去。我站在下面舱板上说话。接着那个做哥哥的人便躬着身子爬下来了。我的另一个朋友，即是他妹妹的男友，也跟着下来。他一边走，一边叮嘱做哥哥的道："你回去对她母亲说得好一点，不要说是这样的船。"做哥哥的点头说："我晓得，你只管放心，"又转头对妹妹叮咛了两句，声音有些呜咽了。我也跟这个善良的人告了别，他还对我说："以后我会随时写信报告你们广州的情形。"

小艇在阴暗中开走了，我们就留在另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我也由那道小梯到上面去。上面地方相当宽敞。篷柱上挂着一盏小的风雨灯，这灯光微弱地照亮了我们这一段舱面。我们先在箱子和铺盖卷上坐下来。船上的人听说我们不曾吃饭，便自告奋勇地为我们做饭烧菜。不到一会儿功夫饭做好端了过来，两个小孩为我们安放好桌面和碗筷。我们十个人便围着桌面吃起来。在吃饭的时候我听见叫唤声、水声和小火轮驶近声。我们的船开始摇动。等到我们吃完饭洗好脸，木船已经被小火轮拖着走了不少的路了。

我们忙了一天，大家都感到疲倦，对着一盏阴暗的小风雨灯，实在打不起精神谈笑。我们便打开铺盖卷，认定了各人的铺位，把被褥铺好，倒了下去。我们就这样平安地离开了广州。

三

船走了一晚。天还未大亮，警报来了，船立刻停下来。小火轮一共拖了四只木船，这时便跟它们分开，独自开到他处去了。船上的人忙乱了片刻，敲着钟，又将灯吹灭。我被这忙乱惊醒了，朦胧的睡眼看不见什么，仿佛听见飞机声，我也不去管它，便又沉沉地睡去。

早晨到容奇，船又停了，小火轮仍旧开往他处躲避飞机，直到傍晚才开船。这天飞机果然又来了。我听见机声，知道飞机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并未盘旋，就沿着西江往前飞走了。它们去炸梧州也未可知。我等到飞机走后才上岸去，在蔗林里散步了一会儿。有两个朋友跟着船上的人到镇上去买东西。后来他们买了点心回来，还有一份二十日的《星岛日报》，但上面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我们在船上过着清闲的日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看书、谈话外不能做别的事情。伙食是船上供给的。菜还不错，不过总是那几样菜。但是大家的饭量都增加了，每天吃两顿还嫌不够。第三天到了马口，我们上岸去"饮茶"。船泊在一带蔗林下面，我们上了岸，沿着蔗林走到土坡的尽头，便看见马口的街道。这里很小，店铺大半关了门，我们找不到"饮茶"的地方，只得买了几个沙田柚回船上去。上了船听见机声，我和三个朋友又上岸去看。我们站在蔗林旁边，机声自远而近，三架轰炸机从西方飞来，到了蔗林上空撒下一些传单。它们

飞得很低，翼上红点映着日光，十分眩目。传单飞到远处去了，在这附近找不到一张，我们也不想读它。

这天听见船上人说，敌人已经到了广州郊外的石牌，据说昨晚路上遇见军人来封船，这个消息是军人传出来的。但是我们都不相信这句话，以为敌人不会跑得这么快。

船上的人也不大注意这个消息，他们更怕的是敌机。白天不开船便是害怕敌机轰炸。第四天早晨到禄步，我们又遇着敌人的飞机。禄步比马口大得多。我们上岸三次，看见店铺全开着门，饮食店不少，大都在门前竖一红纸牌，上书："楼上新到上等女职工。"生意似乎不错。卖狗肉的小摊也有几处，每处都有血淋淋的狗头对着行人。我们一直走到小学的门前，才转回来，又在各处看看，打算在一个饮食摊前面吃碗粥。但是警报来了。我们看见街上人乱跑才知道。一个人手执红旗吹着哨子走遍各街，这是发警报。我们走回江边，不下船，就在树下站立一会儿。下面是一片大江，对面是山，山是碧绿的，盖满了繁茂的树丛。水边泊了不少的船只，稀落地卧在山脚，似断似续，一直到我的眼睛望不到的地方。听见机声去远了，我们才回船上休息。不久我们又看见先前执红旗的人改拿绿旗，另一只手摇着铃，这算是解除警报。

这天又听见船上人说，有人二十一日从广州来，临行看见爱群酒店一带冒烟，海珠桥也被炸断了。我们仍然不相信，不过因此更想知道广州这几天里的情形。

四

第五天到了都城，我们搭的木船不能再往前走了。它是走东江的船，这次因东江战事失利才改走西江，但是还没有领到去广西的执照，他们也不预备去梧州。这真相是我们上了船以后才知道的。石龙的朋友事前不曾弄清楚，他对我们说船是开往梧州的。这时我们也无法和船上的人争论。我们先上岸去，到各处看了一下，打听了开梧州的船期，回来在船上吃饭。船上的人还是客气地招待我们，并且同意我们住在船上，等着开梧州的"拖渡"到来，他们会帮忙我们雇两只小艇把人和行李送到"拖渡"上面。我们在这只船上多住了一天。傍晚小艇来了，划船的人说，今晚十一点钟左右有"拖渡"来，要我们早作准备。但是到了十点光景他们又来通知今晚不会有"拖渡"来，我们可以摊开被褥睡觉。我们睡到深夜十二点半钟忽然被人叫醒，说是"拖渡"到了。我们不顾疲乏和瞌睡，连忙起来打铺盖卷。但铺盖卷才打好两个，小艇的人又嚷着说，"拖渡"已经开走了。我还很瞌睡，不管其它的事，马上摊开铺盖又睡。睡到四点多钟，我们又被人唤醒，说这时又有"拖渡"，我们只得再把铺盖卷捆好，和行李一起由木船上的人搬下舱板，逐一交给小艇上的人。

天未亮，江面还被黑暗与寒冷盖着。两只小艇只顾往灯光最多的地方走。逼近了一只电船时，我们才知道小艇走错了路，这不是开往梧州的船。于是船夫又把小艇划往另一个

方向去，那边有灯光，却不大亮，我们靠近那里，才知道是一艘大木船。我们的小艇先到，问明了这是开梧州的“拖渡”，我便第一个跳上去。后来另一只小艇也到了，又上来一位朋友。我们看大舱，已经没有地方了。再去餐楼，那里也是人挤得满满的，行李凌乱地到处放着，连过道也给堵塞了。两个茶房正在整理客人的行李，把它们依次搬到外面一个地方去。

我们找不到铺位，却又不能不搭这只船，只得出去通知留在小艇上的友人，要船夫先把行李搬上船再说。行李到了船上，一部分放在餐楼里面，另一部分堆在上层甲板上。我们把行李安排好，这时天色开始发白了。有人向我们“兜生意”，愿意出卖铺位。他们共有铺三个，讨价法币两圆，我们交涉了一阵以一元半的代价成交了。那个人拿了钱面带喜色地穿好衣服，准备上岸去。我们买了铺位，以为至少可以让大家轮流地睡一会儿了。谁知道上半天不开船，客人都得上岸去躲警报。连茶房也早早地带着紧要东西往岸上去了。但也有少数客人留在船上。我们也不走，大家又坐了一会儿才上岸去吃早点。

我们到了热闹市区，在市场上一家粥店里喝了很好的牛肉粥，这是用小锅子临时烧起来的，时间相当久。我们刚刚付了钱，警报来了，外面许多人在跑，我们认为敌机目前还不致于炸这个小城，便从容地回到江边去，不过不到船上，却到江边山坡上一座庙门前。那里有树木可以掩蔽我们，我们立在树下，或者坐在庙前石阶上，还可以望见江中景物和我们的“拖渡”。

后来警报解除，我一个人先回“拖渡”去睡觉，也不管飞机

会不会再来。船上也有一些人，但只占全数四分之一。有许多人要在岸上吃了晚饭才回来。我们后来又上岸去，在一家大的茶楼里吃了东西。都城又比禄步大得多，有新修的公路，西江中来往的船只又多，这也是一个交通要道，房屋整齐，马路清洁，高大的新建筑物也不少。店铺门口进出的大半是外省人。这里显然是最近才繁荣起来的，幸好敌机还没有来投过弹。

下午五点半钟开船。不久便开始卖票，票价每人法币六角。在船上我们遇到一个湖北商人，他是二十一日上午逃出广州的。他听见枪声和炮声，又听见爆炸声，也看见浓烟，行李没法带出来，路上家眷又失散了。他步行了一天，又坐了船，后来在肇庆才搭上这只“拖渡”。但是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却给我们看一张二十三日的《星岛日报肇庆号外》。上面刊载二十二日的广州电话，报告李汉魂、叶肇在前线督师，还有其它的战事好转的消息。读了这张《号外》我们都很放心，以为广州市暂时不会有问题。后来又遇见一位中山日报社的职员，那个人也是二十一日从广州步行出来的。他说敌人先头部队到过广州的白云山，后来被张发奎率领的援军打退了。广州市现在仍在我们的手里，他们报馆已经派人回广州调查去了。

这个人的谈话和《星岛日报》的《号外》，给这个餐楼添了不少的温暖和欢欣。我们知道广州保全了，大家都很高兴。

晚上十一点多钟船到了梧州，但是因为等候检查的人(?)，它不能立刻靠岸，我们直到深夜一点钟光景，才踏上了

广西的土地。

早晨八点钟到街上闲走，我们看见梧州公安局二十三日的布告，才知道广州在我们离开那里的第二天（二十一日）就失陷了。

以上的“通讯”在桂林写好寄出后，我接到了那个留在广州照料书店的新会朋友的来函。他已经回到新会了。这个诚实而勇敢的人在大轰炸中也不曾停止他的工作。他的朴素的笔写不出夸张的辞句。这个身经目击者对广州撤退的报告应该是可靠的文件，我现在把它节录在这里：

> 二十一日早晨我们还到公园散步。回来忽闻炮声隆隆，初尚以为是国军试炮，但再细听，则密集的步枪声大作，自远而近，好似万马奔腾。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往街上一看。啊，人山人海狂潮般的奔跑。兵士和警察也杂在里面。同时浓烟笼罩了整个广州市。
>
> 当时我们太惊慌了，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拿，单身便跑。长蛇般的行人都是逃难者，扶老携幼，母亲唤儿子，哥哥唤弟弟，一齐向海珠桥进发。我们到了河南，河北的黑烟滚过来，扑进鼻里，干燥难耐。
>
> 何去何从，只有天晓得，逃难者中间很少有人知道去路的。当局连市民最后逃难的路线也不好好地插上指路牌，逃难者都很愤慨。我们过桥后不到半点钟，许多人都说海珠桥炸断了。同时我们也听到大的声音，又看见浓

烟一股一股地升起来。敌机不停地在河北投弹。几辆救火车驶过，满载着行李和消防队员，到这马路的尽头，把东西卸下便弃车跑了。河北的大火却没有人管，许多逃狱的囚犯脚上带着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跑着。

渡河时大家腿靠腿的拥挤不堪，我们等了一点多钟，还不能够爬上船，可是跌入河里去的人，我在这短时间里看见的就不下十四个。有一个妇人背负着她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个落汤鸡，只顾在那里啼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船驶到河中，纸厂又被炸了，这回是亲眼看见，隆隆的巨响把江水也震动了……

11月下旬在桂林追记。

梧州五日*

一

我们的脚踏上梧州的土地，时间已经过了中夜，应该是两点钟罢。没有路灯，黑暗中看不见街景，我们一行五个人只是埋着头跟随挑夫走过那些陌生的街巷。除了我们的脚步外，没有别的声音。在一个丁字街口转了弯，我们走入大街了。警察岗位上没有人影，在街旁一个旅店的骑楼下歇着两副担子。借着从门缝里透出来的一线灯光，我看见了戴钢盔的军人的影子。轮廓是很熟习的。我走近两步，那边发出来唤我的名字的声音。我又在这里遇见那个朋友了。我和他先前才在拖渡上面分别了的。

挑夫把担子也放在这个骑楼下，她们全是女人，唠唠叨叨地用广东话发议论。戴钢盔的朋友告诉我，他走遍旅馆找不到一个房间，这时正托警察设法打电话去别处找一个借住的地方。如果有地方，他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早已听见人说旅馆家家客满，正打算去各处“碰碰运气”，听说有办法，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民族公论》第二卷第二期。发表时题为《在梧州——旅途杂记之一》。

便停在这里等候警察打电话的结果。

不到一会儿功夫，警察和另一个朋友从旅馆中开门出来。警察手中拿着电筒，在我们的脸上照亮一下，他客气地表示，他也没有办法；要我们自己到旁边一条街上那家小旅馆去问问看。我们不能在骑楼下停留，只得催促挑夫领我们到那个旅馆去。

旅馆在一个短短的巷子里，正对着大街。门已经关上，却被我们唤开了。这是一个破旧的小客栈。迎着我们来的是主人的没有表情的贫血的脸。我们好像并不受人欢迎。对我们的问话，这里的回答是：没有房间。我们继续交涉，也没有结果。连楼下这个小小的厅堂里也临时安放了帆布床，这里的拥挤是可想而知的。我看见主人不肯为我们设法，心里想大约要给人赶出去睡马路罢。但是戴钢盔的朋友不肯白白地走出这个旅馆，他很有耐心地在和主人商量。后来那张呆板的脸上的肉颤动起来了，那个人动动眼睛，客气地表示可以把一个堆东西的小房间和门前的过道让给我们，不过每人每天得纳费四毫。

便是过道也一定比马路好。桂币四毫只合法币两角。我们自然高兴地答应了，立刻打发走挑夫，又把行李存放在楼下厅堂里，再跟着主人到楼上去。

我们经过不时摇动的类似舞台布景的楼梯，到了堆东西的房间。房间和过道都小得使人发笑。房里只可以放两张帆布床。过道上勉强容得下我们的五床棉被。我们七个人睡下，便把这两个地方挤得满满的。主人幸灾乐祸地在旁边望着，

要我们直捷了当地回答他：要或者不要。我们不愿意睡马路，而且这时已到三点钟，我们的眼皮重重地往下坠，眼前的景物也有些模糊了。我们七个人差不多齐声地回答了一个“要”字。

以后的手续是登记姓名、籍贯、年龄、职业等等，每个人都得详详细细地写出来。于是我们可以自由地处置那个小房间和走廊了。两个朋友睡在房内，那里有两张破床。我们五个人把铺盖卷打开，摊开被褥，倒下去便睡。刚闭上眼睛，什么事都忘在脑后了。真是好睡！

二

一觉醒来，时候不早了，我们才发觉自己睡在别人的房门口。我们害怕妨碍别人走路，连忙从地上起来，自己收拾了被褥。后来茶房送脸水来了，我们就在走廊前面栏杆旁边洗了脸，那里满地都是污水，我们不得不站在几块砖头上面。

我们出去吃饭。戴钢盔的朋友先走了。我们五个人走过一条整洁的街道，便找到一家广东茶楼。在那里吃东西要先买筹码，为了发警报时跑路方便。我们吃过饭，五个人分作三路去找朋友。我和上海友人到一家更小的客栈去看一位年长的朋友，他的地址还是刚刚从路上遇见的一位朋友那里打听到的。

客栈在一个小巷子里，还要转弯，门前有污水，进门是一个小小天井。越过天井便是厅堂，厅堂背后是厕所。房间只有那么少的几间。没有楼房。我们的朋友正坐在厅堂上读当

天的报纸，看见我们，便放下报站起来。我们从他的谈话里才知道他们上岸比我们迟几分钟，便不得不在骑楼下坐了一夜，直到天明才找到房间搬进这里来。另外几个同行的友人这时都掩着门在房里沉沉地酣睡了。

后来这位年长的友人邀我们出去"饮茶"。我们在大街上意外地看见了一个咖啡店。年长的友人对咖啡有特殊的嗜好，这发见使他非常高兴。我们便进了咖啡店，走到楼上去。

咖啡并不好，我们拿着杯子，一面谈话，年长的友人还为我们叫了三客煎饼。煎饼迟迟地不见送来。忽然警报响了。几天来我们没有听见这个声音，现在好像是旧友重逢，声音也特别响亮。

坐在我们前后的客人惶恐地跳起来，慌忙跑下楼去。我们觉得奇怪。在广州我们没有"躲警报"的习惯，而且也没有可躲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坐在咖啡店中静听敌机投弹和用机关枪扫射。我们本来不打算走，但是下面骚乱地起了一阵闹声，许多人在嚷着，跑着，同时茶房也来催促："警报！快！快走！"

我们走下楼，在柜台上付了钱，出门一看：满街都是人，有的提箱子，有的背包袱，有的牵小孩，带嚷带跳狼狈地向右奔去。人群像决了堤后的水，带着不可抵拒的力量冲过低湿的地方，淹没了一切。我们眼前全是人头，它们像汹涌的波涛滚滚地顺着飓风奔腾过去。人挤着，人跑着，做出种种惊惶的样子，没有谁回过头望，也没有谁停留片刻来缓一口气。仿佛有一股力量推动着众人，使他们盲目地奔向一个地方。从各个

小巷里人不断地流出来，又消失在大群中。好像许多支流汇集在一起向大海流去。这个海便是中山公园，那里有防空的山洞。

这景象倒使我感到惊愕了。我们在这里是陌生的旅客，不知道应该怎样办，也不知道这里空袭的情形，连去防空洞的路也不清楚。我迟疑一下，便决定跟着众人走去。年长的友人要先回旅馆去一趟，便跟我们分别了。我和上海朋友却跟在人群后面走向山洞去。

我们走着陌生的街道，终于上了坡。再往上走，还绕弯，人群渐渐地散开了。上山有几条路，每一个路口吸引了一部分人。这是土山，颜色黄得可爱，松松的土仿佛是脚垫。我们是经过了中山公园的大门进来的。

山坡上的路相当阔，人继续减少，我们走着显得很宽舒了。一边是更高的山，上面有树，有草，有藤；一边是下面的城市，中西两式的建筑物掺杂地立在山下，安静得像玩具和模型。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山洞就在我们的右面。我看见了：一个，两个，三个……并不大，一个人身子高。我们跳过一条小壕便可以进去。里面已经有人头在晃动。还有新的人走过去。有人弯着腰在进洞。我们继续往前面走，看见更多的洞，看见木柱拦住的窗户……

穿黑制服的警察和防空部的人员到处巡视指挥。呜——呜……短促的声音接连响着，急促而凄厉。紧急警报发出了。警察拿着武器指挥人们进洞。我们也找到了一个洞，埋着头

进去。

洞里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蹲在地上。这个洞似乎还通到旁边的另一个洞，可以转弯走过去。这时连过道上也挤满了人。我听见有人低声谈话，又听见另一个人发声干涉。我立在洞口，往里看，只看见朦胧的面影。有人叫我蹲下，我虽然觉得站立较蹲踞舒适，但是我也只好服从公意。我刚蹲下，从外面又进来两个女人：一老一少，年轻的服装还入时，不过面部未施脂粉。年老的胆怯地挤进里面去了，年轻的愿意留在洞口，即是在我的旁边。年老的再三催促，要她进里面去，她也不肯。她后来甚至带了点烦躁地说："我不怕，你那么胆小。"她说的是广东话。

外面声音完全静了，忽然从远处响起了轻微的机声，声音自远而近，由小而大。"飞机来了，"有人这样自语道。大家差不多屏了呼吸似地倾听着。

孔隆，孔隆……我知道这是轰炸机的声音。我们怀着严肃的心情等待着。高射炮嘹亮地响了。洞里好些人惊惶失措地战抖起来。

"快进来！"年老的女人又在催促年轻的。年轻的摇摇头说："不要紧。"可是她的脸色变成灰白了。她拾起一块碎石片在黄土地上用力划着写字："颠沛流离……飞机……炸弹……"

接着是投弹声，仿佛山也起了震动。那个年轻女人把碎石丢开，埋着头沉默片刻。她听见接连的投弹声，忽然用手在胸前划起十字来。

搅乱了的空气渐渐地平静下来。机声去远了。洞外山坡上开始响起脚步声。我觉得两腿发麻，再也忍耐不住，便站起来走到外面去。一切同平时一样，在这里看不见轰炸后的创伤。城市安然无恙地躺在下面。上海朋友也出来了。我们就在阳光下面闲步，随便谈了一些话。我看见那个年轻女人站在洞口跟人讲话，脸兴奋地红着，身上有几处黄土，不曾拍掉。

人愈集愈多，洞里的避难者几乎都出来了。于是十分清亮地响起了解除警报的汽笛。每颗心都欣慰地沉静了。人们欢喜地微笑着。人群像江水一样缓缓地流下坡去。

在大街上我们遇见了年长的友人和另外两个朋友。他们先前也在山上躲警报。不过他们进的是大洞，还是被客栈主人带去的。我们一起正往前走，忽然注意到前面街口聚集了一大堆人，又有不少的警察。我们走不过去，也看不见什么，正在惊疑，心想该不是那里落了炸弹，却听见一个不认识的人说：是在捉汉奸。

我们无法回到旅馆去，便去茶楼消磨时间。年长的友人还在那里吃了中饭。一个多钟点以后我们回到旅馆，才知道先前就在搜查年长的友人住的客栈，说是那里某一个外省客人有做汉奸发信号的嫌疑。人是抓去了。别的事却不知道。年长的友人还应该留在客栈里等候警察来检查他们的行李。

去对河的两个友人回来了，今天被炸的地点就在对河，他们受了不小的虚惊。他们说，他们刚到那边友人的家，看见一座很漂亮的洋楼，问起来知道是广西大学的理化馆。不久警报来了，他们跟着友人躲进防空洞去，在洞里听见炸弹爆炸声，

警报解除后回到友人家，再看那个美丽的建筑物，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疑心先前是不是做了一个梦。

三

这天晚上我们用不着在走廊上睡觉了。戴钢盔的朋友和他的友人先得到一个房间，在楼下。后来我们也有了楼上的两个小房间，而且可以把行李全部搬了上来。在小楼上我们听见三个江苏布客的逃难的经历。他们在二十日的夜晚还在黄沙车站给朋友送行，二十一日上午在长堤他们却见不到行人了，一个美国女教士张惶地催促他们："你们还不快走！日本人就要来了！"他们抛弃了行李，还出了重价雇到一只小船将他们载往石苇塘去。车站上已经没有火车开行了。他们起初步行，后来找到小船，在肇庆才搭到拖渡来梧州。他们离开广州比我们迟十几个钟头，却尝到十倍的辛苦。他们原是从长沙去广州看看那边的情形，他们在广州住不上半个月，现在却应该绕着这么一个大圈子去桂林转衡阳回长沙。他们搭不上去桂林的公路车，又买不到开柳州的船票；他们没有充足的川资住收费昂贵的旅店，又没有大的胆量每天听警报的汽笛。他们终于匆匆地挤上拖渡往桂平去了。是这样平凡的三个小商人，他们对广州市的莫名其妙的失陷以及当局的昏聩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是他们对抗战的信心却不曾因个人的受苦而有丝毫的动摇。

早上我刚刚在洗脸，警报又来了。茶房上楼来催我们走，

不给我们停留的时间。我们五个人一起走下楼去。街上的情形和我前一天看见的一样。这次我们决定去另一个地方。自然还是那座山，不过是山的另一角。我们不走山坡上的大道，却走入一条蜿蜒的小路，到了一个一般人不大注意的小洞。刚到洞口我们便听见了紧急警报。大家都挤进洞去。机声响起来。我们的心情突然变为严肃了。我蹲在洞口，听见山坡上树丛间一只小鸟的叫声，风吹动树叶。机声自远而近。"看！"一个年轻店员伸手惊呼道。

我随着他的手指望出去。在树枝中露出来的一小段蓝天里，三架灰色轰炸机蜻蜓似地安然飞过。有人在后面干涉："不要看！"但是飞机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以外了。这一次没有听见投弹声。过了半点多钟便解除警报。我们慢慢地走回去吃中饭。

年长的朋友搬了地方，他住在另一个较大的旅馆。我去看他，要经过一道桥。整整有一条多街中了燃烧弹烧成了废墟，桥畔还堆积着瓦砾。商务印书馆的废址给烧得焦黄的铁门锁住。门内只剩了断瓦颓垣。从门缝里我们看见烧残的书页散落在瓦砾堆上。

朋友们刚才躲在一个最大的防空洞里。那是用水门汀修建的，里面有电灯，还可以容纳一千多人。

年长的友人决定提早去桂林的日期，他预备在那里编印刊物。我也有这样的计划。我在梧州没有工作。我们由广州运梧的书籍不曾运出来，这是受了转运公司的欺骗，现在知道也无法追究了。

晚上在我们的旅馆里我遇见那位戴钢盔的朋友，我们交换了几日来的见闻，喝了他从广州带出来的酒。我们决定第二天去买船票，往柳州去。本来这里有公路车开柳州，可是车费较贵，车票更难买到。

四

《梧州日报》上刊出武汉撤退的消息，报馆门前砖柱上挂着警察局长劝告疏散妇孺的布告牌。这个报馆每天要把本日的重要消息写出来贴在门口。每次我走过南华酒店总看见报馆门前万头攒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想在那里得到一点好信息，然而读到的大半是关于空袭的记载。晚上在南华酒店门前聚集了一大堆人。有人用激昂的语调演说保卫广西的意义。女学生唱起了救亡歌曲，随后人们大声喊口号，全体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梧州在怒吼了！

但是另一方面，市面上谣言很多，我们几个陌生者得不到一点真实的消息。街巷里的石板早被掘了起来，说是运往鸡笼洲去封江。外省人在这里因为语言不通、习惯不同的缘故，常常招来麻烦。虽然我们又听见人说克复广州，但是看到第二天的报纸才知道广州市还在敌人的手里。希望成了一场空，我们对着报纸叹气。

船票没有买到，说是要预先登记。戴钢盔的朋友跑了好几趟也无办法。他决定把行李搬到码头上去，整天坐在那边等船，先挤上船去，再设法买票。我无意间遇见一个从广州来

的新闻记者，他是我的老友，答应替我设法，并且热心地为我介绍了一个熟习这类事情的朋友，他称这个人为“张老板”。张老板要我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以前到南华酒店去听回音。

第二天早晨不到七点钟我到了南华酒店，那位做新闻记者的朋友还睡在床上，我唤醒了他。但是张老板已经出去了，朋友知道张老板此刻在洞天茶室，便陪着我去找他。茶馆里坐满了客人，我们却看不见张老板的影子。朋友要我稍等一下。我们各拣一个座位（还有两三张空桌子）坐下，朋友摸出一张钞票换了一元毫洋的筹码，用它们来买茶和点心。筹码分半毫、一毫两种。这是本地茶馆的新规矩，这样可以避免警报来时的混乱和损失。

张老板陪着四五个男女客人进来了，坐在一张较大的桌子旁边。他和我们打了招呼。我问起买船票的事，他先说票子难买，应当先向合作社登记，后来又说下午有办法。我相信他的话。

我们正在喝茶，忽然看见多数客人惊惶地往外面跑，朋友还不注意，我说警报来了，便和朋友出去。在门前我们果然听见特别响亮的警报声，许多人疯狂似地奔跑。我和朋友赶到我住的那个旅馆去。三个友人都在楼上房间里不肯走。我一个人也不想进洞去。我前一天白白地蹲在洞里剥花生吃，带了一裤子的黄泥回旅馆，这时也不想多跑这一趟路。做新闻记者的朋友看见我不上山，他也说不去了，预备回到南华酒店去写信。

我和房里的三个友人随便在谈论，紧急警报很快地响了

起来。旅馆主人上来催我们走。他请我们至少到楼下厅堂里躲避一下。我们只得锁了房门下去。

我很舒适地躺在一把竹椅上。飞机声突然孔隆地逼近了。主人变了脸色站起来，悄然说："我们到骑楼下躲一躲，飞机来了。"我们跟着他出了大门，他看着一个茶房把大门锁好，才靠着墙壁移动，陪着我们走出巷子立在骑楼下面。

我们不作声，刚刚站定，机声就更响亮地进了我们的耳朵。跟着是高射机关枪的声音。一个警察忽然横着步枪惊恐地跳起来，他从骑楼下斜着头望天空，口里发出一声轻微的、但同时是恐怖的叫喊。他看见了飞机，他看见了飞机投弹的姿势，他嚷的是：敌机投弹了！接着爆炸声震破了静寂来证实他的警告。

我觉得我的脸颊上露出了苦笑。我想，要是敌机今天准备大轰炸的话，这个建筑并不坚牢的骑楼是不能够庇护我们的。

但是敌机投掷了一批炸弹后便匆忙地飞走了。我们四个人看见旅馆主人回去，也从容地走回旅馆。我们依旧安然无恙。

下午做新闻记者的朋友来，告诉我张老板买不到船票，说可以帮忙雇一只小船载着我们人和行李，等拖渡开到，硬把我们推上船去，随便挤在什么地方，只图能够在船上买到大舱的票就好了。

这个办法近于冒险，我们耽心会因此失去行李，不肯照办。我要这个朋友陪着我们到中国旅行社去打听有无别的办法买到船票。他陪我们去了。

中国旅行社在这个时候也无办法。那里已经停止代售船票了。前面便是西亚酒店，是梧州最大的新式旅馆。我们知道那里也替客人代买船票，就顺便去问一下。

我们到账房去打听，一个本地人来答复我们。他的话倒很爽快。他记下我们的姓名和地址，要我们明天上午七点钟，到这里来同他一起去买票。他表示很有办法，我们倒是出乎意外地十分满意。而且为了免得明天早晨错过买票的时间，一个朋友提议索性搬到这个旅馆来住，我们当场看定两个小房间，付了定钱，然后回到名利（我们原先住的旅馆）去搬行李。到了名利，我才知道那个戴钢盔的朋友居然挤上船走了。

晚上我在这里洗了澡，舒适地躺在四层楼的柔软的床上。没有声音打扰我。我忘却一切麻烦安然地睡了。半夜醒来听见警察来查旅馆，他们在敲隔壁的房门，后来进去问话。我睁开眼睛等候他们，但是他们却悄然过去了。

五

早晨我跑到楼下账房间去，还不到七点钟。昨天跟我们接洽的人不在这里。桌椅凌乱地放在一旁，工役们正忙着打扫。我站在大门口。街上冷清清的，少有行人，店铺全关着门，照例要到下午三点钟才打开门做生意。

我等待的那个人忽然从里面钻了出来，我连忙跑过去，问起买票的事，他要我等一会儿，说是时候太早。我便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等候。没有事情，早晨的凉风从外面吹进，我觉得疲

倦，觉得冷，眼皮垂下来，坐在沙发上面打盹。许久没有消息。旅店的职员在我旁边安好了大圆桌吃饭。他们吃完饭，我以为可以去买票了，便望望那个人，他却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到了九点钟，穿着整齐的中山装的旅店账房来对我说话了："你要买船票吗？我现在陪你去。"他的礼貌使我相信他的热心的服务。我感激地跟着他走出西亚酒店。我们走过几条荒僻的街巷（早晨的梧州静寂得像荒墟），后来到了福安筏。他引我走上码头，转一个弯，走到挂着售票处牌子的木洞前面。但是木洞门已经关上了。他用手轻敲两下，没有应声，又重重地敲两下，依旧没有动静。他尽了责似地对我摇摇头说："就在这里买票。恐怕下午才开门。"我才知道他也没有别的办法。码头上挂着"民财渡今晚七时开往石龙、柳州"的红纸牌。我除了白白望它两眼外，连话也说不出一句。我的失望是谁也可以想象到的。

回到旅馆我把失望带给朋友们。一个朋友主张我去找张老板，我没有话说，连忙赶到南华去。张老板一个人在床上打鼾，房门开着。我走进去，我的重的脚步声不能把他惊醒。我只得大声唤他，一连唤了十多声，他才睁开眼睛，茫然地望着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开始说话。他才受惊似地动一下赤脚猛然坐起来。他含含糊糊地说，倘使有船开，他一定买得到票，要我下午一点钟去拿票子。我这一时的喜悦驱走了先前的失望。我的奔走算是得到酬劳了。

这天没有警报。我们早早吃过中饭，我看自己的表将近十二点半了，便又去找张老板。我到了南华四楼，他还睡在床

上，似乎这天就没有起过床。南华的钟还只有十二点十分，我来得太早了，不便去搅乱他的好梦。我在走廊上闲踱，我又在客厅里枯坐，足足等了五十分钟，才毅然走进他的房间。这次又轮着我来唤醒他。他没精打彩地坐起来，他对我说，已经派人打听船去了，要我等候那个人的消息。

我跟张老板没有多的话好谈，他似乎还应该再睡两小时，我后悔不该这样打扰他。但是他居然下了决心似地按了铃叫茶房打脸水。他洗完脸，那个"部下"回来了。"部下"知道的消息和我已经知道的一样，不过附加说船今晚来不来还不知道，而且票子已经卖光了。张老板还是主张替我们雇小船挤上拖渡。我虽然觉得这个办法不好，当时也不想再对他说一句话。失望之上又加失望，我过于麻烦自己了。

下午年长的朋友来打听买票的消息。做新闻记者的朋友也来看我们，很关心地劝我们采纳张老板的提议。我不能立刻答复他。另外两个朋友气愤地主张自己到福安筏去买票。他们去了一趟也没有结果。据说民财的票子早就卖光了。也许过两天有一只叫"民行"的船来，那时就有办法买船票了。

傍晚我打算到南华去告诉张老板：我们不再拿雇小船的事情麻烦他了。在路上我遇见做新闻记者的朋友，他邀我同去洞天饮茶，说不必去找张老板。时候还早，洞天茶室里只有寥寥几个客人，桌子大半空着，伙计们坐在角落里谈闲话。我在这里坐了半个钟点，张老板同着几个人来了，我觉得没有趣味，便告辞出来。

正是夜市开始的时候，街旁灯烛辉煌，行人相当多，大家

安详地走着，没有惊惶的样子。但是我走入一条横街，就遇见了阴暗和冷静。我先前到福安筏去过一趟，这时还想再去，以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究竟更清楚些。我便走向通福安筏的路。路略向下倾斜，街巷里只有三四点灯光，我没有电筒照路，差不多摸索地慢慢走着。忽然飞机声传到了我的耳边。我仰头望，天上有好些颗星星。我看不见别的东西，但是我早从《梧州日报》门前报告板上知道了今天下午有一架飞机要从桂林来。一个苦力挑着担子走过我的身边，他惊疑地自语道："机声。"我想对他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不过我无法使他听懂我的话。是的，我们自己的飞机纵然只有一架，但是在被敌机不断地轰炸了以后，一架自己的飞机也够使人觉得亲热，而且给人以莫大的安慰了。

到了码头我看见一只拖渡泊在那里，有两三个人挑着行李上船去，但是毫不拥挤。我觉得奇怪，便也跟着别人上去。舱里人不多，铺位大半空着，有几个木匣似的铺位上放着铺盖卷。一个小孩坐在卖杂货的桌子前面。我问他这只船开往什么地方，他说开往石龙和柳州。我又问卖不卖票，他说在下边卖票。这只拖渡的名字是"民富"，我先前在下面就看见了。于是我连忙离开船大步走到木洞门前。洞门正开着，里面露出一张胖脸，有人站在外面对胖脸说话，我兴奋地问了一句："去柳州的票子还有吗？"

"只开石龙。[1] 票子不多了，要什么舱位？"

---

① 冬天水浅，小火轮只能开到石龙（这是广西省的石龙）。

"餐楼十张。几多钱一张?"

他告诉我价目,我付出钱把票子买了。另一个人买了"民财"的票,来交涉改坐这只船。胖脸不肯,他说"民财"也许明天就到,票子早已卖光,倘若允许客人换船,便无法维持秩序。这样看来,倒是"民富"救了我们,倘使来的是"民财",我们连一张票子也买不到。

我拿了票子,高兴地一口气跑到旅馆。我喘着气把好消息告诉同行的四个人。他们忙着收拾行李,准备上船。我还要到另一个旅店给年长的友人送票去。船上挂牌说是晚上十点开船,这时已是八点了。我们十个人应该在一小时以内上船。我经过洞天茶室,还进去跟那个做新闻记者的朋友告别。他看见了船票也替我高兴。我应该感谢他:他在这里已经给我帮过不少的忙了。而且他自己也还陷在"要走走不动"的境地中!张老板知道我买到了票子,却不说一句话。

我把票子送到东亚酒楼,年长的朋友正在交涉雇民船,跟茶房介绍的船夫谈了一阵还没有结果。他意外地得到船票便准备立刻动身了。我在那里略一停留又匆匆跑回旅馆。到了我们住的西亚酒店,我才知道已经付出了的这晚的房钱经一个朋友交涉以后又退了回来。

九点钟光景,我们上了拖船,这时船上已经挤满了人,年长的友人一起五个人不久也都来了。船大约在十二点钟才离开梧州。

11月底在桂林追记。

民富渡上*

一

上了船应该安心了，我原先是这样想。但是在船上我望着那些高高地堆得使舱里几乎连缝隙也没有的行李，就有点心烦。我们五个人把自己关在舱里一个小房间内（这是一个小得刚刚可以容纳五个人的房间，本来应该住六个人，那个年长的友人大量地让出地方，他上楼去和别的友人挤在一起了），没有风，就觉得闷热。我们时时刻刻都盼望着开船，可是始终不见船动。没有人给我们带来消息。年长的友人在楼上打着鼾睡熟了。

我躺在铺上，耳边还响着飞机声。我打开窗户望，大海似的天空里泛着灯火似的星星。我们的头上很静。这时连自己的飞机也去远了。那声音是从我的记忆的彼岸过来的。我想，在受够了敌机轰炸的人们的梦里，自己的飞机也会时常出现罢。

房里点着煤油灯，看见这灰黄的灯光我更觉得心里不痛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出版《文艺新潮》第一卷第六号。

快。同房的人都不作声了。我一个人睡不着，便吹灭了灯，让我静静地在黑暗中过一夜。

船在我的睡梦中离开梧州。我对这个城市倒有些留恋，大概因为这几天来我已经走熟了这里的整齐的街道，过惯了这里的生活罢。

二

船上的生活是很呆板的。我几年前在广东搭过这样的拖渡，可是每次都只花去一夜的功夫。在船上住四天，似乎太久了。但是我们也无法使船走得更快。大家只得安心地过着日子。

白天我看书，大家都高兴看书，可是我们身边带的书太少了。有时在铺上躺得太久了，觉得腿酸，便走出房去，在船头舱板上散步，或者晒太阳，这时的阳光很可爱的。拖渡旁边系着一只小划子，常常有人坐在那里面脱了鞋袜把脚伸进水里洗濯，爱这样做的是那几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别的人偶尔也去。我喜欢坐在捆缆绳的木桩上，看着前面那只烧木柴的小火轮，靠两根粗绳把两条大木船拖着缓缓地逆流上去。江水曲折地流过两旁的石山中间，山蜿蜒地伸出去，似乎一直到无穷，水也是。山有高有低，水有深有浅。江上有不少的滩。过小滩倒不难，过大滩时情形就颇为严重了。有一次我看见前面那只木船上有人点灯烧香。那时我们船上舱房里人声嘈杂，水手们全出来立在顶上或者舱板上。船两次都不能上滩，刚

被拉到边上又倒退下来。水手们带着紧张的表情忙碌地工作，把缆绳从水里抬起来，将它拉紧了。我们看得见那根缆绳笔直地横在水面，把小火轮和这木船系在一起。我们船上在敲钟，人们在大声叫唤。前面水流得很急，水在打转，浪头接连打到船上。但是我们终于平安地过去了。

因为滩多水浅，我们的船在夜间停航。有时船停泊在一个市镇旁边，我仰头看那些旧式的南方楼房，压不住要上岸去的心思，便出去踏上渡船，看它在朦胧中把我和几个客人送到岸边，我再摸索地走上水湿滑脚的石级，进了没有电灯的小城市。我到过的地方是蒙江。我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同行的是那位年长的友人。我们只看见饮食店，和街旁连接地排着的饮食担和摊子，别的店铺已经关了门。阴暗中去陌生的地方，得不到深的印象。岸边墙壁上的大字抗战标语我倒是看清楚了的。

三

有一次早晨船停在桂平，我和两个朋友坐了小划子到岸边。我们去得晚了，听说不久便要开船，许多客人都匆忙地走下斜坡准备搭船回去。我们不敢走远，略略走过两三条街，看见整齐的街道、整齐的房屋和绘在墙上的抗战宣传图画，便回到岸边。那只拖着我们木船航行了一路的小火轮，原先开到别处去了（照例船一停小火轮便跟拖渡分开），这时正往拖渡停泊的地方开去。显然是那边在准备开船了，我们只得雇一

只小划子赶回拖渡。

我跳上小划子的时候，忽然瞥见旁边一只有篷的木船上一个穿蓝布长袍的中年男子，这个人很像我的一位老友，我和他最近一次会面还是在“一·二八”那年（一九三二）。我听说他到过广州，却不知道他如今在什么地方。小船缓缓地流向河心，我忍不住时时抬头去望那边，我越看那个人，越觉得他像我的朋友。别人告诉我他现在和朝鲜友人在一起工作。在那只木船上果然出现了几个朝鲜男女青年的影子。

这时小划子已经摇到了“民富”跟前，我们三个人跳上了拖渡，以为就要开船了，但是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动静。我想到那个朋友，我不愿意放过这难得的机会。他的影子又在船头出现了。我站在舱板上看得清楚：他坐下来吃饭。我一定要去看他。我看见一只空着的划子停在船边，我就跳到划子上面，叫船夫赶快把我划向对面靠岸的那只大木船去。船夫起初不大明白我的意思，还想把我送到岸边，后来也就听从了我的话。划子渐渐逼近木船，于是两只船靠在一起了，我的身子摇摇晃晃地站在划子上，我惊喜地叫出那个朋友的名字。吃饭的众人似乎都吃惊了，一个中年妇人从竹椅上站起来，她也惊喜地唤着“巴金！”，她是那位朋友的太太。想不到她也在这里！朋友连忙从木船上伸出手来让我握着。他们夫妇要我上去，但是我害怕拖渡开走了，我不能在这里停留多久。他们还在给我介绍朋友。我只得站在划子上匆忙地说了几句话，告诉了他们我的通信处，仍旧由这划子把我送回去。

我回到船上以为马上就要开船了，可是等了十多分钟，还

没有消息。我和刚才分别的朋友夫妇站在两只船的船头，望着彼此的脸，却不能交谈一句。忽然我看见那位朋友在向江边一只划子招手。“难道他还要到我这船上来？”我这样想。他果然跳下划子向我这里来了。这时他已经脱下长袍，只穿一身白布短衫裤。我们这次有机会谈许多话。他告诉我他几年来的情况。我知道他比我早离开广州，在梧州和朝鲜友人一起到桂平来。他们也到柳州去，但是木船到了桂平，却找不到小火轮来拖它，已经在桂平停了一个星期了，目前正在找县政府为他们设法。在那只船上还有他的八十多个朝鲜朋友。……

朋友在我们船上蹲了这么一会儿功夫，终于站起来走了。我能够在这里看见他，我是很高兴的。后来我也进房间去了。年长的朋友来和我谈话，他谈得很起劲。我仿佛听见有人在外面唤我的名字，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想不到会有什么人叫我。我以为这是我的错觉，也就不去管它。我正站在铺位前面，眼睛朝着大开的上铺窗户。迎着我的视线的是朝鲜人的木船。我忽然看见一只划子靠近那木船，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女人从小划子跳上木船去。我认出她是我那朋友的夫人。她到什么地方去了来？我好奇地想着。这时一个朋友进房来说，刚才有一个中年女人上船来，在船头叫我的名字，她叫了三四遍，看不见人便匆匆地走了。我知道这一定是朋友的夫人。我连忙跑出小房间从餐楼走下去。出乎意外地我们的拖渡已经在动了。我连忙走到船头，还看得见那只木船和晒在船上的蓝色和白色的衣服，和几个逐渐变小的人影，我痴痴地站在船头朝那个方向不住地挥手。我感动地望着那只木船，我不知

道在木船上的朋友夫妇是否还看得见我。

四

傍晚船停在一个沙滩旁边。附近没有人家，也看不见亮光。据说前面有大滩，天晚了，上滩不方便，船只得在中途停下来。晚间无事，我们也下去走走。我一个人在沙滩上闲踱了好几回。江畔是一块沙地，再往里走，便只见一片鹅卵石。有两个朋友拿了电筒照着在各处找寻石子。船头挂了一盏大的汽灯，将四周地上照得非常明亮。

深夜，朋友们都睡了，我不能入寐，我想起前前后后的许多事情，尤其是这次广州市的莫名其妙的失陷，我不能再往下想了。……我烦躁地走出房去。我走过大舱旁边，看见水手们挤在隔壁一个小房间里推牌九赌钱。我再到沙滩上，那里静静地没有人声，水悄悄地私语，一声，两声……石子触痛了我的脚掌。天色灰白，水色也是灰白。风吹透我的衬衫，夜渐渐地凉了。

在第二天的黄昏，船到了目的地停下来。我们的旅程又告一段落，我们应该上岸去了。这是十一月三日，我们是在十月三十日上船的。

12 月初在桂林追记。

石龙——柳州*

从船上远远地望石龙，只看见几座石山，想不到那里会有多少人家。但是船慢慢地逼近了，终于停下来。

夜来了。从天空撒下朦胧的月光。船停在江中，搭客上岸不大方便。我们不能断定在岸上我们会找到客栈寄宿，便决定让两个朋友先坐小船上岸去找寄宿的地方。我们想，倘使那边没有地方，我们便在拖渡上多住一晚也是好的。但是那两个朋友上岸以后好久不见回来。年长的友人去找拖渡的账房谈话，却听说这只拖渡一大早起就要开回梧州。看这情形在拖渡住一晚也成问题。我们正在焦虑间，上岸的友人意外地回来了，说是找到了两个寄住的地方，一是客栈的厅堂，一是民家，可以容纳我们一行十个人。

小划子把我们送到岸边。我们站在斜坡上等着女挑夫把行李从划子上搬下来，一件一件地归在一起，然后分挑在五个女挑夫的担子上。我们押着行李一步一步地走上石级。月光淡淡地铺在道路上，我们踏着它。前前后后都是同船的乘客，说着各省的方言鱼贯地走着，没有争吵，虽然不曾交谈，但彼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风》第十期。

此关切的注视使得这个行列好像一个大家族。

这个小市镇上就只有那么几条小街，然而路倒是相当整齐的。我们一行十个人找到两个宿处。年长的朋友和四个友人住在民生客栈，我们五个人寄宿在门柱上贴着“××寓”的民家。

在前楼我们睡到半夜，蚊香把一个朋友①的枕头烧着了（我和他同睡在地板上）。他从梦中醒来，拿着枕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顾用一本《口琴吹奏法》去压灭火。这没有用，火在鸭绒枕头中间延烧。烟早把我惊醒了。我忙乱中拿起皮鞋踏那个枕头，一面把枕头套取开。我的眼睛被烟熏得流了泪。那朋友也是这样。他慌张地抢过枕头一面说：“吐口水，吐口水！”他真的吐起口水来。我看这情形不对。枕头芯已经烧成了几段，而且贴着地板烧，便捧起一堆从窗户往楼下街中抛掷。街上静寂无人，忽然远远的电光一闪。我吃了一惊，我以为警察来了。但是我不得不继续把着火的鸭绒抛到街心去，另一个朋友也起来帮忙。那个主张吐口水的朋友便把剩余的半个枕头芯拿到下面去用水浇熄。等另外两个朋友醒起来时，我们的“消防”工作已经完成了。睡在外面房间的房东却始终不曾睁过眼睛。

我们在这个民房里睡了一晚，第二天就准备走了。这里

---

① 一个朋友：这里指的其实是我的一个兄弟。

有汽车去柳州。我们一清早就去车站打听消息。车已经开走了，站上人说下午还有车开。有不少的人等在站内空地上，他们都带着大堆行李。

我们吃过中饭再去车站，车子已经开到，而且里面坐满了人。只有一辆车。另外有几个军官着急地找车站职员办交涉，要包一部车子送家眷。这个职员是柳州车站派来调整车务的，这里的站长因为无法应付军官和旅客，在这天上午称病逃走了。新来的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想叫坐好的乘客下去让出车子给军官，但是乘客不肯。他们正在争持间，又一辆车子意外地开来了，解决了这位职员的困难。

我们没有办法争到车子，同时我们的行李还存在"××寓"里面，我们暂时断了念，打算散步回"××寓"去。忽然人们惊惶地跑起来，说是发警报了。那两部车子立刻开出站去。我们空手往田野走。走不多远我就听见机声了。不是轰炸机。但我们也只得在一丛矮树旁边隐藏起来。机声逐渐逼近。飞机在我们的头上出现了。我仰头一看，青天白日印在两翼下面。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我们便自己把警报解除了。

我们回到站上不久，遇见同船的四个旅客，他们对我们说，已经打电话托柳州朋友包好了车子，要我们加入同行。我们自然高兴地答应了，便匆匆忙忙地回到民家去搬取行李。在路上我们看见一个人手执铜锣，更夫似地敲着锣，我知道这是解除警报了。

我们把行李搬到车站，在那里足足等了四个钟点，在柳州包的那辆大汽车终于来了。司机坚持说最多只能坐十四个

人，行李也不能多带。但是包车的人却已经约了二十一个同伴。为了搭这辆车，旅客中间发生了争执，后来经过旁人劝解，这事情才得到和平的解决。

车子开动，我没有留恋地离开了石龙车站。我想：又多走一个地方了。

车上堆满了行李，人坐下就不能把脚搬动一下。车颠得厉害。对面一个客人呕吐起来。我望着窗外：一座山，又一座山，都是奇形怪状的石山，一座、两座……我数着，我数不清，我的眼睛花了，头也昏了。夜无声地慢慢落下来，落在山上，落在马路上，落在车上。车子不知道疲倦地向前滚着。终于远远地灯光出现了。

傍晚我们到了柳州。柳州是一个热闹的城市。一条柳江分隔了南北两岸。江上没有桥，连接这两岸的是一些摆渡的小船。汽车停在河南。河南有不少大旅馆。但每家都说已经客满了。我们走遍旅馆找不到一个房间，后来只得在一家“伙铺”里勉强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搬到旅馆去。

在这里我打算休息两天，以后就搭车到桂林去。这一段路的车票是容易买到的。

12月上旬在桂林追记。

在 柳 州*

在柳州住了三天，我们现在买到去桂林的车票，明天早晨不等天亮就要搭汽车出发了。同路的三个朋友① 去贵阳转重庆，搭西南公路局的车，也是在明天上午动身。在柳州只有这短时期的勾留就很顺利地买到了车票，这倒是我们料想不到的。

去四川的朋友昨天下午还到路局登记，他们的轮值是明年二月十八日，就是说他们要在柳州住三个多月才可以买到票子。这长久的等待会使每个人失掉勇气，而且在旅店住三个月，即使自己身边带着充足的川资，也会被警察当作汉奸看待。这里警察的感觉是特别锐敏的。他们来"查夜"，看见我的案头放着一份新买来的广西地图，就以为发现了汉奸的阴谋，立刻发出一些奇怪的问话，后来事实证明自己毫无所获时，他才悻悻地去了（我倒喜欢梧州的警察，他甚至替过路人打电话找住处）。从这件事情看来，外省人长久留在这个地方，是不大方便的。既然在这里没有事做，还是早些离开好。去四川的朋友正打算改变计划，忽然意外地在一个新成立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文艺新潮》第一卷第七期。

① 里面有一个是我的兄弟。

四川旅行社买到了三张去贵阳的车票，每张索价法币二十七元五角，比原来的票价多花五元。那个旅行社转卖三张车票就赚去法币十五元。这种做法也是发国难财百术之一罢。不过朋友们能够买到第二天的车票，已经万分高兴了。在这里不知道还有若干人在等待机会购买去贵阳或者重庆的票子，而且有好多人已经等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至今还见不到一线的希望。

我们明天要离开柳州了。

这三天我们就住在河南。没有遇见一次警报。午后我们走到江边，搭着渡船跨过柳江，到河北去。河北才是柳州的市区。地方大，热闹的街道多。有卖新书的书铺，也有两家较大的旅馆。我们在其中之一的新柳江饭店的二楼饮茶。每张茶桌都被客人占据了，我们停留一刻钟才找到座位。人声嘈杂。外面还有清脆的鸟鸣，偶尔被风吹进一声，两声。我喝着红茶，吃着点心，仿佛坐在广州西关的西南酒家里面。我觉得我是在做梦。这半个多月的奔波不过是一场奇怪的梦。不然我四周为何还有如此太平的景象。

昨天是一个很好的晴天，我们午后到河北去游中山公园，在那里面一个茶棚里喝茶。我和年长的朋友兴奋地谈论抗战的前途，也谈论这半个多月来的见闻。现实的黑暗面投掷了阴影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的心不时发痛。但是光明永远在我们的眼前闪耀。我们始终不曾失去对未来的信仰。公园里飘荡着南国的香气，明绿色的茂盛的树木给我们遮盖了焦热的日光。我们在茶棚里坐了两个钟点，后来听见外面的号鼓

声，才慢慢走出去。我们站在门前，看见中央军校第六分校的学生整队走进对面公共体育场集合，举行纪念典礼。走在最后的是该校的化装宣传队，所以还有五六个学生穿着女人衣服，他们刚刚在外面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等街头剧。

晚上月色甚好，年长的朋友约我们几个人到河北江边一家广东酒楼吃饭。我们坐在楼头栏杆畔，望着江水载了月光缓缓地流动。渡船带着星子似的灯火流过来，又流过去。对面是山，山似乎贴在淡青色的天幕上，又仿佛是名画家随意的几笔涂抹。山上也有几点灯火，它们却是多么昏暗。

里面人们在饮酒谈笑，那是广西大学农学院教职员的聚餐会，参加的人不少，坐满了两桌。人们笑容满面地彼此劝酒。酒楼上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我又回头望江面，月亮进了云堆中，江面罩上朦胧的灰色。依旧是那几点昏暗的灯火。忽然在下面，在码头上，在什么地方一个年轻的女音唱起了《渔光曲》。于是明月从云层里慢慢地露出它团团的脸庞。

柳州和梧州不同，柳州是一个还没有受到战争损害的城市。

然而明天不等天亮，我们就要走了。

12月上旬在桂林追记。

桂林的受难

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这是那位年长朋友①的寄寓，我受到他的好心的款待，他使我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我们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听见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

我们躲警报，有时去月牙山，有时去七星岩。站在那两个地方的洞口，我们看得更清楚，而且觉得更安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桂林市区第一次被敌机大轰炸(在这以前还被炸过一次，省政府图书馆门前落下一颗弹，然而并无损失)，那时我们许多人在月牙山上，第二次大轰炸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又在月

---

① 指林憾庐(？—1943)。

牙山，这次还吃了素面。但以后月牙山就作了县政府办公的地方，禁止闲人游览了。

七星岩洞里据说可以容一两万人，山顶即使落一百颗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所以避难者都喜欢到这个洞躲警报。但是人一进洞，常常会让警察赶到里面去，不许长久站在洞口妨碍别人进出。人进到里面，会觉得快要透不过气，而且非等警报解除休想走出洞去。其实纵使警报解除，洞口也会被人山人海堵塞。要抢先出去，也得费力费时。所以我们不喜欢常去七星岩。

在桂林人不大喜欢看见晴天。晴天的一青无际的蓝空和温暖明亮的阳光虽然使人想笑，想唱歌，想活动。但是凄厉的警报声会给人带走一切。在桂林人比在广州更害怕警报。

我看见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几份人家，像做日课似地每天躲警报，觉得奇怪。他们在天刚刚发白时就起身洗脸做饭。吃过饭大家收拾衣物，把被褥箱笼配上两担，挑在肩上，从容地到山洞里去。他们会在洞里坐到下午一点钟。

倘使这天没有警报，他们挑着担子或者抱着包袱负着小孩回来时，便会发出怨言，责怪自己胆小。有一次我们那个中年女佣在厨房里叹息地对我说："躲警报也很苦。"我便问她：为什么不等发警报时再去躲。她说，她听见警报，腿就软了，跑都跑不动。的确有一两次在阴天她没有早去山洞，后来听见发警报，她那种狼狈的样子，叫人看见觉得可怜又可笑。

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

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都剩下断壁颓垣。人在那些墙壁上绘着反对轰炸的图画，写着抵抗侵略的标语。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燃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罢。

每次解除警报以后，我便跨过浮桥从水东门进城去看灾区。第一次在中山公园内拾到几块小的弹片；第二次去得晚了，是被炸后的第二天，我只看见一片焦土。自然还有几堵摇摇欲坠的断墙勉强立在瓦砾堆中，可是它们说不出被残害的经过。在某一处我看见几辆烧毁了的汽车：红色的车皮大部分变成了黑黄色，而且凹下去，失掉了本来的形态。这些可怜的残废者在受够了侮辱以后，也不会发出一声诉冤的哀号。忽然在一辆汽车的旁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我听见人讲起那个可怜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给烧

死在地上。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是衣服和血肉粘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第三次大轰炸发生在下午一点多钟。这是出人意外的事。以前发警报的时间总是在上午。警报发出，凄厉的汽笛声震惊了全市，市民狼狈逃难的情形，可想而知。我们仍旧等着听见紧急警报才出门。我们走进菜园，看见人们挑着行李、抱着包袱、背负小孩向七星岩那面张惶地跑去。我们刚走出菜园，打算从木桥到七星岩去。突然听见人们惊恐地叫起来："飞机！飞机！"一些人抛下担子往矮树丛中乱跑，一些人屏住呼吸伏在地上。我觉得奇怪。我仔细一听，果然有机声。但这不是轰炸机的声音。我仰头去看，一架飞机从后面飞来，掠过我们的头上，往七星岩那面飞走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骚动平息了。人们继续往七星岩前进。我这时不想去山洞，就往左边的斜坡走，打算在树下拣一个地方坐着休息。地方还没有选好，飞机声又响了。这次来的是轰炸机，而且不是我们的。人们散开来，躲在各处的树下。他们来不及走到山洞了。十八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一转，于是掷下一批炸弹，匆匆忙忙地飞走了。这次敌机来得快，也去得快。文昌门内起了大火。炸死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音乐家。①

第四次的大轰炸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了，我要另写一篇《桂林的微雨》来说明。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火头七八处，从下午燃烧到深夜，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警报解

---

① 青年音乐家：指张曙(1909—1938)。

除后，我有两个朋友，为了抢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围在浓焰中，几乎迷了路烧死在火堆里。这一天风特别大，风把火头吹过马路。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不过另一部分书搬到了较远的地方，便没有受到损害。

就在这一天（我永不能忘记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警报解除后将近一小时，我站在桂西路口，看见人们忽然因为一个无根的谣言疯狂地跑起来。人们说警报来了。我没有听见汽笛声。人们又说电厂被炸毁了，发不出警报。我不大相信这时会再来飞机。但是在这种情形里谁也没有停脚的余裕。我也跟着人乱跑，打算跑出城去。我们快到水东门时，前面的人让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拦住了，那个人拿着手枪站在路中间，厉声责斥那些惊呼警报张惶奔跑的人，说这时并没有警报，叫大家不要惊惶。众人才停止脚步。倘使没有这个人来拦阻，那天的情形恐将是不堪设想的了。后来在另一条街上当场枪决了一个造谣和趁火打劫的人。

以后还有第五次、第六次的轰炸。……关于轰炸我真可以告诉你们许多事情。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从以上简单的报告里，你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受难的情形，从这个城市你们会想到其他许多中国的城市。它们全在受难。不过它们咬紧牙关在受难，它们是不会屈服的。在那些城市的面貌上我看不见一点阴影。在那些地方我过的并不是悲观绝望的日子。甚至在它们的受难中我还看见中国城市的欢笑。中国

的城市是炸不怕的。我将来再告诉你们桂林的欢笑。的确，我想写一本书来记录中国的城市的欢笑。

1939年1月中旬在桂林。

桂林的微雨*

绵绵的细雨成天落着。昨晚以为天就会放晴，今天在枕上又听见了叫人厌烦的一滴一滴的雨声。心里想：这样一滴一滴地滴着，要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起来看天，天永远板着脸，在那上面看不见笑的痕迹。我不再存什么希望了。让它落罢，这样一想，心倒沉静下来，窗外有人讲话。我无意间听见一个本地口音说：

"这种天气谓之好天气。"接着是哈哈的笑声。低的气压似乎被这笑声冲破了。我觉得心境略为畅快。

我初来这里正遇着这样的"好天气"。我觉得烦躁，我感到窒闷。那单调的滴不断似的雨声仿佛打在我的心上，我深夜梦回时不禁奇怪地想：难道我的心是坚厚冷硬的石板，为什么我的心上也响起那同样的声音？

我走在街上，雨水把我的头发打湿，粘成一片。眼前似乎罩了一层雾。我的脚踩进泥水中了。我是在两个半月以前，还是在今天？……我要去找那家书店，看那三张善良的年轻面孔。我以为我就要走到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文汇报·世纪风》。

但是，啊，街道忽然缩短了，凭空添了一大片空地。我看不见那家书店的影子。于是一道亮光在脑中掠过，另一个景象在眼前出现了。我觉得自己被包围在火焰中。一股一股的焦臭迎面扑来，我的眼睛被烟熏得快要流出眼泪。没有落雨，但是马路给浸湿了。人在跑，手里提着、捧着东西。大堆的书凌乱地堆在路中间。一个女人又焦急又气愤地对两个伸着手的人说："人家房子都快烧光了，你们还忙着要钱！"她红着脸把手伸进怀里去掏钱。我在这个女人的脸上见到熟人的面容了。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不，我应该说是见过这张面孔，这样的表情我在我走过的每一个中国的地方都目击过。这里有悲愤，有痛苦，有焦虑，但是还有一种坚忍的力量……

我再往前走，我仿佛还走在和平的街上。但是一瞬间景象完全改变了。我不得不停止脚步。再没有和平。有的是火焰，窒息呼吸、蒙蔽视线的火焰。墙坍下来，门楼带着火摇摇欲坠；木头和砖瓦堆在新造成的废墟上，像寒夜原野中的篝火似地燃烧着。是这样大的篝火。烧残的书页散落在地上。我要去的那家书店完全做了燃料，我找不到一点痕迹了。

"走，走！"警察在驱逐那些旁观的人。黑色的警帽下闪露着多么深的苦恼和愤怒。……我忽然醒过来了。

我又从一个月以前的日子回到今天来了。雨丝打湿了我的头发。眼镜片上聚着三五滴雨点。我一双鞋底穿了洞的皮鞋在泥泞的道路上擦来磨去。刚刚亮起来的街灯和快要灭尽的白日光线给我指路。迎面走过来两三个撑伞的行人。我经过商务印书馆，整洁的门面完好如旧。我走过中华书局，我看

不见非常的景象。但是过了新知书店再往前走……怎么我要去的那家书店不见了？还有我去过的一位朋友的家也不知道连屋瓦都搬到了何处去！剩下的是一片荒凉。几面残剩的危墙应当是那些悲惨的故事的目击者。它们将告诉我一些什么呢？

我站在一堵烧焦了的灰黑的墙壁下，我仰起头去望上面。长的、蛛丝一般的雨打湿了我的头发。墙壁冷酷地立在那里。雨丝洗不去火烧的痕迹。雨落得太迟了。墙壁也许是一个哑子，它在受了那样的残害以后还不肯叫出：复仇！

我觉得土地在我的脚下开始摇动了。墙壁在我的眼前倾塌下来。不。没有声音，墙壁车轮似地打了一个转，雨水一下子全干了。墙头发生了火。火必剥必剥地燃着。……我又回到一个月以前的日子了。

夜色突然覆盖了全个城市。但是蓝空却有一段红的天。红色的火光舐着天幕。火光升起来，落下去，又升起来。这时风势已经减弱了。但是凉风吹过，门楼、屋梁、墙头忽然发出巨响，山崩似地向着新的废墟倒下来。火仍在燃烧，火星差不多要飞到我的棉袍上面。我们穿过一条尚在焚烧的巷子，发出热气的墙壁和还在燃烧的瓦砾使我的额上冒汗了。瓦砾堵塞了平时的道路，我们是踏着火焰走过去的。一个朋友要去探望他那个淹没在火海中的故居，可是那里连作为界限的墙壁也不存在了。他立在一片还在冒烟的瓦砾前搔着头在记忆中找寻帮助。他很快地认出了地点，俯下身子想在砖石堆中挖出一两件他所喜欢的东西。我帮忙他找寻那只画眉的尸骸，

却看见已经失了形的打字机的遗体。他自己在另一处找到了鸟笼的烧焦的碎片，他珍惜地用两根手指提起它，说："你看，不是在这里吗？"我这时仿佛听见了那只可怜的鸟的最后哀鸣。

"你们找东西的明天来。现在火还没有熄，不好翻。"对面的房屋还是完好的，它能够巍然单独存在于废墟的中间，大概因为它有高的风火墙罢，在门前坐着一个人，上面的话就是从他的口中发出来的。

"我们来找自己的东西，"朋友回答了一句。

"没有人敢来拿东西的，我们在这里给你们看守。有人挑水去了。你看这边那边都还有火。你们明天来罢！"那个守夜的人说。

这个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梦。我回顾四周，没有朋友，没有守夜的人。现在不是在夜间，我也不要找人和物件。我不要到这里来。但是回忆把我不知不觉地引到这里来了。

我走过环湖路，雨较大了。冰凉的雨点打在我的脸上。脚总是踩在水荡里，雨水已经浸入鞋底，把袜子打湿了。但是鞋底还常常被泥水粘住，好几次要把身体忽然失去平衡的我拖倒在地上。我听见旁边一个年轻人说："这样的天气真讨厌！"

"讨厌？这算是好天气呢！在这种天气是不会有警报的，"另一个人高声回答。

我已经走过洋桥，更往南走了。我忽然觉得身子轻松，路很快地在我的脚下退去。天晚了。我看见夜幕张开来。雨立

刻停止。代替的是火。火又来了。时间一下便跳了回去。

马路上积着水，堆着碎砖，躺着断木，横着电线。整条整条街都只剩下摇晃的墙壁和燃烧的门楼。没有人家，没有从窗户映出的灯光，没有和平的市声，桂林成了一个大的火葬场。耸立的颓垣便是无数的火柱，已经燃烧了五六个钟点了。一家旅馆，我到那里去过两次，那是许多朋友的临时的住家，我看见火在巍峨的门楼上舐着舐着，终于烧断了它，让砖石和焦木带着千万点火星向着我们这面坍下来。是发雷的响声，接着又是许多石块落地的声音。火星向四处放射，像花炮一样。但是在废墟上黑暗的墙角里一个男人尖声叫喊："救命！"

许多人奔过去，人们乱嚷："拿电筒来，拿电筒来！"

电筒！我一怔：我手里不是捏着电筒吗？我正要跑过去。但是——我的眼前只有寂寞的废墟，而且被罩在夜幕下面了。我用电筒去照，廉价的小灯泡突然灭了。我才记起来火已经熄了将近一个月了。

"好天气？哼。真正闷死人！我宁肯要晴天，即使飞机来炸，我们也不怕。凭它飞机怎么狠，它能够把我们四万万五千人炸光吗？"

还是先前那个年轻人，怎么我跟了他们到这里来了？怎么他到现在还谈着那同样的话题？我觉得奇怪。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我想看他一眼。我随手举起电筒，按着电钮。然而没有亮。我才记起我的电筒不亮了。我无法看清楚那个人的脸。我想大概不是做梦罢，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

电筒不亮，就打消了我再往前走的心思。其实这句话也

不对。我有点害怕我会再落到一个月以前的日子里去，让那些永不能忘记的景象再度将我的心熬煎。

回到家里，我看见一个月以前自己写在一张破纸上的潦草的字迹：

> 什么时候才是我们的复仇的日子呢？什么时候应该我们站出来对那些人说："下来，你们都下来！停止这卑怯的谋杀行为，像一个人那样和我们面对面地肉搏"呢？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升到天空去将那些刽子手全打下来呢？
>
> 血不能白流，痛苦应该有补偿，牺牲不会是徒然，那样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我相信自己的话。

1939年1月下旬在桂林。



感　想

《感想》，一九三九年七月由烽火社初版，迄一九四〇年七月，共印行三版（次）。

前　　记

收在这小册里的短文只是一些感想和杂感。它们算不得正式的文章，不过我在那里面说的全是真话。而且我以为我们在这时候应该说真话。

我自己十分喜欢那一篇题作《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文章，这是怀着热烈的希望写成的。我写最后一段时敌机就在我的头顶上投弹，但是我终于把它写完了。我对于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坚决的信念，读者可以在这文章里看出来。

巴　金 1939年5月。

感　　想(一)

——在"孤岛"

我在这里看见了我所要看见的一切，现在我应该走了。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远迢迢的从天津写信来说："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短短的两句话中含着无限的沉痛。我固然感激她的关怀，但是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她那渴望着温暖的年轻的心。我没有权利叫人为我的安全耽心。我现在是很安全的，但在这种时候，一个人的安全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粟，哪里还值得提说！

我是自由的，没有一种命运能够压倒我，所以，我要到别的容许自由活动的地方去。在这里空气太沉闷了。有人把这里称作"孤岛"，但我说，它更像一个狭的囚笼，有时我觉得连气也缓不过来，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有一只魔手扼住我的咽喉。

然而在这囚笼中生活着的并不只我一个，这里还有几百万的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思。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对于这无数的中国的儿女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在前面等着他们呢？还有在马路上抱着书本往来的成千成万的男

女学生，我常常看见那些天真的面貌，我常常想念那些纯洁的心灵。于是那个十七岁的天津孩子的信函里的话语，就飘进了我的心头。我倒为我一个人的安全的离开感到羞惭和苦恼了。我苦痛地想：难道我真的不能把这身子变做火柴燃烧起来，给那些年轻的心灵添一点温暖么？我自己太没有力量了。

牵系我的心的便是那无数的年轻的心灵，所以读到天津的来信，我竟然淌了眼泪。但是我绝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派。真正相信着最后胜利的极少数人中间我应该算是一个。我至今还向朋友们发表我的乐观的论调。然而那些三四个月前高呼抗战、慷慨激昂，以青年领袖、民众领袖自居的人们不是惶惶然逃入安全地带，便是垂头丧气，让汉奸论调征服了他们。连一些大报也渐渐改变了态度。在"孤岛"上的中国人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他们的信念已经动摇了，正需要别人来使它坚定。目前的暗云遮住了每个青年的眼睛，使他们对于黎明的将来失却了信仰。年轻的心常常是脆弱的，经不起暴风雨的打击。他们在失望、苦闷的时候，需要人来给他们一点安慰，一点鼓舞，而且一点温暖，因为现在是寒冷的冬天了。最近还有一个青年朋友在给我的信上说："许多人都离开我们了，我们现在是多么孤独彷徨。谁来领导我们呢？"这也是中国的青年的呼声，还有人愿意给他们一个回应吗？不说领导，就是些微的安慰和鼓舞，对于他们也很可宝贵的。

然而生活在患难中的中国的青年是不应该徒然悲观的。即使那应得的安慰和鼓舞不会来，即使没有人来领导他们，他

们也必须在苦难中支持下去，用患难把自己的脆弱锻炼为健强，培养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那黎明的将来。

那个天津的孩子说得好："我记得"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书里的末一句话：Wait and hope 我愿意如此。"这 Wait 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1937年12月。

感　　想(二)*

——在广州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加到这日子上面。我不曾分析过我当时的感情。那第一声炮响是我盼望了许久的。它终于意外地走来了。许多朋友在那天早晨感动得疯狂似地跳起来，称这为“神圣的炮声”。我用“意外地”三字，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相信我们的“军事当局”已经下了决心要洗尽从前不抵抗的耻辱。上海的炮声扫除了无数的人的疑惑。有人甚至想：大翻身的时候到了。打碎镣铐争取自由，这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居然活到了这一天。以前的一切顾虑束缚都没有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大街上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用口，而且用行动来表现这个意思。于是像发生了奇迹似地在我们同胞中间的隔膜和成见马上消失了。一声炮响把大家连接在一起，使那许多颗心变成了一颗心，彼此不相识的人会在电车里亲密地谈起话来。从陌生的口里不断地送来祝贺的话语。大家兴奋着，希望着，而且开始为那一个共同的目标忙碌着。等不到别人来动员他们，民众自己动员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大公报》。发表时题为《一点感想》。

了。宣传、募捐、参加救护工作、扶助难民……还有许多许多。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伸出手交出自己所有的东西，而且谦逊地向一些机关，一些团体要求："给我一件工作，我愿意为这神圣的抗战牺牲我的一切。"这些人的确是不自私的。他们中有的已经舍弃了在闸北、虹口、江湾一带的财产和事业；有的甚至经历了和家族"生离死别"的惨剧。便在"大世界"炸弹事件发生以后也没有人发出一声怨言。大家只觉自己所牺牲的还不够多，他们还应该把剩余的一点力量贡献出来。我看见一个小孩自动地打碎了扑满把几年来的储蓄全交给父亲送到收捐款处去。我看见一个娘姨把她的有限的工钱含笑地亲手送给进来捐款的女学生。我不想多举这一类的例子。要说明"前方将士慷慨牺牲，后方民众热心服务"这是多余的事。每个人都太熟习了。每个人都在那样的日子里生活过，而且有的人(大多数的人)还一直是那样地生活到现在。

我这里说大多数人，因为有些人(极少数的人)在抗战的过程中失去了这种热诚(也许他们从前的热诚便是虚伪的)，改变了态度。后来竟然发表古怪的论调或者甚至投降在伪组织下面为侵略者张目。他们的灵敏手腕也许可以在晴明天幕上涂抹几片云雾。但不能蒙蔽世人的眼目。连这云雾也常常被巨风吹散了。在四万五千万人民的巨步下面这些人只是几只蚂蚁。迟早会被踏死的。

现在到了"八·一三"的周年纪念日。虽然我们的抗战已经进入第三期，但我在一年前所看见的即我在前面提过的那一切现象最近都还存在，而且民众的动员也已开始成为具体

化了(自然仍还有不少的缺点,但这是可以渐渐克服的)。

就抗战本身来说。这一年来我们的努力也并没有失败。若有人提起失地,我就举出上海做例子,上海在今天还是我们的,和一年前并没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在今天我们的旗帜会淹没了上海的租界。比一年前我们在那里能看见的多得多。在上海的四郊时时响着我们的军队的炮声。这事实连敌人也无法否认。这些就告诉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失去的是些什么,不曾失去的又是一些什么。

一年前近卫要使我们屈膝,现在我们还站得很稳,而日本的脚却陷进污泥里愈陷愈深了。我等着那个东方的法西斯国家的屈膝,我等着那个穷兵黩武的帝国的崩溃。

1938年8月。

第一次听见那炮声

妃格念尔在她的自传里描写了俄国革命党人得到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时的感动。她和朋友们抱吻着互相祝福，同时哭笑。这时候在他们的眼前现了自由的曙光。他们觉得那个多年来笼罩着俄国的梦魇是突然地消失了。

在“八·一三”那天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怀着这种感动的心情来祝贺那“神圣的”炮声。这声音是许多人期望了许久的。有些多疑的人因为久等不到就断定它永不会响起。那时北方的天空中正布满了黑焰，许多同胞的生命和事业都毁在华北的大火里，没有人可以伸出一只手去救出一些来。仿佛一个不能挽救的大灾祸就要临到这个民族的头上。年老的束手叹息着我们的劫运。中年人绝望地问自己：应该怎样做？青年奔走呼号想唤醒人们的迷梦。这似乎没有用。希望逐渐黯淡，空气非常沉闷，许多人都透不过气来。不能忍耐的人开始觉得生存是一个痛苦的重荷了。但在这时意外地来了那炮声。它打破了疑惑，驱散了悲观。它甚至像洪钟一般地告诉人说：这些年来扼住我们的咽喉的那只魔手已经被我们甩开了。到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自由地呼吸一口气，准备去抓住那重新逼近的希望。老年人不再叹息了；中年人不再徘徊了；青年则发

见了献身的机会。难道还有比这炮声更可喜的？更令人兴奋的？更能够鼓舞人的？在这炮声里许多人中间的隔阂都立时消失了。若说这炮声把全中国人团结在一起，这也不是夸张的话。所以当时有人称这炮声为“神圣的”。

虽然时间过了一年，我还不能忘记那一天的情景。朋友们如何兴奋地跑到我的房里来，兴高彩烈地告诉我那个我已经知道了的消息。我们谈了一些关于将来的话，又一道出去把这消息告诉别的朋友。我们跑了好几个地方。我们谈着，笑着，大声叫着，又流着眼泪，我们有时对望着，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或者口吃似地重复地说着几个字。我们想，多年来笼罩着中国的可怖的梦魇现在开始消失了。

那时人太激动，我们不多思想，却让情感奔放。但这一年中的事实证明出来我们当时并不是过于乐观。在抗战中未来新中国的基石的确被奠定了。中国渐渐在改变。中国在前进中，正如西班牙在前进中一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次的抗战称为革命。

朋友们商议创刊《救亡日报》还是“八·一三”以前的事。那时平津沦陷了，京沪两地弥漫着和平的空气。我为日报写了一篇愤激的文章，题作《站在十字街头》。日报延期出版，我的文章移在《国闻周报》发表了。我在那文的结尾引用了P.亨利的话：“难道生命竟是如此可贵，和平竟是如此甜蜜，须得用奴隶的镣铐来作代价么？……给我自由，不然便给我死！”

自由或死！正是抗战的中国的呼声。这一年来为着这自由牺牲了生命与事业的人已经是不可计数。然而自由的呐喊

只是一天一天地更加响亮。痛苦并不曾动摇了人的决心。甚至连日残酷的轰炸也不能减少广州市民的抗敌情绪。今天、昨天敌机都在热闹市区中投过弹，昨天有人看见二十多辆卡车装载着受伤者到医院。我昨天下午见到那些残毁的房屋，晚上却看见壮丁宣传队拿着旗帜游行街市，旗上写着："八·一三到献金台去。"昨天落弹的地方离献金台并不远！但我知道八·一三那天会有成千成万的人到那里去！

死的威胁并不能闷杀自由的呼声。这样的精神一定可以给我们保证抗战的胜利。

1938年8月。

失败主义者*

再过一星期，又是“八·一三”了。我们居然和侵略者认真地打了一年的仗。这对于那些失败主义者，的确是一个奇迹。他们绝不相信中国的抗战会支持到今天，而且更想不到在今天我们还是同样英勇地和敌人在搏斗。一年前我遇见过不少这样的人，听过不少悲观的论调。我曾用热情想煽起他们的火，拿历史的教训来提醒他们。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没有用。他们叫我等着看。北方战事的失利正是他们表显口才的机会。“大世界”的炸弹使他们躲在租界里连房门也不敢出。我们的军队退出上海了，他们叹一口气就预言快要讲和。这预言没有实现。他们便又等着南京的陷落。敌人进了南京，却始终无法使中国屈膝。战争仍旧继续下去。现在那班人又应该盼望着武汉的退出了。他们不相信保卫武汉的计划会实现；他们不相信中国会得着最后的胜利；所以他们希望早日造成利于议和的环境。他们不敢想到解除日本的武装，只得盼望中国武装解除了。

战争使人民受苦，这自然是事实。失败主义者便以这事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见闻》第二期。发表时题为《杂感（一、失败主义者）》。

实做理论的根据。他们不知道在某种情形下不战更使人民受苦。也许他们是知道的，不过他们更看重自己的个人利益，只要自己照常舒服地过日子，别的就可以不必管了。有着这种苟安心理的人是很多的。两个月前有人向我断定战争在“八·一三”以前结束。他的理由是中国不能支持下去。我自然不相信他的话。不过看他谈得很有把握，我也就不去打岔他。后来谈到他个人的计划，他说他想回到某某地方过某样的生活。那地方现在还是在敌人统治下面，要等和议成功后他才可以回去。这时我才明白是他自己支持不下去，希望讲和了。并非中国不能够继续打仗。我这朋友不是商人，倒是知识分子。我在知识分子中间遇见过不少的这类的人。有几个从前还慷慨地发表过一回抗战言论，后来却埋怨自己把中国军事方面的实力估计得过高了。他们虽然还不致于听见胜利消息就说是报纸造谣，可是一旦知道重要城市陷落，便偃息旗鼓地坐等和平了。

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于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有妨碍。不过它们在目前还不能成为一种力量。而且不等它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就会将它们打碎。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违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我说过抗日是一道门，我们要生存要自由，非跨进这道门不可，至于进了门往哪条路走，那是以后的事了。目前抗战是

第一义。我们应该牺牲一切，使抗战胜利。

一年自然不是长时间。然而到现在我们的抗战力量丝毫没有动摇。从各方面的情形看来，我们倒是“越战越勇”了。事实坚定了我们的最后胜利的信念，事实也会粉碎失败主义者的言行。

1938年8月。

国家主义者*

我们都知道西班牙的战争不是普通的内战，而是一个革命。我以为中国这次的抗战也含有革命的意义。这一层已经有许多人明了了。但也有一些人还不曾注意到，我想在另一节杂感里谈谈它。

我听见一些人的谈话，我看见一些人发表的文章。什么"杀尽日本人"，"杀到东京去"，"把朝鲜拿回来"之类的话都有。还有人希望中国在这次抗战胜利之后，就要征服日本，征服世界。

这种极端的国家主义者的见解和失败主义者的论调是同样要不得的，同样对抗战前途有妨碍的。中国的抗战是为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而起的。事实上就以反帝国主义、反法西主义为号召。中国的抗战是为着求自己的生存，谋自己的独立。这目标里并不含有一点侵略的野心和征服的欲望。所以说我们是为正义而战，这并不是自夸的话。

我们不是好战的民族，甚至在今天，我还觉得"好战"并非可奖励的事。然而当我们的自由被剥夺，生存受到威胁时，忍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见闻》第三期。发表时题为《杂感（二、极端国家主义者）》。

辱苟安便成了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它害了自己还不够，并且会连累别人，甚或贻祸子孙。我们这许多年来所忍受的耻辱，所经历的灾祸，以及近一年来在抗战期间所贡献的那么巨大的牺牲，这一笔欠帐还是满清的统治者和甘愿在那横暴统治下做奴隶的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现在必须用我们的血来把债偿清，我们才可以获得自由。我们将来留给我们子孙的应该是一个光荣的遗产，而不是一笔欠债。忍辱偷安的生活是债，以武力建立的霸业也是债。征服别的国家，征服世界，那是侵略者的迷梦。日本的统治者整天都生活在这样的好梦里。我们现在竖起抗战的大旗来偿还从前的忍辱偷安的债。日本的统治者，遣派大军远涉重洋来实现侵略的企图，也是在偿付从前的穷兵黩武的债。我们还了债可以得到自由；他们还了债则趋向灭亡。忍辱苟安违反了所谓人类繁荣的法则；穷兵黩武也违背了它。所以中国不抗战则必灭亡；日本继续侵略也必归于毁灭。武力并不能征服人类繁荣的法则，它倒会被那法则征服。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一时的阴云虽然可以遮蔽天空，但一阵大雨又能洗出一个清明的世界。

杀到重庆摧毁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使中国沦为殖民地，这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好梦。可惜梦景不会成为现实，将来日本的军阀政客只好抱着作战计划和什么立国论之类含恨饮泣地进到坟墓里去。这正是他们的宿命。

“一·二八”抗战停止后我曾在江湾立达学园的墙上，看见日本兵士的手迹，是“打倒支那，不残一人”八个大字。这是日本人的汉文。“残”不是“残害”的“残”，而是“残留”的“残”。

意义很明显：打到中国不留下一个人。这正是侵略者的梦中最“奇丽”的一景。而作为反侵略者的我们则向着海那边的劳动者喊出了口号：“弟兄，去打你们自己的敌人，不要来打中国的兄弟。”我们和侵略者的不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说，来中国作战的日本兵士是我们的敌人，发动这次战争的日本的统治者是我们的敌人，积极支持这战争的日本社会各种领导人物是我们的敌人，这都不错，我们必须将他们打倒！对于在那边也受着压迫的无数和平的劳动者，则我们有将他们唤醒，使他们起来和压迫他们的统治者算账的义务。若有人问用什么东西唤醒日本的劳动者，我的回答是“我们的抗战！”，这不是一句空话，欧洲大战中德俄两国的结局便是日本的命运。

在今天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将另一民族打倒而“不残一人”的。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坡格隆”，和最近德奥两国的排犹运动，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日本的野心家想“打倒支那，不残一人”，而最后将他们送入坟墓中去的必是这些“支那人”。我们不必梦想杀到东京去。我们只要能够将侵略者逐出国境，则在那边必有他们的敌人等待着他们。尼古拉二世是死在他所统治的俄国人手里的。坦能堡一战，种了爱加特林堡悲剧的因。安知我们的保卫武汉的大战不会产生一个东京的悲剧？倘使我的揣测不错，这悲剧是不要经我们的手而演出的。

在这悲剧演出之前或后，朝鲜是应该见到黎明，得到自由了。朝鲜的独立必是我们抗战的结果之一。这是自然的事。目前朝鲜的兄弟正参加着我们的抗战，将来我们也要帮助他

们夺回自由。关于这方面我下次还有话说。至于想把朝鲜拿回来放在中国保护之下，那是极端国家主义者的梦想。

极端国家主义者和侵略者中间的差别很小。我们不想做侵略者，所以我们应该纠正这种错误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的观念。

1938年8月。

最后胜利主义者*

在中国有短视的人，有性急的人，有些人根本看不起自己，有些人又把自己看得太高。还有人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十分简单，十分容易。也有人把一切人力做得到的事情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患恐日病的“日本通”，也有把近代日本仍视作倭寇的自大主义者。我们有失败主义者，也有胜利主义者。

这些胜利主义者又可以被称为最后胜利主义者，因为挂在那些人的口边的，永远是“最后胜利”四个字。

我前些时候，和一个人谈过话，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去年上海还未沦陷时他对我的朋友说，上海可以守一年，但不久国军就撤退了。后来他又发表南京必守的宏论。他不是说应该守，他是宣传可以守，而且守到某一个时期日本帝国就会崩溃了。他对于抗战的前途是如此乐观。他好像比谁都更有把握。这一次在久别后和他遇见，他和我谈起保卫武汉的事，仍然是那两句口头禅：“抗战第一”，“最后胜利”。他劝我不要管任何事情，只是闭着眼宣传“最后胜利”就够了，因为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见闻》第五期，发表时题为《杂感（三、胜利主义者）》。

在这时期，除了“最后胜利”外，其余的一切我们都不需要。

这位先生的确是一个最后胜利主义者。在这时候许多慷慨激昂的宣传家、政论家都撤退到重庆和昆明了，有些未撤退的热心之士也发出了悲观的论调，他还能够保持着他的信念，倒是值得佩服的。他有着如此坚定的信念，那么他对于“最后胜利”也一定有非常透彻的了解了。但是我和他谈话以后才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对于“最后胜利”只有信仰，并无了解。他相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却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也不明白我们怎样会得到最后胜利。

“抗战第一”和“最后胜利”这两个口号并不错误，但它们的意义却不像最后胜利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狭隘。使全国民的努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每个国民要贡献出他的最好力量：所有的人忙碌地工作以争取最后胜利。抗战需要着各种力量，也需要各方面的工作。最后胜利并非像奇迹那样地从天上落下来，却应该由全个民族不顾一切地努力去争取它到手。士兵在前线浴血是在参加抗战；工人在后方工厂里劳动也是在参加抗战。生产、建设、交通、教育……等等在抗战期内的任务比较在平时更加重大。在轰炸的威胁下热诚服务的各城市的各种小职员也许不会被人重视，但是他们对于抗战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难民需要教养，交通需要维持，生产需要增加，边疆需要开发，各项建设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工作也需要展开……还有许多许多，这些问题不解决，最后胜利决不会到来。要支持长期抗战，仅仅注意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上。日本军阀不能使中国屈

膝，正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后方。这广大的后方也是中国的抗战的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这个力量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至目前为止的前线的失利之所以不能影响战局，也因为我们有着这广大的后方。这可见为着抗战而建设后方的工作是如何迫切地需要了。至于盲目地宣传最后胜利，那倒是毫不重要的。

最后胜利主义者谈"抗战第一"时，眼睛只望着前线；谈"最后胜利"时，他只等待着日本军队的崩溃（或者等候威尔斯的预言的实现）；现在谈"保卫大武汉"他却看不起民众动员这样重要的工作。

据说希特勒是糊里糊涂地变成了英雄的。这且不管。我们那位胜利主义者倒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相信了最后胜利的。

别的话下次再说，这里只算说了一半。

1938年9月。

公式主义者*

“抗战的八股文，读得太多了，渐渐地叫人讨厌起来”，这是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的话。其实向我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的人不只他一个。

我前些时候买到一批新刊物，约有七八种，我把它们从头到尾地翻阅，结果我觉得仿佛只读了一篇文章。起初我很惊奇，我禁不住要责备自己的鲁钝；后来我才恍然明白：那许多文章有着差不多的内容（要说它们只有空架子，没有内容也未尝不可）。到这时我才相信那朋友的话是有道理的。

公式文章是这样写的：——头一段述日本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野心，与夫积弱的中国如何受强邻侵略而忍辱偷生；第二段述中国由发奋图强而至发动抗战，引起全世界的尊敬；第三段述抗战的各阶段；第四段述日本帝国的即来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崩溃；最后结论是“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写这种公式文章的人自然和我上次说的“最后胜利主义者”是一类。不过，这中间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我那位朋友的朋友真是准备着死守武汉，而写那些公式文章的人却早已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宇宙风》乙刊创刊号。

连人带刊物地一起搬到重庆或昆明去了。他们似乎是用搬家来对付敌人，以后也许会再搬到巴安或拉萨去坐等最后的胜利。

倘使单靠"坐等"的话，那么谁也不会看到最后胜利了。幸而我们这民族里面还有着不少知道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而且用热血去和侵略者相拚的人，所以最后胜利的希望还悬挂在我们的前面。但这和我们那些公式主义者是无关的。我把专门写上面那种公式文章的人称为公式主义者，以别于"最后胜利主义者"。

"公式主义者"不像"最后胜利主义者"那样糊里糊涂地相信着一两个简单的口号。他们的特长是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话。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来推翻自己的主张。所以，最先从武汉撤退的便是高叫"保卫大武汉"叫得最响亮的人，正如上海沦陷后仓皇地化装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论的民众领袖。他们写出来的是一般人承认的公式，他们所顾念的却是自己切身的利益。别人都愿意听那样的话，别人都说惯了那样的话，自己照样地说一遍，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正话是好听的。说过写过之后似乎责任已尽，他们回到家里仔细一想，又觉得胜利渺茫，一听到不好的消息，便以走为上策。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又开始这公式主义者的生涯，再叫出保卫这地方的口号，鼓动民众做保卫的工作，但等到这地方真该保卫时，他们又会首先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从这种事实看来，我觉得要是单靠公式主义者的笔和口

来争取最后胜利，这胜利的确是很渺茫的。但这也并不是说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单靠军事的力量。我上次便说过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政治机构的改革，和有计划的动员民众，是抗战的老鹰的翅膀。没有翅膀老鹰便飞不起来，这是谁也知道的事实。然而现在一般人却要老鹰不用翅膀飞。最后胜利主义者和公式主义者便是这类人的代表。

我们现在都喜欢谈西班牙，玛德里的保卫战更被人常常当作奇迹似地讲起。但是大家却忽略了：在那边战争和革命同时进行着。西班牙的叛军不能成功，只是因为在政府军方面民众动员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革命”逐渐在生长。西班牙政府是用了志愿兵来和叛军作战的；保卫着玛德里的也是从前并未受过军事训练的西班牙的民众。但玛德里的保卫战已经支持了将近两年了。

我们的壮丁被留在沦陷区给人活埋，我们的民众被逼迫给人服役（筑路、筑工事、运输东西），这正是我们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过失。不能因此就抹煞了那巨大的民众的力量。要将这力量组织起来，在必需的场合使用它，我们过去的政治的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着大的改革，事实上已经有部分的改革实现了。

从这里我们便明白：笼统地说一句“抗战第一”，其实等于不说，因为意义太含糊了。我们应该叫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从前的革命家说过，“要民众饿起肚皮革命是不行的”。同样我也以为要人保卫一件东西，必须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值得保卫的。倘使叫一些人流血，而

让另一些人得利，像目前这样一些人为抗战牺牲生命，在抗战中受苦，而别一些人却借抗战发了财（在抗战中获利的人是不少的），倘令这种状态永久存在下去，则最后胜利属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这一点甚至在前线浴血苦战的军人也感到了的。而且他们已经吃了这个的亏。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感到动员民众的必要。而在后方作文的人倒糊涂起来了，因为他们离战争太远，他们看战争和看西班牙战争影片没有两样。

"惩治贪污"的口号也不是从公式主义者发出来的，但它却非常适应目前的需要，而且已经开始被实行了。"贪污"和"腐败"常常阻止民众参加抗战。所谓"不准抗战"，并不是一句笑话，在内地的确有些当权者不准人民做抗战的工作。其实不仅在内地，便是在上海，南市的两万石米怎样会落到敌人的手里，许多小工厂怎样不能从苏州河北岸搬出来，而必须化成灰烬，这些惨痛的事实差不多每个上海的同胞都会含恨切齿地告诉你们。

产生贪污与腐败的政治机构不改革，剥削民众的设施不终止，减削自己力量的事实一再发生，那么便是军事的胜利也还不能保持，最后胜利更不会到来了。

最后胜利是大众的。倘使这目标不能得着大众一致的拥护，则最后胜利便不会到来。我们要全体人民一致地拥护这个目标，必须向他们保证最后胜利会带来普遍的，大众的幸福。第一，腐败与贪污的事实便须永远根绝。

"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岁，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

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不是匪，要砍头！而且每回每回一有军队过路，就排家排户的派粮食。你们这回也一样。他是得了一大笔钱了的。我们哩，一个烂眼钱也见不着！”

这是小县里一个“老掌柜”对联合大学学生们说的话。“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借用向长清先生的话，原文载《烽火》旬刊）。这忧郁是内地无数安分小百姓的普遍的忧郁。这是抗战前途的绊脚石，它们倒是十分可怕的东西。我们要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将这些绊脚石搬开。否则一味地空谈最后胜利。简直是在睁起眼睛做梦。

这只是一端。各方面都应该改革，我们不能一一举例。至于伍特丽女士在最近一篇演说里所指出的前方救护的不完备，这方面的改革更是十分迫切的了。

这里还未说到民众动员的事。

然而这一切都是公式主义者所没有谈到，或者不想谈到的。

1938年10月。

〔附录〕巴金启事[①]

香港《南华日报》转载我的文章《公式主义者》（去年十月在广州为《见闻》半月刊作，这是杂感之四，后载《宇宙风》），并未得我同意。我的论据决非卖国求荣的汉奸

① 原刊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七日《文汇报·世纪风》。这次编印《全集》时附录于此。

所能利用。我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决不是“和平”。在这时候谈“和平”，无异乎任人宰割。

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

在广州失陷、武汉撤退的今天，失败主义者、妥协论者之类应该又有抬头的机会了。每一次抗战局势发生变化，动摇分子就不断地在外面散布流言。这流言在很短的时期里也许会骗得少数头脑单纯的人的相信，但不久便为铁的事实所粉碎。事实明摆在我们眼前，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显明：我们除了继续抗战而外并无别的生路。

我不想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有人反复地详说过了。对于抗战我们是不应该有一点疑惑的。我们目前要注意的问题乃是如何使抗战“必胜”。这问题是多方面的，我只想谈谈我所知道(或者说我所感到)的一点。我想先谈一点关于动员民众的事。

最近我差不多每天都听见人谈起动员民众的话。民众两个字是常常挂在某一些人的嘴上的。但是我觉得在抗战的一年中最被人忽略了的仍还是民众。

这不是愤激的话。我们如果以一个平民的资格往各处去看一下，我们便知道在这时期受苦最大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民众在口头上在书本上受人尊重，在生活里却受人践踏，而且他们所身受的痛苦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抗

战以来我们的民众的力量并不曾好好地被使用过。譬如我们在各处都看见一个标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然而事实却和这不同。有钱的人既未尽力出钱，有力的人出力也不多。我以为若说“一部分人抗战，一部分人逃难”，倒是近于事实。逃难的自然是民众。但也有很多的例外，便是在某一些区域内民众并不逃难，却帮助正规军或游击队抗敌。

“民众逃难”，这句话自然有点不漂亮，但是对于这事情我觉得我们没有掩饰的必要，而且也没有理由去责难民众。从敌人方面的记述，或第三国新闻记者的报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平民落在敌人手里大半会得着惨酷的命运。敌人自己曾将他们活埋我们的壮丁，斩杀我们的青年，奸淫我们的妇女的残酷行为视作皇军的伟绩而摄影流传。许多人都见过那些“不朽”的照片；至于文字记载中表现的虐杀狂的事迹更令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读后发指。我们立誓为牺牲者报仇是一件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便是使未死的人不要也落进那样的火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他的同胞白白地牺牲在敌人的魔手下面。我们正祈祷着每个同胞能够尽可能的“逃”掉这个“难”的。自然这意思是和胡乱奔跑不同。

“疏散人口”，“疏散妇孺”的话语常常见诸各地方当局的布告。告示中再三叮嘱，叫人民不要“自误”。但是因为交通工具的缺乏，一纸布告又非缩地奇方，有秩序的疏散无法实现，民众便在混乱的局面下开始逃难。逃得快的，虽然历尽辛苦，还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逃得慢的那结果便不堪设想了。

要人民疏散却不给他们一条路，不说交通工具大部分被

垄断，连为徒步撤退者竖立的指路牌也不见一块，在这次广州的事变中民众被忽视的程度可说是达到最高点了。报纸上不断地刊载着广州市内发生的惨剧，敌人的枪刺不知又多染了若干我们同胞的赤血。但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牺牲。那许多无辜者的生命是糊里糊涂地被断送了的。

这次我在广州看见了一些事情，我是十月二十日晚上离开广州的。据说第二天下午敌人的先锋队便进城了。海珠桥的炸毁则是二十一日上午的事。我离开广州的时候，那个都市里至少还有一二十万的居民，其中的大部分是想走而走不了(搭不到车和船)的。在二十日的晚上谁也想不到第二天上午在那里就会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变。当天的报纸上明明载着战事顺利的消息，人看不见一点暗示暴风雨就要到来的朕兆。但是黑夜一过，一切都改变了。下面是一个身经目击者的报告：

> 二十一日早晨我们还到公园散步。回来忽闻炮声隆隆，初尚以为是国军试炮，但再细听，则密集的步枪声大作，自远而近，好似万马奔腾。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往街上一看。啊，人山人海狂潮般的奔跑。兵士和警察也杂在里面。同时浓烟笼罩了整个广州市。
>
> 当时我们太惊慌了，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拿，单身便跑。长蛇般的行人都是逃难者，扶老携幼，母亲唤儿子，哥哥唤弟弟，一齐向海珠桥进发。我们到了河南，河北的黑烟滚过来，扑进鼻里，干燥难耐。

何去何从，只有天晓得，逃难者中间很少有人知道去路的。当局连市民最后逃难的路线也不好好地插上指路牌，逃难者都很愤慨。我们过桥后不到半点钟，许多人都说海珠桥炸断了。同时我们也听到的大声音，又看见浓烟一股一股地升起来。敌机不停地在河北投弹。几辆救火车驶过，满载着行李和消防队员，到这马路的尽头，把东西卸下便弃车跑了。河北的大火却没有人管，许多逃狱的囚犯脚上带着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跑着。

渡河时大家腿靠腿的拥挤不堪，我们等了一点多钟，还不能够爬上船，可是跌入河里去的人，我在这短时间里看见的就不下十四个。有一个妇人背负着她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个落汤鸡，只顾在那里啼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船驶到河中，纸厂又被炸了，这回是亲眼看见，隆隆的巨响把江水也震动了。……

这里面没有一句假话，写这信的是一个诚实而勇敢的人，甚至在敌机大轰炸广州市的时候，他也不曾停止过他的工作。他的朴质的笔写不出夸张的语句。这应该是可信赖的文件，不像我们这次在西江沿途听来的传言。读完这信函，我觉得广州的失陷是一个奇迹，或者更可以说是一个解不透的谜。但有一件事情则是大家知道了的：人民的损失重大。单拿各书店的损失来说，那数目也就可观了。然而我更关心的却是十月十×日参加火炬游行的八万壮丁，还有那许多来不及退出的

年轻妇女。我希望有人告诉我：他们现在落在什么样的命运里面。

在广州有秩序的撤退并不是不可能的(倘使这城市必须放弃的话)；现在却只看见混乱的逃难。这是人的过失。对于这事情谁应该负责，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因了这过失许多无辜者的生命便徒然牺牲，不曾索回一点代价；在我们的损失单上又添加了这一笔巨大的不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本可以避免这样的不必要的牺牲，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了。在我们的眼前尚留着好些惨痛的先例。想不到如今还有人偏偏要蹈那覆辙。倘使能够挽救这些巨大的损失，把它们用在抗战上面，则我们的抗战的力量会大大增强。这一点我相信，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但是我们终于让许多力量白白地耗费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在减轻、削弱我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甚至只在表面上用功夫。譬如说“动员民众”，往往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很少有人真正想或者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某一些地方，负责的人抱着关门主义，这就是说自己不能够动员民众，却又不让别的有办法的人去做动员的工作。

有一些近视的人会责备民众逃难，其实他不曾明白要是“民众动员”真的成为事实，则民众不会狼狈地逃难的。到十月二十一日还留在广州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便是想在那里做救亡工作，甚至准备在那里参加巷战保卫家乡的，但结果除了仓皇奔跑外别无其他的路。走得稍迟一点，说不定会做了敌人满足虐杀狂的对象。他们的初衷，决不是如此。所以民众的

逃难是无可非难的。应该受责备的倒是那般负责动员民众而不能尽责的人。

逃难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单看广州市经过许多次的轰炸后还有那数十万的居民这事实，便知道我们的民众是不喜欢逃难的了。但是惨苦的命运逼迫着他们逃难。慷慨激昂地和敌人搏战而死，这并不是可悲惜的事，然而徒手就缚地被敌人残杀，那便是不幸的灾祸了。勇敢的人愿意做雄狮，却不肯作羔羊。一个人逃避这样的结局，他的行为是正当的。我们若不能帮忙组织民众，使他们武装起来，而徒然责备他们不该逃难，这是不公道的。

我并不鼓励人逃难。事实上逃难者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民，而且他们已经受到严重的处罚了。后方的社会对于逃难者可以说是一个陷阱。他们在那里得不到所期待的同情。相反的，好像一旦落入陷阱就成为受人剥削的掌中物。有人把逃难者视作猪羊，抓住就想择肥而噬。"八·一三"以来我在各处都看见同样一件事：一部分人逃难，另一部分人发财。所谓发国难财，大半是从逃难者身上剥削来的。我碰见好些逃难者，他们从江浙富庶之区逃到西南，不知走了若干的路程，到现在喘息未定，却已到了身无长物的地步了。他们的劫余的财物全部入了舟车公司、房东、旅馆老板等等的囊中。在敌人的抢掠之外还加上同胞的层层剥削，对于逃难者这样的处罚已经是够严厉的了。这处罚也许有它的存在的理由，但由房东、旅馆主、舟车公司等等做执法官却不能使人心服。

最使我感到惊奇的便是一个城市失陷以后另一些城市里

的物价便突然增高，尤其是旅馆不近情地提高房价降低待遇，对于过往的旅客除了要钱而外再不知道别的事情。我看见好些诚实的小商人受着坏的待遇，而掏出他们的最后一点钱。没有见谁对这事情加以取缔，仿佛这是天经地义。安居后方的人冷眼望着沦陷区域中逃出来的同胞，真若秦人视越人的肥瘠，一点也不关心。但能够得到这种待遇的人已经算是相当幸运的了。露宿在街头被雨淋日晒，终日不得一饱的人也并不是没有的。还有一些便牺牲在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纵说我们现在没有余裕谈到同情，但是我们能够说抗战不是全民的工作？或者放弃一个城市同时便须连这城市的民众也放弃？倘使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过去的错误便应该加以纠正了。

眼前的事情也许会叫人看不清楚，但历史的教训我们是不该忘记的。民众始终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巨大的力量。离了民众便不能完成任何伟业。抗战也不能是例外。现今民众拥护抗战，抗战也需要民众的力量。我们正应该切实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好好地运用这个力量。千万不可以和民众隔离，让他们自己去找寻生路。

许多人羡慕玛德里的防卫，却少有人明白玛德里之所以守得住，那是靠着民众的力量。在那地方民众是真正地动员起来了的。在西班牙是行动第一，事实第一，标语口号次之，所以他们成就了保卫玛德里的伟业，使敌人的精锐部队和最新式利器成为无用。

我们正应该学这个榜样。

话说得太多了，有点不中听。那么就在这里带住罢。以后若有机会，我还要饶舌的。

1938年11月。

和平主义者*

我已经谈过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现在应该谈和平主义者了。

其实这时候在“和平”下面加上“主义者”三字是有点滑稽的。汪精卫和他的公司之所谓和平是没有主义，而且也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和他们从前写的抗战文章，发表的抗战演说一样。不管汪精卫的艳电和以后的谈话也好，或是林柏生、陶希圣之流的文章也好，都是没有内容的，说来说去，无非替敌人担负一半责任，轻轻一笔就把戎首的罪名挑到自己民族的肩上。这对于主子当然算是尽了力，可以报销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话就等于没有说。他的和平是什么，我们始终不明白。而且，在他们的东西里面根本就没有“和平”。有的只是投降。

有人说汪精卫系的文章是写给日本人看的，这话也很有道理。我想他们的文章日本人看了，一定比看日本人自己写的东西还痛快。日本人想说的话，他们都说了，日本人想说而觉得有点碍口的话，他们也毫不为难地说了出来。陶希圣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七十八期。

“说老实话”自负，可惜他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说，“老实话从今已矣。”其实他自己就未说过老实话。而且以后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在中国失败主义者是不少的，失败主义者看轻自己民族的力量，经不起任何失败的打击，他们胆颤心惊地整天做着和平的梦。等着和议成功，他们便可以像从前那样地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他们究竟还是中国人，他们只是希望讲和，他们却不敢做和议的运动，而且更不会替敌人分担戎首的罪名。

这种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是有妨碍的，不过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我在《失败主义者》中所说：“不等它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就会将它们打碎。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违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倘使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一定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然而现在，汪精卫、林柏生之流出现了，他们便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的。陶希圣以“卖国求荣”为老实话，李圣五拿勇于作汉奸的勇敢自豪，林柏生倡抗战亡国论为敌人张目；秦桧成为民族英雄，项羽被视作自取败亡的殷鉴。文化人陶希圣、李圣五等等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并非时代无情，倒是自甘堕落。还有那些躲在角落里吱吱喳喳的魑魅魍魉有一天也会被照妖镜照出原形的。那时他们将无所逃遁了。

抗战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和平”或中途妥协才是自取败亡。慕尼黑协定并不能保障捷克的独立，反而促成它的解体。这便是不战而亡的最好的例子。空谈和平的人结果永远得不到和平，倘不先使自己变成了奴隶。

我们发动抗战，原是有目标，有主义的。我们已经在最困苦的环境中支持了二十一个月，今天正是我们越战越勇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的和政治的主力都未被敌人击破，我们还有着那么广大的后方，那么忠诚的人民，而且我们的长期抗战已经开始把侵略者拖进了泥淖，他们在疲于奔命的当中多少现露了败亡的征象。这时候希望的确在我们的前面远远地发光了。我们更应该拿出信心和勇气向着抗战的目标前进。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汪精卫之流却在这样的时期出来谈和平，甚至运动和平，而且躲在中国人民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作鬼鬼祟祟的活动，这行为就表示出来他们是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受着全国人民的唾弃的。他们眼前也许只有敌人给他们预备的利禄，却忘记了他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我抨击过我在抗战的城市中见到的黑暗面，我抨击过内地官僚的贪污，认为这是抗战的绊脚石，我更指摘过那班在这面前闭着眼睛的人，我叫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①。

① 有人误把抗战文章和所谓“抗战八股”混为一谈，耽心反对“抗战八股”便会被论客利用去“消灭抗战”。其实这是过虑。我们的神圣的抗战决非任何“论客”的文章和阴谋所能消灭。“论客”可以变节投降，但是抗战仍会继续进行。因为现在作为抗战之主要支持的是民众，而非“论客”。民众对抗战的认识已经比较

但是我的论据决不是那些看轻自己民族，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利禄的人所能利用。铲除卖国求荣的汉奸便是第一件重大的改革。这改革已经是部分地实现了。汪精卫之流的被全国唾弃，对于抗战的前途倒是很有利的。

汪精卫、林柏生、陶希圣之流大概不久便会被人忘记罢。这倒是他们的幸运。否则像秦桧那样被铸成铁像，跪在西湖岳王庙里承受万人的吐沫，那真是遗臭万年了。

1939年4月。

一般知识分子清楚许多。我见过各地老百姓在敌机威胁下和敌人包围中怎样忠诚地为抗战工作，又怎样毫无怨言地贡献了巨大的牺牲，我也知道他们对抗战中的改革的渴望。因为这样的改革虽然不会给"论客"们带来好处，却会减少民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论客们不说民众需要改革，这是他们自己讳言改革。他们不了解民众，却多言"教育"民众，其实他们自己倒应被民众"教育"。民众为抗战尽过大力，而且以后还要更忠诚地尽力的。在今日的中国，有两种人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民族：一是民众，一是军人。至于咬文嚼字的"论客"，则只有让他们自己去写表功的文章，横竖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

八股文是只有架子没有内容的东西，所谓"抗战八股"即是指那些专在几个名词上面绕圈子，丝毫没有触到抗战的各问题的文章。这种空洞文章是绝对不能与有内容的抗战文章混为一谈的。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南国的气候相当炎热。在你们那里樱花谢了还没有多久，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气罢。我还记得三年前的情景。千岁村①的和平朴素的田园，你②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简陋的房屋，倾斜的篱笆和曲折的小路，我一个陌生人万想不到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来迟了，没有机会听到你那燃烧着理想之火的演说，或者父亲的慈祥教诲一般的谈话。……我站在千岁村农家茅屋门前的时候，法西斯的魔影已经像黑云一般地把天空玷污了。甚至在这田园中我们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你带着愤慨地告诉我你所遭受到的一切迫害。以前欢迎过你的文章的各杂志现在也不敢再发表你的片纸只字了。连你所翻译的一部叙述人类起源和社会演进的名著③，也不能够续出第二册。你从前曾在好几万工人的面前作过热烈的讲演。但是如今连那个以团结的力量震惊了全日本的、代表数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七月一日、八月二十一日《烽火》第十六、十七、十八期。

① 千岁村：在日本东京郊外，社会学者石川三四郎当时住在这里。

② 你：指石川三四郎。

③ 名著：指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1830—1905）的《地人论》。

十万工人的工会也被打击到只能够秘密存在了。在去千岁村的途中百合子姑娘告诉我许多事情。她有一句愤慨的话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我现在只能够跳舞了，”她说，因为我在报上见过一段记事，说她发明了一种跳舞，我惊奇地问她，她苦笑地这样回答我。七八年前有人向我说起她向群众演说的事。然而这时她却只能够把理想和愤慨寄托在跳舞上面了。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以后还有更厉害的打击。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对统治者表示了软弱，放过了机会，用忍耐来对付压制，用沉默来忍受不义，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最好的时候使用它，结果他们自然地遭遇了毁灭的惨祸，甚至不能够给敌人一个坚强的抵抗。法西斯蒂就是这样地成功的。一九二四年玛蒂阿地① 被刺杀的时候，法西斯蒂在意大利遭逢了一个绝大的危机，莫索里尼也在舆论的斥责下战抖起来，意大利人民本来可以在几天内就去掉这个黑衫的暴君和他的党徒。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让法西斯蒂的领袖渐渐地从隐匿的地方跑出来，继续从事他们的阴谋的工作，让余火慢慢地在灰烬里重燃，终于造成了“燎原之势”，使肥沃的土壤变成焦土，不给意大利留下一片青草。大部分人民在窒闷的空气里憔悴呻吟，他们中间的菁英在屠杀和酷刑下摧残殆尽，残留的也只能够亡命到别的国家。

历史的悲剧不断地重演。意大利的例子又被别的国家先后摹仿。德国之后又临到日本了。这个打击落到日本人民的

① 雅·玛蒂阿地(1885—1924)：意大利统一社会党的书记，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被法西斯蒂暗杀。

头上。压制之上又加了压制。法西斯蒂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剥削和侵略是法西斯蒂统治的两个武器。它帮助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以后，又来帮助他们攫取殖民地开辟国外市场了。东京和大坂的牢狱中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日本劳动运动的优秀分子的生命。回想八九年前五一节东京市街大游行的盛况，真令人起隔世之感。

先生，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日本法西斯蒂增长了势力，还是工人阶级自己坐失了良机？我想你的回答应该是后一个。“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我读过你的一些短文。你的意见正和我们的相差不远。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让狭义的爱国主义迷了你的眼睛。正如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应当做的，你始终站在反强权反侵略的一边，你叫出了“不要打中国的兄弟”的呼声，这呼声得到了大坂等地劳动者的响应。但是呼声太微弱了。响应的人也只是一部分，并不能成为一种力量阻止侵略的战争。这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第一次放弃责任，和这类似的事情已经有过好几次了。让敌人把武器从他们的手中夺去，等到一觉醒来，他们已经成为徒手，纵然大敌当前也只好束手待毙了。日本的劳动阶级就是这样地蹈了意德两国弟兄的覆辙。

三年前和你在千岁村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就感到这一个不幸的预兆，那时我因为要赶到横滨搭船回国，没有和你多谈这种事情。你曾殷勤地挽留我，要我在那个可爱的田园里待一些时候，你还坚持地要出去为我退船票。这个好意我是应该接受的。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是那样无理地固执，一定

不肯听从你的话，还把你从千岁村拉到百合子姑娘的家。在那辆宽敞的汽车里我们谈论了好些事情，却始终没有谈到这上面。后来在百合子姑娘家里受了款待以后，我跨出“玄关”，雇了汽车。当车子转弯的时候，百合子姑娘和另外一位更年轻的女士还立在门口带笑地对我行礼。这温暖的友情使我在车里感动地不住挥手。车子走入了另一条街，我忽然感到一种隐微的心痛。我离开了我所敬爱的友人，我的离愁是很大的。在这时候，在汽车快到中华留日青年会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先前的坚持是何等错误的了。我是应该留下来和你在一起过一些日子，告诉你我所感到那个不好的预兆，要你们注意到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什么也不曾说出来就回到了上海。在虹口公寓的寂寞的长条的小房间里，当回忆来折磨我的时候，热情来揉我的心，悔恨盘据了我的思想，那个囚笼似的房间似乎容不下我，我的心要破壁飞去。但是环境阻碍了我。我不能够说我所想说的话。每晚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休息地在那狭小的地板上闲踱。走得疲倦了时，我又坐下来，借着高悬的电灯的微光咬着牙关一字一字地翻译柏克曼的《狱中记》，用他的十四年的痛苦，来折磨我的并不强健的心灵。我这样地惩罚我自己，磨炼着我自己。于是我不能忍耐了。我给你和称你为父的百合子姑娘写了信。终于把我的忧虑和愤慨叙述出来了。

百合子姑娘的回信来了。在那封委婉而流畅的法文信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另一个国度中争自由的人的苦闷。她告诉我你在生病，她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便衣侦探随时监视着

你们，连一点点微小的努力也会遭受统治者的阻挠。呼声被窒息了，花园似的岛国变成了狭的囚笼。在那里连一棵刚出土的自由的嫩芽也会被暴风雨摧残。许多活跃的友人不是在黑暗的牢狱里忍受酷刑，便是在狭小的监房里浪费生命。

百合子姑娘的信函里充满了忧郁的调子。但是理想并不能够被现实征服。希望的火花永远在黑暗的天空闪耀。甚至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也有人站出来勇敢地叫着："我反抗！"公开的活动改变为地下的工作，组织变得更坚实了。一些人沉默地努力为将来准备一切。她的信函曾这样地暗示过。邮件检查制度使她不能够详细叙说。但是后来一个法国友人告诉了我们这一切。……

然而这一切如今也被一阵的反动的飓风席卷而去了。两次的大检举，大拘捕，差不多摧毁了整个的运动，大部分组织这地下活动的分子都进了监牢。我只在报纸上见到一些陌生的名字。

先生，这自然不是使人愉快的消息。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的心是很沉重的。我的心境不会和你得到宫岛出家、生田投海①的消息时的心境两样。但是甚至这样的打击也不能毁灭我们的信念。多一次的失败更可以增强我们的工作的决心，犹如多一番磨洗更可以发见一件金属品的光辉灿烂。妃格念尔在民意社执行委员会解散，大部分同志在绞刑台上和单人囚室中殉道以后，还想将破碎的金线结在一起，用来在废

① 指日本小说家宫岛资夫（1886—1951）出家和诗人生田春月投海自杀的事。

墟上建造新的九层宝塔。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把她当作可怕的妇人，一些青年男女把她视作指路的明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制止我的疑惑。我翻译了你追忆春月的文章，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同流合污，变节屈辱，固然是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恨的。然而“出家”和“自杀”也并不是可奖励的行为，这是逃避的方法。在庸俗和邪恶之前，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沉默。去掉庸俗和邪恶倒是他们的任务。不愿与庸俗邪恶同生此世而选取了自己毁灭之路，这毅力虽然可佩，但是这决心却值得非难了。被迫而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个战士的行为。真正的战士倘使不能凯旋而归，就应该战死在阵地上。宫岛、生田两先辈的崇高的人格固非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望其项背。我也没有机会读到《从妻房到僧房》(宫岛著书)那样的自白。《魂之家》(春月的诗)只是一个诗人的憧憬。对于他们二人的最后的决心，我实在不能够彻底了解。作为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应该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为止。然而《金》的小说家和《魂之家》的诗人，却放弃了责任而中途倒下了。这是很可痛惜的事。但是你在那两篇追忆文章里却不能将这一点指出来。初读到它们时我有一种感觉：你老了。但是真实的你却并不是这样。我相信你是不会老的。

敬爱的先生，我现在将这些旧事在这里重提，并非故意指摘你的错误，我也不想拿过去的失败刺激你的感情，我不过提醒你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记得十年前读过你一篇关于历史的论文。你说到历史的流转。历史决不是循环的，重复的。

历史是前进的。过去的悲剧固然常常重演，但推动历史的力量却永远是趋向光明的力量。人类社会的演进并没有一刻的停止，纵然它有时走着曲线的道路，使人看不见前进的辙迹。历史的法则是应该遵守的。违背这法则的人只有自趋灭亡，却不能够改变历史的道路。法西斯蒂的魔手用它那野蛮的力量固然可以摧残一部分文明的成就，但是它并不能挽救一个垂死的社会于黑暗的深渊。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的懦弱，虽然常常招来惨祸，甚至延长了残暴的统治，可是这惨祸也不能将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和争自由的力量完全粉碎。人民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而且在任何时代都要为争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我们的全历史就是一部人民争自由的历史。每一次的失败不过多添一页血的记录，并不曾结束这个长期的斗争。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

先生，写过一千余页的西洋社会运动史的你，仔细地研究过法俄两大革命的你，应该知道有组织的民众运动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而且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日本帝国会在有组织的民众运动下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你们那里有一个军阀豢养的论客室伏高信常常说到“历史的宿命”，那么这就是“历史的宿命”罢。连室伏高信有一天也会倒在他自己挖的坟墓里，让后代的子孙用鄙夷和憎恶的口吻提起他的名字。他所梦想的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是永不会再来的了。

这一点你当然很知道。将《古事记》的神话推翻，将天皇即神的传说打破，这也是一个掘根的工作。你在三四年前就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企图。也许是环境阻止你，使你不能把

它完成。但是作为先知者的你们应当起来加紧地从事唤起人民的工作了。你们点燃了烽火，无数的群众就会发出洪钟似的呐喊跟着你们前进。此时正是最好的时机，倘使你们再把它错过，使横暴的统治又得苟延残喘地延长若干年，直到人民愤怒的大爆发，像一把火烧遍了岛国，烧毁了法西斯蒂的宫殿，但是你们却忽略你们的责任了。

"皇军"的飞机在我的头上盘旋。发动机的声音像蚊子叫声似地响着。但这是死的声音，毁灭的声音。我落笔的时候，机关枪就在上面扫射，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在我的周围是死。我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不能够静下剧烈的心跳安静地给你写信。然而我一定要把这封信写完，因为说不定过两分钟我住的房间便会成为粉碎，那时，连我这执笔的手也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人接近死的边沿，不会说一句假话。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的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这一个星期来，我们的救护队含着眼泪埋葬了成千的死者。无辜者的血染红了广州的街市。但是在这里依旧充满着愤怒的呼喊和坚定的信念，却听不见一声乞怜的哀号。犹如在东西南北线各战场上默默地贡献了最后一滴血的千百万兵士，他们的脸上也不带一点畏怯的表情。所有的人都为着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个目标会拯救中国，也会拯救日本。

中国一定会得到解放的。这解放同时带来日本的新生。

侵略者的统治阶级自掘其坟墓，这才是“历史的宿命”。我们如果把樱花岛国比作一间黑暗的囚室，则我们的抗战的炮声就是叩门的信号。在这受苦的土地上流过的血将成为一股洪流，而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冲破日本的牢固的铁门。所以我们同时唤着：“弟兄，醒起来罢。”

“弟兄，努力罢，”你们的劳动阶级同胞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们以我们的热血来作为友情的酬答。东亚两大民族的解放，应该是我们和你们的共同的目标。这自由的花树已经受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赤血的灌溉，我们的血还在不断地流，现在应该由你们来贡献你们应当交出的一部分了。先生，我等着听你们的雄伟的呼声；我等着看你们的壮烈的行动。当你们无产阶级弟兄向着法西斯统治者举起结实有力的拳头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到了。日本帝国的崩溃不过是指顾间的事。残杀者将以自己的血来报偿他所犯的罪恶，留一个污秽的名字在历史上，而让位给为创造新时代而努力的人民。这个“历史的宿命”，并不是一百万军队，或十万吨炸弹，和一万尊大炮所能改变的。凭借武力为子孙树立万世不朽的基业，这只是少数痴愚者的迷梦。连喑呜叱咤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也只得作圣海仑岛上的囚人，而悒郁地度其残生。路易十六却为了祖先的罪孽身死在断头台上。至于尼古拉二世的受刑，威廉二世的流亡，都是可以昭示来者的前车之鉴。但是野心家如军阀政客之流，却非白刃加颈不能明白真理。他们害怕的只是有组织的民众运动。这是可以致他们的死命的。现在当我们立在门前用抗战的炮声来叩门的时候，你们应该起

来发动这样的运动了。

先生，这时候我并没有畏惧。我的信念使我的心镇定。我居然写完了这样的一封长信。我愿意它能够飞越过海的彼岸，把我的这心情传达给你。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自由地住在和平的千岁村，或者你已经在狭小的地牢里牺牲了性命。但是我相信在你们那边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这封信，或者百合子姑娘，或者别的友人，那么让我等候着你们的回答，你们会用行动来回答我，我这样地相信着。

1938年6月5日在广州。

黑　　土

《黑土》，一九三九年十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二年三月，共印行三版（次）。

前　　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文章都是在《回忆》这个总题目下写成的。"九·一八"那年我就开始写我的"回忆"，后来编印过一本叫做《忆》的散文集，那是我的断片的生活记录，也可以算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的平凡的自传罢。

《忆》出版后到现在也有几年了。我本来不想再写回忆过去的文章，我更不想多叙说自己的事。但是今年春天，我答应给一位孤岛报纸副刊的编辑帮忙时，又开始写下了我的"回忆"。我选择这样的题目，只是为着避免给别人招来麻烦。不过这次我写的也和从前所写的不同。我写别人，更多过写我自己。我不但写了我的那个充满着"耶稣"精神的朋友，写了献金的乞丐和被炸垂死的平民，我还写了卢骚、马拉、罗伯斯庇尔，等等。这些人在我一生中多少有过一点影响。……

巴　金 1939年8月。

黑 土*

乔治·布朗德斯[1]在他的《俄罗斯印象记》[2]的末尾写过这样的话：

> 黑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给人们心中充满了悒郁和希望的广阔无垠的原野……

我只记得这两句，因为它们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也知道一些关于黑土的事。

我在短篇小说《将军》里借着中国茶房的嘴说了一个黑土的故事：一个流落在上海的俄国人，常常带着一个小袋子到咖啡店去，"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从袋子里倒出了一些东西……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眼泪。"他有一次还对那个中国茶房说："这是俄罗斯母亲的黑土。"

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在巴黎听见一个朋友对我讲过。他在那里一家白俄的咖啡店里看见这个可感动的情景。我以后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八十期。

① 乔治·布朗德斯(G. Brandes, 1842—1927)：丹麦文艺批评家。

② 指英译本，一八八九年伦敦版。

也在一部法国影片里见到和这类似的场面。对着黑土垂泪，这不仅是普通怀乡病的表现，这里面应该含着深的悒郁和希望。

我每次想起黑土的故事，我就仿佛看见：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在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

这幻景我后来也写在小说《将军》里面了。我不是农人，但是我也有对土地的深爱；我没有见过俄罗斯黑土，不过我也能了解对黑土垂泪的心情。沉默的，肥沃的，广阔无垠的，孕育着一切的黑的土地确实能够牵系着朴实的人的心。我可以想象那两只粗大的手一触到堆在沾染着大都市油气的桌面上的黑土，手指一定会触电似地颤动起来，那小堆的黑土应该还带着草原的芬芳罢，它们是从"俄罗斯母亲"那里来的。

不错，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的国籍如何）都从土地里出来，又要回到土地里去。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女。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但是我想到了红土。对于红土的故事我是永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文章里常常有"耀眼的红土"的句子。的确我们的南方的土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可惜非常短促）就是在那样的土地上度过的。

土的颜色说是红，也许不恰当，或者实际上是赭石，再不然便是深黄。但是它们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红色，而且在我的

眼前发亮。

我好几次和朋友们坐在车子里，看着一座一座的小山往我们的后面退去。车子在新的、柔软的红土上面滚动。在那一片明亮的红色上点缀着五月的新绿。不，我应该说一丛一丛的展示着生命的美丽的相思树散布在我们的四周。它们飘过我的眼前，又往我身后飞驰去了。茂盛的树叶给了我不少的希望，它们为我证实了朋友们的话；红色的土壤驱散了我从上海带来的悒郁。我的心跟着车子的滚动变得愈年轻了。朋友们还带着乐观不住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渐渐地被引入另一个境界里去了，我仿佛就生活在他们的故事中间。

是的，有一个时候，我的确在那些好心的友人中间过了一些日子，我自己也仿佛成了故事中的人物。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的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去搥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煤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

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正人君子，我们都不是注重形式的人。这里有紧张的时刻，也有欢笑的时刻。我甚至可以说紧张和欢笑是常常混合在一起的。公园里生长着许多株龙眼树，学校里也有。我们走过石板巷的时候，还看得见茂盛的龙眼枝从古老院子的垣墙里垂到外面来。我见过龙眼花开的时候，我也见过龙眼果熟的时节。在八月里我们常常爬到树上

摘下不少带果的枝子，放在公园凉亭的栏杆上，大家欢笑地剥着龙眼果吃；或者走在石板巷里我们伸手就可以攀折一些龙眼枝，一路上吃着尚未熟透的果实。我们踏着长春树的绿影子，踏着雨后的柔软的红土，嗅着牛粪气味和草香，走过一些小村镇，拜望在另一个地方工作的友人。在受着他的诚挚的款待中，我们愉快地谈着彼此的情况。

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朋友在大太阳下的红土上走了十多里路，去访问一个友人的学校。我们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但是我们不曾感到丝毫的疲倦。我们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新奇的景象使我们的眼睛忙碌，两三小时的谈话增加了我的兴奋。几十个天真孩子的善良的面孔使我更加相信未来。在这里我看见那个跟我分别了两年的友人。她已经改变得多了。她以工作的热心获得了友人的信赖。她经过那些风波，受过那些打击，甚至寂寞地在医院里躺了将近一年以后，她怀着一颗被幻灭的爱情伤害了的心，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在一群她原先并不认识的友人中间生活了一些时候，如今却以另一种新姿态出现了。这似乎是奇迹。但是这里的朋友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平常。是的，许多事情在这个地方都成为平常的了。复杂的关系变成简单。人和人全以赤诚的心相见。人了解他（或她）的朋友，好像看见了那个人的心。这里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姊妹。在欧洲小说中常常见到的友情在南国的红土上开放了美丽的花朵。

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

“坦白”。

在那些时候，我简直忘掉了寂寞，忘掉了一切的阴影。个人融合在群体中间，我的“自己”也在那些大量的友人中间消失了。友爱包围着我，也包围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互相的，而且是自发的。因为我是从远方来的客人，他们对我特别爱护。

我本来应该留在他们中间工作，但是另一些事情把我拉开了。我可以说是有着两个“自己”。另一个自己却鼓舞我在文字上消磨生命。我服从了他，我写下一本、一本的小说。但是我也有悔恨的时候，悔恨使我又写出一些回忆和一些责备自己的文章。

悔恨又把我的心牵引到南方去。我的脚有时也跟着心走。我的脚两次、三次重踏上南国的红土。我老实说，当那鲜艳的红土在无所不照的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的时候，我真要像《东方寓言集》里的赫三那样跪下去吻那可爱的土块。① 我仿佛是一个游子又回到慈母的怀中来了。

现在我偷闲躲在书斋里写这一段回忆。我没有看见那红土又有几年了。我的心至今还依恋着那个地方和那些友人。每当这样的怀念折磨我的时候，我的眼前就隐约地现出了那个地方的情景。红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原野，在这孕育着一切的土地上活动着无数真挚的、勇敢的年轻人的影子。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我

---

① 见《东方寓言集》里的《赫三怎样落了裤子》。《东方寓言集》一名《猪的故事》，俄国陀罗雪维支著，胡愈之译，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的心由于感动和希望而微微地颤抖了。我也想照布朗德斯那样地赞叹道：

> 红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给人们心中充满了快乐和希望的广阔无垠的原野……

我用了“快乐”代替布朗德斯的“悒郁”，因为时代不同了，因为我们南方的青年是不知道“悒郁”的。

但是在那灿烂的红土上开始出现了敌人铁骑的影子了。那许多年轻人会牺牲一切，保卫他们的可爱的土地。我想象着那如火如荼的斗争。

有一天我也会响应他们的呼唤，再到那里去。

1939年春在上海。

南国的梦

一个星期来许多报纸上关于鼓浪屿的记载使我想起一些事情。我好久不曾听见那个地名了，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它。这半年来我忘记了许多事情，我也做过不少的噩梦。在梦里我不断地挣扎，我和一切束缚我的身体的东西战斗。梦魇常常压得我不能够动弹。我觉得窒闷。最近一连三四个月，我就做着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梦。……

鼓浪屿这个地名突然冲破梦的网出现了。它搅动了窒闷的空气。……我现在记起那个日光岩下的岛屿，我记起一些那里的景象和住在那里的朋友。我记起我从前常常说到的"南国的梦"。

我第一次去鼓浪屿，是在一九三〇年的秋天。当时和我同去的那位朋友今天正在西北的干燥的空气里，听着风沙的声音，他大概不会回忆南国的梦景罢。但是去年年底在桂林城外一个古老的房间里，对着一盏阴暗的煤油灯，我们还畅谈着八九年前令人兴奋的旅行。我们也谈到厦门酒店三楼的临海的房间。

当时我和那位朋友就住在这个房间里。白天我们到外面去，傍晚约了另外两三个朋友来。我们站在露台上，我靠着栏

杆，和朋友们谈论改造社会的雄图。这个窄小的房间似乎容不下几个年轻的人和几颗年轻的心。我的头总是向着外面。窗下展开一片黑暗的海水。水上闪动着灯光，飘荡着小船。头上是一天灿烂的明星。天没有边际，海也是。在这样伟大的背景里，我们的心因为这热烈的谈论而无法安静下来。有一次我们抑制不住热情的奔放，竟然匆匆地跑下码头，雇了划子到厦门去拜访朋友。

划子在海上飘动，海是这样地大，天幕简直把我们包围在里面了。坐在小小划子里的我们应该觉得自己是如何地渺小罢。可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一直昂起头看天空，星子是那样地多，它们一明一亮，似乎在眨眼，似乎在对我说话。我仿佛认识它们，我仿佛了解它们的语言。我把我的心放在星星的世界中间。我做着将来的梦。

这是南国的梦的开始。我在鼓浪屿住了三天，便在一个早晨坐划子把行李搬到厦门去，搭汽车往前面走了。

美丽的、曲折的马路，精致的、各种颜色的房屋，庭院里开着的各种颜色的花，永远是茂盛和新鲜的榕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鼓浪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新奇。我喜欢这种南方的使人容易变为年轻的空气。

在一个古城里我们住下来。我在改建后的武庙里住了一个月光景。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也了解了一些事情。在那里一间古老的小楼中，我发烧到一百零二度以上，但是我始终没有倒下去。我反而快乐地帮助朋友料理一个学校的事情。在这个学校里我第一次会见那个后来被我们戏称为“耶稣”的友

人。他喜欢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他常常和他们谈话四五个钟点不间断。他诚恳地对他们谈着世界大势和做人的态度。他在这个学校教书，同时还在另一个校址在文庙的中学兼课。他比我迟两三天来到古城，我和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我们分别的时候，我记得他穿着蓝色西装上衣和白色翻领衬衫，服装相当整齐，他可以被称为漂亮的青年。

两年后的春天里，在上海"一·二八"战争结束以后，我搬出我留在闸北的余物，寄放在亲戚的家中，便和一个年轻的友人同路再作南国的旅行。

我又来到鼓浪屿了。两年的分别使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改变。我和年轻朋友在那没有汽车、电车或黄包车的马路上散步，沿着蜿蜒的路走上山去。我们还在有马来人守门的花园里，坐在石凳上，毫无顾忌地谈着种种事情。但是傍晚我们却不得不冒雨回到厦门的住处去。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往那个古城走了。

到了古城，在这天的黄昏我便到那个文庙里的中学去看"耶稣"。是的，在这时候他已经得着"耶稣"的绰号了。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只是几个朋友私自地这样称呼着。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遇见几个朋友，我正和他们谈话，忽然一个人在后面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我迟疑了一下，我记不起这黑瘦的面貌。但是那双奕奕有神的眼睛不能够是别人的。一定是他。我便伸出手去。我看他的微驼的背，我看他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我看他一头蓬乱的头发，我看他陷入的两颊。

"你看我做什么？你不认识我吗？"他坦然笑问道。

我也只好微笑。我不能对他说他瘦得多了，老得多了，他的健康坏了。我不能够。我只说想不到两年的功夫他竟然作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

晚上我睡在他的房间里，他们为我安置了帆布床。煤油灯被吹熄后，一屋子都是蚊虫声。他却睡得很好。我不能睡。我睁开眼睛，望着阴暗的空间，我想到今天听见人谈起的这个朋友的痔疮和虱子的事。两年前他穿着翻领衬衫的姿态在黑暗中出现了。这两年间一个人的大量牺牲和工作成绩折磨着我。我拿我自己的生活跟他的相比。我终于不能忍受这寂寞，我要出去走走。我翻身站起来，无意间一脚踏灭了蚊香，发出了声音，把睡在对面帆布床上的他惊醒了。

"你做什么？还没有睡？"他含糊地问道。

"我闷得很，"我烦躁地回答。

"你太空闲了，"他梦呓似地说了这一句，以后就没有声音了。我再说话也听不见他的回答。

的确比起他来我太空闲了，也许太舒服了罢。但是难道他就比我有着更多的责任？这是苦恼着我的问题。

我在这间房里和他同住了一个多星期，看惯了他怎样排遣日子。我离开他的时候，他依恋地对我说，希望我将来还能够再去。他又说："倘使学校还能够存在的话，你下次给我们带点书来罢。"

在汽车中我和那个陪伴我的朋友谈起"耶稣"，那个朋友耽心着他的健康，说起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钟点才能

够做事的话。我把那个朋友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上，我说我要和另一些朋友想一个妥当的办法。

我的办法并没有用。但是我却不曾忘记朋友的嘱咐，为那个学校的图书馆捐了两箱书去。学校虽然还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可是它已经克服了种种的困难而继续存在了。第二年我又去访问那个学校。这一次是和一个广东朋友同去的。去年在粤汉路银盏坳小站的废墟中，我们在残毁的月台上候车的时候，我还和这个朋友谈起那一次的旅行。我们重复说着一九三三年我们两人在鼓浪屿厦门酒店中（还是那同样的房间）谈过的话。我们谈论着我们的朋友"耶稣"。这是八月的夜晚，工人们忙碌地在被炸毁的车站房屋的旁边建造一间简单的茅屋，他们有的还爬在屋梁上用葵叶铺盖屋顶。我曾经指着这茅舍对朋友说："这就是我们'耶稣'的工作，他会把碎片用金线系在一起，他会在废墟上重建起九重宝塔来。"

他的确能够在废墟上重建宝塔的。我们第三次在学校里看见"耶稣"，他显得更瘦、更弱了。他过着更勤苦的生活。他穿着更破烂的衣服。他花去不少的时间和学生们谈话。他热心地对几班学生讲授数学的功课。这一次我们谈了不少的话，商量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我提到他的病，说起他应该休养的话，他总是打岔地说："我们不会活到多久的，我们应该趁这时候多做一点事情，免得太迟了。"

我看见他用过度的工作摧残自己的身体，我看见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点点工作成绩。我不能够责备他。我倒应该责备自己。我们的确太需要工作了。我自己不能代替他工作，

别的空话便都没有用。这个学校里充满着殉道者的典型，但是他比别人表现得最完全。在他们的面前我显得太渺小了。在他们中间我做了几天的美丽的南国的梦。

一个多月以后我游历了广东乡村回来，路过鼓浪屿，我们的船停在海中，在开船前的六七小时，两个朋友从古城赶到了。他们到船上来看我。我们三个人坐划子到那个美丽的岛屿去。这一次我们攀登了日光岩。在最高的峰顶上眺望美丽的海。我们剥着花生，剥着荔枝，慢慢地吃着，慢慢地把荔枝皮和花生壳抛到下面海滩上去。我们听着风声，听着海水击岸的轻微的声音。我们畅谈着南国的梦。我们整整谈了两个钟头，我们愉快地笑着。我的眼前尽是明亮的阳光和明亮的绿树。在这个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上我们做了两小时的南国的梦。但是吃过中饭我应该回轮船去了。

这两个朋友把我送到船上。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把剩余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耶稣”，要他用来治病。这只是一个关心他的友人的一点敬爱的表示。

船到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厦门。它掉转身的时候，我还留恋地投了一瞥最后的眼光在那形状奇特的岩石上，还有岩石中间的小桥，先前我们明明走过的，现在它显得这么高，这么小。但是船再一转动，鼓浪屿便即刻消失了。我的眼前只有花和树、海水和阳光。

在上海我得到“耶稣”的信，知道他不曾医病，却用那笔款子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读书。第二年在北平朋友告诉我“耶稣”带了二十多个学生到上海，预备作徒步旅行。又过一年

在东京我知道“耶稣”又带着十几个学生第二次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个患痔疮的人简直在戕害他自己了。

我从东京回来，不久他也从北方旅行归来了，这一次他坦白地说出他的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话。这是第一次。话进了我的耳里，倒使我的心发痛了。我以为我们有理由说服他留在上海医病。但是他依旧坚决地跟着这一班学生走了。临行时他还留恋地说他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话。

一九三七年夏天他离开了古城，到广州去。他也许是抱着医病的目的去那里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八·一三”民族解放的战争爆发，点燃了他的沸腾的血。他怀着不能抑制的热情回到那个古城去了。我知道在那里有着更忙碌的工作等待他。我相信他会把他的工作范围扩大。在那里还有不少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朋友给他帮忙。

这一次我不能再拿疾病作理由来劝阻他了。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和能力。我们民族的生存和自由受到侵害的时候，保卫它们便是我们的第一件工作。他就是这样地主张的。现在轮到他来实现他的这个主张了。以他那样的毅力和能力，一定可以做出比过去更大的成绩来。

我去年十月从广州出来以后，走了不少的地方，始终没有直接得到“耶稣”的信息。不过我从别处知道他忙碌地在古城里工作。他准备着有一天用有组织的民众的力量来歼灭侵略者的铁骑。

现在鼓浪屿骚动起来了。铁骑踏进了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那个培养着我的南国的梦的地方在敌人的蹂躏下

发出了呻吟。

然而使我激动的是行动的时刻到了。鼓浪屿的骚动一定会引起更大的事变。铁骑深入闽南的事情是可以想到的。敌人也许不会了解，但是我更明白，倘使敌人果然深入肥沃的闽南的土地的话，那么在那里得到的一定不会是胜利，而是死亡。那时我的南国的梦中最“奇丽”的一景便会出现了。

我怀念着南国的梦中的友人，我为他们祝福。①

1939年春在上海。

① 这篇回忆是在我十分激动的时候写成的。我当时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见到“耶稣”，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想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结果还是一场空，我不仅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用这几句话来解释以上的两篇回忆，也很恰当。（一九五九年注）

在　广　州*

一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上午，第二次日机的轰炸开始，我和几个朋友躲在一座四层洋楼的底层。我站在门口听见敌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听见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听见机关枪声阁阁地在附近的空中响着。于是一个炸弹带着“沙沙”声下来了。那巨雷似的爆炸声把脑子都给我震昏了，我本能地退到后面去。石灰和尘土立刻细雨一般地落下。我们满头满身都是尘土。我以为是楼上被炸了。但是过了片刻，我仍然安全地立在那里。飞机又在我们的头上发出了可怕的惨叫。这是投弹的警告。我们屏住呼吸地等待着。这并不需要我们等候。沙、沙、沙的声音便突然响了。我仿佛看见炸弹在空中旋转而下，绞着空气响。这次的爆炸声比前次的更大，震落了更多的尘土，使得站着的我不由自主地蹲下来。我想这一次炸弹应该落在我们的屋顶上罢。但是仍然没有。还有第三次的爆炸。然而除了震下更多的灰尘外并没有带给我们什么伤害。

* 本篇中的第三节曾以《八月十六日夜在广州》为题，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文汇报·世纪风》。

机声渐渐地去远了，我们便站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走到门外。

“前面的防空壕落了弹，”有人跑着这样说，还有人跟着跑到巷口去。我也去到了那里。

防空壕就在巷口的空地上，那里并没有落弹。被炸的是旁边一条街，两旁的店铺倒塌了，树木折断在地上。砖块、电线、尘土堵塞了路。救护队员忙着在那里工作。

在那块长满青草的空地上，我看见一个人躺在那里，他那穿香云纱短衫的身上满是血迹，肚子炸破了，肠子露在外面。他的身子微微地颤动。脸白得像一张纸，眼睛睁开，痛苦地望着我们的脸，那双眼睛似乎看不清楚什么，眼珠转动得极慢。忽然脸上起了一阵拘挛，眼皮动了一下，眼珠也略略转动，嘴微微张开。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失神的眼光似乎在痛苦地哀求：请帮点忙，终止我的痛苦罢。

但是这周围，我们几十个人都袖手旁观着，不能够帮一点忙。他的嘴唇里淌出血来。我半痛苦、半恐怖地转过了身子。

这个身体不久就被人搬走了。可是他那染着血的白纸一样的脸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

二 八月十三日

在惠新东街我们书店的那间小屋子里，我每天下午坐在对着窗户的桌子前面写信，看校样。在这些时候我常常听见警报声或者飞机声。巷子里很静，有时我半天听不见一声脚

音。阳光停滞地照在这寂寞的路上。我沿着这路走出巷口，再转进大街。在汉民分局门前人们正忙着搭献金台，这是为了“八·一三”献金搭的。同样的献金台有好几座，在这个城里的几个重要街口。在热闹的街上我常常看见手执白旗的宣传队，旗上写着：“八·一三到献金台去。”

八日下午这个城市遭了一次日机的大轰炸，我们书店附近也落了几颗弹。九日早晨西关一带又遭了残酷的屠杀。这天午后在惠新东街的巷子里更少听见人声。我还是坐在我的桌子前面。我放下笔，抬起头。穿过窗户我看见对面人家门前的石阶上坐着一个穿黑色短衫裤的瘦汉子。这个人并不是从今天起才坐在这阶上的，不过我这时候才注意到他。他安静地坐在那里，望望天空，望望周围。他埋下头拔起阶下的青草。他拿起草慢慢地放进嘴里嚼着。我觉得我的喉管堵住了。我用力挣扎，半晌才咳出一声嗽，好像我自己吞食了青草一般。

这个汉子依旧安静地坐在那里，他又拔起第二把青草，照样地放进嘴里，默默地吃着。他没有发出一声呛咳，仿佛他吃惯了这种东西。我望着他，我甚至忘了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说广东话，我无法向他发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乞丐，但是我并未看见他向着谁讨过什么。

第二天下午我坐在这同样的房间里，窗外仍旧坐着这同样的黑衣人。我听见两次警报，又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我看见黑衣人默默地站起来走了。

“八·一三”的傍晚我和一个朋友从书店里出来，走过汉

民分局门前。献金台上悬着汽灯，转着走马灯，一个年轻人拿着扬声筒，嘶声哑气地在台上演讲。台下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挤进人丛中去。我听见一阵拍掌声。我站定了，举起头再向台上望去。一个穿黑色短衫裤的瘦汉子立在台口。这平凡的面貌是我熟习的。他在这里！黄瘦的脸困窘地微笑着。细小的眼睛睁大起来，惶惑地望着台下。年轻人在旁边鼓励他。他的脸色忽然发红了，他张开口，吼叫似地开始说话，他一面挥动着拳头。他说话不多。我不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一个乞丐。这是他讨来的钱。他把这仅有的财产贡献出来，因为他相信只有在大家一颗心、共同对付敌人、把敌人赶走以后，大家才可以保全性命，过安宁日子。他还说到残酷的轰炸，说到那许多惨死的同胞。他希望那些有钱的人也照他这样做。他激昂地说着，口里溅出白沫。但是话一说完，他却又现出了窘相，匆忙地一鞠躬便走下去了。服务的年轻人大声说着恭维这个乞丐的话。众人在台下感动地拍掌。

我的眼光跟随着这个平凡的黑衣人，当他消失在人丛中时，我还在各处找寻他。他的面貌对我显得更亲切了。

三　八月十六日夜

在哥伦布咖啡店的二楼，我和两个年长的朋友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子旁边。窗下对面是献金台，台前聚集了一大群人。没有电灯，广州市这时还在警报中。咖啡店里点着洋烛，献金

台上燃着汽灯。年轻的服务人拿着扩声筒对群众演说。女学生在台上唱救亡歌，台前挂的走马灯带着人影不断地转过去。我看见一个光头的人走上台，服务人把他介绍给群众，人们在台下欢呼起来。那个人说不出话，只吐出几个字，就带着羞涩的样子走下去了。这是一个可敬的献金者。接着又上来一个小孩子，人抱起他，指给群众看，群众拍掌。小孩子说了几句话。群众又拍掌。

我们伸长颈项出神地望着窗外，忽然汽灯灭了，走马灯也灭了。警察在下面大声说话，咖啡店侍者连忙过来吹灭洋烛，那个和善的侍者带笑地对我们说："飞机来了。"

楼上楼下全是一片黑，没有一点声音。天色很阴暗，连星子也没有几颗。我想："它们这时候来做什么呢？在这样的夜里看得清楚目标吗？"但是我仿佛听见了摩托的声音。我看下面，还有那么一大群人。我只看见黑影子在动。大家都不作声。只有在献金台上有人偶尔小声讲一两句话。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无线电喇叭在报告日机这时到了什么地方，有什么动作。许多黑影子聚在那里听消息。

机声消失了。大概是无线电喇叭报告飞机离开了市区，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在献金台上又开始了演讲。不过声音还是相当低。演讲完毕，女学生又唱起了救亡歌曲。

我听到这清脆的歌声，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情。我想大概就是这班女学生罢。一个本地朋友今天对我说过，在"八·一三"那天上午，日机已经飞到汉民分局门前献金台的上空了，那时台上还有一批工作的女学生。本来已经预备好汽车，要

载她们到别处去躲避，可是她们不肯离开献金台，而且表示宁愿在台上工作而被炸死，不愿放弃职责。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感动的故事！现在她们又在日机的威胁下勇敢地唱起歌来了。

楼上楼下仍是一片黑暗。我倾听着歌声。渐渐地我似乎被那勇敢的歌声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境界。我看见光明，看见喜悦，看见微笑的面孔。……忽然四周响起了一阵发狂似的欢呼，人们在拍掌，不停地拍掌。女学生唱的歌曲立刻被群众接着合唱下去。走马灯燃起来了，汽灯也亮了。侍者点燃洋烛，送了一支到我们的桌上来。

我知道日机已经出海了。人们从无线电喇叭里得到这个消息，他们拍掌欢呼，只是因为那个可怕的梦魇已被光明驱散，至少这个晚上他们可以安静地工作一夜，再没有什么东西来妨害他们。从八月十三日以来我已经有过三次这样的经验了。这是第四夜，而且以后还会有第五，第六……夜。我是和那些拍掌欢呼的人有同感的。

于是解除警报的汽笛响起来，献金台旁边的汉民分局门前有警察在敲钟：一下，二下，三下，四下……钟声带来了更大的喜悦。

街中响起了汽车的声音，接着听见人们在喊口号。灯光闪电似地在黑暗的街上亮了几下。我看见三四辆卡车满载着手执白纸小旗的男女青年从财政厅那面驶过来。卡车停在十字路口，车上的人不住地挥动着小旗。

献金台上的女学生又唱起救亡歌。卡车上的青年也合唱

起来。但是卡车终于载着歌声往前面走了。像船后的水痕一样，卡车的后面也拖了一条长长的“音路”。我听得见它，而且也仿佛看得见它。

从财政厅那面又走来十几个人一队的歌唱团，其中有男有女，有的唱歌，有的吹口琴。他们经过这里，并不在献金台前停留，却转弯走了。

四 十月一日

高射炮的声音静下以后，四周渐渐有脚步声了。楼下对面那家药铺的大门依旧寂寞地锁着。一个乞丐似的男子安闲地从大新公司那方面踱了过来。他不时仰起头望天空。他走到我们的门前就在石阶上坐下休息。一个穿白布短褂的药铺伙计在巷子的另一头出现了。他站在那里似乎在和另一个人讲话。

没有解除警报。我不能等待了，我要到印刷局去。已经到了我和那边的人约定的时间，我要去拿这期刊物的校样。

我穿好皮鞋。对面药铺的大门被推开了，我听见了声音，一定是先前在大新公司门口防空壕里“躲警报”的人回来了。我便匆忙地走下楼，推开门出去。

我走出巷子，看见商店门依旧开着。我进入大街，却看见警察岗亭上挂着红旗，这是表示紧急警报的信号。街上仍然和平时一样热闹，行人不带一点慌张的样子。

我雇了黄包车，让那个年轻车夫沿着我走惯了的路线把

我拖到印刷局去。

转过一个街口，我看见许多人围聚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无线电喇叭报告日机的行踪。

快要到印刷局了，我忽然看见行人匆忙地往骑楼下走去，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大概是飞机回来了。果然车夫仰起头自语似地说："机声！"

我侧耳一听，不用说是那熟习的声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也仰头去望天空。阳光直往我的脸上射来，使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我始终没有看见什么。

市声渐渐地静下去了。摩托声更清晰地进了我的耳里。天空没有什么可怖的景象。我的四周也只有静寂。这里仿佛是一个和平的境界。人行道上南国的绿叶跟着风的节奏微微飘动。但是比蜜蜂声音较大一点的机声却压住了每个人的心。这是死的声音。毁灭的声音。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切的灾祸。它可以使我们眼前的这一切即刻化为烟雾。它可以使我们这五尺的身躯变成粉碎。这似乎是我们的物质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所以那个车夫忽然惊恐地叫起来了：

"飞机向我们这面来了。"

话不是这么说的，意思却是这样。我朝着车夫指的方向看去。三架飞机，一架在前，两架在后，向着我们这面飞来。它们飞得相当高，但声音不小。有几个人跑着，也有人伫立在街头仰天观看。车夫慌张起来。他拖着车子，打算往什么安全的地方跑去。

崩！崩！崩！崩！……高射炮嘹亮地响着，声音十分清脆，

好像什么东西冲破了天幕，进入大气里去了。

晴朗的蓝天里现出一连串小团的白烟。一个靠一个地排列着，使人不相信竟然会有这么美丽的白云。

我的心立刻静下来了。这是我们的高射炮的声音。我便安慰这个老实的车夫道：

“不要怕，我们的高射炮会把飞机打走的。”

果然高射炮的声音停止以后，摩托声也渐渐地小了。那些杀人的利器不久也就离开了市区。我在印刷局取了校样，又从那里走到书店。我还不曾走到书店的巷口，就听见了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同时在汉民分局门前警察慢吞吞地打起钟来，岗亭上的警察也含笑地取下红旗卷起，另外拿出绿旗来挂上。

1939年春在上海写完。

无 题

《无题》，一九四一年六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二年七月，共印行五版(次)。

前　　记*

这本小册子里有杂感，有短论，有悼文，有卷头语，有后记；说“杂”，说“短”，倒是名符其实。自然它们都是不像样的东西，不过因为全和抗战有关，我就把它们集起来付印了。

书名《无题》，并无深意。我从来不会将就题目做文章。过去作文虽然也效法前辈，在篇前加一个标题，其实我只是信笔直书，随便发抒个人的浅见，且往往越出题目的限制，更没有依照文章的作法。因此我翻读旧作，常常感觉到对不起题目似的惭愧。这次用“无题”作书名，无非说实话。

巴　　金 1941年3月在重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自由中国》新一卷第三期。

无　　题*

一

在河口铁桥炸断以后，一个朋友从安南来，他告诉我下面一件事情：

他们从海防到了老街，晚上在老街的"廉访所"对护照。一个中国学生因为他的护照照片是戴着帽子摄的，在对护照时他没有揭下帽子，签护照的法国官员发了脾气，命令他脱帽。他没有听清楚法国人的话，动作稍微慢一点，在旁边的安南兵就动手打人。中国学生做出抵抗的样子。结果他得着违法的罪名被拘捕了。同路的人不能够给他帮忙，他们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不过据旅馆的人说，将来审讯以后那个中国学生会被判处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有期徒刑。

我听到这番话以后，不过一个星期的光景，昆明的日报上就刊载了日军在海防登陆的消息。他们并不曾遇到抵抗。我很担心那个学生的安全。

法国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我从前还以为自己对那些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四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在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面生活的人多少有一点了解。现在我才知道自己被书本欺骗了。我还记得三个多月前贝当政府向希特勒投降的时候，我曾经同几位上海友人争辩，我说，卢骚和伏尔泰的法国，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法国是不会投降，也不会安安静静地让屈服者统治的。然而现在法国人在贝当的指挥下又在世界的另一角做了卖友的行为，再一次对侵略者低头了。我期待着一次巴黎公社的壮剧。等待了三个多月，我却只看见法国的第二次投降。贝当下令放下武器的时候，他说过这是光荣的和平，但是给我们看见的却只有苟且偷生，这里并没有一点光荣。

一百五十年前(一七九二)，巴黎成了四国君主进攻的目标，在最危急的情势中，丹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的号召。是这样的吼声压倒了那些失败主义者的呻吟，扫去了一切的吱吱喳喳。丹东还从乡下把他的年老的母亲接到巴黎来，表示他一家人愿与这个名城共生死。法国人的这种无畏精神保全了革命，保全了法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遍欧洲。这样的精神在当时是极普遍的，所以法兰西民族曾经被人称为爱自由的战士。在过去靠了“自由”，法国才得在欧洲发射灿烂的光辉。我翻读法国历史，可以看见若干先烈为了自由上断头台流尽热血。要恢复法国的光荣，就不能背弃自由。背弃自由只是一条灭亡的路。

现在贝当却牺牲了法国的自由，建立一己的政权，在投降的政策下面谋个人的利禄。在欧洲就已经出现了使人难信的事实。海防的登陆，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贝当走的路也就是德古在安南走的路。贝当向德国的侵略者低头之后，他又命令德古向日本的侵略者屈服，贝当以为这样他就可以巩固他的政权，却不知道自己不过做了德国法西斯蒂掌握下的傀儡。他不把安南还给安南人民，却宁愿让它也在很短的时期中变做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掌中物，这也许是贝当一类的人的得意行为。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走到深渊的边沿，而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起后悔的念头，不过那时又太迟了。

然而现在似乎还是他们得意的时候。贝当在国内努力铲除异己。德古的部下也在安南各地欺侮中国侨民和安南人民。两个多月前我从上海来昆明，在海防登岸换车时，曾在海防的海关里耽搁了七八小时，只为了两件小行李。那一天我看够了法国关员的横暴行为，也看够了我们同胞的狼狈情形，还听够了同胞们的唉声叹气（他们在那里不像旅客，却像一群囚徒）。一个广东同胞为了几件汗衫、短裤和衬衣，就被关进了木屋，课以高额的罚金。一个江苏同胞的一双马靴被强迫着从脚上脱去。为了抢先拿行李送检查，许多同胞还挨过法国官员的拳头。我站在那个广阔的厅子里，看见了这一切情形，我的心发痛，我的血在沸腾，我想不透一个问题，我痛苦地想着：难道这也是卢骚、伏尔泰、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的子孙？难道这也是我在法国看见的那些爱自由的法国人的父子兄弟？我得不到一个回答。我后来又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在侵略者的威胁下，在自己受到的屈辱的当中，而且在自己的毁灭的边沿上还做出这种狂暴的作威作福的行

为？难道他们还不明白究竟是哪一种人应该先得到可耻的恶运？是他们还是我们？我似乎比他们看得更清楚。我原谅这些“世纪末”的病态行为。但是我不能原谅他们加在我们同胞身上的侮辱。

十几年前我说过：“我爱法国，我将永远爱它。”现在我不再说这样的话了。贝当统治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殖民地统治者所代表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我不知道那些人会把法兰西拖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我只希望法国人民起来挽救他们的“祖国”。在过去某一个时期法兰西做过自由的象征。至于将来它会不会做屈服的象征，这要看那般爱自由的法国人的努力了。

至于安南人呢，他们决不会让帝国主义者长久支配他们的命运。不论是对付法国的统治者或日本的统治者，安南人一定会争取到自由。

二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钟，还没有听见警报。日本人广播说今天要再炸昆明。一个星期前昆明才遭过二十七架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今天不知道他们又要来一个什么样的屠杀！不过警报未放前，我还可以在市区里安静地写文章。而且我已经写了三个半钟头了。今天为了等警报，我在七点钟以前就起来了。这时罩在我头上的还是晴空，却也有好些片鱼鳞似的白云。半点钟前还有两架我们的飞机在云间盘旋，如今空中

却寂然了，我只听见窗前树上小鸟的鸣啭。

又过了一刻钟，还是没有动静。没有警报，我自然在天空找不到敌机的影子。我想起了这样的事情：前年六月里日本武士也曾扬言要在广州抛下一千个炸弹；去年一月他们又散布传单说要在三天以内炸平桂林。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空言威胁，不曾得到武士们预期的效果。

轰炸只是卑怯的屠杀，懦夫的行为。勇敢的人愿意在公平的条件下与敌人搏斗。躲在上空抛下武器，杀害徒手的人群，这种行为里并没有一点点英勇的气概。多轰炸一次，不过多在这两个民族中间添一笔血债。若说用轰炸就可以摧毁对方的抗战精神，收得投降的效果，这是在做梦。历史上就没有这样的先例。何况中国有那么广大的国土，那么众多的人民，这是日本的有限的炸弹所炸不尽、毁不完的。

让那些武士躲在云端做他们的好梦罢。我们是不会投降的。而且不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永不会停止抗战。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他们从云端跌下来，埋葬在污泥里！

1940年10月7日11时半在昆明。

附记 文章刚写好，警报响了。我到了郊外，便看见二十五架敌机飞过我的头上，接着炸弹在市区东南角爆炸了。我只看见往上冒的浓黑的烟，却不知道灾区在什么地方。

下午一时在田上记。

先死者*

今天我又走到了金碧路的灾区。

这是第二次了，三天前夜里我也到过这个地方。那时我在黑暗中摸索，靠着一只手电筒的微光给我指路。我只知道自己迎着尘土与人声走。我再也认不出近来时常经过的那条热闹街道。砖块绊住我的脚，背影挡住我的眼光。我终于停住了。我看见就像要倒下似的断壁。那个华丽的建筑物只剩了半个空架子！我小心地下着脚步，怕让坏电线缠住我的脚。我依旧用手电筒照路。在这条黑暗的街中，就只有闪电似的手电筒的光。好几道光照在瓦砾堆上。一些人站在堆上工作，另一些人立在街心望着瓦砾堆叹气。我也把眼光往那边射去，我只看见砖瓦、木片、灰尘。

还是这同样的废墟，不，我应该说是同样的伤痕，这三年来，我在广州、武昌、梧州、桂林、金华都见过了。中国的土地在受难，在受磨炼，在受熬煎。每个人都跟着它受苦，但是都看见它在苦难中生长。多看见这样的伤痕，自然给人增加痛苦，但同时也加强了我对未来的信念。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国民公报·文群》。发表时题为《先死者——昆明随笔之一》。

今天我又走过这条伤痕满身的街。

白日的亮光把犯罪者的“成绩”完全暴露出来了。每一块碎砖，每一片断木，每一堵断壁，每一个破洞，都在诉说伤痛，都在叫喊复仇。

在一个瓦砾堆上，还有好些人躬着身子在工作。十几具白木薄棺材搁在他们旁边。我没有心肠去数棺材的数目，不过我注意到其中有三具放在另一边。我在瓦砾堆前立了三五分钟，正要举脚往前走时，忽然听见身旁一个人说：“有十七个人埋在里头，现在才挖出来三个。”

我又站住了。我把眼光射在那三具白木棺上。薄薄的木板盖着三个无名者的尸体。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生前事迹，也不知道他们遗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也许没有见过他们的面貌。但是我默默地揭下帽子，我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

我想，他们躺在棺材里该不会有怨言罢。他们跟着中国的土地受难，他们默默地交出生命，为了这土地的生长而倒下了。他们用自己的血灌溉他们所爱的土地，对这土地他们尽了最后的力量了。以后应当由我们来继续他们的工作，由我们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哀悼他们。我们倒应该尊敬他们。他们并非不幸的、徒然的牺牲者。他们用血来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这样的血是会发出光辉的。

“我流的是感激的眼泪。对这些先死者，我没有资格哀悼他们，”我这样说着，一面伸出手去擦眼睛。

1940年10月3日在昆明。

静寂的园子*

没有听见房东家的狗的声音，现在园子里非常静。那棵不知名的五瓣的白色小花仍然寂寞地开着。阳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树上，给那些绿叶涂上金黄色。天是晴朗的，我不用抬起眼睛就知道头上是晴空万里。

忽然我听见洋铁瓦沟上有铃子响声，抬起头，看见两只松鼠正从瓦上溜下来，这两只小生物在松枝上互相追逐取乐。它们的绒线球似的大尾巴，它们的可爱的小黑眼睛，它们颈项上的小铃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索性不转睛地望着窗外。但是它们跑了两三转，又从藤萝架回到屋瓦上，一瞬间就消失了，依旧把这个静寂的园子留给我。

我刚刚埋下头，又听见小鸟的叫声。我再看，桂树枝上立着一只青灰色的白头小鸟，昂起头得意地歌唱。屋顶的电灯线上，还有一对麻雀在吱吱喳喳地讲话。

我不了解这样的语言。但是我在鸟声里听出了一种安闲的快乐。它们要告诉我的一定是它们的喜悦的感情。可惜我不能回答它们。我把手一挥，它们就飞走了。我的话不能使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现代文艺》第二卷第二期，为《轰炸中及其他》之一则。

它们留住，它们留给我一个园子的静寂。不过我知道它们过一阵又会回来的。

我坐在书桌前俯下头写字，没有一点声音来打扰我。我可以把整个心放在纸上。但是我渐渐地烦躁起来。这静寂像一只手慢慢地挨近我的咽喉，我感到呼吸不畅快了。这是不自然的静寂。这是一种灾祸的预兆，就像暴雨到来前那种沉闷静止的空气一样。

我似乎在等待什么东西。我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我不能够静下心来。我一定是在等待什么东西。我在等待空袭警报；或者我在等待房东家的狗吠声，这就是说，预行警报已经解除，不会有空袭警报响起来，我用不着准备听见凄厉的汽笛声（空袭警报）就锁门出去。近半月来晴天有警报差不多成了常例。

可是我的等待并没有结果。小鸟回来后又走了；松鼠们也来过一次，但又追逐地跑上屋顶，我不知道它们消失在什么地方。从我看不见的正面楼房屋顶上送过来一阵呩呩的乌鸦叫。这些小生物不知道人间的事情，它们不会带给我什么信息。

我写到上面的一段，空袭警报就响了。我的等待果然没有落空。这时我觉得空气在动了。我听见巷外大街上汽车的叫声。我又听见飞机的发动机声，这大概是民航机飞出去躲警报。有时我们的驱逐机也会在这种时候排队飞出，等着攻击敌机。我不能再写了，便拿了一本书锁上园门，匆匆地走到外面去。

在城门口经过一阵可怕的拥挤后，我终于到了郊外。在那里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还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警报解除后，我回来，打开锁，推开园门，迎面扑来的仍然是一个园子的静寂。

我回到房间，回到书桌前面，打开玻璃窗，在继续执笔前还看看窗外。树上、地上、满个园子都是阳光。墙角一丛观音竹微微地在飘动它们的尖叶。一只大苍蝇带着嗡嗡声从开着的窗飞进房来，在我的头上盘旋。一两只乌鸦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叫。一只黄色小蝴蝶在白色小花间飞舞。忽然一阵奇怪的声音在对面屋瓦上响起来，又是那两只松鼠从高墙沿着洋铁滴水管溜下来。它们跑到那个支持松树的木架上，又跑到架子脚边有假山的水池的石栏杆下，在那里追逐了一回，又沿着木架跑上松枝，隐在松叶后面了。松叶动起来，桂树的小枝也动了，一只绿色小鸟刚刚歇在那上面。

狗的声音还是听不见。我向右侧着身子去看那条没有阳光的窄小过道。房东家的小门紧紧地闭着。这些时候那里就没有一点声音。大概这家人大清早就到城外躲警报去了，现在还不曾回来。他们回来恐怕在太阳落坡的时候。那条肥壮的黄狗一定也跟着他们“疏散”了，否则会有狗抓门的声音送进我的耳里来。

我又坐在窗前写了这许多字。还是只有乌鸦和小鸟的叫声陪伴我。苍蝇的嗡嗡声早已寂灭了。现在在屋角又响起了老鼠啃东西的声音。都是响一回又静一回的，在这个受着轰炸威胁的城市里我感到了寂寞。

然而像一把刀要划破万里晴空似的，嘹亮的机声突然响起来。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声音多么雄壮，它扫除了这个园子的静寂。我要放下笔到庭院中去看天空，看那些背负着金色阳光在蓝空里闪耀的灰色大蜻蜓。那是多么美丽的景象。

1940年10月11日在昆明。

大 黄 狗*

早晨园子外面意外地响起一阵狗叫。大概是邻家那条黑白花的狗的叫声。我想起了这里的大黄狗。我好几天没有看见它了。

往常，敌机还不曾飞到这个城市来投炸弹的时候，清早我起身不久，就会听见房东家通园子的小门依呀地一响，一条大黄狗带着快乐的叫声从窄小的过道奔进园子来。它并不挨近园中花草，也不去寻找食物。它的第一个工作便是到掩着的园门口大声叫唤，一面用嘴和脚去推动园门，想把门拨开。然而门是扣上了的，它忙了一阵，还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它居然把扣子摇脱了，但是房东家的小孩马上走来把扣子扣上。所以它始终打不开那两扇红漆的木门。不过它从门缝也可以嗅到外面的空气，瞥见外面世界的景象。

它每天总要在门口徘徊好些时候，有两三次它还带着求助似的吼声用力抓那木门。但是门始终关着，没有人来给它帮忙。它又望着门狂吠一会儿，然后绝望地转身往园内跑。它经过我的房门，跑到后面园子里去。后面的园子比较大，那里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公报·文群》。

还有房东为他们一家人建筑的防空室。可是它在那个地方只跑了两转，房东家的小孩就走来把它唤了进去。于是小门一闭，园子里又寂然了。

在上月三十日的大轰炸以后，一连几天园子里都没有狗的脚迹。我上午照例在房里读书写字等警报。有时我把疲倦的头从桌上抬起，就想起了大黄狗抓园门的事情。听不见那样的声音，我觉得寂寞。

昨天早晨，我刚刚在书桌前坐下，就听见房东家小门打开的声音。我想，大黄狗该出来了罢。它果然箭也似地飞奔出来了。

虽然离开了几天，它还是没有忘记它的日课。它进园来第一件事就是抓门。自然这不会有结果。不过这一次它的渴望似乎更大了。它不住地拚命推门，它好像抱了不把门推倒不停止的决心似的。可是它刚刚把扣子摇脱，房东家的小孩就立刻跑来扣上，而且等它刚转身往后园里跑去，那个小孩便将它赶进过道，赶进小门，使它的影子消失在依呀的闭门声里。

我想到那条得不着自由的狗的失望，心里非常不舒服。我又记起它好几次带着和善的表情望着我叫的事。两个月来它从没有用过凶恶的眼光看我。它或许是把我当作朋友来向我求助也未可知。可惜我不懂它的语言，不能够给它帮忙。我明白自由是一个生物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不说人，便是狗也知道爱自由。然而我却不能够帮助一条狗得到自由。

写完以上的话，我又因为空袭警报跑到郊外。今天看到

了可怖的轰炸。下午五点钟回到城里，在灾区走了一转，触目尽是断瓦颓垣。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一间倒下的房屋前面看见一条狗的尸首，连肚肠都露在外面。

晚间我回到园子里，迎着我的只有冷冷的月光和蟋蟀的悲鸣。我站在松树下水池旁边，想起了那条爱自由的大黄狗。我不知道它是否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我还记得它的面貌，尤其是在它和善地望着我的时候，它就像一位长发、长眉、长须的老人。

1940年10月13日在昆明。

轰 炸 中*

二十七架敌机飞过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正躺在草地上。树叶给我们遮了当顶的阳光，但是我偏起头就可以看见一蓝无际的天海中飘浮着二十七只排列得很整齐的又白又亮的蜻蜓。从树下看，它们似乎是可爱的东西。然而它们带给我的却只有憎恨和畏惧的感觉。我刚才还听见炸弹爆炸声。现在炸弹又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响了。和"狂朗狂朗"声相似的巨响，使我们四周的空气震动起来。我不知道炸弹落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这些残酷的侵略者要到什么时候才终止它们的屠杀行为。我们静静地伏在地上，偶尔用极轻微的声音交换一两句短语。机声极大，并且愈过愈响。我抬起眼睛看天，我满眼都是阳光，只看见头上一片无涯的蓝海，却找不出一个白点子。但是机声就在我们的四周响，我觉得敌机始终在我们的头上盘旋。难道它们仍然在找寻目标？难道它们今天就不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时候？机关枪声、高射炮声、炸弹声混杂在一起成了恐怖的音乐。尤其使人心悸的是飞机俯冲投弹的声音。但是这时候我的心反而安定了。我似乎在等待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现代文艺》第二卷第二期，为《轰炸中及其他》之一则。

死，对将来不存一点希望，也就没有一点杂念。不过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没有听见炸弹在空中旋转而下的声音，我知道弹落的地方和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个判断使我从容地坐起来。

但是一种沙沙声突然响起来，声音不小，我知道这是可怕的声音，连忙伏在地上。于是一个大的爆炸声响了，我的身子受到一下震动。另一个年轻朋友跑到稻田里去，他伏在刚割好的稻草上。他后来告诉我们，他被这震动抛了起来，这一下可把他吓坏了。

在这个巨响以后，我们等待着第二次的同样的声音，但是除了机声外我听不见什么。空气也似乎较为宁静了。

我想，今天的灾难大概完结了。我嘘了一口气，正要立起来，忽然一阵飞机俯冲声随风送进我的耳里，声音十分响亮，我瞥见一架敌机的影子掠过我们的头上，我的心被一个恐怖的念头抓紧了，我默默地等待着这个最后的灾难。

然而跟着来的却是安静。机声也渐渐地死去了。过了片刻，四周还没有动静。这仿佛告诉我们敌机已经离开市空了。我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伏在田里的人也走过来，大家开始讲话。所有的眼睛都望着市区的西方。那里正冒着大股黄黑色的浓烟，烟雾遮盖了天空的那一角。

“我们的家一定炸掉了，”在书店里做事的朋友带着绝望的表情说，我也住在那个书店的栈房里面，就是在那个花园里。

“我们的学校恐怕也靠不住了，”第二个朋友说。

“日本人欠中国人的这笔债不晓得要到哪天才还得清！”第三个朋友说。

我没有说什么，我却在想这笔血债将来应该怎样地偿还。

回到城里才知道我们的“家”完好无恙。但是第二个朋友的学校却遭到了惨炸，连她们的宿舍也震坏了一部分。

10月13日在昆明。

十月十七日

空袭警报发出后已经很久了。我摊开带在身边的那张油布，躺在树下小河边一块斜坡上，差不多要睡着了。我闭了眼睛，让那些从树叶间洒下来的秋阳的光点随着风在我的身上和脸上移动，我恍恍惚惚地听见两三个人在我后面低声讲话。

有时我睁开疲倦的眼睛，看见下面大片金黄色的稻田里，几个顶着蓝布包头帕的农妇躬着身子在割稻。四周静得很。连微风吹过、一群蚱蜢在稻草中间跳跃的声音，也隐约地听见了。

抓住人的心的是那突然响起的机声。许多只眼睛从草地上抬起来在空中找寻。那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它的大的灰影子使晴朗的蓝天变得更美丽了，但是它只给我们留下这匆匆的一瞥。

"教练机走了，一定是有情报，敌机要来了，"旁边另一株树下一个穿制服的人说。

接着是一阵可怕的沉寂。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稻田里有好些人慌张地向我们这面跑过来。

从远处响起了另一种机声，这是那种使人心悸的声音。它渐渐地变大，告诉人：杀人的利器向着这个城市飞来了。

我躺在地上，好像受到了一种压迫似的。我烦躁地一翻身。我略略抬起头看对岸只隔着这一条沟的小河。对岸和这里极相似，也是被一排树掩盖着，斜坡下也有一片金黄色的稻田。先前对岸还有一些人头在晃动，如今映入我眼里的却只有绿草和黄土了。

“敌机！敌机！”后面有人恐怖地小声叫起来。他伸手指着头上的天空，报告敌机有三架。

我的眼光顺着他的手指往天空射去，正看见一只小小的白蜻蜓从白云里飞出来。我的眼光移动一下，我又看见了另外的两只。它们就在我们的头上飞，在上面盘旋一回，就不见了。起初我还听见机声，后来就寂然了。我想，这大概是敌人的侦察机罢。但是等我刚刚嘘一口气时，另一种更可怕的使人不用分辨就明白的轰炸机马达声又突然自远而近，由小而大，带着大的威胁来了。

“来了，”有人用压抑住的低声说。我略略举头看下面，看四周。没有人影，连割稻的农妇也失踪了。在未割的稻田上，在捆好的稻束上谷穗垂下它们的珠串似的头，叹气似地在风里微微摇摆。

“不要动，”有人在后面低声干涉我，我又默默地躺下。

“在那里，三中队，二十七架，”穿制服的人说。

我听见强大的机声，这好像是从我的头上发出来似的。我连忙用眼光去找寻。在蓝天里出现了一群白蜻蜓的影子。我数着它们，九只一群，共三群，但是有一群中间少了一只。清清楚楚的是二十六架。它们正向着我们这面飞过来。

在我的周围只有死一样的静寂。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样的灾祸，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看见我们这个可爱的和平的都市！我只有静静地等待着。我也明白这等待是不会久的。

高射炮在我的左边响了，飞机俯冲投弹的声音也听见了，这是在城市的东南角。先前的二十六架敌机还安闲地在我们的头上飞。这个发见增加了我的恐惧。我不知道今天来的敌机究竟有几批几架。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怀着残酷的目的要来把整个繁荣的城市炸成灰烬。

高射炮在我的右边响了。接着是大批炸弹落下的声音。我立刻明白是我们后面那个工厂区的某小镇被炸了。在这边是高空投弹，好像一下子就投下了几十颗似的，砰砰砰地响个不停，配合着左边连续的俯冲投弹声，凑成了一曲送人进地狱去的恐怖的音乐。

这时除了炸弹爆炸、飞机俯冲的声音外，只有另一株树下一个老太婆带着青白的脸色闭上眼睛，合掌低唤“阿弥陀佛”。

右边二十六架敌机投了大批炸弹以后便逃走了，剩下大股白烟从树梢冒起来。在左边投弹的飞机似乎就只有两架（我只看见两架）。它们从容地投了几次弹，在那个被黄黑浓烟罩着的城市的一角盘旋了一会，才满足地飞开了。

我站起来，就在那个斜坡上看下面受难的城市。东南角上的黄烟还很浓。我不知道灾区在什么地方。不过从那个方向揣测，我想大概还是在金碧路一带热闹的市区。

黄烟渐渐地淡去，树木和房屋现出了一个轮廓，不久它们

都像先前那样清晰地图画一般嵌在晴朗的蓝天里。我再找不到这个城市的伤痕，我的心里略略感到一点安慰。我转身看另一个受难的地方，那里还冒着大股白烟。在那个小镇里一定有房屋在燃烧，我仿佛还听见爆炸声。

我又回转身再看市区，那里的蓝天也被一股笔直的黑烟涂乱了。难道有什么建筑物起了火？我的心受到熬煎了。

市区的黑烟不久也就消散了。工厂区的白烟却仍然贴在树梢，许多避难者为我们的损失在唉声叹气。

警报解除后我经过稻田走上大路，看见一个人力车夫模样的中年男子，坐在路旁自语地骂道：

"×你妈，你把昆明就炸光了，老子也还是要抗战！"

我回到市区，才知道这一天的空袭并没有带给我们多大的损害。

1940年10月21日在昆明。

在泸县[*]

我知道船要在泸县过夜，等它靠好码头，便拿起大衣，戴上呢帽到岸上去，这时不过下午三点钟的光景。

我慢慢地走上土坡，在一个墩上站住，便掉转身子去看江景。白带似的江水横在我的脚下，映着午后的秋阳，发出悦目的闪光，和天空成了一样的颜色。岸边一片沙滩，几间茅屋，两只囤船，还有一列帆樯高耸的小舟。这些似乎全陷入静止的状态，但是来往的人却使它们活动了。人们像带色的棋子一般在这块大棋盘上不停地跳动。人们像一根线从囤船拉上土坡，于是颜色和声音混杂在一起，从我的面前飘过。一切于我都是十分亲切。我怀着轻快的心把它们全收入我的眼里。我望着四周景物渐渐地回复到静止的状态中，我才拔脚往坡上的城市走去。

这是我第二次踏上泸县的土地，第一次还是在十七年前。那时我不过是十八九岁的少年，怀着一颗年轻的纯白的心。现在我重睹这个可爱的土地，我的心上已经盖满了人世的创伤，我不能说这十七八年的奋斗给我带来什么结果。不过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四日《国民公报·文群》。

走进泸县的街市，仍然只是这个轻松的身子，我的两手并不曾染过一滴别人的血。我想我应该有了大的改变。但是站在一个掷"糖罗汉"的摊子跟前，听着从两个人手里先后掷下的骰子声，望着摊子上三四排长短不齐的糖人，我忽然觉得自己回到小孩的时代了。那个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碗里的孩子仿佛就是我。我留恋地在这个摊子前站了一刻钟光景，我感到一种幼稚的喜悦。那个孩子空着手走开了，他讲话用的是我极其熟习的声音。这声音引着我走了大半条街。我跟着小孩走，好像在追自己的影子，我似乎一跳就越过了二十年的长岁月。

然而就只走了大半条街，就只有这么短短的快乐的时间！我突然被拉回来了，从远去了的年代回来了。一大片炸毁房屋的废墟横在我面前，全是碎砖破瓦，只有倾斜欲坠的断墙颓壁留下来，告诉我们人家的界限。焦炙的黑印涂污了粉白墙，孤寂的梁柱带着伤痕向人诉说昔时的繁荣和今日的不幸。有一处，在一堵较大的白壁上，触目地现出"我们要替死者复仇"的标语。我隔着废墟望这些字，这时下落的太阳的余晖正停留在这面断墙上，像一片血光，它罩住了标语的一半字迹。

这不是我的错觉。我看见的应该是血。在这些瓦砾堆中不知埋葬了若干善良的生命。半个不设防城市的毁灭必然包含无数凶残的暴行，烧夷弹点燃的烈火一定会像嗜血猛兽似地吞食了许多人的血肉。这都是说着我熟习的语言、过着我熟习的生活的人们的血。血涂在墙上，血也涂在我的心上。是这些人的血自己在向我讲话，是这些人的血自己在叫喊复仇。

我站在废墟前，让一阵愤怒的火烧着我的心。我的孩子

的梦醒了。从前的繁荣的街市我只能在记忆里找寻，坟墓似的瓦堆掩埋了旧日的脚迹。甚至在这个江边的小城里，还有血痕来烧我的眼睛，不容我的心在昔日的梦中逃避！

惨痛的记忆接连地来了。它们从四面八方袭来，我不能驱走它们。我移动脚往前走，还是看见同样的景象，我还是想着同样的情形。我加快脚步往前走，一座高塔似的钟楼拦住我的视线，"怎样还剩下这个东西？"我刚这样想，我的脚就停住了，好像突然受到惊恐似的。我明明看见一具骷髅！那座教堂的钟楼已经成了风化的干尸，但是它依然僵立在坡上，洞穴似的眼睛望着我，仿佛在诉说它身受的酷刑。

我默默地看着，默默地听着，看那枯焦的骨架，听那无声的语言。这里有一段悲惨的故事。但是我惭愧我只有这无力的手，不能给它任何的安慰和援助。我埋下头走到它旁边。我的眼光被几个浓黑的大字吸引住了，依旧是抗战的标语，它们就写在这座教堂的墙柱上，这是我看惯了的字句。但这时我的头昂起来了，仿佛有一道强烈光芒射进我的肺腑，照亮我的胸膛。我感到勇气的增加。我的信念在这里又受到一次锻炼。然而它还是坚强地从火里出来了。我没有说错话：只有抗战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存，和平却会带来毁灭的命运。曾是和平的象征的十字架已经熔化在大火中，而代表一个民族生存的意志的标语，却显明地留在断壁残柱之上，感动了千万的人。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的思想跑得真快。在这短短几点钟内，我经过了一个民族的若干年的受难的岁月，经历了一个平凡人的二三十年

的生活。但是我瞥见一线光明了。

我终于走过了斜坡。眼前现出一片绿色，我还听见有力的年轻的声音。原来我走到公园里来了。这里还是完好的。在树荫下围着一张竹制的小茶桌，六七个穿制服的青年坐在竹椅上，慷慨激昂地辩论。我走过他们身边，我在砖砌的栏杆前面立了片刻，我听见了几句话。他们在谈论中国的将来，这的确是一个大题目。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捏紧拳头大声说："我知道时代是永远前进的。但是我们要推动时代，不要让时代把我们拖起走。"

我已经走过了这张茶桌，但是另一个人的激动的声音还从后面追上来："我们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我们要争取这最后胜利，我们要保持这最后胜利，不管付怎样大的代价，流怎样多的血，我们要战斗到底！"

我站住，倾听下面的话："物质的损失，生命的牺牲，会带来伟大的结果！你看着，我们就要在这一片废墟上建造起九层的宝塔。"

我感到极大的喜悦。我的确瞥见光明了。这是年轻的中国的呼声。这是在轰炸的威胁下长成的中国的呼声。它是何等响亮，何等有力！我相信它，我等着看那废墟上建造起来的九层宝塔。

回到船上以前我还在各处走了一转。我走过一条很长的马路，我没有注意街名，但我知道这是本城唯一热闹的街市。这里两旁都是完好的商店，还有许多白木新屋。另外在较冷静的街上我看见新的巨厦的骨架和"上梁大吉"的红纸条。一

个中国的城市在废墟上活起来了，它不断地生长、发达。任何野蛮的力量都不能毁灭它。我怀着这个信念回到了船上。

晚上十点钟左右船开往蓝田坝上煤，就泊在那里。第二天晨光熹微中船载着我们离开了泸县，缓缓地往上游驶去。

1940年12月24日在重庆追记。

做一个战士*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战士颂》的作者① 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
>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这一段话很恰当地写出了战士的心情。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少年读物》创刊号。

① 指亡友陈范予（1901—1941）。

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他要消灭它们而取得光明。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

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他的脚步很坚定。他看定目标，便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怕被绊脚石摔倒，没有一种障碍能使他改变心思。假象绝不能迷住战士的眼睛，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

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能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战士，只

要他有决心。所以我用“做一个战士”的话来激励那些在彷徨、苦闷中的年轻朋友。

1938年7月16日在上海。

“重进罗马”的精神*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后，许多人怀着恐惧与不安离开了上海。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给我绝望地倾诉留在孤岛①的青年的苦闷。我想起了圣徒彼得的故事。

据说罗马的尼罗王屠杀基督教徒的时候，斗兽场里充满了女人的哀号，烈火烧焦了绑在木桩上的传教者的身体，耶稣的门徒老彼得听从了信徒们的劝告，秘密地离开了罗马城。彼得在路上忽然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影子。他跪下去呐呐地问道：“主啊，你往哪里去？”他听见了耶稣的回答：“你抛弃了我的百姓，所以我到罗马去，让他们把我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感动地站起来。他拄着拐杖往回头的路走去。他重进了罗马城。在那里他终于给人逮住，钉死在十字架上。②

绰号“黄铜胡子”的尼罗王虽然用了火与剑，用了铁钉和猛兽，也不能摧毁这种“重进罗马”的精神。像这样的故事正是孤岛上的中国人应当牢牢记住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六日《少年读物》第二号。

① 孤岛：指当时的上海租界。

② 见波兰小说家显克微支（H. Sienkiewicz，1846—1916）的历史小说《你往哪里去？》。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在这里感到苦闷呢？固然在这里到处都听得见“到内地去”的呼声，而且也有不少年轻人冒危险、忍辛苦离开了孤岛。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无法展翅远飞，不得不留在这里痛苦呻吟。他们把孤岛看作人间地狱，担心在这里受到损害。我了解他们的心情。

不用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没有理由干涉他们。对那些有翅膀的，就让他们远走高飞，我也无法阻止。但是对于羽毛残缺或者羽毛尚未丰满的，我应该劝他们不要在悲叹中消磨光阴，因为他们并非真如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比别的人更不幸；而且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肩上还有与别人的同样重大的任务。固然可以使人呼吸自由空气的内地是我们的地方，但是被视作黑暗地狱的孤岛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土地！一直到今天孤岛还不曾被魔手捏在掌心里，未必就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放弃？自由并不应当被视作天赐的东西。自由是有代价的。真正酷爱自由的人并不奔赴已有自由的地方，他们要在没有自由或者失去自由的地方创造自由，夺回自由。托玛斯·潘恩①说得好：“不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祖国。”参加过北美合众国独立战争的潘恩是比谁都更了解自由的意义的。

唯其失去自由，更需要人为它夺回自由。唯其黑暗，更需要人为它带来光明。只要孤岛不曾被中国人完全放弃，它终有得着自由、见到光明的一天。孤岛比中国的任何地方都需

① 托玛斯·潘恩（T. Paine，1737—1809）：美国启蒙学者、政论家，争取美国独立的思想家。

要工作的人，而且在这里做工作比在别处更多困难，这里的工作者应当具有更大的勇气、镇静、机智和毅力。工作的种类很多，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减于在前线作战。这样的工作的确是值得有为的青年献身从事的。

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孤岛上的工作？我们平日责备失地的将士，那么轮到我们来“守土”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看轻我们的职责？撇开孤岛的历史不说，难道这四五百万中国人居住的所在就是一块不毛的瘠土？谁能说匆匆奔赴内地寻求自由，就比在重重包围中沉默地冒险工作更有利于民族复兴的伟业？反之，“重进罗马”的精神倒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石。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在失地中已经见到了不少的这种精神的火花。这种精神不会消灭，中国不会灭亡，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因此住在孤岛上的人，尤其是青年，应当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而兴奋、振作，不要再陷入苦闷的泥淖中去。

1938年7月19日在汕头。

悼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悼的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支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根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季月刊》第一卷第六期。编入十四卷本《文集》时，作者曾作如下题注："这是《文季月刊》一卷六期的卷头语。《文季月刊》是我和靳以编辑的文学刊物，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发行。"

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作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1936年10月在上海。

感激的泪*

空中响起了机关枪声，三只敌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我坐在黄包车上，膝前堆着印书用的白报纸；铜版纸和模造纸重重地压在我的脖子后面。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我忽然疑惑起来：为什么这些纸是用来印《纪念集》①，而不是印他的著作的？于是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他死了！"的确，他已经在一年前逝世了。

一年前我写过："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的确我们的损失至今还不曾得到弥补。

但是我在前两天又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说过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前进。这并不是一个空泛的诺言。各个前线的炮声和山间田畔中国士兵的赤血便是一个凭证。全中国儿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救亡日报》。发表时题为《深的怀念》。

① 《纪念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一九三七年十月出版，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经售。

的心结成了一块磐石；全中国儿女的力汇集成一股铁流。这是我们民族解放战争中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会把横暴的侵略者打击到屈膝的。”

我们相信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我们说过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诞生，便是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这些都不错。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抗战一定胜利，新中国一定到来。但是鲁迅先生的仁爱和他的教诲，我们却无法再领受了。想起这一点，我无法制止我的感激的眼泪。

1937年10月在上海。

龙·虎·狗

《龙·虎·狗》，一九四二年一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七年八月，共印行三版（次）。

序*

到了这里一个月，正遇着雨季，差不多天天落雨。早晨起来便听到淅沥的雨声，午夜梦回，也会听见淅沥的雨声。这雨似乎就滴在我的心上，真叫人心烦。

雨落大了，我们这个巷子里就淹了水，有时必须赤脚走过。水退得快。但是水退了，路又滑得很。人走一步，身子不免要摇晃一下。一不小心，谁都会摔倒在泥水里。

因此在上午或傍晚，或夜间，除了到附近茶铺去泡开水外，我不常到外面去。我总是坐在窗前书桌旁边，有时看书，有时写信，有时也写短文。这些时候好像心里装了很多东西似的，我只想把它们倾吐。拿起笔就想写文章。这样我每天总要写满两三张稿纸。

今天把写过的稿纸检点一下，一共是十九篇短文，连以前存放在上海友人处的四篇较长的文章，也可以编成一本小书了，我便花了半个上午的功夫，将集子编好。自己翻看一遍，想想也算做了一件事情。书名《龙·虎·狗》，并无深意，我不过把书中三篇短文的题目借用来作书名，同时也表示书里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新蜀报·蜀道》。发表时题为《〈龙·虎·狗〉题记》。

有什么劝道传世的大文，都是些“随便谈谈”而已。

外面又在下雨，天是病态的苍白色，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为止。我心里闷得慌，我想快些把面前一堆文章封好，冒雨到邮局寄发。淋淋雨或许可以使我的心畅快些。

雨渐渐地小了，天空还是那么阴暗，外面忽然响起了飞机声。我跑到露台上去看，正有三架飞机冒雨低飞。看见自己飞机的雄姿，我觉得心里爽快。在这里最使人兴奋的事便是看见自己的飞机列队飞翔。

巴　金 1941年8月5日在昆明。

爱尔克的灯光*

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但是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还是那样宽的街，宽的房屋。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狮子，那一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十八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十八年以前的遥远的旧梦。

守门的卫兵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他不了解我的心情。他不会认识十八年前的年轻人。他却用眼光驱逐一个人的许多亲密的回忆。

黑暗来了。我的眼睛失掉了一切。于是大门内亮起了灯光。灯光并不曾照亮什么，反而增加了我心上的黑暗。我只得失望地走了。我向着来时的路回去。已经走了四五步，我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新蜀报·蜀道》。

忽然掉转头，再看那个建筑物。依旧是阴暗中一线微光。我好像看见一个盛满希望的水碗一下子就落在地上打碎了一般，我痛苦地在心里叫起来。在这条被夜幕覆盖着的近代城市的静寂的街中，我仿佛看见了哈立希岛上的灯光。那应该是姐姐爱尔克点的灯罢。她用这灯光来给她的航海的兄弟照路，每夜每夜灯光亮在她的窗前，她一直到死都在等待那个出远门的兄弟回来。最后她带着失望进入坟墓。

街道仍然是清静的。忽然一个熟习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唱起了这个欧洲的古传说。在这里不会有人歌咏这样的故事。应该是书本在我心上留下的影响。但是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事情。

十八年前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离开这个城市、这条街的时候，我也曾有一个姐姐，也曾答应过有一天回来看她，跟她谈一些外面的事情。我相信自己的诺言。那时我的姐姐还是一个出阁才只一个多月的新嫁娘，都说她有一个性情温良的丈夫，因此也会有长久的幸福的岁月。

然而人的安排终于被"偶然"毁坏了。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但是这"意外"却毫无怜悯地打击了年轻的心。我离家不过一年半光景，就接到了姐姐的死讯。我的哥哥用了颤抖的哭诉的笔叙说一个善良女性的悲惨的结局，还说起她死后受到的冷落的待遇。从此那个作过她丈夫的所谓温良的人改变了，他往一条丧失人性的路走去。他想往上爬，结果却不停地向下面落，终于到了用鸦片烟延续生命的地步。对于姐姐，她生前我没有好好地爱过她，死后也不曾做过一样纪念她的事。

她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死带走了她的一切；这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的旧式女子的命运。

我在外面一直跑了十八年。我从没有向人谈过我的姐姐。只有偶尔在梦里我看见了爱尔克的灯光。一年前在上海我常常睁起眼睛做梦。我望着远远的在窗前发亮的灯，我面前横着一片大海，灯光在呼唤我，我恨不得腋下生出翅膀，即刻飞到那边去。沉重的梦压住我的心灵，我好像在跟许多无形的魔手挣扎。我望着那灯光，路是那么远，我又没有翅膀。我只有一个渴望：飞！飞！那些熬煎着心的日子！那些可怕的梦魇！

但是我终于出来了。我越过那堆积着像山一样的十八年的长岁月，回到了生我养我而且让我刻印了无数儿时回忆的地方。我走了很多的路。

十八年，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死了许多人，毁了许多家。许多可爱的生命葬入黄土。接着又有许多新的人继续扮演不必要的悲剧。浪费，浪费，还是那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精力，感情，财富，甚至欢笑和眼泪。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看见的还是一样的情形。关在这个小圈子里，我禁不住几次问我自己：难道这十八年全是白费？难道在这许多年中间所改变的就只是装束和名词？我痛苦地搓自己的手，不敢给一个回答。

在这个我永不能忘记的城市里，我度过了五十个傍晚。我花费了自己不少的眼泪和欢笑，也消耗了别人不少的眼泪和欢笑。我匆匆地来，也将匆匆地去。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

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在那里找到。我不会像我的一个姑母或者嫂嫂，设法进到那所已经易了几个主人的公馆，对着园中的花树垂泪，慨叹着一个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种的树上的苦果，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没有跟着那些人走一条路，我当然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脚迹。几次走过这个地方，我所看见的还只是那四个字："长宜子孙"。

"长宜子孙"这四个字的年龄比我的不知大了多少。这也该是我祖父留下的东西罢。最近在家里我还读到他的遗嘱。他用空空两手造就了一份家业。到临死还周到地为儿孙安排了舒适的生活。他叮嘱后人保留着他修建的房屋和他辛苦地搜集起来的书画。但是儿孙们回答他的还是同样的字：分和卖。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聪明的老人还不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长宜子孙"，我恨不能削去这四个字！① 许多可爱的年轻生命被摧残了，许多有为的年轻心灵被囚禁了。许多人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憔悴地捱着日子。这就是"家"！"甜蜜的家"！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①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终于走进了这个"公馆"。"长宜子孙"四个字果然跟着"照壁"一起消失了。（一九五九年注）

于是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依旧是十八年前的那些人把我送到门口，这里面少了几个，也多了几个。还是和那次一样，看不见我姐姐的影子，那次是我没有等待她，这次是我找不到她的坟墓。一个叔父和一个堂兄弟到车站送我，十八年前他们也送过我一段路程。

我高兴地来，痛苦地去。汽车离站时我心里的确充满了留恋。但是清晨的微风，路上的尘土，马达的叫吼，车轮的滚动，和广大田野里一片盛开的菜子花，这一切驱散了我的离愁。我不顾同行者的劝告，把头伸到车窗外面，去呼吸广大天幕下的新鲜空气。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忽然在前面田野里一片绿的蚕豆和黄的菜花中间，我仿佛又看见了一线光，一个亮，这还是我常常看见的灯光。这不会是爱尔克的灯里照出来的，我那个可怜的姐姐已经死去了。这一定是我的心灵的灯，它永远给我指示我应该走的路。

1941年3月在重庆。

风

二十几年前，我羡慕“列子御风而行”[1]，我极愿腋下生出双翼，像一只鸷鸟自由地在天空飞翔。

现在我有时仍做着飞翔的梦，没有翅膀，我用两手鼓风。然而睁开眼睛，我还是郁闷地躺在床上，两只手十分疲倦，仿佛被绳子缚住似的。于是，我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

做孩子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伴都喜欢在大风中游戏。风吹起我们的衣襟，风吹动我们的衣袖。我们张着双手，顺着风势奔跑，仿佛身子轻了许多，就像给风吹在空中一般。当时自己觉得是在飞了。因此从小时候起我就喜欢风。

后来进学校读书，我和一个哥哥早晚要走相当远的路。雨天遇着风，我们就用伞跟风斗争。风要拿走我们的伞，我们不放松；风要留住我们的脚步，我们却往前走。跟风斗争，是一件颇为吃力的事。但是我们从这个也得到了乐趣，而且不用说，我们的斗争是得到胜利的。

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值得怀念的。

---

①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

可惜我不曾见过飓风。去年坐海船，为避飓风，船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天气闷热，海面平静，连风的影子也没有。船上的旗纹丝不动，后来听说飓风改道走了。

在海上，有风的时候，波浪不停地起伏，高起来像一座山，而且开满了白花。落下去又像一张大嘴，要吞食眼前的一切。轮船就在这一起一伏之间慢慢地前进。船身摇晃，上层的桅杆、绳梯之类，私语似地吱吱喳喳响个不停。这情景我是经历过的。

但是我没有见过轮船被风吹在海面飘浮，失却航路，船上一部分东西随着风沉入海底。我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今年我过了好些炎热的日子。有人说是奇热，有人说是闷热，总之是热。没有一点风声，没有一丝雨意。人发喘，狗吐舌头，连蝉声也像哑了似的，我窒息得快要闭气了。在这些时候我只有一个愿望：起一阵大风，或者下一阵大雨。

1941年7月9日在昆明。

云

傍晚我站在露台上看云。一片红霞挂在城墙边绿树枝叶间。还有两三紫色云片高高地涂抹在蓝天里。红霞淡去了。紫云还保持着它们的形状和颜色。这些云并没有可以吸引住眼光的美丽，它们就像小孩的信笔涂鸦。但是我把它们看了许久。

一片云使我的眼光停留一两小时，这样的事的确是有过的。我看云不是因为它们形状瑰丽、而且时常幻出各种奇异的景物，也不是因为看见云易消易生，而使我想起许多过去的事情。不是。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想乘云飞往太空。

我读过一个美国人①写的剧本《笨人》，后来也看过根据这个剧本摄制的影片。在电影里我看见黑天使乘着棉花似的白云在天空垂钓。这似乎是有趣的事。可是我没有这种兴致。我并不为这事情羡慕那些黑天使。倘使我能乘云飞往太空，我绝不会在空中垂钓，不管钓的是什么东西。

我想乘云，是愿意将身子站在那个有着各种颜色的、似烟似雾、似实似虚的东西上面，让它载着我往上飞，往上飞，摆脱

---

① 一个美国人：指美国剧作家玛·康乃里（1890—？）。

一切的羁绊，撇开种种的纠缠。我再看不见一切，除了蔚蓝的太空；我再听不见一切，除了浪涛似的风声。我要飞，一直飞往宇宙的尽头（其实这尽头是不存在的），或者我会挨近烈日而被灼死，使全身成为燃料，或者我会远离太阳而冻成石尸。甚至这个也是我所愿望的结局。我在永闭眼睛以前一定会感到痛快，而且是无比痛快的。

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幻想，我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仍然是一个戏①，而且我也看过由这个戏改编的电影。一个叫做立良(Liliom)的年轻的幻想家抛弃了妻儿自杀了。他飞上太空去受最后的裁判，在神面前他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要求——回到人间。几年以后一列火车穿过云霞，送他到地上，送他回到他那个小小的田庄去。他要求回家，只是想做一件帮助妻儿的事。他作为一个陌生人到了那个家，受了温情的款待，结果却打了自己的小孩一记耳光，像一个忘恩者似地走了。

我了解他那时的心情。

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幻想家么？已经飞向太空了，却又因为留恋人间而跌下来。为了帮助人而回到人间，却只做出损害人的事情空着手去了。

立良的刀仿佛就插在我的胸上。我觉得痛了。

我明白我是不能够飞向太空的。纵使我会往上飞，我也要从云端跌下来，薄薄的云片载不起我这颗留恋人间的心。

---

① 一个戏：指匈牙利剧作家费·莫纳尔(1874—1952)的剧本《立良》(一九二一年)。

现在我应该收起我的幻想了。我不愿走立良的寂寞、痛苦的路。

7月10日。

雷

灰暗的天空里忽然亮起一道"火闪"①，接着就是那好像要打碎万物似的一声霹雳，于是一切又落在宁静的状态中，等待着第二道闪电来划破长空，第二声响雷来打破郁闷。闪电一股亮似一股，雷声一次高过一次。

在夏天的傍晚，我常见到这样的景象。

小时候我怕听雷声；过了十岁我不再因响雷而颤栗；现在我爱听那一声好像要把人全身骨骼都要震脱节似的晴空霹雳。

算起来，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还是个四五岁的孩子，跟着父母住在广元县的衙门里。一天晚上，在三堂后面房里一张宽大的床上，我忽然被一声巨响惊醒了。房里没有别人，我睡眼朦胧中只见窗外一片火光，仿佛房屋就要倒塌下来似的。我恐怖地大声哭起来，直到女佣杨嫂进屋来安慰我，让我闭上眼睛，再进到梦里去。在这以后只要雷声一响，我就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会马上崩塌，好像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了。不过那时我的世界就只是一个衙门。

---

① 火闪（四川话）：即闪电。

这是我害怕雷声的开始。我的畏惧不断地增加。衙门里的女佣、听差们对这增加是有功劳的。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关于雷公的故事。有一个年老的女佣甚至告诉我：雷声一响，必震死一个人。所以每次听见轰轰雷声，我便担心着：不晓得又有谁受到处罚了。雷打死人的事在广元县就有过，我当时不能够知道它的原因，却相信别人眼见的事实。

年纪稍长，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雷公原来有着这样一个相貌：一张尖尖的鸟嘴，两只肉翅，蓝脸赤发，拿着铜锤满天飞。这知识是从小说《封神榜》里得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相貌，我倒想见见他。我的畏惧减少了些，因为我在《封神榜》中看出来雷震子毕竟带有人性，还是可以亲近的，虽然他有着那样奇怪的形状。

再后，我的眼睛睁大了。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谜。我不再害怕空虚的事物，也不再畏惧自然界的现象。跟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脚跟也站得比较稳了。即使立在天井里，望着一个响雷迎头劈下，我也不会改变脸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内。从此我开始骄傲：我已经到了连巨雷也打不倒的年龄了。

更后，雷声又给我带来一种新的感觉。每次听见那一声巨响，我便感到无比的畅快，仿佛潜伏在我全身的郁闷都给这一个霹雳震得无踪无影似的。等到它的余音消散，我抖抖身子，觉得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要是没有这样的巨声，我多半已经埋葬在窒息的空气中了。

去年一个昆明的夏夜里，我睡在某友人的宿舍中，两张床

对面安放。房间很小，开着一扇窗。我们喝了一点杂果酒，睡下来，觉得屋内闷热，空气停滞，只有蚊虫的嗡嗡声不断地在耳边吵闹。不知过了若干时候，我才昏沉沉地进入梦中。这睡眠是极不安适的，仿佛有一只大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胸上。我想挣扎，却又无力动弹。忽然一声霹雳（我从未听见过这样的响雷！）把我从梦中抓起来。的确我在床上跳了一下。我看见一股火光，我还没有睡醒，我当时有点惊恐，还以为一颗炸弹在屋顶爆炸了。那朋友也醒起来，他在唤我。我又听见荷拉荷拉的雨声。“好大的一个雷！”朋友惊叹地说。我应了一句，我觉得空气变得十分清凉，心里也非常爽快，我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今年在重庆听见一次春雷，是大炮一类的轰隆轰隆声。“春雷一声，蛰虫咸动。”我想起那些冬眠的小生命听见这声音便从长梦中醒起来，又开始一年的活动，觉得很高兴。我甚至想象着：它们中间有的怎样睁开小眼睛，转头四顾，怎样伸一个懒腰，打一个呵欠，然后一跳，就跳到地面上来。于是一下子地面上便布满了生命，就像小说《镜花缘》中的故事：因为女皇武则天的诏令，只有一夜的功夫，在浓冬里宫中百花齐放，锦绣似地装饰了整个园子。这的确是很有趣的。

7月16日。

雨

窗外露台上正摊开一片阳光，我抬起头还可以看见屋瓦上的一段蔚蓝天。好些日子没有见到这样晴朗的天气了。早晨我站在露台上昂头接受最初的阳光，我觉得我的身子一下就变得十分轻快似的。我想起了那个意大利朋友的故事。

路易居·发布里在几年前病逝的时候，不过四十几岁。他是意大利的亡命者，也是独裁者莫索里尼的不能和解的敌人。他想不到他没有看见自由的意大利，在那样轻的年纪，就永闭了眼睛。一九二七年春天在那个多雨的巴黎城里，某一个早上阳光照进了他的房间，他特别高兴地指着阳光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可喜的事。我了解他的心情，他是南欧的人，是从阳光常照的意大利来的。见到在巴黎的春天里少见的日光，他又想起故乡的蓝天了。他为着自由舍弃了蓝天；他为着自由贡献了一生的精力。可是自由和蓝天两样，他都没有能够再见。

我也像发布里那样地热爱阳光。但有时我也酷爱阴雨。十几年来，不打伞在雨下走路，这样的事在我不知有过多少次。就是在一九二七年，当发布里抱怨巴黎缺少阳光的时候，我还时常冒着微雨，在黄昏、在夜晚走到国葬院前面卢骚的像脚下，向那个被称为“十八世纪世界的良心”的巨人吐露一个年

轻异邦人的痛苦的胸怀。

我有一个应当说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的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住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为了浇熄这心火，我常常光着头走入雨湿的街道，让冰凉的雨洗我的烧脸。

水滴从头发间沿着我的脸颊流下来，雨点弄污了我的眼镜片。我的衣服渐渐地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模糊的雨景，模糊……白茫茫的一片……我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来走去。转弯时我也不注意我走进了什么街。我的脑子在想别的事情。我的脚认识路。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马路，我不留心街上的人和物，但是我没有被车撞伤，也不曾跌倒在地上。我脸上的眼睛看不见现实世界的时候，我的脚上却睁开了一双更亮的眼睛。我常常走了一个钟点，又走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我回到家里，样子很狼狈。可是心里却爽快多了。仿佛心上积满的尘垢都给一阵大雨洗干净了似的。

我知道俄国人有过“借酒淹愁”的习惯。① 我们的前辈也常说“借酒浇愁”。如今我却在“借雨洗愁”了。

我爱雨不是没有原因的。

7月20日。

① “俄国人的借酒淹愁的毛病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坏。昏沉的睡眠究竟比烦恼的失眠好……”(见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五部)

日*

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飞蛾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

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①

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没有了光和热，这人间不是会成为黑暗的寒冷世界么？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7月21日。

---

* 本篇及以下《月》、《星》二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宇宙风》第一二三期。总题为《梦痕》。

① 中国神话："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旸谷，渴死。"（见《山海经》）

月

每次对着长空的一轮皓月，我会想：在这时候某某人也在凭栏望月么？

圆月有如一面明镜，高悬在蓝空。我们的面影都该留在镜里罢，这镜里一定有某某人的影子。

寒夜对镜，只觉冷光扑面。面对凉月，我也有这感觉。

在海上、山间、园内、街中，有时在静夜里一个人立在都市的高高露台上，我望着明月，总感到寒光冷气侵入我的身子。冬季的深夜，立在小小庭院中望见落了霜的地上的月色，觉得自己衣服上也积了很厚的霜似的。

的确，月光冷得很。我知道死了的星球是不会发出热力的。月的光是死的光。

但是为什么还有姮娥① 奔月的传说呢？难道那个服了不死之药的美女便可以使这已死的星球再生么？或者她在那一面明镜中看见了什么人的面影罢。

7月22日。

---

① 姮娥：即嫦娥。中国神话："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宫。"（见《淮南子》）

星

在一本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里，我无意间见到这样的句子：

> 星星，美丽的星星，你们是滚在无边的空间中，我也一样，我了解你们……是，我了解你们……我是一个人……一个能感觉的人……一个痛苦的人……星星，美丽的星星……①

我明白这个比利时某车站小雇员的哀诉的心情。好些人都这样地对蓝空的星群讲过话。他们都是人世间的不幸者。星星永远给他们以无上的安慰。

在上海一个小小舞台上，我看见了屠格涅夫笔下的德国音乐家老伦蒙。② 他或者坐在钢琴前面，将最高贵的感情寄托在音乐中，呈献给一个人；或者立在蓝天底下，摇动他那白发飘飘的头，用赞叹的调子说着："你这美丽的星星，你这纯洁的星星。"望着蓝空里眼瞳似地闪烁着的无数星子，他的眼睛润

---

① 引自于尔拜·克安司的《红石竹花》(见戴望舒选译的《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

② 一九四〇年上海的苏联侨民根据尼·伊·梭包里斯奇科夫一沙马林一九一三年的改编本《贵族之家》演出。

湿了。

我了解这个老音乐家的眼泪，这应该是灌溉灵魂的春雨罢。

在我的房间外面，有一段没有被屋瓦遮掩的蓝天。我抬起头可以望见嵌在天幕上的几颗明星。我常常出神地凝视着那些美丽的星星。它们像一个人的眼睛，带着深深的关心望着我，从不厌倦。这些眼睛每一霎动，就像赐与我一次祝福。

在我的天空里星星是不会坠落的。想到这，我的眼睛也润湿了。

7月22日。

狗

小时候我害怕狗。记得有一回在新年里，我到二伯父家去玩。在他那个花园内，一条大黑狗追赶我，跑过几块花圃。后来我上了洋楼，才躲过这一场灾难，没有让狗嘴咬坏我的腿。

以后见着狗，我总是逃，它也总是追，而且屡屡望着我的影子狺狺狂吠。我愈怕，狗愈凶。

怕狗成了我的一种病。

我渐渐地长大起来。有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忽然觉得怕狗是很可耻的事情。看见狗我便站住，不再逃避。

我站住，狗也就站住。它望着我狂吠，它张大嘴，它做出要扑过来的样子。但是它并不朝着我前进一步。

它用怒目看我，我便也用怒目看它。它始终保持着我和它中间的距离。

这样地过了一阵子，我便转身走了。狗立刻追上来。

我回过头。狗马上站住了。它望着我恶叫，却不敢朝我扑过来。

“你的本事不过这一点点，”我这样想着，觉得胆子更大了。我用轻蔑的眼光看它，我顿脚，我对它吐出骂语。

它后退两步，这次倒是它露出了害怕的表情。它仍然汪汪地叫，可是叫声却不像先前那样地“恶”了。

我讨厌这种纠缠不清的叫声。我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子，就对准狗打过去。

石子打在狗的身上，狗哀叫一声，似乎什么地方痛了。它马上掉转身子夹着尾巴就跑，并不等我的第二块石子落到它的头上。

我望着逃去了的狗影，轻蔑地冷笑两声。

从此狗碰到我的石子就逃。

7月24日。

猪

人们爱说“猪狗”，其实“猪”和“狗”是不能并提的。也有一些人喜欢狗，却没有一个人爱过猪，虽然有不少人天天在吃猪肉。

最近在重庆沙坪坝，我常常看见一群一群的白猪被人赶着走过正街。这些猪大概是走向屠宰场去的，它们自己或许明白这件事情也未可知，我这个猜想是从它们赖在路上不肯前进的举动上来的。

自然也有人说，猪不肯走路，是因为它们身躯过于肥胖，走路不便，或者只是因为猪是“懒”动物。他们的说法也许有道理。不过我每次看见赶猪人拿着竹片打在猪的背上，听见猪的怪叫声，又看见白毛上绽出的一条一条的血痕，我总要想，这些猪一定不愿意到刑场去罢。

我们有一句俗话：“蝼蚁尚且贪生，”那么即便是一条猪，它也一样知道爱惜生命罢。

可是世界上却少有不被宰割的猪。猪似乎就是为着做人的食料而生的。猪被人养着，结果是被人吃掉。有个诗人①

① 诗人：指陆志韦（1894—1970）。

曾经感叹地写过：

看见猪，就想吃，
蠢哉猪也！

据诗人看来，猪被吃，是它自己的错。我也明白诗人的意思。的确要是猪的肉不肥美，绝不会有人看见猪肉就流口涎。

但是若说看见猪就想吃，这话也有问题。我有几次走过人们养猪的地方，看见好些猪拥挤在猪圈里，一身灰黑色，头上背上全是脏水，有的躺在地上，有的拿鼻子和嘴到处碰来碰去，哼着不成腔调的怪声音。我当时即使肚饿，我也不会想吃它们。看见猪，就厌恶，这样说，倒更近于真实。如果我们再想到猪是人的食料这一事实，那么看见猪，起怜悯心也是可能的。

我吃猪肉，但是我厌恶猪。生活在污秽里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吃着睡着，睡着吃着，把自己养肥，以便给人们作食料。这样的东西我无论如何是不能爱的。

据说牛进屠宰场会掉眼泪，而且要向屠夫双脚下跪。也有人为了这个就不肯吃牛肉。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不过我从没有听见人说起猪流泪的话。那么猪大概是糊里糊涂地被杀掉、吃掉的罢。我说猪不肯走向刑场，恐怕只是我个人的猜想。

在桂林城里我见过人们抬着猪在街上走。看那被抬着的猪的样子，似乎它很舒服，比那些被赶被打的猪舒服得多。被抬着的猪若能思想，它也许会说出它比别的同伴幸福的话。

不过在我们人看来，无论安适地被抬着也好，或者痛苦地被打着也好，押送刑场被宰杀，总是一样，后来做成菜被人们吃进肚里也是一样。

做了猪除去被吃而外，再没有别的更好的命运。

那么猪为什么还要吃着，睡着，养肥自己，准备给人们饱餐一顿呢？

我又想起了诗人的“蠢哉”两个字。

7月25日。

虎

我不曾走入深山，见到活泼跳跃的猛虎。但是我听见过不少关于虎的故事。

在兽类中我最爱虎；在虎的故事中我最爱下面的一个：

深山中有一所古庙，几个和尚在那里过着单调的修行生活。同他们做朋友的，除了有时上山来的少数乡下人外，就是几只猛虎。虎不惊扰僧人，却替他们守护庙宇。作为报酬，和尚把一些可吃的东西放在庙门前。每天傍晚，夕阳染红小半个天空，虎们成群地走到庙门口，吃了东西，跳跃而去。庙门大开，僧人安然在庙内做他们的日课，也没有谁出去看虎怎样吃东西，即使偶尔有一二和尚立在门前，虎们也视为平常的事情，把他们看作熟人，不去惊动，却斯斯文文地吃完走开。如果看不见僧人，虎们就发出几声长啸，随着几阵风飞腾而去。

可惜我不能走到这座深山，去和猛虎为友。只有偶尔在梦里，我才见到这样可爱的动物。在动物园里看见的则是被囚在“狭的笼”[①] 中摇尾乞怜的驯兽了。

其实说“驯兽”，也不恰当。甚至在虎圈中，午睡醒来，昂

---

① “狭的笼”：指虎圈，见爱罗先珂（1889—1952）的童话《狭的笼》（鲁迅译）。

首一呼，还能使猿猴颤栗。万兽之王的这种余威，我们也还可以在作了槛内囚徒的虎身上看出来。倘使放它出柙，它仍会奔回深山，重做山林的霸主。

我记起一件事情：三十一年前，父亲在广元做县官。有天晚上，一个本地猎户忽然送来一只死虎，他带着一脸惶恐的表情对我父亲说，他入山打猎，只想猎到狼、狐、豺、狗，却不想误杀了万兽之王。他绝不是存心打虎的。他不敢冒犯虎威，怕虎对他报仇，但是他又不能使枉死的虎复活，因此才把死虎带来献给“父母官”，以为可以减轻他的罪过。父亲给了猎人若干钱，便接受了这个礼物。死虎在衙门里躺了一天，才被剥了皮肢解了。后来父亲房内多了一张虎皮椅垫，而且常常有人到我们家里要虎骨粉去泡酒当药吃。

我们一家人带着虎的头骨回到成都。头骨放在桌上，有时我眼睛看花了，会看出一个活的虎头来。不过虎骨总是锁在柜子里，等着有人来要药时，父亲才叫人拿出它来磨粉。最后整个头都变成粉末四处散开了。

经过三十年的长岁月，人应该忘记了许多事情。但是到今天我还记得虎头骨的形状，和猎人说话时的惶恐表情。如果叫我把那个猎人的面容描写一下，我想用一句话：他好像做过了什么亵渎神明的事情似的。我还要补充说：他说话时不大敢看死虎，他的眼光偶尔挨到它，他就要变脸色。

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的确是值得我们热爱的。

7月26日。

龙*

我常常做梦。无月无星的黑夜里我的梦最多。有一次我梦见了龙。

我走入深山大泽，仅有一根手杖做我的护身武器，我用它披荆棘，打豺狼，它还帮助我登高山，踏泥沼。我脚穿草鞋，可以走过水面而不沉溺。

在一片大的泥沼中我看见一个怪物，头上有角，唇上有髭，两眼圆睁，红亮亮像两个灯笼。身子完全陷在泥中，只有这个比人头大过两三倍的头颅浮出污泥之上。

我走近泥沼，用惊奇的眼光看这个怪物。它忽然口吐人言，阻止我前进：

"你是什么？要去什么地方？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是一个无名者。我寻求一样东西。我只知道披开荆棘，找寻我的道路，"我昂然回答，对着怪物我不需要礼貌。

"你不能前进，前面有火焰山，喷火数十里，伤人无算。"

"我不怕火。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甘愿在火中走过。"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自由中国》新二卷第一、二期合刊。

"你仍不能前进，前面有大海，没有船只载你渡过白茫茫一片海水。"

"我不怕水，我有草鞋可以走过水面。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甚至溺死，我也毫无怨言。"

"你仍不能前进，前面有猛兽食人。"

"我有手杖可以打击猛兽。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愿与猛兽搏斗。"

怪物的两只灯笼眼射出火光，从鼻孔中突然伸出两根长的触须，口大张开，露出一嘴钢似的亮牙。它大叫一声，使得附近的树木马上落下大堆绿叶，泥水也立刻沸腾起泡。

"你这顽固的人，你究竟追求什么东西？"它厉声问道。

"我追求生命。"

"生命？你不是已经有了生命？"

"我要的是丰富的、充实的生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它摇摇头。

"我活着不能够做一件有益的事情。我成天空谈理想，却束手看着别人受苦。我不能给饥饿的人一点饮食，给受冻的人一件衣服；我不能揩干哭泣的人脸上的眼泪。我吃着，谈着，睡着，在无聊的空闲中浪费我的光阴——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说是有生命？在我，若得不到丰富的、充实的生命，那么活着与死亡又有什么区别？"

怪物想了想，仍然摇头说："我怕你会永远得不到你所追求的东西。或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在它那张难看的脸上见到一丝同情了。我说：

"不会没有，我在书上见过。"

"你这傻子，你居然相信书?"

"我相信，因为书上写得明白，讲得有道理。"

怪物叹息地摇摆着头："你这顽强的人，我劝你立刻回头走。你不知道前面路上还有些什么东西等着你。"

"我知道，但是我还要往前走。"

"你应该仔细想一下。"

"你为什么这样不惮烦地阻止我?我同你并不相识，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告诉我，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已经有很久没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了，我自己也差不多忘记了它。现在我告诉你：我是龙，我就是龙。"

我吃了一惊。我望着那张古怪的脸。

"你是龙，怎么会躺在泥沼中?据我所知，龙是水中之王，应该住在大海里。你为什么而且不能乘雷上天?"我疑惑地问道。这时天空响起一声巨雷，因此我才有后一句话。我看看它的身子，黄黑色的污泥盖住了它的胸腹和尾巴。泥水沸腾似地在发泡，从水面不断地冒起来难闻的臭气。

龙沉默着，它似乎努力在移动身子。但是身子被污泥粘着，盖着，压着，不能够动弹。它张开嘴哀叫一声，两颗大的泪珠从眼里掉下来。

它哭了!我惶恐地望着它的头，我想，这和我在图画上看见的龙头完全不像，它一定对我说了假话。它不是龙。

"我也是为了追求丰富的生命才到这里来的，"它止了泪开始叙述它的故事。它的话是我完全料不到的。这对我是多

大的惊奇！

“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在无聊的空闲中浪费我的光阴。我不愿意在别的水族的痛苦上面安放我的幸福宝座，我才抛弃龙宫，离开大海，去追求你所说的那个丰富的、充实的生命。我不愿意活着只为自己，我立志要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我飞上天空，我又不愿终日与那些飘浮变化的云彩为伍，也不愿高居在别的水族之上。我便落下地来。我要访遍深山大泽，去追寻我在梦里见到的东西。在梦中我的确见过充实的、有光彩的生命。结果我却落在污泥里，不能自拔。”它闭了嘴，从灯笼眼里流出几滴泪珠，颜色鲜红，跟血一样。

“你看，现在污泥粘住了我的身子，我要动一下也不能够。我过不了这种日子，我宁愿死！”它回过头去看它的身子，但是眼前仍然只是那一片污泥。它痛苦地哀叫一声，血一样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它说：“可是我不能死，而且我也不应该死。我躺在这里已经过了多少万年了。”

我的心因同情而痛苦，因恐惧而猛跳。多少万年！这样长的岁月！它怎么能够熬过这么些日子？我打了一个冷噤。但是我还能够勉强地再问它一句：“你是怎样陷到污泥里来的？”

“你不用问我这个。你自己不久就会知道，你这顽固的年轻人。”它忽然用怜悯的眼光望我，好像它已经预料着，不幸的遭遇就会降临到我身上来似的。

我没有回答。它又说：“我想打破上帝定下的秩序，我想改变上帝的安排，我去追求上帝不给我们的东西，我要创造一

个新的条件。所以我受到上帝的惩罚。为了追求充实的生命，我飞过火焰山，我斗过猛兽，我抛弃了水中之王的尊荣，历尽了千辛万难。但是我终于逃不掉上帝的掌握，被打落在污泥里，受着日晒、雨淋、风吹、雷打。我的头、我的脸都变了模样，我成了一个怪物。只是我的心还是从前的那一颗，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那么，你为什么阻止我前进，不让我去追寻生命？”

“顽固的人，我不愿意你也得着恶运。你是人，你不能活到万年。你会死，你会很快地死去，你甚至会毫无所获而失掉你现在有的一切。”

“我不怕死。得不到丰富的生命我宁愿死去。我不能够像你这样，居然在污泥中熬了多少万年。我奇怪像你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年轻人，你不明白。我要活，我要长久活下去。我还盼望着总有那么一天，我可以从污泥中拔出我的身子，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追寻丰富的、充实的生命。我的心在跳动，我的意志就不会消灭。我的追求也将继续下去，直到我的志愿完成。”

它说着，泪水早已干了，脸上也没有了痛苦的表情，如今有的却是勇敢和兴奋。它还带着信心似地问我一句：“你现在还要往前面走？”

“我要走，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我坚决地甚至热情地回答。

龙忽然哈哈地笑起来。它的笑声还未停止，一个晴空霹

雳突然降下，把四周变成漆黑。我伸出手也看不见五根指头。就在这样的黑暗中，我听见一声巨响自下冲上天空。泥水跟着响声四溅。我觉得我站的土地在摇动了。我的头发昏。

天渐渐地亮开来。我的眼前异常明亮。泥沼没有了。我前面横着一片草原，新绿中点缀了红白色的花朵。我仰头望天，蔚蓝色的天幕上隐约地现出淡墨色的龙影，一身鳞甲还是乌亮乌亮的。

7月28日。

死　去*

有一夜我梦见自己死去。

我直伸伸地躺在床上。我不动，也不讲话。我看不见什么。我只听见一个人在我耳边说："他死了，一句话也不说就死了。"

又有人说："他本来可以不死，可惜他不听别人劝他的话，他任性，他拚命摧残自己。"

第三个人说："死了就算了，反正像他那样的人多得很，少了他，谁都没有损失。"

第四个人说："现在盖棺论定，我那篇研究文章可以付印了。一句话说完，他的思想错误，他的作品浅薄。"

还有第五第六的人讲话，可是吱吱喳喳，我听不清楚。

"死了也还不能清静，"我这样一想，心里很不快活。不过我还是不动，也不讲话。

这些吱吱喳喳终于消失了。我得到片刻安静。过后我又听见一阵低微的哭声。我认得这是熟人的声音。我想招呼他们，说一两句告别的话。可是我不能动，也不能发言。我觉得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自由中国》新一卷第四期。

很疲倦。

过了一些时候，人们把我放进棺材了。我觉得闷，不过我不能动，也不想动。我静静地躺着。我知道棺材是在被人抬到墓地去。棺材慢慢动着，动着。后来就停下来了。

这一定是什么公墓罢，我刚这样一想，就听见有人在发言。我听不出他们在讲什么。后来他们显然激烈地争论起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地方争吵。他们好像是谈论到我才争辩起来的。

我默默地躺在棺材里，我想：敌与友大概都到场了罢。

闹声停止了。我听见棺材放在洞穴里面。土落在棺上，并且“一拥而入”似地一下就把洞穴填满了。

我想，从此什么都完了。我不久便会失去知觉进入死的酣睡。

然而我还听见声音！谈话声和脚步声仍还是这么清晰！我知道一定是棺盖薄，埋葬不深。

从这天起我便寂寞的睡在坟墓中。我听见风声雨声：风吹动树叶发出叹息；雨穿过泥土滴在棺上。我也听见哭声，有人来哭过我。以后在一个短时期中我四周很静，没有人来，似乎谁都忘记了我。

我不能动，我不能讲话。但是我还有知觉。我知道在我上面春天来了，我听见小鸟在树上歌唱，我闻着墓地的花香。虽然有点寂寞，我却觉得相当舒适。

可是不久又有人到我坟前来了。起初听见的是熟人的哭声，他们原来还没有忘记我！后来我就听见吱吱喳喳，似乎又

有一些人在我墓前辩论，我仍还听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

再后又换了一种声音，这仍是吱吱喳喳，可是我却能听见一些字句来。说话的是我的仇敌。他们和我中间虽然隔了一个坟墓，但他们却没有忘记我，而且也不肯忘记我。

“你现在承认我批评你的那些话罢：你写的东西全是有毒的。”

“你没有给人们指一条路，你的思想永不能给人们指一条出路。”

“你的出路就是坟墓，哈，哈，你自己现在有了出路了。”

“你不回答，你不做声，你一定承认自己的错误，你现在一定在忏悔罢。”

那些人每天来，或者隔一天来，或者隔四五天来，来了总要说，说的便是这类话。他们还怕我埋在墓里听不清楚，每次总用什么东西把我墓上的泥土挖去一些，直到后来某一次棺盖见了天，他们便举行大会，全体围绕棺盖站立，来一个集体唾骂。

我安然睡在棺中。我听见骂语和唾液落在棺上，铿然有声，我没有愤怒。我坦然微笑。

骂语和唾液愈来愈多，骤雨似地打着棺盖。它们发出金属的声音，有如刀剑。但是我睡在棺中仍还坦然微笑。对这吵闹我以沉默报答。

我听见斧子声在棺盖上响，似乎他们在演劈棺的戏。

“我死了还不肯让我安静么？你们未必要同我纠缠到坟墓里？”这样一想，我有点不高兴了。

哈，哈，哈，他们在上面大笑起来。斧子声响得更勤。我听见棺盖被砍破的声音。

“难道你们还要来一个鞭尸的表演么？”我想着，觉得愤恨把我的心烧热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一线光亮。同时一个人带笑地得意说：“好了，现在可以把我的研究文章读给他听了。”

响应他的是一阵大笑。接着是一阵吱吱喳喳。棺盖被砍碎，我的身子暴露在阳光下面。

“怎么，还没有腐烂！脸也在，嘴也在！”又一个人的惊愕的声音。

“怎么，他还有眼睛？看，他的眼睛睁开了！”另一个人叫道。

“快吐口沫！快吐口沫！”那个准备来朗读文章的人说，他第一个吐了一口痰在我脸上。

一股难闻的臭气扑进我鼻里。我立刻发了恶心。我忍耐不住，张开嘴，“哇”的一声，就坐起来。

“有鬼！有鬼！”那些人张皇地叫起来，马上鸟兽似地逃散了。他们一面跑，一面嚷着“救命”。有的跌在地上又爬起来；有的被荆棘绊住腿，把衣服撕破了。

于是这周围再没有吱吱喳喳。也看不见谁的影子。棺材四周堆了一些写满小字的原稿纸。我想，这些大概就是研究文章罢。可惜我没有机会听见作者们的朗读。

我站起来，走出棺材。立在坟墓堆中，我看看天，看看四周，又看看地。小鸟在小桃树上唱歌，花瓣随着风飘下树木。

天空是蔚蓝色，没有一小片白云。

我张开口，居然吐出声音和话语。我能看，能动，能讲话。我还活着。我没有死！

一阵风吹过，这不是微风，花瓣纷纷落下，空中飘起一些原稿纸，有一张飘到我手边，我抓住它，拿起来一看，我看到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浅薄，落后，不通，错误。

这应该是他们的胜利罢。我想着，不觉坦然微笑了。我把手一松，原稿纸又落回在地上。再一阵风吹过，它飞腾起来。

我走出墓地还回头去看那里，原稿纸仍在空中飘舞，仿佛是一些未烧过的纸钱。

7月30日。

伤　害*

一个初冬的午后，在泸县城里，一条被燃烧弹毁了的街旁，我看见一个黑脸小乞丐寂寞地立在面食担子前，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两个肥胖孩子正在得意地把可口的食物往嘴里送。

我穿着秋大衣，刚在船上吃饱饭，闲适地散步到街上来。

但是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赤着脚，露着腿，身上只披一块破布，紧紧包住他那瘦骨的一身黑皮在破布的洞孔下发亮。他的眼睛无光，两颊深陷，嘴唇干瘪得可怕，两只干瘦得像鸡爪的手无力地捧着一个破碗，压在胸前。

他没有温暖，没有饱足。他不讲话，也不笑。黑瘦的脸上涂着寂寞的颜色。

我不愿多看他，便匆匆走过他的身旁。但是我又回转来，因为我也不愿意就这样地离开他。

这样地一来一往，我在他的身边走过四五次。他不抬头看我一眼，好像他对这类事情并不感到惊奇。我注意地看他，才知道他的眼光始终停留在面食担子上。但甚至这眼光也还是无力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现代文艺》第四卷第一期。

我站在他面前，不说什么，递了一张角票给他。

他默默地接过角票，把眼光从担子上掉开。他茫然地看看我，没有一点表情，仍然不开口。于是他埋下眼睛，移动一下身子，又把脸掉向面担。两个胖小孩还在那里吃“连肝肉”、“心肺”一类的东西，口里“嘘嘘”作声。

我想揩去他脸上的寂寞的颜色，便向他问两句话。他没有理我。他甚至不掉过头来看我。

我想，也许他没有听见我的话，也许我的话使他不高兴。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家？有没有亲人？

我不再对他说话，我默默地离开了他。我转弯时还回头去看那个面担，黑脸小乞丐立在担子前，畏怯地望着卖面人，右手伸到嘴边，一根手指头衔在口里。两个肥胖小孩却站到旁边一个卖糖食的摊子前面去了。

七天后我再到泸县城里，又经过那条街。仍然是前次看见的那样的街景。面食担子仍然放在原处。两个肥小孩还是同样得意地在吃东西。黑脸小乞丐仿佛也就站在一星期前立过的那个地方，用了同样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似乎并没有在别处耽搁了一个星期。

我走到黑脸小孩面前，又默默地递了一张角票到他的手里。他也默默地接着，而且也茫然地看我一眼，没有表情，也没有动作。以后他仍旧把脸掉向面担。

我们两个都重复地做着前次的动作。我甚至没有忘记问他：你有没有一个家？有没有一个亲人？

这次他仍旧不回答我，不过他却仰起头看了我一两分钟。

我也埋下眼睛去看他的黑脸。茫然的表情消失了。他圆圆地睁着那对血红的眼睛，泪水像线一样地从两只眼角流下来。他把嘴一动，没有发出声音，就掉转身子，用劲地一跑。

我在后面唤他，要他站住。他不听我的话。我应该叫他的名字，可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姓名。我站在面担前，希望能够看见他回来。然而他的瘦小身子像一股风似地飘走了，并没有一点踪迹。

我等了一会儿，又走到旁边那个在废墟上建造起来的临时广场上，跟着一些本地人听一个老烟客讲明太祖创业的故事。那个老烟客指手划脚地讲得津津有味。众人都笑，我却不作声，我的心并不在这里。

过了半点多钟，这附近还不见那个黑脸小孩的影子。我便到城里各处走了一转，后来再经过这个地方，我想，他应该回来了，但是我仍旧看不到他。那两个肥胖小孩还在面担前吃东西。

我感到疲倦了。我不知道黑脸小孩住在什么地方，或者他是否就有住处。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再到这里来。看见阳光离开了街市，我觉得疲倦增加了，我想回到船上去休息。

最后我终于拖着疲倦的身子离开了泸县。那一段路是不容易走的，我的心很沉重。我想到那个黑脸小孩和他的突然跑开，我知道自己犯了过失了。

我为什么两次拿那问话去折磨他呢？这原是明显的事实：要是他有家，有亲人，他还会带着冻和饿寂寞地立在街旁么？

他还会像一棵枯草、一只病犬那样，木然地、无力地捱着日子么？

他也许不知道家和亲人的意义。但是他自己和那两个胖小孩间的差别，他应该了解罢。从这差别上他也许可以明白家和亲人的意义。那么，我大大地伤害了他，这也是很明显的事实了。

今天，八个月以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个黑脸小孩的面貌和他两只眼角的泪水。他一定早忘记了我。但是我始终忘不掉他。我想请求他那小小的心灵宽恕我。然而我这些话能够达到他的耳边么？他会有机会看到我的文章么？

我不知不觉间在那个时候犯了不可补偿的过失了。

8月1日。

祝　　福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从北方寄来一封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写下地址，信里只有一些简单的字句，大意是：一个北方的孩子给你送来“祝福”。

这是三年前的事了。每次我的眼前起一阵雾，或者我的心发痛的时候，我就想起那封短信。后来我便觉得力量渐渐地恢复了。

我不是宗教的信奉者，神的祝福不能够控制我的脑筋。我不是修行人，不会祈求来世的幸运。我不信神，便不想进天堂。我不信鬼，故不怕入地狱。

但是一个孩子的单纯的话却能镇定我的迷乱，鼓舞我的精神。他用了带宗教味的“祝福”这个名词，他是有道理的。这心与心的相通，心对心的关切，与“利害”无关，和“虚伪”隔绝。这个孩子不知道我的家世，不认识我的面容。他看见的只是我的心。他用他的心来接触我的心，他的心了解我的语言。作为反应，他写下他的心的语言寄给我。

那个孩子的真诚的心的颤动越过了数千里道路，越过了数不尽的美丽的河山，达到我双手可以接触的地方。我的手拿着那张信纸，我的眼睛就仿佛看见那一颗没有一点尘垢的

鲜红的“赤子之心”。这颗心是热的，它的热暖了我的心；这颗心是活鲜鲜地跳动着的，它的勃勃的生气振奋了我的精神。

从那个孩子的信上我的确得到了“祝福”，而且这“祝福”的效力还是那些神的祝福、宗教的祝福所不能及的。

我接受了孩子的祝福，让我在“赤子之心”前低首膜拜。

8月2日。

撇　　弃*

凉夜，我一个人走在雨湿的街心，街灯的微光使我眼前现出一片昏黄。两个老妇的脚声跟着背影远远地消失了。我的前面是阴暗，又似乎是空虚。

我在找寻炫目的光辉。但是四周只有几点垂死的灯光。

我的脚不感到疲倦。我不记得我已经走了若干时候，也不知道还要走若干路程。

一个影子在后面紧紧跟着我。他走路没有声音。我好像听见他在我的耳边低声讲话。

我回过头，看不见一个人，等我再往前走，我又听见有人在我后面说话。

“谁？”我问道。

“我，”这是一个熟习的声音。

“你是谁，为什么紧紧跟着我？”

“我是你的影子。我从来就跟在你后面。”

“那么请你出来，让我见你一面。我不要听你那些叽哩咕噜。”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萧萧》半月刊第一期。

他不作声，却仍然跟着我走。

“我说，请你出来，让我见见你。你为什么老躲在黑暗里面？”我不能忍耐地再说一次。

“我不能出来，”他嗫嚅地说；“我不能离开黑暗。黑暗可以作我的掩护。”

“那么你可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我突然问道。

“我不知道，不过我要跟着你。”

“我告诉你，我要去寻找光明。”

我似乎听见一声“啊哟”，过了半晌，耳语又响起来：

“你不会找到光明。你还不如回头走别的路。”

“我一定要往前走。见不到光明，我就不停脚步。”

“但是你知道这地方离光明还有若干路程？你这一生又还可以走若干时候？”

“我不管这些事。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个地方去找光明。”

“你会什么也看不见，就疲倦地死在中途。没有人埋葬你，却让你暴尸荒野，给兀鹰做食料。”

“我宁愿让兀鹰啄我的肉，却不想拿它们去喂狗。我宁愿疲劳地死在荒野，却不想安乐地躺在温暖的家中。”

“所有的人都会嘲笑你；谁都会忘记你。你口渴，没有人递给你一杯水。你倒下去，没有人搀扶你一把。你呻吟，便有人向你投掷石子。一直到死，你得不到一点点同情。”

“我为什么要别人的同情？难道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路？”

"那么你不怕寂寞？你不知道前面的路便是用寂寞铺砌的？"

"我知道。我的脚踏在寂寞上面，我的步子就显得更有力。寂寞会成为我的忠实伴侣。"

"你这个傻子，即使你得到光明，你拿它来做什么用？你能将它当饭吃，当衣穿？"影子居然哂笑起来。

我昂然回答："我若得到光明，就把它分给众人，让光辉普照世界。若得不着光明，我愿意一个人寂寞地死在中途。"

"但是为你自己，你留什么给你自己？"

"如果光明普照世界，我也可以分到一线光——"

"然而要是黑暗统治一切呢？"它打岔地问我。

"那么我就努力跟黑暗斗争，我要打破黑暗。"

"打破黑暗？你有多大的力量？"它哈哈笑起来。"我劝你不要过分看重自己。"

"不管我有没有力量，但是我有志愿，我有决心。我做不到，不要紧。别的人可以做到。"

"你这个疯子，你这个空想家。你不要安乐，你不要荣誉。你把寂寞当作宝贝，还要它做你的永久伴侣。你还要追求光明，打破黑暗，却不想，没有黑暗，我怎么能够生存？"它冷笑，它哂笑，它大笑。"算了罢，我也该死心了。老是跟着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不甘心做一个傻瓜，自白毁掉我自己。从这时候起，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让你去拥抱寂寞，任你去爱抚死亡。我会看到兀鹰啄尽你的肉，马蹄踏碎你的骨。"

带着几声轻蔑的大笑，我的影子离开了我。它走路没有

声音，我不知它去向何处。我只看见一个黑影在我的眼角一晃。

于是我的耳边寂然了。

在我的眼前，那昏黄淡到成为一片灰黑。前面展开一条长的路。路是阴暗的，我抬起头用力向前望去，我要看透那阴暗。好像有一线光在远处摇晃，但亮光离这里一定很远。

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慢慢地在寂静中移动脚步。我不记得我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也不知道还要走若干时候。

8月4日。

醉*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你只管摇着头这样否认，但是你的脸、你的眼睛、你的话语、你的举动无一样不告诉我们：你是醉了。

有的人醉后伤心哭泣，有的人酒后胡言乱语。我醉了时便捧着沉重的头，说不出一句话。你呢？

你永远是你那个老样子：你对我们披肝沥胆地讲个不停。的确你在挖你的心，像一个友人所说的。

酒使你改变了许多。你平时被朋友们称作"沉默寡言的人"。

我们都说你醉，你自己说没有醉。其实你酒后不是比不醉时更坦白、更真诚、更清楚么？酒后的你不是更能够表现你那优美的性格么？

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热烈的叙说和自白则使人们互相接近。热情是有吸力的，酒点燃了你的热情，你的热情又温暖了我们的心。

酒从没有乱过你的本性，也没有麻痹过你的神经。酒却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新蜀报·蜀道》。发表时题为《醉——给一个朋友》。

像一阵光常常照亮你全个身子、全个性格。你的醉不是头脑昏钝，却是精神昂扬。

在这里，暮夏的雨夜已使人感到凉意了。我很想看看你那醉脸，听听你那火热的话呢！

8月2日。

生*

是啊，老头儿，我已经生活过了，
要是没有那幸福的三天——
我的生活比起你那衰弱的老年
更是多么不幸，多么可怜。①

读着莱蒙托夫的诗句，我不觉想起了你。你应该比高加索少年木奇里更懂得生活。

叫做木奇里的童僧逃出寺院，追求自由，在树林里漫游了三天，迷了路，碰到了豹子，跟它搏斗，受了重伤，终于让寺院里的僧人找到，死在寺院里面。

然而他毕竟过了三天自由与斗争的生活。在他看来，他是尝到生活的滋味了。

我赞美他的话，我了解年轻的心的渴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渴望。

但是你，我的一个畏友，我每想到生活，我就不能忘记你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战时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① 见俄罗斯诗人米·莱蒙托夫（М.Ю.Лермонтов，1814—1841）的叙事诗《童僧》。

那清瘦脸上的微笑，你那坚定的表情，你那炯炯的目光。

至少最近十二三年来你是过着自由与斗争的生活的。我常常想用一本账簿记下来，你在这十二三年（我认识你的十二三年）中间，过了些什么样的日子，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没有机会来记这笔账，但是将来一定有人用一支忠实而有力的笔写下它来。你应该满意你自己做了那许多事情。

你会满意么？我就从没有见过你的满意的面容。我若向你提说你的成绩，你便会回答我，你还有更多的责任。你说你的生活是一条长路，你必得见到光明，才肯躺下嘘一口气。

你没有家，没有任何可以称为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抛弃了安乐和荣誉，在集体的事业上贡献了你全部时间和精力。你追求光明，想把它带给亿万的同类。你追求自由，想把它还给受苦的人群。你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帮助他们去获取幸福，鼓舞他们去争取自由，而且将他们引上光明灿烂的前途。

说努力，你留给自己的便是不倦的工作；说斗争，你自己甘冒任何的危险，忍受一切的艰苦，把一群天真的好心孩子集到你身边，你像一个长兄似地爱护他们，教育他们。年轻的一代人在你的庇荫下成长了，他们带着活泼的朝气勇敢地迈进人生大道。

看，那些年轻的亮眼睛，是谁使它们睁开了的？听，那些活泼勇敢的歌声，又是谁教练出来的？谁在荒地上种了花树？谁在废墟上建起高塔？

你还要否认什么呢？而且我问你，这十二三年内你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呢？

你多了一身变了色的学生服，你添了一样难治的痔疮。

你把“利”践踏了，你把“名”埋葬了。捧着一碗糙米饭，一杯白开水，你可以毫无挂虑地和年轻人一起大声欢笑。

我羡慕你，我佩服你，我敬爱你。

然而要是有一天我把我这时的心情告诉你，你一定会摇头说：“这又算什么呢？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必须开花。不然我们就会内部地干枯的。”①

你要引用居友的话，你是有权利的。在你这里，的确开放了人生之花。

只有你才真正了解生的意义。你才是一个真正生活过的人。跟你相比，那个满意地歌唱的高加索少年木奇里也应该是多么不幸，多么可怜了。

8月3日。

① 法国青年哲学家玛里-让·居友（1854—1888）说过：“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之花；”又说：“要是没有它，我们就会死亡，就会内部地干枯。”

梦*

据说“至人无梦”。幸而我只是一个平庸的人。

我有我的梦中世界，在那里我常常见到你。

昨夜又见到你那慈祥的笑颜了。

还是在我们那个老家，在你的房间里，在我的房间里，你亲切地对我讲话。你笑，我也笑。

还是成都的那些旧街道，我跟着你一步一步地走过平坦的石板路，我望着你的背影，心里安慰地想：父亲还很康健呢。一种幸福的感觉使我的全身发热了。

我那时不会知道我是在梦中，也忘记了二十五年来的艰苦日子。

在戏园里，我坐在你旁边，看台上的武戏，你还详细地给我解释剧中情节。

我变成二十几年前的孩子了。我高兴，我没有挂虑地微笑，我不加思索地随口讲话。我想不到我在很短的时间以后就会失掉你，失掉这一切。

然而睁开眼睛，我只是一个人，四周就只有滴滴的雨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自由中国》新一卷第五、六期合刊。

房里是一片黑暗。

没有笑，没有话语。只有雨声：滴——滴——滴。

我用力把眼睛睁大，我撩开蚊帐，我在漆黑的空间中找寻你的影子。

但是从两扇开着的小窗，慢慢地透进来灰白色的亮光，使我的眼睛看见了这个空阔的房间。

没有你，没有你的微笑。有的是寂寞、单调。雨一直滴——滴地下着。

我唤你，没有回应。我侧耳倾听，没有脚声。我静下来，我的心怦怦地跳动。我听得见自己的心的声音。

我的心在走路，它慢慢地走过了二十五年，一直到这个夜晚。

我于是闭了嘴。我知道你不会再站到我的面前。二十五年前我失掉了你。我从无父的孩子已经长成一个中年人了。

雨声继续着。长夜在滴滴声中进行。我的心感到无比的寂寞。怎么，是屋漏么？我的脸颊湿了。

小时候我有一个愿望：我愿在你的庇荫下做一世的孩子。现在只有让梦来满足这个愿望了。

至少在梦里，我可以见到你，我高兴，我没有挂虑地微笑，我不加思索地随口讲话。

为了这个，我应该感谢梦。

8月3日。

死*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一句话：

死是永生的门。

为着了解它的意义，我思索了许久。

有一天我们在成都一个友人家中谈到你，你的死讯突然来了。

这消息是无可疑惑的。半个多月前还有朋友来信报告医生们对你的病下的诊断。那位朋友说，这个冬天便是你跟肺病挣扎的最后关头，结果不是你永闭眼睛，就是病永久消灭。

我们希望你战胜病，但是死捉住了你。

信静静地躺在桌上。我们痛苦地埋下头，怕看彼此脸上的痉挛。

死在我们的眼前慢慢地走过去。

"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死了，"友人叹息地说了一句。

"他不愿意死，他不应该死，然而偏偏是他先死去，"我制止不了我的悲痛的声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现代文艺》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时题为《死——纪念范予兄》。

在成都，在重庆，在昆明，在任何地方，我都看到你的文章，你的充满活力、散布生命的文章，你鼓舞人勇敢地去体验生活，坚决地去征服生命。你赞美“生之欢乐”，你歌颂斗争的美丽。

一直到最后的日子，你没有停止过你那管撒播生命种子的笔，你蘸着生命的露水写字，你蘸着自己的赤热的血写字。有人说你是“生命的象征”。

“生命的象征”会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么？

我不相信你会死。便是在今天我们还想，你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你不过在远地方活着，你在做什么事情，或者你在埋头写什么东西。

今天离你去世的日子将近半年了。在这半年中我们一直在谈论你，我和许多朋友都在谈论你，像一个大家敬爱的活人，不像一个死去的影子。你始终活在我们中间，而且你将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我们读着你写的文章，我们谈论你做过的事情，我们重复着你说过的话，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又有一代的人来读你的文章，谈论你的为人，遵行你的教训。

的确你始终活在我们中间，而且永远活在我们中间。这“我们”的意义一天比一天地在扩大。

你何曾死去？这不就是永生的开端么？

“死是永生的门。”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了。

8月4日。

附　录

关　于《雷　雨》

——给一个上海友人①

……从江安回来，我见到你的信。我在沙坪坝过了几天忙碌日子，把那大堆信件打发走了，昨天同一个朋友偷闲到南温泉来洗澡，今早那朋友回去了，我一个人住在青年会楼上二号房间里，先前才和住在这里的某友人去游了花溪，看了瀑布，倦了回来，想起我欠你的那封信，就在小桌前坐下来，随便给你写些话。

我在江安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在那些天里，我常常和V兄②在一起，我们谈了许多事情。那是一个只有三千居民(?)的小城，夜晚七点钟街上就只有一片黑暗。我每天早晨从东市散步到西门，总要来回好几趟。逢着赶集的日子，我还可以在大街上徘徊许久，看乡下人笑嘻嘻地买卖东西。我住在V兄家中一间小楼里，那地方真静。每夜在那间楼房里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

---

① 上海友人：指吴天。他当时在上海剧艺社。

② V兄：指曹禺。

九、十点钟。有一天下午坐在街头一家小茶馆里，我们一面看街上衣服朴素的行人，一面谈话。这时我们忽然谈起了《雷雨》。

《雷雨》，这本感动了千万善良心灵的戏，如今差不多成了和“克腊西克”一样的东西，甚至在远僻的市镇里我们也会遇到它的读者和观众用赞叹的声音提起它。可是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记得从前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时，我也有过同样的激动。

第二年在东京，我便看到《雷雨》的上演。那时我住在神田青年会楼上一间小屋里。我还记得很清楚，你们贴了布告征求刊载这剧本的《文学季刊》(第三期)，你们在楼下大礼堂中排演它。我默默地注意着这事情的发展。每夜我伏在书案上听见你们在楼下背台词，听见你们的各种响动，我心里非常高兴，我知道一本好的作品已经渐渐地被人认识了，我知道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被别人喜欢了。我当时的快乐正像我在那陌生的国土里忽然遇到一个谈得来的熟朋友似的。

在那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你的名字，你是《雷雨》的导演者中的一人。靠了你们的努力，《雷雨》在东京上演了。这是

我第一次看见那剧本的上演。你想不到我那时的喜悦。我接连看了三天戏，我没有感到些微的疲倦。我不说你们的演出是如何完美，但我知道你们是在怎样的困难情形中，种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下从事了这工作的，你们的认真和苦干使我钦佩，使我感动。为了这，我就想认识你们。不久我居然有机会和你见面了，而且很快地我们就成了熟朋友。这有几个原因，然而说《雷雨》使我们接近，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又想起了一九三五年我们在东京过的那些日子（H兄①的名字是应该在这里提起的，我和他好久不通信了），虽然我们当时常常带着愤慨讲话，虽然我进过半天的拘留所，但是因了我们这群朋友的温暖的情谊，那些日子还是值得怀念的。不知你和H兄还想到这些事情么？你的信更使我记起五年前的旧事了。

可惜路隔了这么远，我不能飞过山，飞过海来看你的戏。不过我想，我的心可以越过空间的限制来到你们的身边。……

1940年11月19日重庆南泉。

① H兄：指漫画家黄鼎。



废 园 外

《废园外》，一九四二年六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废 园 外*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我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倾塌了。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花还在盛开。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花要告诉我的还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西南文艺》第二期。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我回头看，没有人。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人们还在那里挖掘。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愣。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罢。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

一只带泥的腿，一个少女的生命。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炸弹毁坏了一切，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这样地逃出囚笼，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

花随着风摇头，好像在叹息。它们看不见那个熟习的窗前的面庞，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罢。

但是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这我却是看见了的。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

夜色降下来，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为什么这样静？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难道我是在梦里？

脸颊上一点冷，一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漏雨。

1941年8月16日在昆明。

火*

船上只有轻微的鼾声，挂在船篷里的小方灯突然灭了。我坐起来，推开旁边的小窗，看见一线灰白色的光。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船停在什么地方。我似乎还在梦中，那噩梦重重地压住我的头，一片红色在我的眼前。我把头伸到窗外，窗外静静地横着一江淡青色的水，远远地耸起一座一座墨汁绘就似的山影。我呆呆地望着水面。我的头在水中浮现了。起初是个黑影，后来又是一片亮红色掩盖了它。我擦了擦眼睛，我的头黑黑地映在水上。没有亮，似乎一切都睡熟了。天空显得很低。有几颗星特别明亮。水轻轻地在船底下流过去。我伸了一只手进水里，水是相当地凉。我把这周围望了许久。这些时候，眼前的景物仿佛连动也没有动过一下；只有空气逐渐变凉，只有偶尔亮起一股红光，但是等我定睛去捕捉红光时，我却只看到一堆沉睡的山影。

我把头伸回舱里，舱内是阴暗的，一阵一阵人的气息扑进鼻孔来。这气味像一只手在搔着我的胸膛。我向窗外吐了一口气，便把小窗关上。忽然我旁边那个朋友大声说起话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桂林《大公报·文艺》。

"你看，那样大的火！"我吃惊地看那个朋友，我看不见什么。朋友仍然沉睡着，刚才动过一下，似乎在翻身，这时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舱内是阴暗世界，没有亮，没有火。但是为什么朋友也嚷着"看火"呢？难道他也做了和我同样的梦？我想叫醒他问个明白，我把他的膀子推一下。他只哼一声却翻身向另一面睡了。睡在他旁边的友人不住地发出鼾声，鼾声不高，不急，仿佛睡得很好。

我觉得眼睛不舒服，眼皮似乎变重了，老是睁着眼也有点吃力，便向舱板倒下，打算阖眼睡去。我刚闭上眼睛，忽然听见那个朋友嚷出一个字："火！"我又吃一惊，屏住气息再往下听。他的嘴却又闭紧了。

我动着放在枕上的头向舱内各处细看，我的眼睛渐渐地和黑暗熟习了。我看出了几个影子，也分辨出铺盖和线毯的颜色。船尾悬挂的篮子在半空中随着船身微微晃动，仿佛一个穿白衣的人在那里窥探。舱里闷得很。鼾声渐渐地增高，被船篷罩住，冲不出去，好像全堆在舱里，把整个舱都塞满了，它们带着难闻的气味向着我压下，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无法闭眼，也不能使自己的心安静。我要挣扎。我开始翻动身子，我不住地向左右翻身。没有用。我感到更难堪的窒息。

于是耳边又响起那个同样的声音："火！"我的眼前又亮起一片红光。那个朋友睡得沉沉的，并没有张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梦里的火光还在追逼我。我受不了。我马上推开被，逃到舱外去。

舱外睡着一个伙计，他似乎落在安静的睡眠中，我的脚声并不曾踏破他的梦。船浮在平静的水面上，水青白地发着微光，四周都是淡墨色的山，像屏风一般护着这一江水和两三只睡着的木船。

我靠了舱门站着。江水碰着船底，一直在低声私语。一阵一阵的风迎面吹过，船篷也轻轻地叫起来。我觉得呼吸畅快一点。但是跟着鼾声从舱里又送出来一个“火”字。

我打了一个冷噤，这又是我自己的声音，我自己梦中的“火！”。

四年了，它追逼我四年了！

四年前上海沦陷的那一天，我曾经隔着河望过对岸的火景，我像在看燃烧的罗马城。房屋成了灰烬，生命遭受摧残，土地遭着蹂躏。在我的眼前沸腾着一片火海，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火，火烧毁了一切：生命、心血、财富和希望。但这和我并不是漠不相关的。燃烧着的土地是我居住的地方；受难的人们是我的同胞、我的弟兄；被摧毁的是我的希望、我的理想。这一个民族的理想正受着熬煎。我望着漫天的红光，我觉得有一把刀割着我的心，我想起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这样的几分钟会激起十年的憎恨，一生的复仇。”① 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发誓：我们有一天一定要昂着头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要在火场上辟出美丽的花园。我离开河岸时，一面在吞眼泪，我仿佛看见了火中新生的凤凰。

---

① 见亚·赫尔岑（А.И.Герцен，1812—1870）的《从彼岸来》第二篇《暴风雨后》。

四年了。今晚在从阳朔回来的木船上我又做了那可怕的火的梦，在平静的江上重见了四年前上海的火景。四年来我没有一个时候忘记过那样的一天，也没有一个时候不想到昂头回来的日子。难道胜利的日子逼近了么？或者是我的热情开始消退，需要烈火来帮助它燃烧？朋友睡梦里念出的“火”字对我是一个警告，还是一个预言？……

我惶恐地回头看舱内，朋友们都在酣睡中，没有人给我一个答复。我刚把头掉转，忽然瞥见一个亮影子从我的头上飞过，向着前面那座马鞍似的山头飞走了。这正是火中的凤凰！

我的眼光追随着我脑中的幻影。我想着，我想到我们的苦难中的土地和人民，我不觉含着眼泪笑了。在这一瞬间似乎全个江、全个天空，和那无数的山头都亮了起来。

1941年9月22日从阳朔回来，在桂林写成。

长　夜*

我对着一盏植物油灯和一本摊开的书，在书桌前坐了若干时候。我说若干时候，因为我手边没有一样可以计算时间的东西。我只知道我坐下来时，夜色刚刚落到窗外马路上；我只知道我坐下来时，门前还有人力车的铃声，还有竹竿被人拖着在路上磨擦的声音，还有过路人的谈笑声。我坐着，我一直坐着，我的心给书本吸引了去。我跟着书本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的心仿佛落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海上受着颠簸。于是我抬起头，我发见我仍然坐在书桌前面，这许久我就没有移动一下。

火在灯罩里寂寞地燃着，光似乎黯淡了些。我把头动了动，忽然发觉一堆一堆的黑影从四面八方向着我压下来，围过来。但是灯火发出一圈亮光，把它们阻挡了。我看见黑暗在周围移动，它们好像在准备第二次的进攻。

四周没有声息。我不知道马路是在什么时候静下来的。我注意地倾听，我很想听见人声，哪怕是一声咳嗽、一句笑语。在平日甚至夜深也还有人讲话，或者笑着、哼着歌走过马路。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我听了片刻，仍旧没有声息。我奇怪，难道这时候醒着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为什么我四周会是死一般的静寂？

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搅动，又仿佛有一股一股的水像浪涛似地在往上翻腾。我用力镇定了我的心，我把头再埋到书本上去。一条一条的蚯蚓在我的眼前蠕动。我抓不到一个字义。为什么？难道是黑暗伤害了我的眼睛，或者是静寂损坏了我的脑子？

我把灯芯转亮，我再看看四周，黑暗似乎略为往后退了，它们全躲在屋角，做出难看的鬼脸，无可如何地望着灯光。

我又埋下头，而且睁大眼睛，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书本上。这一次蚯蚓停住不动了，它们变成了一行一行的字。……

我进到了另一个时代里去经历另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站在一群叫嚣的人中间，高耸的断头机的轮廓贴在淡蓝色的天幕上，一个脸色惨白的年轻人带着悲痛立在台口，他用眼光激动地在人群中找寻什么东西，他的嘴颤抖地动了一下。一个少妇带着一声尖锐的哀叫向着台口扑过去，她仰起那张美丽的脸去承受从台上投下的眼光。泪珠沿着年轻人的脸颊滚下来。一只粗壮的膀子伸过来拉他，他再投下一瞥依恋的眼光，于是断念似地睡倒在木板上面。少妇伏在台阶上伤心地哭着。

悬在架上的大刀猛然落下。我的心一跳。应该听见那可怕的声音。鲜红的血溅起来。又一个头落在篮子里。那只粗壮的手拿着头发把这个头高高举起给台下的人看。惨白色面颜显得更惨白了。眼睛微微睁开，嘴半闭着。

我的心发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似乎听见这一句痛苦的问话。

我吃惊地举起头，房里仍然只有我一个人。黄色的灯火孤寂地在玻璃灯罩里摆动，任是怎样摇晃，也发不出一点声音。背后墙壁上贴着我自己的影子，它也是不会发声。窗外、门外，夜悄悄地溜过去。没有人从门缝里送进一句不等回答的问话来。那么又是我的心在说话了。但是会有人来给我一个回答么？

我等待着。这次我听见声音了。皮鞋的声音，一个男人的脚步。脚声渐渐地近了。是一个朋友么？他在这深夜来找我谈什么事情？或者他真的来给我回答那个问题。

我激动地等待着叩门声。我几乎要站起来出去开门。但是声音寂然了。马路上静得好像刚才并没有人走过似的。我屏住气息倾听，没有风声，甚至没有狗叫。世界绝不能够是这么静。难道我是在做梦？我咳一声嗽，我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多么空虚，仿佛响在一个荒凉的空场上。未必我已经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摸摸自己的手、自己的脸颊，它们还是温暖的。我把手在桌上一击，响声立刻传到我的耳里。我可以相信自己还是一个活人。

灯光又开始暗起来。黑影也跟着在活动了。它们恢复了原先的阵地，而且进攻。灯用它的亮光抵抗，显得很吃力。我知道油快完了。我动动脚，想走去拿油瓶。但是一阵麻木抓住我的腿。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一双腿快冻僵了。我需要活动。我要表示我的存在。我还需要亮光。我跟麻木的感觉挣

扎了一会，才缩回两只伸了好久的腿。我终于站起来了。

我打了一个冷噤。寒气似乎穿过衣服，贴到皮肤上来了。我的脚尖和腿弯微微发痛。手指也有一点麻木的感觉。夜一定深了。我应该上楼去睡。但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躺下来，我更不愿意闭上眼睛。我的脑子还是清醒的，我不愿让梦给它罩上一层糊涂。

我穿过包围着我的寒气和黑暗，走到厨房去拿了油瓶来给灯加了油。于是灯光又亮起来。这灯光给我驱散了黑暗和寒气。我听听四周，这是坟场上似的静寂，没有人在马路上走过。我失望地在书桌前面坐下，又坐在原来的地方。

我的头又埋在书上。慢慢地、慢慢地一幅图画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仍旧是那个断头台。两个少妇坐在阶上，身子挨得很近。一个埋着头低声在哭，另一个更年轻的却用柔和的声音安慰她。

"露西·德木南，"我听见一个粗暴的声音叫起来。那个年轻的少妇慢慢地站起，安静地把脸朝着人群。怎么？还是先前那张美丽的脸，还是先前扑倒在台阶上哀哭的女人。现在她神色自若地走上断头台去。她对自己的生命似乎没有爱惜，上断头台就像去赴宴会。平静的，甚至带着安慰表情的面颜是那么年轻，那么纯洁。一对美丽的蓝眼望着天空。巴黎的天还没有她的眼睛这么美！我想起一个人的话："为了使你美丽的眼睛不掉泪，我愿意尽一切力量。"① 但是她也在木板

---

① 见阿·托尔斯泰（1883—1945）的剧本《丹东之死》（一九二三年）第四幕。

上躺下了。

铛的一声，架上的大刀又落了下来。我不由自主地叫出一声“呀！”，仿佛一滴血溅到了我的眼镜片上，模糊中我看见一个被金丝发盖着的人头滚进篮子里。

露西·德木南终于跟着她的丈夫死去了。那个篮子里一定还留着她的丈夫颈项上淌出来的血罢。

我想起了德热沙尔的诗：

有着温柔的爱情的女人
小孩儿，小鸟儿，
母亲的心，芦苇的身，
露西，一个优美的女人
…………
…………
啊，你可爱的小女人，
为了追随你所崇敬的爱人
你在断头台上做了自愿的牺牲，
献出了你年轻的生命。
啊，想起你不由我眼泪纵横！
…………①

诗人的语言在我的耳边反复响着。那个披着金发的美丽的头又在黑暗中出现了。眼睛紧闭，嘴唇像要发出哀诉似地

---

① 见E.德热沙尔的诗集《大革命的诗》（一八七九年巴黎版）。

微微张开，鲜红的血从雪白的颈项下不断地滴落。……

我把眼睛闭上。我的眼睛已经受到伤害了，我觉得眼珠像被针刺似地痛起来。我取下眼镜，伸手慢慢地揉眼皮。那个金发覆额的法国少妇的头还在我的眼前摇晃。我取开手，睁大眼睛。仍然只有一盏灯和一本书。一百五十年前的悲剧是无可挽回的了。为什么今天还会轮着我站到协和广场上，让我的心受一番熬煎？

我抬起头凝神地望着那一圈跳荡似的金黄色的灯火。我想忘记一百五十年前的事，但是我的思想固执地偏偏粘在那件事情上面。砍去露西·德木南的头的断头机也砍去了罗伯斯庇尔的头。血不能填塞人的饥饿。为什么当时没有人伸出一只手把那只粗壮的膀子拉住？为什么从那些昂着头在台阶上观看的人中间不发出一声“够了”的叫喊？

迟了！断头机终于杀死了革命，让反动势力得到了胜利！

迟了，一百五十年已经很快地过去了。难道我还有什么办法来改写历史，把砍去的头接在早已腐烂的身上？对一百五十年前的悲剧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纵然怀着满腔的悲愤，也无从发泄。

但是悲愤也会燃烧，和眼前的灯火一样，它在我的胸膛里燃起来。我的身体应该是个奇怪的东西，先前那里面有的是狂涛巨浪，现在却是一阵炙骨熬心的烈火。我绝望地挣扎着。

我又凝神倾听，我希望在静寂中听出一下脚声，我希望听出一两声表示这个世界还醒着的响动。我希望一个熟人起来叩门。我甚至想，只要有一个人，哪怕是不认识的人也好，只

要他走进来，坐在我对面，我就把我的悲愤全倾吐给他。这时候我多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醒着的人。

我听了许久，坐了许久，希望了许久。

于是像回答我的希望似地在外面起了一种声音。什么东西在沙沙地响？难道谁在门外私语，等着我去开门？或者我又在做梦，不然就是我的听觉失了效用？

我坐着，听着。我只觉得一股一股的冷气从脚下沿着腿升上来。我终于听出来了：雨声。声音越来越密，越响。后来连屋檐水滴下的声音也听得见了。雨声淹没了一切，甚至扫去了我的希望。

我还是坐着，我还是听着。我要坐到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时候？难道我必须等到天明？或者我还能够怀着满腹烈火进入梦中？

我不想闭上眼睛。即使我能进到梦中，我也不会得着安宁。火热的心在梦里也会受到熬煎的。那么我就应该在书桌前面坐到天明么？

夜更加冷了。这么长的夜。还不见一线白日的亮光。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夜的尽头。枯坐地等待是没有用的，不会有人来叩门。我应该开门出去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应该出去找寻晨光的征象。

我移动我的腿，又是一阵麻木，仿佛谁把冰绑了在我的腿上似的。我挣扎了片刻，终于直立起来了。

灯火开始在褪色。黑暗从埋伏处出来向我围攻。但是我用坚定的脚步穿过黑暗走到外面，打开了大门。

一股冷风迎面扑上来。暗灰色的空中飘着蒙蒙的细雨。天空低低罩在我的头上，看不见一小片云彩。我的眼前只是一片暗雾。

“难道真的不会有天明么？”我绝望地问道。

但是从什么地方飘过来一声竹笛似的鸡叫。这意外的声音使我疑心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我屏住气向这广阔的空间听去。

欢呼似的鸡声又响起来。

我吐了一口气。我的寂寞的心得到安慰了；我的燃烧的心得到宁静了。

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起来。

漫漫的长夜终于逼近它的尽头了。

1941年冬在桂林。

寻　梦*

我失去一个梦，半夜里我披衣起来四处找寻。

天昏昏，道路泥泞，我不知道应该走向什么地方。

前面是茫茫一片白雾，无边无际，我看不见路，也找不到脚迹。

后面也是茫茫一片白雾，雪似地埋葬了一切，我见不到一个人影。

没有路。那么，梦会逃到什么地方去？

我仍然往前面走。我小心下着脚步，我担心会失脚跌进沟里。

我走到一家小店门前。柜台上一盏油灯，后面坐着一个白发老人。我向他打个招呼，问他是否见到我遗失的东西。

"你找寻什么，年轻人？"

"我找寻一个梦。"

"梦？我这里多得很，"老人咧嘴笑起来；"我这里有的是梦，却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种？"

"我失去的是一个能飞的梦。"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自由中国》新二卷第一、二期合刊。

“我不知梦能飞不能飞，不过你看它们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你可以从里面挑选任何一个，并不要付多大的代价。”他给我打开了橱窗。

无数的梦商品似地摆在那里。的确是各种各类的梦：有的样子威严，有的颜色艳丽，有的笑得叫人心醉，有的形状凄惨使人同情。这里面却没有一个能飞的梦。

我失望地摇头，我找不到我失去的东西。

“随便挑一个拿去罢，难道里面就没有一个你中意的？”老人殷勤地问。

“没有。我只找寻我失去的那一个。别的我全不要！”

“但是茫茫天地间，你往哪里去找寻你那个梦？年轻人，我应该给你一个忠告，失去的梦是找不回来的。”

“我一定要找！从我身边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找回来！”

“傻瓜，为什么这样固执？”老人哂笑道，“多少人追寻过失去的梦，你可曾见到什么人把梦追了回来？听我的话，转回去好好地睡觉。”

我却继续往前走。

雾渐渐变为稀薄，我看见江水横在我的面前。

我踌躇起来，没有舟楫，我怎么能达到彼岸？

忽然一只小木船靠近岸边，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撑着篙竿高呼“过渡”。

我立刻跳到船中，连声催促船夫火速前进。

“老先生，为什么这样着急？半夜里还有什么要紧事情？”

这个少年怎么称我做“老先生”？刚才在小店里，我还被唤

做“年轻人”，难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会增加了许多年纪？

我没有功夫同他争论，我只问他：

“喂，你有没有见到我那个失去的梦，那个能飞的梦？”

少年不在意地回答：“我在这里见到的梦太多了，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的？若说能飞，它们都是从这江上飞过去的，没有一个梦会半路落在江里。”

“我那个梦特别亮，比什么都亮。”

“除了星星，我没有见到更亮的东西。那么你的梦并没有飞过这里，因为我见到的全是无光的影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它飞往什么地方？”

“我不能。不过我知道它一定不在对岸，我劝你不要过去。”

“我一定要过去。请你把我快送过去，我愿出任何的代价。”

少年把我送到了对岸。

没有雾。天落着小雨。我走的全是滑脚的泥路。我好几次跌倒在途中，又默默地爬起来，揉着伤，然后更小心地前进。

一座高山立在我面前。没有土，没有树，这是一座不可攀登的石山。

“难道我应该空手转身回去？”我迟疑起来。

“不能，不能！”我听见了自己的心声。

“年轻人不能走回头路，”我的心这样说。

我鼓起勇气攀登岩石，一个继续一个，直到我两手出血，两脚肿痛，两腿发软，我还在往上爬行。

我几次失掉勇气，又恢复决心；几次停止，又继续上升；几次几乎跌落，又连忙抓紧岩石的边沿。最后我像一个病人，一个乞丐，拖着疲倦的身子和破烂的衣服立在山顶。我仍然看不到我那个失去的梦。

上面是一望无垠的青天，下面是一片云海、雾海。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只有一只苍鹰在我的头顶上盘旋。

我的眼光跟着鹰翼在空中打转。我羡慕它能够那么自由自在地在无边的天海里上下飞翔。它一会儿飞得高高的，变成了一个黑点，一会儿又突然凌空下降，飞得那么低，两只翅膀正掠过我的头。我看见它那只锋利的尖嘴张开，发出一声嘲笑似的长啸。

它一定在笑我立在山顶束手无策，也许就是它攫去了我的梦。所以它第二次掠过我的头上，我愤然伸出手去捉它的脚爪。我捉住了鹰，但是一个筋斗把我从山顶跌下去了……

我睁开眼，我还是在自己的家里。原来我又失去了一个梦。

1941年11月在桂林。

灯*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

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地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

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

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罢。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

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么？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么？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

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

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希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它的帮助。

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泅过海峡来的利安得尔的眼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是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沉海底。

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我心灵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

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啊！"），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

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

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1942年2月在桂林。

后　记

在零下四度的寒夜里，我的心热得像一块烧红的炭。是我的眼睛见到心么？是我的手摸到心么？不，我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比喻，姑且把心比作热炭。四周异常静，先前那些吱吱喳喳也都寂然了。但是我没有睡意，我不愿意倒在寒冷的床铺上闭住眼睛。

这些天里，笼罩在太平洋上的暗云紧紧地压住我的心，一定是它做了火种。我听够了叹息和疑虑的询问，我看够了报纸上那些可怕的标题。我的心反抗着，我的信念坚执着。我怀疑过“将来”么？我相信恶势力的胜利么？我愿意在侵略者下面低头么？不，这不可能。我的心始终在反抗。因此它燃烧起来了。

我无法使这颗心安静，便找出放在箱子里的一叠旧稿，拿起笔来校改。夜悄悄地在窗外进行，灯里的油逐渐地减少，我的两只脚渐渐地变得不灵活了。就在这寒冷的冬夜里，我编好了这本小书。

《火》、《长夜》、《寻梦》、《怀念》①、《灯》五篇都是在桂林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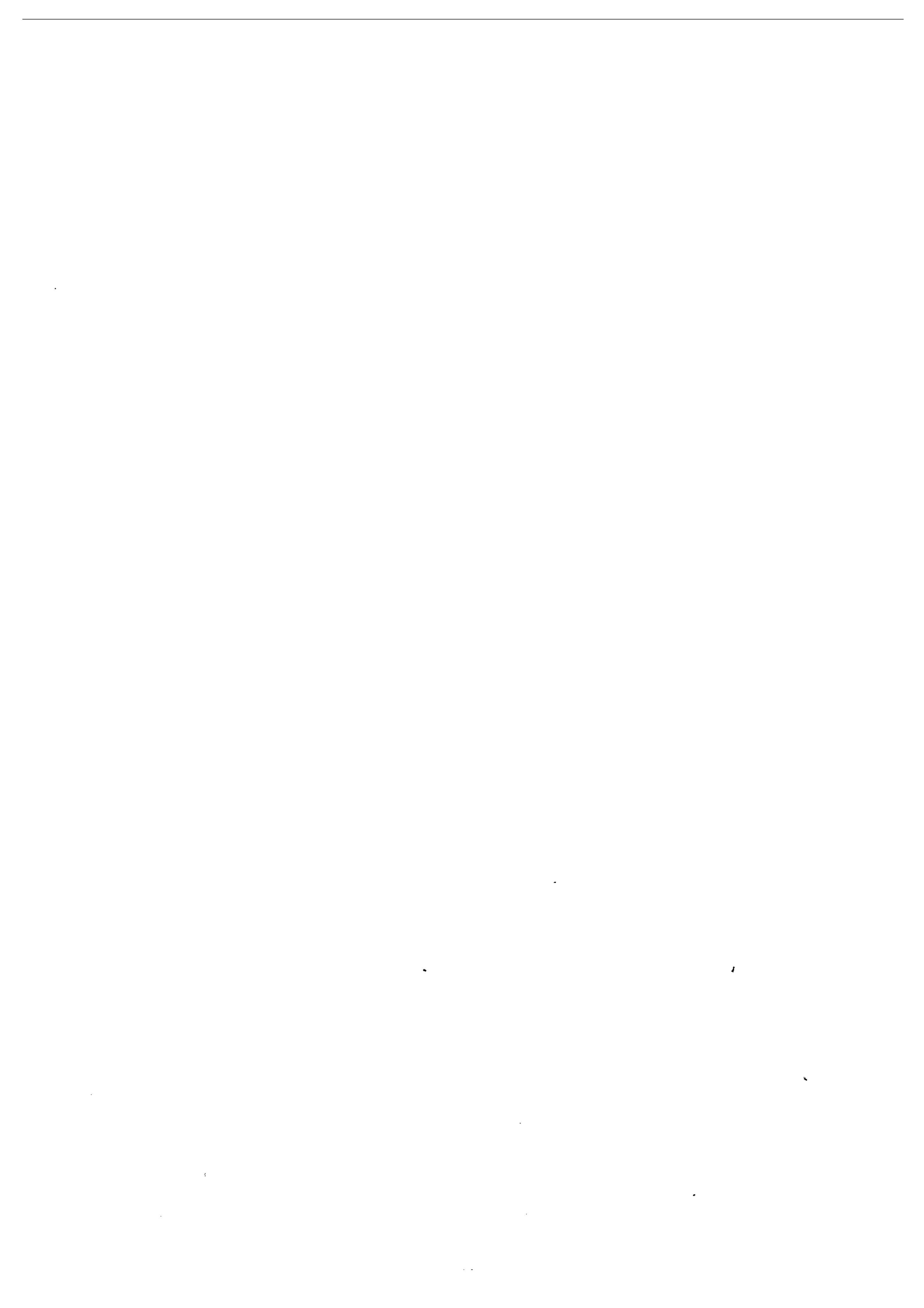
---

① 我后来又把《怀念》抽出，编在另一散文集《怀念》里面了。

的,《废园外》则是在昆明写成。第三辑中的公开信,还是一九三八年在广州的旧作。

这些不像样的零碎文章,都是被一个信念贯串着的,那就是全国人民所争取的目标:正义的最后胜利。因此我愿意把它们献给读者。

巴　金 1942年2月。



旅途杂记

《旅途杂记》，一九四六年四月由万叶书店出版。

前 记

过去我印过一本《海行杂记》、一本《旅途随笔》和一本《旅途通讯》。有人因此称我为旅行家。其实我对旅行并无特殊爱好。我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在旅途上，只是为了看看我那些散处在各地的朋友，和体验一些人的生活。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我的生存因为我周围无数人的存在而有了光彩。没有朋友，便没有我那些拙劣的文章。不但这样，我有勇气，并且能够以平静的心境经历了抗战八年中的艰苦日子，这也得感谢我无数朋友的帮忙。

《旅途通讯》是在抗战的初期写成的，出版期是一九三九年四月，那时我刚由桂林回到上海。但是我在“孤岛”上只住了一年。在德军进占巴黎以后，我又搭了去海防的太古船，转赴昆明。

五年箭也似地飞去了。现在在德、日投降，上海光复以后，我回到这个被敌骑践踏了八年的土地，见到一些久别的友人，我的笨拙的口舌不能传达我感激的心情，更不能叙说我这五年的经历。我只好求助于我的这管秃笔，让它老老实实地对朋友们讲几段我的生活的故事。为了这个目的，我编印了我的第四本“旅行的书”——《旅途杂记》。文章都是这五年中

间在桂、筑、渝、蓉的旅寓中写成的。

分别五年，我没有别的礼物，献上这一本不像样的小书，请朋友们接受它。时间证实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亲眼看见了侵略者的败亡。我们并没有犯错误。我们且等着看火中凤凰的诞生罢。

巴　金 1945年12月8日。

别桂林及其它*

别了，桂林的夜！

我们记错了开车的时刻，冒着微雨赶到车站，车还没有来。站上挤满了乘客，迎面扑来一阵温暖的语声，使我忘记了刚才在黄包车上经过的大段冷清清的黑路。

我同朋友们进了月台，把人和行李都安顿在一把长椅上。头上是一片漆黑的天，没有遮拦，我们缩紧身子坐在长椅上休息，雨已经住了。

列车没有来，这长期的等待是够磨折人的。分别的痛苦把我们抓在它的手里，一捏一松。它给我们看见一线希望，但一转眼它又使我们明白这希望全是空虚。平静的心境给搅乱了，多留一刻，和朋友们多处一刻，也不能使我们再像从前那样无挂虑地谈些快乐事情，恰恰相反，这只会延长我们的担心，拉长那所谓离愁别绪，让我们多有功夫来咀嚼它的苦味。

我爱旅行，但是我有太多的留恋——我留恋人，也留恋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一二七期。发表时题为《随笔三篇——〈旅途通讯〉续篇》。

方，我甚至留恋微小的事物。我容易动感情，我知道这是一个缺点，然而到现在我还无法治好这个病。倘使换一个环境，顺自己的性子，我也许会老死在一个小小城市，不与外面世界通消息。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走了好些地方，不肯让自己的脚步，也不肯让自己的心灵休息。可是想不到我仍然有那么多的留恋，仍然害怕离别。因此我喜欢单独地来去，没有人送别，也没有人知道我的行期。我纵使提着皮箱，也不觉得自己是在走长路，就要跟一些人、一个地方分别。其次我高兴那种梦似的别离——突然的决定，飞也似地跟着车船驶去，不给人留一点时间来思索，来咀嚼。一句短短的话，一声短短的笑，于是一阵骚动，然后是一片静。船驶进海中，列车在轨道上奔驰，汽车卷起大股尘土飞逝。动的码头和月台渐渐地静下来，送行者慢慢地走回家，旅行的人则在舟车中欣赏新的景物。

现在的情形和这两种都不同。我坐在长椅上或者站在椅旁，我讲不出一句有意义的话，朋友们也是这样，我们默默地捱着时刻。我在阴暗的电灯光下看见朋友们的脸，就想到我今晚要跟他们分别了。

通车还没有来。衡阳开来的慢车先到了。寥寥几个客人下车，月台上还是相当安静。虽有火车头接连的叫声，也不曾打破这沉闷的空气。

我们等待着。风吹起来，夜变得更冷了。我觉得寒气透过我的不够温暖的衣服，触到我那怕冷的皮肤。一个朋友也低声叫起“冷”来。桂林的春夜原是这么寒冷的。没有雨。为

了遮住从背后吹来的风，三个朋友张开了雨伞。

阴暗的电灯突然灭了。黑夜重重地压在月台上。我用手电筒的亮光照着翻看一本小书，一个在椅子上打瞌睡的朋友却不安地说手电光会伤眼睛。我们在黑暗中等待了好一会儿，话讲得极少。这送别是相当凄凉的。我只盼望车早点来，立刻来，让我马上离开这些朋友；我只愿即刻离开月台。这痛苦的时刻我实在捱不下去了！

电灯开始重明，火车头的亮光也在远处出现。分离的时刻逼近了，我却感到兴奋，好像我心上的重压快要被卸去似的。我看朋友，他们似乎也有这种感觉。火车头给我们带来了生气。

于是一阵骚动，一阵奔跑，一阵忙乱。我们上了车，我找到了我的房间，安置了行李。铃子响了，声音是那么坚定，它们结束了等待的痛苦。

分别就在眼前，但是意外地我却感到踌躇了。我坐在车厢内，推开半扇车窗，朋友们就立在窗下月台上，八张亲切的脸同他们的微笑一转眼便会消失，我不能没有留恋。我不转眼地望着他们。我觉得眼睛发痛了。

大的雨点在窗外落下。朋友们又撑起雨伞，他们回家时还要走那么一大段黑黑的泥路，八个人，三把伞——我想着，就挥手请他们回去。他们不理会我。我着急起来。就在这时候火车慢慢地开动了。

朋友们摇着手，慢慢地退去。我把头伸出车窗，拚命地挥舞我的帽子。我想把他们拉回来。但是他们已经不见了！

夜包围着我们的列车，使它烦躁地吼叫着往前跑。星群似的灯光还在窗外闪耀，但是它们也逐渐地隐去。我的眼睛还向着窗外望。那最后的几颗星星也消失了。从火车头冒出来的灰白色的浓烟在黑暗的空间里滚动，像一条巨龙在空中飞舞。

别了，桂林的夜。我应该关上车窗休息了。

在金桂通车中

雨跟着桂林留在后面了。第二天早晨，迎接我的是一个晴天。

车厢里似乎只有闷热，狭小的房间放着不少的行李，对面铺上那位乘客的朋友们来往不绝。然而我得承认二等卧车中是相当舒适的。

火车在山中奔驰，仿佛永远不会感到疲倦，它那单调的脚步声已经使许多熟习的耳朵生厌了。

正午，为了填塞肚中的饥饿，又不愿久等服务生送来那盆食之无味的蛋炒饭，我便穿过好些车厢，走到厨房车里去。路相当远，而且因为挂在最后（？），厨房车颠簸得特别厉害，从这里把稀饭等等送出来，的确不容易。倒并不是车里没有这些东西。

我要了一碟馒头，一碗稀饭，一碟香肠和牛肉。服务生给我用一块木板盛着，放在一个箩筐上，旁边有一个用席子盖着的小铺盖卷，他让我坐在铺盖卷上。

车宽大，人又少，我应该坐得舒适，吃得舒适。可是车身震动得太厉害了，仿佛随时都会翻倒似的。我觉得全身都在抖动。我看厨子和服务生，他们倒若无其事地照常工作。我也只好忍耐地勉强把馒头吃完。但是我离开铺盖卷站起来的时候，两只脚几乎站不稳了。

下午两点半光景，火车把我载到了金城江。

金　城　江

金城江比半年前更繁荣了。那么拥挤的人，那么嘈杂的声音，新的建筑，堂皇的名字……我几乎以为这是另一个地方。

我雇了挑夫把行李挑到铁路宾馆去。但是我的箱子刚挑到检查处等候检查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心思，从检查处出来，我吩咐挑夫跟着我去汽车站。

去河池的车票刚刚卖完，车子还没有到。我拿着一封介绍信去找一位办事人，他意外地替我买到一张最后的票子，并且叫人把行李给我过了磅，让我在候车处安心等着开车。

在候车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人们正在谈论香港的悲剧，从装束、态度和口气，我知道他们是香港脱险出来的同胞。汽车中的血，沙发内的十万港币，舞女的巧计，门前的死尸……还有种种惊心动魄的题目。谈了又谈，谁也不嫌重复和详细。车还没有来，这班车是先由河池开来，再开回去的。现在它脱班了！

在我快要等得绝望的时候，车子到了。河池来的客人下了车，我们再依着次序上去。我坐在司机台上，但是地方相当窄，连转动身子也不方便，可见车内的拥挤了。

摩托叫吼，车轮跟着滚动，一阵难闻的汽油味扑上我的鼻端。我这样地离开了金城江。

车子出了车站，在马路上跑起来。我向着金城江那些门面华丽的竹棚式的房屋投下最后的一瞥，我不禁想起在火车中听见的关于这个地方的谈话：

"金城江，神秘的地方。娼妓、赌博、打架……没有一样它没有。人们的钱花得像江水一样，去了就不会流转来。在这里住上几天，就必须留下一些东西，带走一些东西，也许会有人带着美丽的回忆走开的，但是更多的人从这里带去了痛苦的记忆。这里的确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河　池

河池，我还认得这个别了五个月的老朋友，它没有多大的改变。

这个小城只有一条石子铺的街道，商店、旅馆和一部分的机关就立在街的两旁。比起金城江来，这个小城朴素多了。人不会相信金城江还是河池县管辖的一个小地方。

为了等车我得在这里住四个夜晚。在一个比较干净的旅舍中我开始了单调的生活，每天散三次步，吃两顿饭，睡两回觉，其余的时间，我便用来写信看书。

在旅舍中，第一个晚上我睡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里，第二天早晨我便搬进了一个靠街的房间。房间不大，但靠街有两扇大窗，挂着半截的窗帘，窗台相当宽，窗台旁挂着一幅淡黄色窗帷。书桌放在窗前，坐在桌前抬起眼睛便可望见无云的蓝天。对面是一所平房，刚刚给粉红色的窗帘遮住了。旅舍建筑在街的一头（街的两头大半是住房），离商店较远，所以比较清静。

在这里我醒得早，早晨我常常沿公路散步，再转到山脚，去听绿树上群鸟的歌唱。散步回来，在旅舍的小屋内，因为爱惜明媚的阳光，我还坐在窗前翻译了王尔德① 的一篇题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话。

散步的时候我常常走到汽车站，在那里徘徊十几分钟，每天我都遇见好些熟习的面孔，可见到那里去的人并不止我一个。不同的是，我在那里不讲一句话，别人却不断地询问、恳求，甚至哀求。这些办法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不过白费精神的却不在少数。有一个本地人讲得好："个个是人，个个会讲话，个个要先走，"结果总有一些人留在后头。

公路车一个星期开三次；另外有三班交通车，却是专给公务人员乘坐的，登记的人也相当拥挤；坐商车花钱多，还不舒服，坐别的车又怕路上发生问题。一车一车的人从桂林、金城江不断地运来，填塞在这里的各个旅店里，大小房间都装满了。每天到处都听见人在问："有房间没有？"在每个旅馆门口

① 奥·王尔德(O. Wilde, 1856—1900)：英国唯美派作家。《自私的巨人》收在童话集《快乐王子集》内。

人们互相问询："找到车子没有？""你等了几天？""找车子好伤脑筋啊！"倘使听到一句"我明天走！"或者"我后天走！"（多么骄傲的一句话！）谁都会用羡慕的眼光看那个说话的人。不管他坐的是什么车，能够往前走的人便是幸福的。

我每天逛三次街，街只有一条，中间的一段便是热闹的中心区，有菜馆，有洋货店，有药铺，有镶牙馆（镶牙馆多得叫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别的商店，却没有一家卖书报的铺子。

夜晚比白昼热闹，这里有夜市，洋货摊、烟摊、饮食摊、刻字摊……使得狭小的街道变得更狭小了。人们不断地从旅店和菜馆中走出来，带着各个地方的口音，谈论旅途的见闻。没有消遣的地方，好些人便集在旅馆的厅堂内。大多数的旅店都有一个可以作为临时谈话室的地方。偶尔一两位汽车司机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便会留下那一对上海口音的男女，唱两三出平剧；只有他们会做那对嗓子不好的清唱家的慷慨的顾客。

每晚我都看见那一对清唱家，是两个面带烟容的瘦弱的人，他们走起路来，步履也很艰难。男的拿胡琴，女的抽香烟，看他们那种斯文样子，倒像是落难的富家夫妻。他们从前也许经历过不少荣华的岁月，如今却流落异乡，在汽车司机的笑颜下面讨生活了。

今天傍晚，我去看了"丹池公路殉职工友纪念塔"，这不是什么伟大的雕刻，然而它抓住了我的心，它是伟大的牺牲精神的象征。我不认识那些陌生的名字，他们更不知道我。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血汗，我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又怎么能够往北

去？望着这块刻上许多不朽名字的纪念塔，连我这个渺小的人也怀着感激的心思掉泪了。

“明天我就要踏着你们的汗迹、血印往前走了。可是我又有什么报答你们呢？”我揩着眼泪低声说。

不仅是我，许多经过这条公路的人，都应该拿这样的话问自己。

1942年3月18日在河池。

邮政车中*

邮政车中

早晨河池的阳光欢送我，又是一个很好的晴天。我自己把两只皮箱和一个皮包拿到邮局汽车站。转进那条横街，我觉得有点吃力，便把箱子放在地上，打算休息片刻。这时候一个工友模样的人从后面走来，笑着对我说："我看你拿不动，我来拿。"他不等我答话，就提起我那只大皮箱，踏着大步子往前走了。到了站门口，他放下箱子，似乎连我那句道谢的话也没有听清楚，就匆匆地走了。他好像是在邮局里服务的，可是以后我便不曾再看见他。

我办好手续上了邮政车。到开车的时候，车子却不肯动了。司机坐在司机台上，另一个人倒开着另一部车在后面推动。推了一阵，没有用；再推第二回，还是"一个屁也不放"（借用司机的话）。这样地推了五六回，我们车子的摩托才叫起来。

车子开出车站，先去装邮袋，邮袋装好，又耽搁了一会儿，在九点钟的光景，它才经过"丹池公路殉职工友纪念塔"，离开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宇宙风》第一二八期。发表时题为《旅途通讯·续篇》。

了河池县境。

金黄色阳光从蓝空中撒下，长春的绿树在车顶上挥舞它们的枝叶，鸟群愉快地在每棵树上歌唱，我带着满眼明亮的绿色离开了河池。在这一刻河池的确显得非常美。

车开得快，因此也震动得厉害。我和另一个人坐在车上，还有一个搭客坐在司机台上。我们在车上并不能说是坐，不过是半坐半躺地在邮袋上面打滚。车子走了十多公里以后，我那没有习惯汽车生活的脑子给抖得有点胡涂了，也无法领略在万山丛中奔驰的乐趣。

车子逼近六寨时，忽然出了毛病，司机停了车修理许久，才勉强把车子开到六寨。我们在六寨吃饭的时候，又看见修车厂（就叫它做大同修车厂罢）的两个工人在修理我们的车子。这个修车厂就在饭馆的对面。

从六寨出来，我才注意到喇叭不响了。每逢应当按喇叭的时候，司机（也许是押车的）就拍车板来代替。我常常听见砰砰砰，起先觉得奇怪，后来才恍然明白了。

我看见一块高高地耸立着的纪念碑模样的牌子，像展开鹰翼似地从旁边飞过，我瞥见了牌上的字样，才知道它是为着纪念桂黔两省公路的衔接而竖立的。我想，再往前走应该进入贵州省境了。我便注意地往前后看。山不还是一样的么？土不还是一样的么？树不还是一样的么？这四万万五千万人不是一个亲密的大家庭么？省界的区分并不是为着分割一个民族而存在的。我们不要用省界来拘束自己。

下午，车开到独山城外，在邮政局车站前停了下来。

过 独 山

前一次经过独山，我仅仅在车站旁边一条街上走了一会儿，那是在夜晚，我不曾看清楚什么。这次车到得早，我在太和旅社开的那间当街的楼房里充满阳光，纸窗亮得可爱，我一点也不感到疲倦，我真想坐下来写两三个钟头。然而我得出去打听第二天早晨开车的时间，也只好暂时抛弃了这间明亮的屋子。在邮政车站我遇见了一个同车的人，他邀我逛街，但是走在半途，他又有事走开了。我一个人进城去走了一大转。我到处停留，到处看，回到旅馆的时候，黑夜已经帘帷似地挂在我的窗外，我得大声叫茶房点灯了。

独山城相当大，街道窄小而整洁，店铺多，大都是平房。每家门方上贴着崭新的春联，有些写得很有趣，可惜匆匆一瞥，什么都没有留在我的眼底。我只记得门方上贴着“迎亲大吉”、“于归大吉”之类的横额的也不少。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喜庆的城市罢。

夜带来更多的车。车又带来更多的人。卡车、客车、军用车、邮政车、商车，它们线似地停在车站那条街的两旁。各种各样的人带着尘土立在车的四周，行李凌乱地堆在地上。北方口音、江浙口音、两湖口音、四川口音、广东口音、福建口音，它们像一支神奇的乐曲在这里奏起来。

在一家北方酒馆的门前，一个中国青年用英语给两个美国人解释中国菜名。在另一个北方馆子里，两个苏北口音的

绅士向掌柜先生交涉借宿的事。"好，包给我，你九点钟来，我给你预备好房间，"一个熟识的年轻茶房说。掌柜先生加上一句："你先进城去，找不到再来。"穿黄色雨衣挂热水瓶的绅士立刻答道："找不到房间，我才到你这块来。"他说的是真话。

在广场上，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前面，一个山东汉子对着一群人在讲包文拯时代的英雄故事。一个伙伴替他收钱。他讲得很不错，而且讲中有唱，他唱时，那个伙伴还要拉胡琴。听众不少，似乎都很感到兴味。但是他讲了一回，讲到精彩的地方就停下来要钱。他的伙伴把装满角票的香烟纸盒拿到那张放灯和放茶壶的条桌上。他一数，说是只有两块钱，还差三块，要收够了钱，他才肯接下去讲唱。他等待着，说了些鼓动的话，于是有人叫了："拿去！"伙伴去接过来，只有两角。"还差两圆八！"他嚷道。另一个人叫："拿钱去！"是一张两圆的钞票。"还差八角。"他倒这样认真。我也出了一块钱。他高兴地宣布："多了两角，下回少要两角。"这个汉子也辛苦了，从山东跑了这么多的路来到这里。

早晨天没有亮，我就起来，把行李拿到邮局车站门口。街上已经有不少的行人了。车站的大门还关着，我坐在门前白石上等候天明。

过了半点多钟，司机慢慢地走来敲门，门开了。我和另外两个客人也跟着进去。今天换了一个司机，也换了一辆车。邮袋在昨晚就装好了。我和昨天那位同车者仍然必须躺在邮袋上面。车上多一张油布，却少了一个竹篷。

六点钟光景车子飞也似地开出了独山车站。车一路颠簸

着，我们也在邮袋上面颠簸。风相当大，叫人有点受不住。我看见阴暗的天色，就一直耽心着下雨。而且和昨天那位司机一样，我们这位司机在中途也带了几个“黄鱼”，叫大家挤在一块儿，连腿也伸不直了。

但是不管这些，我仿佛看见贵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高兴地想：下午我便可以在贵阳的大街上散步了。

3月22日在贵阳追记。

贵阳短简*

我还记得你对我说过你讨厌贵阳的天。你似乎十分相信那句老话："天无三日晴。"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我在这里接连看见几个美丽的晴天。头上没有一片云，天空是淡青色的。阳光给树叶薄薄敷上一层金粉。大群苍鹰展开两翅在空中自由地翻腾，麻雀在屋檐上愉快地讲话。一阵微风吹到脸上，就像是一只熟习的手在轻轻抚摩。桃花盛开，杨柳也在河畔发芽。我呼吸着春天的空气。

我坐在"社会公寓"的一间整洁、明亮的小小楼房里给你写信。窗下是一个有绿树点缀的天井，我的书桌安放在窗前。对面楼房后耸起来一座八角亭的第三层顶楼，顶尖是用五个颜色不同的磁瓶叠砌起来的，这时它正在午后阳光下灿烂地发光。八角亭的每只角尖上伸起一个骄傲的龙头。在一个龙头的旁边忽然飘起了一只白白的小风筝。棕色的书桌还是新近油漆过的，在它的发亮的表面上也有一块小小的天，不过颜色却淡成灰白了，有时我俯下头就会看见一只鹰在桌面上掠过。除了鹰，这里还有乌鸦和它们那单调的呱呱声。

---

* 本篇及下篇《筑渝道上》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宇宙风》第一二九期。发表时总题为《贵阳短简及其他——〈旅途通讯〉续篇》。

晚上我又看见更美丽的星天。其实这是月夜，但是我更喜欢提说星星，一钩新月，好些星星，蓝天显得很亮，星星像灯一般地挂在我的头上，好像我们随便拾起一个石子掷去，便可以把它们打落下来。为了这样的夜，我宁愿舍弃我的睡眠。

离开天，再来看地、看人，我想这些应该和你两个月前看见的差不多。街道不会变。人也不会变。人永远是那样，街道也永远是那么拥挤。

昨天下午我在大街上散步。我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想头，眼前那些人似乎都是过路的、活动的，他们的脚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不停地跑，朝着各个方向跑，匆匆忙忙，去了回来，回来又去，到处都是站口。大家抢先恐后地挤到一个无形的热海里去洗一回澡。头上是汗，心里是火，大家热在一起，大家在争取时间，大家在动、在战斗。大家都疯了。

"走啊，走啊，快向前走啊！"到处都是这样的叫喊，高声的、低声的、有声的、无声的，似乎整个城市都在附和着，整个城市都在动。

汽车的摩托响起来；沿着公路无穷无尽的车子开过来又开出去；商货卸下一批，另一批又装上了一部车子。麻袋、蒲包、木箱……有的在城内留下；有的却从城内往外流去。这里原是一个转运的站头，它又是三条叉路的中心点：从这里有无数的车辆开往重庆、昆明和桂林。

每个旅店门前都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最引人注目的白字："今晨有车直放重庆、昆明、金城江，请向本帐房登记。"或是金城江，或是昆明(曲靖)，或是重庆，在黑板上每天至少

总有一个地名。真有车开么？没有那样的事！或者偶尔有一辆商车开往什么地方托帐房代拉两个客人，这倒是可能的。半年前我经过这儿，住在一家旅馆里，就看见两个去重庆的学生为了坐车的事跟旅馆的人打架，听那两个学生的话，好像是人家先收了他们的钱才去找车，而车又不好。事情过了半年，我也记不清楚了。不过现在有一件事倒是确实的：运输统制局禁止烧汽油的商车从这里开行。要把汽油车改装上烧木炭的设备，也不是短时间内办得到的事，那么哪里来的车子直放××呢？难道是为了安慰旅人，减轻他们的等待的痛苦，才故意挂上这块黑板，绘上一点点希望的彩色么？

"我明天走了，"能够说这句话的人是幸福的。可是幸福的人每天只有少数。住在旅店里和亲友家中焦急地等车的人不知道还有若干。中国运输公司的班车是照常开行的。到车站去登记罢。往重庆可以在十九天以后买票；去金城江必须整整等待一个月；曲靖的班车从三月四日起就停开了。那么怎样走呢？我们能够飞么？不走，难道还可以把旅馆当做家？况且旅馆都有规定，限制旅客久住。即使旅馆可以通融，但是那样高的房钱谁能够长期负担？

我在这里等了六天了，不知道还要等待若干时候。从物价较低的地方跑到物价高涨的这里住下来，而且还要到生活程度更高的地方去，我也跟着别人跑。为着什么？难道我也在发疯？但是我不管这有限的旅费是否会在这长期的等待中耗尽，我每天仍旧安静地在明亮的窗前读书，或者在暖和的阳光下与平静的星夜里在"社会公寓"门前小河边散步。我的心

的确是安静的。倘使我在争取时间这一点上战败了，那么就让我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一会儿罢。

你知道我的脾气。我懒得为找车的事情到处奔跑。其实这句话也有点夸张。我已经奔跑过了，事情也有了眉目，说不定再等两天我便会离开贵阳。

1942年3月25日在贵阳。

筑渝道上

别贵阳

听说是早晨六点钟开车，我不等天亮便醒了，用手电筒照着看表，不过四点多钟，“公寓”里还是一片黑，一片静。我想再睡一会儿，闭上眼睛，脑子里却好像起了骚动似的，思想起落不停，我觉得烦躁，便睁开眼从床上坐起。天开始泛白色，房里的桌椅在阴暗中渐渐地露了出来。等我穿好衣服，用昨夜留下的冷水洗了脸漱过口，茶房才用含糊的瞌睡声来叩门。

我应当感谢这个年轻的茶房，他为我至少牺牲了一小时的睡眠，他把我的两只皮箱提下楼，又为我打开“公寓”的大门，还跑到街上去叫来一部黄包车。

天已经大亮，麻雀吱吱喳喳地在檐前叫个不停，清晨的凉风送我上车。我望了望河边的几株绿杨，桥头停着好几辆去花溪的马车。只有箱子似的车身，马不知歇在哪里，倘使不离开贵阳，我今天会坐这样的车到花溪去。但是现在我失掉机会了。啊，不能这样说，我看表，只差十分钟就到六点；黄包车还要走一大段路，又有上坡路，说不定我到车站时，邮车已经开走了。我很着急，可是车夫拖着人和箱子走不动，也没有

办法。

我后来下了车让车夫单拉行李，车子终于到了邮车站。我并没有来迟，好几部汽车都停在站上。开重庆的汽车到七点钟才开出车站。这次我安稳地坐在司机台上，两手抱着皮包，眼光透过玻璃窗直望前面的景物。

街旁的店铺依次向后退去，尘沙在空中飞腾，汽车跑着、吼着，沿着灰白色的公路，离开了阳光笼罩的贵阳城。车很兴奋，我也很兴奋。

筑 渝 道 上

汽车疯狂似地跑着。它抛撇了街市，抛撇了人群。它跑进了山中，在那里它显得更激动了。

公路像一条带子，沿着山坡过去，或者就搭在坡上，叫车子左弯右拐，有时绕过山，有时又翻过山。我只见一座一座的山躲到我后面去，却不晓得走过了若干路程。

山全是绿色，树枝上刚长满新叶，盛开的桃李把它们的红白花朵，点缀在另一些长春的绿树中间。一泓溪水，一片山田，黄黄的一大片菜花，和碧绿的一大块麦田。小鸟在枝头高叫，喜鹊从路上飞过。两三个乡下人迎面走来，停在路边，望着车子微笑。七八匹驮马插着旗子摇着项铃慢吞吞地走着，它们听见了车声便慌张地让路。

这一切抓住了我的心。我真想跳下车去扑倒在香味浓郁的菜花中间，我真想像罗曼·罗兰的英雄克利斯多夫那样

叫道：

“为什么你是这样地美？……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

一片土，一棵树，一块田……它们使我的眼睛舒畅，使我的呼吸畅快，使我的心灵舒展。我爱这春回大地的景象，我爱一切从土里来的东西，因为我是从土里来，也要回到地里去。

生命，无处不是生命。在现代化的城市里生命常常被窒息；在这群山中，在这田野上，生命是多么丰富，多么美！

正午我们在坝水镇吃中饭，阳光当顶，天气相当热。午前我们的车子经过乌江，那是一段从石山中间凿出来的危险路，车子紧紧地傍着悬崖走，一旦失脚，便会落在无底的江中。铁桥是新近造成的，高高地架在江上，连接了两座大山。车子过了桥，便往对面的山上爬去，我转脸一望，已经绕过一个大圈子了。下午，太阳快落坡的时候，我们到了被称为“黔北锁钥”的娄山关，车子再往前走，从山上转着急弯盘旋下去，路也是相当危险的。司机精神贯注地转动车盘。我朝下望，公路在两座绿色的高山中间一弯一拐，恰像一条山涧流向我的眼光达不到的地方。车子一颠一簸地往下滚动的时候，我注意司机的脸部表情，那种严肃和紧张是看得出来的。但是我放心了，仿佛眼前就是平坦的大路。

我们到达桐梓的时候，太阳刚落下山去。月亮已经挂在天空了。又是一个温暖的月夜。

晚上在桐梓的街上散步。只有几条街，相当整齐；还有电灯，这倒是我没有料到的。

我和另一位乘车者这一夜就住在邮车站附近一个人家，

离城有一公里远，我们踏着月色走回那边去。坐了一天车子以后，走在宽阔的马路上，我觉得非常爽快。

第二天早晨天不亮，我就起来了，可是在车站上还耽搁了好一阵子。天色阴暗，我们头顶上便是大片灰暗的云，好像随时都会落雨似的。

车子经过花秋坪，这里又是一个危险地方，不过我在车上什么也看不见。车到山顶，四周全是云雾，我看见一块写着“花秋坪全景眺望台”的牌子。从那里望下去，我应该看见许多东西，但是一片雾海把它们全遮住了。车就在云雾中走，前后都好像没有路似的。然而转一个弯，过一个坡，路自然地现出来了。下了山，抬头一望，山头云雾弥漫，我不觉疑惑地想起来：我真的是从那座山上下来的么？路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换了一个司机，是广东人，也是一个熟手，和昨天的湖北司机一样，而且他更镇定，更沉静，开车更有把握。我用不着耽心。

押车的还是昨天的旧人，他坐在邮袋上。每到一个邮局或者代办所，车停住，他就得爬下来办事情。昨天在遵义搬了那么多沉重的袋子下来，也够他辛苦了。今天的工作倒轻松了些。

车子过綦江，并没有停多久，但我们也下去站了一会儿。坐得太久了，也是一件苦事。然而前面还有八十几公里的路。

在一品场停车受检查，海关人员和宪兵都爬上车来，检查相当仔细，我的两只箱子都打开了。在前面另一个地方还要经过一次检查手续。每一次检查都告诉我们：重庆城就近在目前了。

五点半钟，车子到达海棠溪 在公路车站前我瞥见了一个朋友的影子，他追上来在车窗外向我招手，我还来不及回答他，车子就把我载到江边叠满石子的滩上。

我下了车，望着那个向我跑过来的朋友的影子，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现在我终于到了重庆了。

1942年3月30日在重庆。

成渝路上*

早晨天刚刚亮，车子从城里开出去。我向着那个拿着手杖在车窗外频频点头的朋友挥了挥手，他那带睡意的笑脸仿佛还在我的眼前摆动。但是车子却发出巨大的吼声滚滚不停地沿着宽广而倾斜的马路驶下去了。我勉强睁开疲倦的眼睛，望着窗外的街景。最后的几点灯光灭了。一阵微风，一股眩目的光从失去了玻璃的车窗扑进来。车子在清洁的南区马路上沿着山转弯倒拐，一条大江低低横在我的右边，公园中昂然自得的绿树常常捉住了我的视线，我偶尔伸出头去望天，乳白色中泛出一点浅蓝。一个晴天就要在车顶上展开了。我觉得心里一阵爽快，慢慢地闭上了我的沉重的眼皮。

车子停住了，我睁眼看窗外，一条较安静而整齐的街，寥寥几个行人。晓风轻轻拂着我的脸颊，我的眼皮又垂下来。睡梦模糊中我又觉得车子开动了。我的身子跟着车身颤抖，我感到一阵舒适，我一夜没有闭眼，现在算是得到了补偿。这以后汽车一停一动，我都不去注意了。我也不知道这样迷迷糊糊地睡了多久，忽然听见有人唤我，我睁开眼睛，才发觉车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

子在青木关停了，这是司机在对我讲话，他要我下车去休息一会儿，他还要取用放在我坐垫下面木箱里的东西，大概是钳子之类罢，我也没有留心。

下车走了一阵，我觉得精神渐渐地恢复了。这里的马路和房屋对我似乎并不陌生。我去年从成都到重庆搭的公路车在这里坏了，耽搁了半天，要不是意外地遇到另一辆车，我和一位年纪较大的朋友，就会在这个地方睡一晚上桌子，因为那时客栈已经住满了人，我们只能在一个茶馆里面找到两张桌子，而且还付过了定钱。这仿佛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一转眼就过了一年多！在这中间许多人、许多事都改变了，我不愿意多想。

我看天，天空全是灰云，不过顶上是亮的，好像要下雨，又像不会落雨。我的行李放在卡车上，没有篷遮住，有一个包袱，是朋友托我带到成都的，里面全是小孩的衣服，我耽心会给雨打湿，正想爬上去把包袱取下来放进司机台内，司机又招呼我进车了。押车的高高坐在卡车上，他知道我的意思，便对我说，不要紧，今天不会落雨。

他说得对，这一天的确不曾下雨。车子跑得极快，一晃便过了璧山，再过来凤驿，过永川，过荣昌，过隆昌，下午三点多钟车子过了椑木镇驶上渡船，我仍旧坐在车内，望着窗外一片大江，对岸的景物渐渐地移近。左边未完成的内江铁桥的桥墩寂寞地立在江中，依旧是它们几个，保持着同样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还没有一道桥来连接它们。"什么时候呢？"我每次经过这里，都要暗暗地问一句。但是没有人回答我，恐怕也

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罢。

船走得慢，我看看司机，他的脸上带着安闲的笑容。我真佩服他，他怎么能够这样镇静！先前在来凤驿发生的一幕喜剧还留在我的眼前。

车子停在来凤驿，就是这个司机，他安闲地坐在我旁边，我望着窗外的来往行人。一个人跑到他的窗外同他讲话，起初声音不高，后来忽然吵起来了。我掉过头，正看见司机伸出手刷的一下在那个人的脸上打了一个嘴巴。这一记耳光很有效，立刻激起了公愤，那个人一嚷，许多人都跑来围住车子。那个人，苍白色的瘦长脸，发红的眼睛，没有血色的嘴唇，他站在车窗外，伸进一只手拉住司机的领口，一面嘶声嚷着："还我的钱，还我一百二十块钱，不还钱就脱不了手。你把人害得好惨。你钱到了手等我去喊客人来，你就开起车子跑了。人家找我赔钱，害得我当衣裳当裤儿来赔。四月十四日的事。好容易今天等到你，你不给钱还要打人！我们找街坊讲个道理！"

司机的领口被捏得紧紧的，他挣不脱，也没有别的话好讲，起初还分辩说，钱已经在永川交还给谁了；后来又说，拿出条子来，就还钱；最后，就只说，"老子没有钱。你敢拦车，当心你脑壳！"

"要钱又不犯罪，难道还会砍脑壳！"旁边有人不平地叫道。又有人在嚷："把他拖下来，拖下来讲！"司机似乎处在更不利的地位了。他应该听见这些声音。可是他的脸上仍然带着笑容，他不慌不忙地说："你先放开手，放开手我就还钱。"

"哼，放开手你就开起车子跑了，我在哪里找你去？"要钱

的人气恼地嚷道。

人行道上有两个女人在讲话。一个三十左右的妇人指着说："就在那个当铺里头当的，我都晓得。"另一个年纪较大的同伴接口道："碰到了，还不出钱来，喊局长作个保人也好。"

"虽说而今钱不值钱，一百二十块钱也不好乱拿。今天不还钱，恐怕走不了路。虽说是国家的车子，不该挡；带'黄鱼'也不是不犯法的事，闹到上头去，司机也有罪，"另一个五十岁光景的男子手里捏着一根长长的叶子烟袋在一旁自言自语道。

司机的脸上仍然带笑，不过他也不再替自己辩护了，他只是温和地说："放开手，我就下来。"那个人果然放开手。他便打开门走下车来，若无其事地对要钱的人说："下来了，没有钱又怎样？"

接着是一阵争吵，人声嘈杂，好些"打抱不平"的人拥了上来。司机算是让了步，他跟着人们到邮局去了。

过了好一阵，我才看见司机从邮局里走出来，脚步慢，态度安详，脸上泛着微笑，仿佛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情似的。他向着车子走来，打开车门，进到车里，一只手捏住车盘。车子刚刚开动的时候，他忽然大声骂起来："哪天老子开车把你们都辗死，一个都不留！"只有在这个时候他的笑容才消失了。他脸上的表情是相当可怕的。

下午四点钟光景，车子到了内江，依旧是那些热闹整齐的街道，和我去年看见的没有两样。我认得这个城，我去年在这

里住过一个晚上，现在又得住一夜了。车子穿过城，驶往郊外的车站，车站离城约有一里多路，在绿树丛中；据说这里是一所公园。

城里旅馆内空房不多，我走了几家旅馆，才找到一个房间，相当宽大，有藤椅和茶几。我在椅上坐了一些时候，又写了两封信，才出去逛街，顺便找一个干净的小馆子吃了晚饭。

我走出饭馆，天已黑尽了，街上行人不少，店铺里灯火相当明亮。在街口，一个人家的檐下高高地摆着一张讲"格言"的桌子，一个老头儿坐在桌边椅上，讲说一段丈夫虐待贤慧妻子的故事。他讲得津津有味，而且摹仿几个人讲话的口气，讲到沉痛的地方，甚至站起来，用带哭的声音申诉，因此颇能感动听众。那些人（男女老幼）仰起头不瞬眼地望着他，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站在人丛中听了一会儿。二十几年前我常常立在街中听这一类劝善奖孝的故事。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曾被它们感动到流眼泪。内容似乎还是一样，不过那时候人们称这为"圣谕"，现在改称作"格言"了。桌子上仍然有一对红烛，却只燃着一支，香炉取消了。一块黑牌子上面刻着两个金字"格言"。

九点钟光景，我走回旅馆，雇好挑夫，叫他明天早晨天刚亮就来找我，我害怕我会"睡过了头"赶脱车。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用手电筒照着路走出去，叫醒茶房给我点灯倒脸水。我等待挑夫正等得不耐烦时，他才慢吞吞地走来。我们赶到车站，车子已经准备好，快要开动了。

今天换了一部轿车，是去年的新车子，司机台旁边只有一扇门，另一扇门不开在我的旁边，却开在后面，我要下车应该先转到后面去，比较不方便。因此我这天下车的次数大大地减少了。司机换了一个，押车的仍是旧人。据押车的说，今天的司机是局里开车开得最好的，本来是领班，用不着自己开车了，他觉得闲着无聊，想出来走一趟，或者可以叫“手头松一点”。

押车的说得不错，这个司机开车果然极稳。我们平平稳稳地经过了许多地方。在球溪河吃中饭，休息了一会儿。这个地方我去年也到过、住过，一切和我去年看见的相同，这个车站，这个客栈，我去年也在这里吃过饭。我还记得，那个傍晚我要了四两酒、一盆菜、一碗汤，就在临街的桌旁坐了两个多钟头。我想多喝酒，可是只喝了三分之一，其余的就送给一个烂脚的小孩搽疮了。

饭后上了车，我觉得很倦，就在车上打瞌睡。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车子转弯开上一道桥，把我惊醒了。我睁眼一看，正看见下面河里一辆卡车侧着身子静静地躺在桥墩旁边。这样的覆车的惨剧我看见不止一次了。公路相当宽，又不是大转弯，开车应该容易。“平路易翻车”原是一句空话，却不想在公路上倒常常应验了。

车子开到资阳车站，正要停下，忽然迎面驶过一部卡车，我匆匆一瞥，来车上似乎有十多个人，其中一张脸却是我十分熟习的。但我一时想不起来这是哪一位朋友的面容，下车去看又不方便，而且我不知道来车是不是要在资阳停留。我正

在思索，忽然听见一个熟人的声音唤我，我惊喜地转头一看，站在车窗外的原来是一位别了八九年的老友。他还是那样年轻，脸上带着和从前一样的笑容。他伸手进来同我握了手。我们谈了几分钟，他问起几个上海友人的近况，我把我知道的全讲了。十年前在上海闸北宝山路鸿兴坊世界语学会里，我常常和这位友人见面，当时常常在一起的还有几个朋友，如今有的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有的还陷在上海过着艰苦的生活，有的则在内地飘流、久无音信了。这个友人几年来都在电报局服务。我知道他服务的机关，却不知道他服务的部门和地点。这次他带了几个职员乘一辆卡车在成渝一带视察，现在他们从成都回重庆，顺路在成渝路沿线各处勾留。车子今天从简阳开出，准备到资中去，他在车上看见了我，才吩咐司机停车来和我见面。虽然是匆匆一晤，但他的盛情却是值得感激的。分别时他还给我留下一个重庆的地址。两部车子相背地开走了。我仿佛还在窗外树丛间看见他的笑容，我觉得心里暖得很。

车子开得很快，很稳。……一瞬眼车子就在龙泉驿"爬坡"了。我的眼光跟着车子左拐右转，公路在山上盘旋，车子不慌不忙地打着圈子。我很兴奋，我想起那个老友刚才说过的话："成都是个好地方，你可以多住些时候。"

到了成都，进了城，车子在站上停下来，我看表，不过三点多钟。这次到得这么早，倒是我想不到的。

1942年5月2日在成都。

怀　念

《怀念》，一九四七年八月由开明书店初版，一九四八年二月再版。

前　记

一年前，或者可以说两三年前，我就想到编印一本这样的小书，为着我自己，也为着读者。可是我始终没有充足的时间让我从容构思落笔，一直拖到今天我才能了却这个心愿。我颇觉一身轻快。

老实说，我不曾写过一篇可以传世的文章。我编印一本小书而说“为着读者”，绝非发夸大狂，以为读者可以从我的书中学得什么扬名显亲之道。我只想介绍他们去接近几个平凡的人。那些人虽说平凡，却也能闪出一股纯洁的心灵的光，那是一般大人物所少有的。他们不害人，不欺世；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物质贫乏而心灵丰富；爱朋友，爱工作，对人诚恳，重“给与”而不求“取得”。他们是任何人的益友。我从他们那里得过不少的好处，我必须让别人也认识这些纯洁的心灵。

我说“为着我自己”，因为这本小书将是我的最亲切的伴侣。我没有福气同那些人永做朋友，更无法填补这些不可补偿的损失。我现在仅能以我这管拙劣的笔，凭着记忆和感激抓住他们的一言一行，让这些篇页永远给我督促和鼓励。我当努力做一个不会玷辱他们友情的人。

我称这本小书为《怀念》，读者可以看见满溢在字里行间的“怀”和“念”。我每一想起我在这些年中间失去的几位好友，我就无法压抑这烧心熬骨的怀念。在寂寞痛苦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写下了这些篇怀念的文章。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这八年中间，我一共失去八位好友(这里面有一位还是我的哥哥。病故的七个人中只有世弥一个死于产褥热，其余六人则都死于肺病。抗战期间的中国好像成了肺病的培养所,“胜利”后情形也未见改善)，所以这里也有八篇纪念文章。另外一篇题作《怀念》的短文，则是香港陷敌后我在桂林怀念憾翁和其他陷在香港的友人时写的，记得那篇短文刚发表,憾翁和别的朋友就到桂林来了。圣泉至今生死不明，虽说凶多吉少,但我仍然希望他今天还活着,还能够听见我的呼唤。所以甚至在这样的一本纪念的小书中，也还有希望的闪光。

我绝不悲观。在中国还有不少的好人，我认识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死去的更是极小、极小的部分。我希望我能有荣幸为活着的友人写一本书。

1947年4月上海。

纪念友人世弥*

我想不到我会来写这样的文章，记忆逼着我写。记忆使我痛苦。甚至在这样一个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中，我还受着个人情感的熬煎。我不说我们民族的损失，固然世弥（即罗淑）是中国的一个优秀的女儿；我不说我们文坛的损失，固然世弥的作品显示了她未来的光辉的成就；因为在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许多青年有为的生命，许多优秀卓绝的文学才能已经变成了白骨黑灰。为了一个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这样的牺牲并不算是昂贵的代价。许多人默默地死去，许多人默默地哀悼他们的死者，没有谁出来发一声不平的怨言。我也没有权利把我个人的悲痛提出来加在这许多人的悲痛上面，促他们多回顾“过去”，给他们多添一分苦恼。他们需要的是“遗忘”，要忘记过去的一切，要忘记灾祸与悲痛，像堂·吉诃德那样地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中去。

然而我不能够制止个人的悲痛，我无法补偿个人的损失。这一个友人的死给我留下的空虚，到现在还不曾得到填补。记忆逼着我写，悲痛逼着我写，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一些朋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文丛》第二卷第二号。发表时题为《纪念一个友人》。

友，我要写下这篇关于世弥的文章。

世弥是一个平凡的人，甚至在她的外貌上，人也看不出锋芒。她写过文章，但她的文笔并不华丽，那里面有的是一种真实、朴素的美。她不喜欢表显自己，她写文章也不愿意让朋友们知道。她把她的热情隐藏在温厚的外表下。许多人说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却少有人知道她是社会革命的斗士。在我们这些友人中间，有时因为意见的分歧会损害友情，个人的成见妨害到事业的发展，然而她把我们（至少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团结在一起。她的客厅仿佛成了我们的会所。但我们并不同时去找她，我们个别地去，常常怀着疑难和苦恼去求助于她。她像长姊似地给我们解决问题，使我们得到安慰和鼓舞。她的考虑十分周到，她的话语简单而有力量，我们都相信她，敬爱她。

她有一种吸引力把许多朋友拉到她的身边，而且使他们互相接近、了解。一个朝鲜朋友被日本人追缉得厉害的时候，他到上海来总是由她和她的丈夫款待，他就住在他们家里，或者她替他转信。那个朋友也是我的友人。艰苦的环境使他的头发在几个月内完全变成了白色，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衰老。有一次我受了一个朋友的嘱托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带了一支手枪、一百颗子弹和一包抗日文件到她的家里寄存。她毫不迟疑地收下了我提去的那口箱子，让那些东西在她的家里放了一年，到她离开上海时才让另一个朋友拿去。这些事倘使她活着，她一定不让我说出来，而我也不便写。但是如今她和我已经成了两个世界的人。我不曾当着她

的面说一句感激的话，我知道这会使她不高兴。然而这时候思念刺痛我的心，我愿意让人知道我们从她那里得过的恩惠。要是这触犯了她，她也会原谅她的朋友，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不敢想，有时候我甚至不能相信世弥的死讯是真实的。去年九月八日上海西车站的分别仿佛还是昨天的事。上海沦陷后她和宗融打过急电来探问我的安全，又屡次写信劝我离开“孤岛”。我答应今年到他们那里去。如今我失了约，而她也不能活着来责备我了。

这三四年来，我在生活里、事业上遇到各种麻烦，我缺乏忍耐，不能从容地应付一切，常常让自己沉溺在苦恼中间。朋友不宽恕我，敌人不放松我。我不能严格地改正错误，我反而让自己陷在绝望的心境中。好几次我带着气愤到她那里倾诉，她仔细地开导我，安慰我，甚至指责我的缺点。她知道我的弱点、我的苦恼和我的渴望。但是她绝不姑息她的友人。我是在朋友们的督责下成长起来的。她便是那许多朋友中间给了我帮助最大的一位。但是如今我不知不觉间失掉了这样一位友人，我的悲痛太大了。

我唠唠叨叨地叙说我个人的损失，我太自私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失去这一个连锁，那损失比我个人的更大。而且就个人的悲痛来说，我们大家热爱的马大哥，我认识他在他和世弥结婚以前，我知道世弥在他的生活里、情感上占着什么样的位置，我知道世弥是他的一个怎样的不可分离的生活与工作的伴侣。他们九年来始终没有分离过。如今一只残酷的魔

手把她抓了去，永远不放回来。留下他一个人带着那个聪明可爱的小弥和一个新生的孩子（那个男孩是她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八岁的小弥天天嚷着要"妈妈"，新生的孩子又无知地啼哭等着人喂奶。做一个这样的父亲，不知道要花费多少的心血。对于在书堆里过惯生活的马大哥，我简直不敢想象他的悲痛。我不能够安慰他，因为他的灾祸太大了。但是我想借用意大利爱国者马志尼劝赫尔岑的话来劝他：

> 勇敢些，你要抑制悲痛，不要叫你的精神破碎。我常常以为我们亲爱的人的死会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你的义务是去做一切她所喜欢的事而不去做任何她所反对的事。……

现在正是这个时候了。

别了，我永不能忘记的友人，我不再用言词哀悼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样做。你不愿意在这样的年纪早早地死去，你更不会愿意在你渴望了几年的抗战的烽火燃烧的时候寂寞地闭上眼睛。但是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了。你留下了这么深的敬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失去了你这样一个连锁，可是我们已经坚实地团结起来。你的手所放下的火炬，也将由我们接过来高高地举起。我们会把它举得更高，使你的和我们的理想早日实现，我知道那会是你最快活的时候。到了那一天，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理想里。

1938年4月在广州。

悼 范 兄*

昨夜窗外落着大雨，刚刚修补好的屋顶，阻止不了雨水的浸泻，我用一个面盆做武器，跟那接连不断的雨滴战斗。我躺在床上，整夜发着高热，不能闭上眼睛，那些时候我都想起你，我善良仁厚的亡友。我的心燃烧着，我的身体燃烧着，但我的头脑却是清醒的。在这凌乱地堆满家具和书报的宽大楼房的黑暗中展开了十二年的友情。你的和蔼的清瘦的面颜，通过了十二年的长岁月，在这雨夜里发亮。在闽南一个古城的武庙中，我们第一次握手，这是我最初从你的亲切的话里得到温暖和鼓舞。没有经过第三个人的介绍，我们竟然彼此深切地了解了。是社会改革的伟大理想把我们拉拢的。你为着自己的理想劳苦了二十年，你把你的心血、精力、肌肉都献了给它，人们看见你一天天地瘦下去，弱下去。一直到死，你没有停止过你的笔和唇舌。

我没有忘记，就是在十二年前那个南国的秋天里，我们在武庙的一个凉台上喝着绿豆粥，过了二三十个黄昏，我们望着夜渐渐地从庭前两棵大榕树繁茂的枝叶间落到地上，畅快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范兄，指陈范予。

谈论着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美丽的未来的梦景。让我们热情的声音，在晚风中追逐。参加谈话的人，我记得有时是五个，有时是六个。他们如今散处在四方，都还活得相当结实，却料不到偏偏少了一个你。

在朋友中你是一个切实的人。即使在侈谈梦景的时候，你也不曾让热情把你引到幻想的境域里去。在第一次的闲谈中我就看出来，甚至当崇高的理想在你脸上发光的时候，你也仍旧保持着科学的头脑。靠着你，我多知道一些事情，我知道怎样节制我的幻想，不让夸张的梦景迷住了我的眼睛。凉台上的夜谈并不是白费的。至少对我已经发生影响了。

在那个古城里，我们常常同看秋夜的星空。在那些夜里我也曾发着高热，喝着大碗神曲汁，但是亿万的发光的生命，使我忘记了身体的燃烧。从星球的生命中，我更了解了“存在界”的意义。你告诉我许多关于星球的事，让我知道你怎样由宇宙问题的探讨，而构成了你的生活哲学。

白天你又从外面那些浮着绿萍的水沼、水潭里带回来一杯、一瓶的污水，于是在你的书桌上，显微镜下面展开了一滴水中的世界，使我看见无数的原生动物的活动与死亡。

在你这里我看见了那无穷大的世界，在你这里我也看见了那无穷小的世界。我知道人并不是宇宙的骄子，我知道生命无处不在，我知道生命绵延不绝。你的生活哲学影响了我的。你的待人的态度也改变了我的。倘使我今天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抽去了你的影响，则我将成为一个忘恩的人而辜负了亡友的期望了。

你不是一个空谈家，也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英雄。在武庙凉台上的夜谈中你就显露了你的真实面目。谦逊、大量、勤勉、刻苦，这都是你的特点。你不是一个充满夺目光彩的豪士，也不是一个口如悬河的辩才。你是用诚挚，用理智，用坚信，用恒心来感动人的。别人把崇高的理想用来做成自己头顶上的圆光的时候，你却默默地在打算怎样为它工作，为它牺牲。所以你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幸福，将自己的心血作为燃料，供给那理想多放一点光辉，却少有人知道你的名字，或者还有些不做一事的人随意用轻蔑的态度抹煞了你的工作。

的确在生前你是常常被人误解的。有人把你看作一个神经质的肺病患者，有人把你视为一个虚伪的道学家，还有人以为你只是一个被生活担子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读书人。有好多次那些狂妄的、或者还带有中伤意味的话点燃了我的怒火，我愤慨地、热烈地争辩，我甚至愿意挖出我的心，只为了使友人能够更明白地了解你。我这争辩自然是没有用处的，我的话并不曾给你的面影增加光彩。后来还是你自己用你的笔、你的唇舌、你的工作精神、你的生活态度把许多颗年轻的心拉到你的身边，还是你自己用这些把别人投掷在你的面影上的污泥洗去，是你自己拨开了那些空谈家的烟雾，直立在人们的面前，不像一个病人，却像一个战士，一个被称为"生命的象征"的战士(一个朋友称你做"生命的象征"，她这话的确不错)。

诚然十二年前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肺病患者，而且我们也想得到有一天你终于会死在这个不治之症上。但是和你在一起时我却始终忘记你是一个病人。你的思想、你的言语和你

的行为都不带丝毫的病态。人从你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犹疑，一丝悲观，一毫畏怯。你不寻求休息，却渴望工作。你在各处散布生命，你应该是一个散播生命种子的人。十几年前你写过歌颂战士的文章，到临死你还写出了《生之欢乐》。你最后留下遗言，望年轻人爱真理向前努力。

在《战士颂》中你坦白地说过："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制造更广、更深的洪流。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在《生之欢乐》的开端，你更显明地承认："有人把人生当作秕糠，我却以为它是谷粒。有人把人生视同幻梦，我却以为它是实在。有人把人生作为苦乐，我却以为它是欢乐。有许多人以人生为苦恼、黑暗、艰难、乏味、滞钝、不自由、憎恨、丑恶、柔弱的象征，我却认为人生是爱、美、光明、自由、活泼、有为、创造、进步的本身。"

你还勇敢地叫喊："人生的美、爱、力量，都是从奋斗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人不是环境的奴隶，而是环境的主人……从奋斗的人格中，我们窥见生之光明，生之进步，生之有为，生之自由。……人生的解释受了积极思想的指导，人将为自由，为光明，为爱，为美，为创造，为进步而生，因此人将与压迫、黑暗、暴行、丑恶搏斗。燧石因相击而生火，人则由奋斗而尝到生之欢乐。"

我从未听见过像这么美丽的洋溢着生命的战歌！在朋友

中就只有你一个人是这么热情地在各处散布生命，鼓舞希望！在一个孩子的纪念册上你写着："希望是人生所需要的，人如没有希望，何异江河涸了流水。"你这条江一生就没有涸过流水。不但这样，而且你这条江更投入在"那个人类生活的大海里"，用你自己的话，"在大海里你得到了伟大的生命力，发见了不灭的希望"，的确一直到死，你没有失掉希望。

你和我都曾歌颂过战士，我们的战士所用的武器，不是枪和刀，却是知识、信仰，和自己的意志。他把自己的意志锻炼成比枪刀更锋利、更坚实、更耐久的东西。他永远追求光明。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他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对于他，生活便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你正是这类战士的一个典型，你从不知道灰心与绝望，你永没有失去青春的活力。

"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这是我称誉战士的话。你确实做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在你的最后两年间，你的肺病已经进入第三期，你受着那么大的肉体痛苦的折磨，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你还实践了你那"以有限的余生，为社会文化、思想运动作最后努力"的约言，完成了《科学与人生》、《达尔文》、《科学方法精华》三部译著。这许多万字，都应该是在"胸部剧痛"和"咳嗽厉害"中写成的。最后躺在死床上，你还努力写着你那篇题作《理想社会》的文章。可见一直到死都是些什么事情牵系住你的心。

十几年来你努力跟死挣扎，你几次征服了死，最后终于给

死捉了去。这应该是一个悲剧。但是想到你怎样在死的威胁下努力工作，又以怎样的心情去接受死，我觉得这是一个壮观。一个朋友说，临死的你比任何强健的友人"都更富于生命力"！另一个青年友人却因为你以濒死之躯竟能够如此平静地保持着"坚决的信心和旷达的态度"而感到惭愧。一个温柔的女性的心灵曾经感动地为你写下这样的赞辞："透过那为病菌磨枯了的身体，我望见了一个比谁都富于生命的欣欣向荣的灵魂！永远不绝望，永远在求生，——为工作而生。"我应该给她添上几句：而且像一个播种的农夫，永远在散播生命的种子。你以一种超人的力量平静地吞食了那一切难忍的病痛，将它们化作生命的甘泉而吐出来。难道世间还有比这更强健的人？还有比这更美丽的生命的表现？

自然在你一生中，经济的压迫与生活的负担很少放松过你。要是换上一个环境，你也许至今还在美国的实验室里度着岁月。你也并不是没有"向上爬"的机会。对你的生活有决定影响的更不是经济的压迫。你为了理想才选取现在走的这条路，而且也是为了理想才选取了过去所走过的路。甘愿过着贫苦生活，默默地埋头工作，在绝望的情形下苦苦地支持着你的教育事业，把忌恨和责难全引到自己的身上，一直到用尽了自己的力量，使事情告一个段落，才又默默地卸下两肩的责任，去到另一个地方开始接受新的工作。倘若单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你不会让工作把你的身体磨到这样；倘若单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你又不会有那么坚强、充实的精力，在患病垂危的最后二年间还做出那样多的事情。

通过了你的一生，你始终把握着战士的武器。你的一生就是意志征服环境的一个最有力的表现，你做了许多在你的处境里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创造自己，只为了来完成更大的工作。你终于留下不少的成绩和不小的影响而去了。你的死使我想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学者龚多塞，他在服毒以前安静地写下了遗言："科学要征服死。"我又想起一个躺在战场上的兵，他看见自己的战胜的旗帜在敌人的阵地上飘扬，才安然闭上燃烧的眼睛。

有了这样辉煌的战绩以后，你对自己的死应该没有遗憾了。你是完成了你的任务以后才倒下的。而我们呢？作为你的朋友的我们，至少我是没有理由来哀悼你的。失去了这个散布生命的人，失去这个"生命的象征"，像这样一个生命的壮观如今竟然在我们的面前永久消去，我们应该感到何等的寂寞。我们应该为这个巨大的损失悲痛。

在这里我不敢提说到个人的私谊，这几年来我已经失掉不少能够了解我、鼓舞我、督责我、安慰我、帮助我的友人，如今又失去这个不可少的你！十二年来的关切、鼓励、期望、扶助（我永不能忘记"八·一三"以后两个月你汇款给我的事，那时你自己也是相当困苦的），现在都成了一阵烟，一阵雾。我在成都得到你的死讯回来，读到你生前寄出的告别信。我读了开头的几句："无论属于公的或属于私的，我有千言万语需要对你说，但我无从说起，"我只有伏在书桌上淌泪，范兄，我不是在为你流泪，我是在哭我自己。

在你的告别信里还有两段我不能卒读的话，我不知道你

是怎样把它们写下来的，你甚至带点残酷地说：

> 自去年冬至节以后，忽然变成终日喘哮不绝，且痰塞喉间，乎卢乎卢作响，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现由中西医诊断，谓阴历十二月一个月为生死关键。
>
> 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因为喉痛，连鲜牛乳、鸡汁都不能自由的吃。四肢和身躯已成枯柴，仅剩了骨和不光泽的皮。我已不能自己穿衣，不能自己研墨执笔，我的身体可说完全失了自由。

在我们这些活着的友人中间有谁受过这样痛苦的病的折磨？又有谁能够忍受这一切而勇敢地一直工作到死？更有谁在自己就要失去生命的时候还能够那么热情地到处散布生命，写出洋溢着生命的歌颂生之欢乐的文章？倘若有一天我也到了你这样的境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保持着你的十分之一的勇敢和热情，像一个战士那样屹立在人世的波涛中间？我更担心自己是否还可以像你那么宁静，那么英勇地去迎接死？

今天仍旧在这间堆满家具和书报的宽大楼房里，窗外街中响着喧嚣的汽车声，尘土和炎热不断地落到我的头上，身上，手上和纸上。时间已是开篇所谓“昨夜”后的第四天了，我的高热刚刚退尽。这几天里我不能够做别的事情，我就只想到你，我善良仁厚的亡友。你现在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一直到最后你还给我们留下一个战士的榜样，你还指示我们一个充实的生命的例子，你对自己，对朋友都可以说是毫无遗憾

的。正如我在前面说的那样，你是尽了你的战士的任务躺下了，你把这广大的世界和这么多待做的工作留给我们。继续你的遗志前进，这正是作为你的友人的我们的责任。范兄！你静静地安息罢，我不能再辜负你的殷切的期望了。

从炎热的下午到了阴雨的深夜，雨洗去了闷热，但也给我带来寂寞。而且这是带点悲凉味的寂寞。一切都睡去了，除了狗吠和蛙鸣。十二年的友情又来折磨我的心。我从凌乱的书桌上，拿起你的信函，你那垂死的手写出来的有力的字迹，正在诉说十二年中间两个友人的故事。武庙中第一次的握手，也就是同样的写这信的手和拿这信的手罢，那么这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的握手了。这样的告别，这是多么可悲痛的告别啊！

但是望着眼前你的活跃的字迹，我能够相信你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么？

凉风从窗外吹入，我伸出头去望天空，雨天自然没有星光，但是我的眼前并不是一片黑暗。我想起了一颗死去的星。星早已不存在于宇宙间了，但是它的光芒在若干年后才达到地球，而且照耀在地球上。范兄，你就是这样的一颗星，你的光现在还亮在我的眼前，它在给我照路！

1941年6月17日夜在重庆沙坪坝。

怀　念*

我读到报上香港陷落的消息，眼前仿佛突然落下一道帷幕，周围显得阴暗起来，又好像从外面吹进一股寒风，连屋内的空气也马上变冷了。

我呆呆地独坐在楼上房里。我的脑子起初迟钝得好像变成了一个铅块，半点多钟以后，我的思想忽然活动起来，而且活动得厉害。在这些时候我的眼前老是隐隐约约地现着你那和蔼的笑容。有一次你的盖着浓黑唇髭的嘴张开，用熟习的声音唤我的名字。但是我睁大眼睛，房内并没有一个人影，窗外安静地横着奇形怪状的石山。我才记起我已经有三个星期不曾得到你的消息了。

我的书桌上还摆着那封未发的信，你的姓名分明地写在信封上面，这里的朋友们常常谈起你，仿佛你随时都可以在我们中间出现，我们不相信你从此就失去踪迹。

三个礼拜原是很短的时期。不过在这些天里永远是大火、轰炸和激烈的战争；永远是饥饿、流血和种种可怕的传说。我们不敢想象你和一些朋友怎样在这种每一刻都接近死亡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现代文艺》第四卷第五期。

环境里活下去。有人残酷地提出一个“死”字，又有人设想你们全进了敌人的掌握。但是我不能相信恶运已经践踏了你们，用一个悲惨的结局埋葬了你们的奋斗的一生。

在我这个楼房里打开窗户，便可以看见马路上、菜畦中摊开的冬日的阳光，宽阔的路上安闲地走着穿了各式各样衣服的男女。他们的笑声和话语常常轻快地飞进我的房里来。这周围的空气是很平静的，很愉快的。在这时候想到另一个地方的激烈的战争和残酷的屠杀，似乎是不可能。要是没有那几张凌乱地丢在屋角的报纸，我还会怀着平静的心情等候你的信，或者看见绿衣人推着脚踏车从马路走下屋前的空地，便匆匆跑下楼去，看有没有从你们那里来的信件。但是我现在不会做这样的事了。我知道等待是徒然的。你不会给我写信来，在你们所处的那种环境里你不会想到写信的事。你即使写了信，也不会有飞机把你的信载到我们这里。

在接连三个礼拜中我做了许多梦，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你和一些朋友都平安地到了这里，或者你们都遭了不幸。像后者那样的噩梦更多，有一两夜它们甚至接连地追逼我。在那些梦中仿佛都有一只魔手扼住我的咽喉，或者一块大石压住我的胸膛，我不断地挣扎着，我终于完全醒过来了。但是我发觉自己躺在灰白色的寒夜里。包围着我的还是那静寂，可以摸到、嗅到、甚至可以看到的静寂。的确静寂带着一种难看的、绝望的惨白色，而且有一种搔痛人鼻子和喉咙的气味。它似乎没有开始，也没有终局。夜也是这样。我醒着，睁大眼睛望着夜，望着静寂。夜是那么深，静寂是那么浓，我的眼光又

是那么微弱无力。于是我的眼皮又垂了下来。

继续来的梦仍然是噩梦。你们又遭遇到不幸。我仍然在跟那些可怖的景象挣扎：残酷的轰炸，大屠杀，一个繁荣城市的毁灭。我自己等着接受和你们的相同的命运，或者我束手旁观你们流血。忍耐到了限度，我又挣扎地醒了，这一次我把一幅棉被掀到床下去了。我突然感到一阵冷。我坐起来，仍是灰白色的夜，仍是无边无尽的静寂。我下床去拾起被来。雨刷刷地落在窗外马路上，这好像是刚刚开始的。我打了一个冷噤，又睡进被里去。

过了一会儿我仍然睁着眼睛。除了夜和静寂，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疑惑地想：究竟先前的是梦，抑或现在的是梦？我想不透。我开始感到疲乏了。忽然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个亲切的唤声：

“××，回来哪！”

接着是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回来了。”

声音继续着，自远而近。同时我的房间里闪动着淡淡的灯光。我看见灯光和人影在窗纸上移动。我不知道走在马路上的是几个人，只听见“回来哪——回来了”的唤声。人们慢慢地走过去。听声音好像这全是女人。这深夜！雨没有停止，反而落得更急了。

但是那几个女人好像没有感觉似的慢慢地走着，叫着。在静夜里她们的叫声显得很凄惨。一声，两声……渐渐地低下去，去远了。

这是母亲为生病的孩子叫魂的声音。同路的大约也是病

人的亲属。我不知道她们一共是几个，不过据我推想，多半是三个。我仿佛听见三个人的讲话声。这样一想，我立刻记起我在什么地方见过的一个景象了。不错，我在梭罗古勃的小说《古屋》[①]里看见了的：三个女人在花园里月光下悲哀地唤着一个孩子的名字，她们等着那个永不会回来的孩子的归来。母亲哀痛地唤着："波利亚，波利亚啊！"祖母含泪回答着："波利亚不会来了，波利亚已经不在了。"姐姐向着月亮伸出手哭喊："波利亚已经被绞死了！"三个人并排站着，望着月亮哭泣。

这母亲的心，亲人的心，是可以历万劫而不灭的。我不能非笑这样的女人，我甚至不想非笑在我窗下冒急雨、犯寒气、为孩子叫魂的迷信的妇女。难道她们真会叫回孩子的失去的"魂"么？自然不会。但是母亲的心有时也会治愈孩子的疾病。

雨仍在落。不知道怎样我的睡意被这一阵雨扫去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我又想到你，想到你们。你们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设法透出来一点消息？或者你们真的不存在了？或者真的陷了在敌人的手里？这不可能！我不相信那些谣言。我想呼唤你们，尤其是你。（我和你曾经共过患难，一同在广州的大轰炸下逃出了性命，一起从广州的敌人虎口中逃出来。那次的情形和这次的应该有十分之四五的相似处，但是这次我却安居在这里，对你甚至无法伸出一只救援的手。）然而你们怎样能够听见我的声音呢？我奇怪：难道

① 《古屋》：陈炜谟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友人的心就不能像母亲的心那样万古长青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静寂的寒夜过去了。接着来的是同样一个痛苦的夜。我又被噩梦惊醒，而且我又听见三个女人在马路上走过去，一路叫唤着。我不能再闭上眼睛，我又在想一些事情。从母亲的心我又想到友人的心。这次我因为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苦恼了。为了安慰我的心，我呼唤了你们几个友人的名字。没有回应。我这声音是不能够越过山越过海的。

于是我只得求助于幻想了：第二天太阳刚刚出来就听见你在窗下唤我，我便下楼去为你开门，让你坐下，喝一杯你喜欢的酽茶，然后听你畅谈脱险的经过。

幻想终于是幻想。我又坐在窗前写这篇怀念的文章了。不，我在这里应该写“坐在楼下饭桌前面”，因为拿起笔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坐在楼上房里，时间是十二月二十几日，现在却是一月十七了。病使我中途搁下笔：我打过一次摆子，好些天不能多用思想，不能做事情，我又白白地浪费了三个礼拜的光阴。这中间，除了谣言外，我得不到一点关于你们的消息。怀念把寂寞堆在我的心上和我的两肩上，我无法排遣，只得再拿起笔每天写一些字，我已经涂坏五张稿纸了。

以上三段是昨晚写的。今天是一个温暖的晴天，这里发过两次警报。现在是午后一点半钟，第二次警报还没有解除，我关起门在楼下饭厅里写字，我仍然在写这篇短文。你看，我的心又在呼唤你们了。你为什么至今还不给我通个消息？你，你们未必到现在还听不见这样一个友人的呼唤？

我想，你们应该听见的，至少有一天你们会听见的。那么我希望你们早日安全地归来，和我们一起呼吸自由的空气。

1942年1月18日在桂林写完。

纪念憾翁*

工人堆上了最后的一撮土，细雨便跟着夜色来了。我又一次揭下帽子，晚风冰冷地敲着我的头，好像要给我唤起那些记忆似的。我转头望望四周，一片黄沙，一堆山影，几棵枯树，除了我们这一群十多个，再不见一个人影，工人们收拾了器具走了。我最后一次望了一下眼前的新冢，然后戴上帽子。我也动身回家了。我的眼睛是干的，那里面没有眼泪，有的只是一个人的影子。我敬爱的亡友，你的影子送我走过那些泥泞的道路，一直把我送到篱笆门前。我到了家，看见那亲切地招呼着我的灯光。两所房屋紧紧地靠在一起，可是我回到了家，你的影子却永远地消失了。

厅堂里那张竹沙发上坐着另一位朋友。那里原是你从前常常坐的地方，那饭桌是你靠过的，那板凳也不知被你坐过多少次，那窗板也曾好几回由你亲手装上，那茶杯和茶壶上面应当还留着你的指痕。板壁和土地也曾听见你的爽朗的笑声，整个厅子似乎都在呼唤你回来。但是一屋子阴沉的脸色给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宇宙风》第一三一期。发表时题为《纪念一个失去的友人》，署名芾甘。

憾翁：即林憾庐。他就是我的长篇小说《火》第三部（旧版本）里面的田惠世。

我一个多么绝望的回答：你永远不会回来了。

在外面爆竹声万马奔腾似地响着，空气里仿佛隐约地飘荡着一阵一阵的欢笑声。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一个欢乐的日子。我们也想跟着这个城市发笑，我们也想说些吉庆的话，可是我们的笑容是忧郁的，我们的笑声是空虚的。便是最会讲话的嘴现在也显得笨拙了。朋友们用痛苦的眼光对望着，然后露出无可如何的微笑。大家都明白任何努力也不能够立刻除去各人心上的重压。我们开始觉得这种团聚是难堪的了，城里的朋友便借了种种的口实一个一个地走开了。剩下住在这里的几个人默默地对着一盆火坐了许久。

夜在接连不断的爆竹声中慢慢地走了过去，它并没有惊动我们。在隔壁你的房间里静静的没有声息，黑黑的没有灯光。我的眼皮渐渐地垂下来，朋友们也都埋下了头。方桌上一盏植物油灯也渐渐地暗淡了。我是在做梦吗？在这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吗？什么都还是同以前一样的吗？

我突然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这不是梦。什么都没有改变。就只是你不会回来了，永远不回来了。

我敬爱的亡友，十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曾想到十三年后今天的这情形么？

十三年，那些数不清的长日子，我应当忘记了许多事情，可是你那时的面容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子里。我们没有机会讲许多话，我只默默地注视你那温和的微笑。这微笑经历了长久的艰苦的岁月都没有消去。它慢慢地把我拉向你的身边。在七年的沉默之后，我们偶然遇在一起，我又在你的脸

上见到那同样的笑容。迟疑和拘束在一瞬眼的功夫完全消失了，我兴奋地握着你伸过来的手。友情从这里开始，苦难巩固它，欢乐装饰它。在寒冷中我感到它的温暖，在暗夜里我见到它的光辉。我开始为了七年的沉默责备自己。现在在一个平凡的面貌下面，我听到一颗善良的心的跳动了，我又开始为自己庆幸。

从那时到今天整整六个年头过去了。我不能计算这七十二个月中我从你那里得到多少东西。你太慷慨了，你为我打开了你那海似的心，让我的心灵在你的鼓舞、安慰、帮助下成长起来。有一个时期在上海租界里敌伪的魔爪向四处伸展，死亡在我们的周围窥伺，外面散布着种种的流言，人对自己常见的朋友都不能够相信了。一天晚上我接到几次朋友们警告的电话，我也把这似可信似不可信的消息用电话转告你。在电话中我听见了你那爽朗的笑声，我的心安了。这些日子里都是你的笑声引起我的笑声，你的镇定和乐观增加了我的勇气，你的豪侠的精神净化了我的心灵。正如在广州大轰炸中和从广州脱险出来的日子里，我因了你的友情的鼓舞而更勇敢地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一样。在任何时候我都觉得我不是孤独的，甚至在危险当前、黑云蔽天、最绝望的时候。我原是一个渺小的人，但我现在也知道为大义献身；我原是一个心贫的人，但我如今也愿意做一块木柴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我始终是在朋友的庇护下面生活的。你正是那些能够了解我、鼓舞我、安慰我、督责我、帮助我的友人中间的一个。现在我又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友人呢？

我不应当在这里唠唠叨叨地诉说个人的私谊。其实受到损失的不止我一个，还有更多的人在悲痛中过日子，她们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亲，这损失更是不能补偿的了。在他们的旁边我没有权利悲叹哭泣。我更没有权利用过去的回忆折磨他们。你原是一个口如悬河的辩才，却默默地跟他们诀别。一瞥最后的注视，一滴最后的泪，你放心地闭了眼睛。你自己安息了，你也把安静留了给他们。一直到死，你都是一个谦和的人；一直到死，你都是在替别人着想。你永远想到别人，忘了自己。

我没有看到你跟死挣扎，我没有看到你在死面前显出胆怯的样子，你死去如同酣睡。"我没有病，我没有病，"你不知说了多少遍。我们不相信你的话。其实也许你比我们更清楚。你是有道理的，因为一直到最后还没有一个医生看出你致死的病源，而那个一口断定一个星期包好的"名医"，几次挺起肚子坐在车上经过你的门前，也忘记下车来问一句他卖出的几十颗高价的"特效药"是否灵验。要是你现在还有知觉，我想你一定会望着他发出你那爽朗的笑声。

然而我们却不能够笑了。我们不是大量的人，不能够宽恕那疏忽和愚蠢。他的轻率的诊断在许多人的心里挖了一条沟，那是无法填满的了，纵使我们活到百年的高龄。

我敬爱的亡友，原谅我又在这里诉说我个人的损失。不过你不会误解我的意思，我并非说你只是在几个人中间发光的人。你的死使神圣的抗战失掉了一个热烈的拥护者，使为正义奋斗的人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朋友。你是一个理想家，但你

又是实际的人；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你又和非宗教者做了好友。你在朋友中间发射着光彩，但是你单单为了一件小小的工作就牺牲了生命。的确，你是为了你那个“该死的刊物”(你骂它该死，更可见你是如何爱它！)死的。你为它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安乐，牺牲了家庭幸福，甚至冒着种种危险；你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熬成墨水，给理想多涂一点光彩，为抗战多尽一分力量。这些年来我就没有看见你闲过一天。最后躺在病床上，你还带着焦虑地筹划刊物的维持与发展。就在去世的前两天，你还关心地问起刊物的事情。你不会想到就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以后，在你自己的刊物上会印出哀悼你的文章。

六年来我的眼睛牢牢地注视着你的生活。我看见你怎样挣扎，怎样跌倒，又怎样爬起来继续前进。没有人在旁边搀扶你一把，或者说几句切实的安慰的话，但你永远是乐观的，永远是谦和的，你从不怨恨别人，只是苛责自己。六年来你就没有畅快地休息过一天，你忠实地守着你的工作，你终于死在你的岗位上。固然，你的事业并未完成，你的抱负并未实现，但是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死去了，你是不该有遗憾的。以后的责任应当由那些活着的人担负，希望他们能好好地继承你的遗志，实现你的抱负，让你更光辉地活在你的事业里罢。

门外寂无人声，夜是这么深了。我还坐在方桌前面拿起一支笔，写你的事情。这方桌就是你从前工作的地方，厅子里除了新添的一张写字台外，一切跟你在时完全一样。但这已是我写了开篇以后的一个多月了，也就是你离开我们以后的一

个多月了。在灯光的四周聚着一团黑影，仿佛有一对眼睛在向我注视。我忽然听见了一声轻微的咳嗽，声音是这么熟。桌上正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浓茶，我说："你坐下喝杯茶罢。"我惊喜地抬起头，可是只看见映在墙壁上的热水瓶的影子，没有一个人，我原来在对自己讲话。你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

门外是一个落着细雨的夜，在那边，润湿的泥土下面一定很冷。但愿叫号似的风不要惊醒你的长眠。我想到伴着你的一片黄沙、一堆山影和几棵枯树，心隐隐地发痛了。原谅我这个自私的人，我独自享受了温暖的灯光和热腾腾的浓茶。……对着这一屋子的凄凉的静寂，我只有愤然掷下我这管秃笔。

1943年3月在桂林。

写给彦兄*

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死讯，我觉得心里很空虚。我躺了几个钟头，没有讲一句话。这时候我愿意我能忘记一切，但十几年前的往事偏偏来到我的眼前。是的，我的眼睛不肯休息，它们找回来那些我以为我早已忘却的事情。我看见你穿着一件白衬衫，带着一个本地小孩走到鼓浪屿一家滨海的旅馆里来。在二楼那间宽敞的房间里，畅谈了一点多钟以后，我们成了朋友，那是十四年前的事。那次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而我知道你的名字，却更早六七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你的《灯》、你的《狗》感动过我。①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的气息，那种对于社会的不义的控诉，震撼了我的年轻的心。我无法否认我当时受到的激励。自然我不能说你给我指引过道路，不过我若说在那路上你曾经扶过我一把，那倒不是夸张的话。我们十三四年的友情就建立在这一点感激上面。我始终没有让你知道我这小小的秘密。其实我何必要告诉你呢？在我们这些分多于聚的十三四年中间，我们也曾一同经历过苦难的日子，分享过朋友畅谈的欢乐。不论在泉州黎明高中的教务室里，上海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文艺杂志》新一卷第一期。

① 《灯》和《狗》都是鲁彦（1901—1943）写的散文。

法租界华北公寓的小房间里，或者上海信义邨的住家，或者桂林福隆街的寓楼，我没有看见你有过十分畅快的笑容。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你瘦削的肩上，它从没有放松过你。这些年你一直在跟它挣扎，你始终不肯屈服，你要畅快地吐一口气。可是你愈挣扎，愈透不过气来，好像这就是对你的惩罚一样。我知道，要是你肯屈服、肯让步、肯妥协，你一定会过得舒适、安乐。你并不是不喜欢舒适和安乐的生活。然而你的性格不让你有片刻的安宁。你的性格使你拖着一大家儿女在各处漂流。在某一点上，你有些像罗亭。这并不是说你能说不能行，我是说你不能适应环境，你不能为自己建立一个安定的窝；你不能为了个人的安乐，忍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你到处撞，到处碰壁，可是长期的困苦并不曾磨去你的锐气。就是在患病以后，不管躺在床上，或是拄杖缓行，你还是昂着头在撞，你还是因碰壁而恼怒。后来你的声音哑了，结核菌蚕食着你的咽喉，肉体的痛苦跟随死亡的逼近一天天在增加着，你还是不肯放下你的笔，你还是不断地为你创办的《文艺杂志》焦心。到最后，你只能用铃子代替你的语言，你还是没有失去对生命的热望，你还是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在先，没有人称你做一个战士。事实上许多年来你一直在奋斗，你想为你自己，也为别的一些人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可是结果你终于痛苦地死在寂寞和贫穷里，像一个死在战地上的兵士，你没有看见胜利的希望就闭了眼睛。即使有人说你没有留下光辉的战绩（其实你一部分的作品不就是光辉的成就么?），但谁能否认你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呢？

虽然我们之间有着十几年的友情，可是我没有资格论断你。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个朋友的意见。认识你的人都有着他对你的一种看法。不管他看重你的好处，或者注意你的缺点。你两样都有，因为你是一个人。而且我们谁又没有更多的缺点呢？况且作为一个十几年的朋友，我在你的苦难中给过你够多的助力么？我分尝过你些许的痛苦么？我做过什么减轻你苦难的努力么？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絮絮地谈到你，夸张地叙说我们的友情呢？

不，彦兄，你多少知道我一点，那么你会明白你的死使我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正是在两年前，有一天傍晚你从桂林三家村寓所把我送到洋桥，我要你陪我进城，到一家小馆里吃点东西，多谈个把钟头，你因为天晚身体不舒服，不肯进城。我们站在洋桥头，随便地谈了一刻钟的闲话，然后你支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了。我望着你那歪斜地走着的身影在逐渐加浓的夜色中消去，我的心忽然隐隐地痛起来，泪水迷糊了我的视线。彦兄，我不是在为你哭，我是在哭自己。我那时就想到在你身上也活着我一部分活动、快乐的岁月，它们快要跟着你死去了。这些年我哭过世弥、哭过范兄、哭过憾翁，现在又轮着我来哭你。每次我都在埋葬，我不是在埋葬你们（自有你们的亲属来使你们的遗体得到安息），我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那就是跟着几个朋友遗体埋葬了的一些岁月，在那里面也许还有些金沙似的发光的东西。现在即使年岁能够倒流，我也找不到像你们那样的印证的人了。

今天，我坐在那间陈设凌乱的书店办公室里，对着一盏昏

暗的电灯，给你写这封诀别的信，这一封你已无法看见、而我不得不写的信。门外是一条热闹的大街，隔壁戏园刚刚散场，一大群人的脚步和笑语，潮水似地在门外流过。接着又是小汽车急驶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男一女在大声相骂。一个卖炒米糖开水的小贩走过了。两个女人叽哩刮啦地走过了，又有人在大声喊“煮两碗抄手”。只隔着一堵墙！在门外，人们在享乐，在活动，在笑，在吵。在我这里却只有老鼠啃字纸的小声音，伴着我的，是寂寞，是一些折磨着我的回忆，还有一颗饱受熬煎的痛苦的心。永别了，我的亡友，在敌骑践踏的星子岩的土地中，你的睡眠不会是安适的罢。但是我们不久就会回到你身边来的。那时我要在你墓前背诵《灯》里面求母亲收回那颗爱人类的心的哭诉，《狗》里面那些漠视弟兄痛苦的自责。我还要告诉你，我怎样在我们两人都喜欢的地方“鼓浪屿”去寻找我们的脚迹。当你知道你是怎样地活在朋友们的心中时，你或者会原谅这个未能在你最痛苦的时刻来到你身边的友人罢。

1944年8月在重庆。

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一

今天在街上看见一个背影跟你很相似的人，我几乎要叫出你的名字，可是我立刻想起你已经在三个月前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大半年来，我的生活特别乱，我的心特别烦。过去的每个日子都给我带来新的追悔，新的苦恼，"生命的浪费"的感觉压迫着我。我像是一个被判定在监牢里憔悴一生的囚人，我不敢用思想，我怕触动我对于无法达到的东西的渴望。我又回到写《灵魂的呼号》①的时代了。可是那时候我还有我的一支笔，可以整天写出我心里的话，现在我有的却是那无数琐碎的事情。我无法摆脱它们。我始终绝望地挣扎，我在跟它们挣扎。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友情的安慰和鼓舞。我想找个机会去你那里同你畅谈一两个整夜，因为在朋友中你是比较了解我而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一期。

① 你一定记得十三年前我在你住的那个北平小小公寓里开头写的那篇短文。我知道你那善良的心对朋友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忘记。《灵魂的呼号》在天津写完，发表在上海《大陆杂志》上，后来又作为"代序"印在《电椅》集的卷首。

又愿意听我发牢骚的人，正如你自己所说，你"一直在系念着"我，而且恐怕再没有像你这样系念着朋友的人。并不是我没有机会。我知道你随时都欢迎我去。还是那些杂事耽误了我。于是我等着你进城，你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里还提过"不久就要进城'就业'"的话。我一直在等着……等着。可是一月十八日早晨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死讯，是用小五号字排的，不过短短的三四行。我不能相信那是关于你的消息，你不能用这模糊的铅字的痕迹向朋友们告别。然而过了三个钟点，同你住在一个地方的左兄的快信到了：

> 崇群今晨三时二十五分长逝于江苏医院，因医院不能久停，无法俟友好齐至一瞻遗体始行安葬，爰定后日(十七日)上午九时落土，心痛笔重，容缓详告。

一切可能有的疑惑和希望都消灭了。想不到一张薄薄的信笺却能够毁灭那么多的东西。朋友，这次真是永别，你竟然一声不响地悄悄走了。这封短信在邮路上走了四天，我到十八日的下午才看到它。我赶到你长眠的地方，却只能看见一堆新土和两个纸制花圈。花圈上贴着白纸条："崇群先生千古……"。除了你的名字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使人相信躺在这松松土堆里的会是你本人。那是一个斜坡，旁边有两座简单的坟墓。不知道是怎样的人做了你的邻舍。你躺在那里应该是多么寂寞。

我在你墓前站了五分钟光景，我没有向你说一句话，或者行一个礼。我默默地跟着朋友们走到渡口去。要是在一个月

前你一定会跟我们同去，可是现在我们却撇下了你。十四年的友谊就这样梦也似地结束了。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在心里暗诵着你从前写给我的那句话："我们无端的相聚又无端的别离了。"①

无端！难道这真是无端的么？

二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睡在江的彼岸，半夜里风敲着窗，窗门被吹开了，寒气从洞开的窗户扑进来，把我从梦中惊醒。屋子里一片黑，外面是砂土飞舞的声音。我不能睡。寒风从四面八方袭来。身子的颤抖使我的脑子特别清醒了。我想到躺在土里的你……那个光秃的斜坡，那些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松松的土块……最后我想到这天傍晚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你临死的情形：

"他真是太善良了，他一直到死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朋友左叹息地说。

"我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善良的人，"左太太说，眼圈已经红了。

我蜷缩在被窝里，一边低声念着他们的话，一边流着眼泪。

只有在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损失是多么地大。我失去了

---

① 见缪崇群著的《一对石球》。

一些永远找不回来的东西，一些我应该珍惜却没有好好珍惜的东西，在我们相识的十四年中间，我不知错过了多少次和你相聚、和你通信的机会。我没有好好地认识你的纯白的心灵，我也没有尽我的力帮助你跟疾病、跟困苦挣扎，我也没有尽我的力帮助你安排一个较好的生活。我给你的只是一些空话，一些不能实现的希望。一直到你死，我没有能给你一点安慰，减轻你一些寂寞和痛苦。作为一个朋友，我辜负了你的信任了。

三

在这不眠的寒夜里，我重温着我们十四年的友情。在这动乱的、漫长的十四年中间，我目睹了够多的人世的兴衰，我忘记了不少的事。可是我们相识、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回想着，回想着，我的心慢慢地温暖起来，黑夜也逐渐淡去，你那温和善良而带苍白色的面颜出现了，还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带痰的咳声，关切的问询。这一切仿佛是永不会改变的东西。从最初的相识到最后的会晤，我没有看见你改变过一点，甚至不治的痼疾，甚至人世的苦辛，都不曾毁损了你的面容和心灵。

"九·一八"事变的前几个月，我去南京访左兄，在成贤街一个小楼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经过第三者的介绍，我们各人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读过你的文章，你也读过我的作品。在我等候左兄的两个钟点里面，我们谈了将近一点半钟。这不是普通的寒暄，这是肝胆的披沥，心灵的吐露。我没有谈起

我的过去，你也不曾说到你的身世，可是这天傍晚我们握手分别时，却像是相知数十年的老友。

过了一天我便回到上海。我们中间信函的往返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当时你正代左兄编辑一份文艺杂志，我做了这杂志的长期写稿人。每个月在一定的日期我为你寄出一个短篇。你收到我的稿子，总是老实地写出你读后的意见，有时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这态度，这习惯，你一直到死前两个月还保持着，虽然你早已不做杂志的编辑了。去年十月我的小说《憩园》出版，你还是它的一个精细的读者，你甚至为我指出那书中的一个"小毛病"（你客气地说，那是"小毛病"），而我自己和别的一些读过这小说的朋友都把它看漏了。

有一次（还是在"九·一八"前）我寄你一篇《我的眼泪》，这小说是为了纪念那个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优美的精神"的意大利卖鱼者樊塞蒂写的。你第一封信向我叙说了你的感动，可是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你愤慨地告诉我你为了我这篇文章跟杂志社负责人发生了争执。第三封来信说负责人已经让步，不再阻止发表这篇文章，却只要求将稿子压一期付排，你还预备以去就力争要我的小说早与读者见面。我感谢你对朋友的热诚和做事的认真，可是我不愿意你为这一件小事就放弃你的工作。我便另外写了一个短篇为你寄去。这就是我收在《短篇小说第一集》里的《一封信》，它占据了《眼泪》的地位。但《眼泪》在下一期杂志上也居然堂皇地与世人相见了。你应该是我见过的一个最有责任感的编辑罢。后来我又为你的杂志写了长篇小说《雨》，可是它只刊出一半，你就因病或者因为

别的事情离开了杂志社，离开了南京。从这时起我就没有看见你的名字印在任何文艺刊物上面了。

“一·二八”沪战爆发的那个夜晚，我正在由京开沪的火车里面，车子开到丹阳又折回了南京，使我在那里同你多聚几天。在我那篇《从南京回上海》中，我这样写着：

> ……下午醒来，到一个朋友那里去。朋友看见我便惊喜地说：“原来你回来了！我们正在替你担心。”我很感激朋友的关心，但是我看见桌上的一张《新民报号外》，我的心又被沉重的石头压紧了。……
>
> “看这情形，上海是没法回去的了，天津恐怕也危险你还是准备在南京多住几天罢。住旅馆不方便，搬到我这里来住好些。”这是朋友的殷勤的劝告，在平时我很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这时候它们却把我的希望杀死了。……
>
> 在朋友那里所谈的只有愤激的话和痛苦的话。朋友也是一个有心而无力的人，他的身体比我的坏得多。他患肺病，最近还吐过血。他是需要静养的。我和他多谈话，只有增加他的痛苦。我看见他那没有血色的脸上怎样燃起了愤怒的火。……我们的口只能够在屋子里叫，我们的手只能够拿笔。……

一个星期以后我安全地回到了上海。过了几个月你也就到了北平。

这年九月我去北平看你，我在你那个小小公寓的小小房间里住过几个夜晚。那时你新结了婚，但是你让你太太住在

岳母家，你一个人睡在公寓里养病，还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只是精神较差一点。

关于这次的相聚，你写过一篇短文。你写着：

记得你来的时候，你曾那样关怀地问：

“在这里，听说你同着你的妻。”

“是的，现在，我和她两个人。”

我诚实地回答你，可是我听了自己的答语却觉得有些奇异，从前，我是同你一个样的：跑东奔西，总是一个单身的汉子。现在，我说“我同她两个”——竟这样的自然而平易！

你来的那天白日，她便知道了她的寂寞的丈夫还有一个孤独的友人。直到夜晚，她才喘嘘嘘地携来了一床她新缝就的被子。

我于是为你们介绍着说：

“这就是我的朋友；这就是你适才所提到的人。”……

那夜，她临走的时候我低低地问：

“一张床，我和朋友应当怎样息呢？”

“让他在外边，你靠里。……没听说过——有朋自远方来，抵足而眠啊。”……

朋友，你在我这里宿了一夜，两夜，三夜……我不知道那是偶然，是命定，还是我们彼此的心灵的安排？

有一次你似乎把我从梦呓中唤醒，我觉出了我的两颊还是津湿。我几次问你晨安，你总是说好，可是夜间我

明明听见了你在床上辗转。……①

你把这篇文章题作《一对石球》。那对有红色斑点的石球是我在颐和园里买来的，我打算把它们带回上海，却放在你那间小屋里忘记带走。你说要给我寄去，我更愿意把它们作为纪念物留给你。那次在北平我玩了好些地方，却只有两次拉着你和你太太同路。一次是游三殿，你们让我一个人进去，却坐在进门处石阶上等候我。你喘着气告诉我你委实没有力走到里面去了。你那时身体似乎很坏，连走路都很费力。你整天就坐在公寓里安静地度着日子。还有一次，我们坐车去看电影，到了戏院门口，你用力拖住我，好让你太太去买了票。我知道你的性情，我必须让你那愿意使每个人欢笑的心灵得到满足。从电影院出来我又跟着你们到附近一家广东酒楼去。我默默地看着你们夫妇红着脸（病态的红），带着欢笑张罗一切，我脸上露着笑，心里却只想哭。我也许只是一个卑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者，可是在这一刻我却愿意拿我一生中最好的时间来换取你们的健康。我不能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我活着不就是在浪费我的生命？

酒浇在我痛苦的心上，我醉了。回到公寓里我不想说话，我却拿出稿纸写起我的《灵魂的呼号》来。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北平。你扶病送我到车站，你太太也去了的。开车的时候我从三等车厢里伸出头来，你们还站在月台上频频对我挥手。我万想不到这一别就是三五年，而

---

① 见散文集《寄健康人》（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三年版）中的《一对石球》。

且我永远见不到你那位好心的太太了。

在车上我想起了几句话，一到上海我就把它们写下来寄给你：

> 我无端的来，无端的去。打扰了你们好几天，分享了你们一些快乐，我带走了一些东西，也许还留下一些东西。可是过去的终于过去了。……

第二年秋天我又去北平，但是你们已经到南京去了。在一篇短文里我这样写着：

> 火车在细雨蒙蒙中离开了浦口，时候是十一点钟。我没有留我的脚迹在南京，我是有遗憾的。……尤其使我挂念的是那个害肺病的朋友和他的夫人。他最近还写信给我说："你的心灵的纯洁，生活的洒脱，只要在我得到一刻沉静的时候，我便追怀着你：我是渐埋渐深的成了一个泥人了。我常常希望着因为我有痼疾而早结束了我的生命。"去年我在北平承他款待了一个多星期，和他在一张床上度过了那些夜晚，听了他多少次的咳声和梦呓。……我带走的他的印象到现在还没有褪色，依旧是去年那样地鲜明："心灵的纯洁"，只有他可以接受这个评语。但是没有人了解他。他如今在艰苦的生活的斗争里、社会的轻视的眼光下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每次我读着他那些混合着血和泪的散文，我的整个心灵都被扰乱了。我常常在心里狂叫着："他是不能够死的，他应该活下去，强健起来，去享受生活里的幸福。"但是谁能够使这

愿望实现呢?……①

没有人回答我这个呼吁，后来连我自己在忙乱的生活中也忘了常常给你去信。我只寄过你两三册我著译的书，《秋天里的春天》便是其中的一本。这应该归罪于我，因为你困居南京，实在追不上我的脚迹。

但是在我去日本的前两夜，我还有机会在上海一家公寓里同你相见。记得你那时刚从南京来，暂住在一个朋友在公寓里定下的房间。小小的屋子里已经坐了四五位客人，他们应该是那位朋友的友人罢。里面有一个偶尔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的作家。我平日很讨厌他，看见他那油滑的面孔，我无法和你谈话，在那个不通风的房间里坐了不到半点钟，我就匆匆地告辞走了。我没有对你说明我匆匆告辞的原因，正因为"匆匆"，也忘了向你讨一个通信地址。

第三天早晨，浅间丸载着我向横滨驶去。三天后我到了那个地方。在那个岛国的居留期中，我改换了我的姓名，除了两三个朋友，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从这时候起整整有二十二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我失去了你的地址，你也不知道我的踪迹。

然而两年以后，一个秋天的傍晚，我在上海意外地接到了你的信，我认出你的字迹，我高兴地对自己说："我又找回他了！"可是拆开了信，我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话：

……你还记得在南京，不，在这个广大世界上，有一

① 见《旅途随笔》中的《三等车中》。

个你系念过的人，你曾为他祝福，希望他生活下去，得到生活里的幸福……并且他也一直的在系念着你。病没有使他灭亡，还如你所希望的在生活着……就是你曾经把一对石球遗忘给的那个人，也是写了《一对石球》寄赠你的那个人。

朋友，五年的时光一霎间的过去了。如今除了我还在系念着我的几个私自景仰、私自向往的友人之外，怕再没有如我这样的在系念着我的友人了。我是一无所有的。你所希望于我的，生活下去，这便是我生活下去的一条荒凉的寂寞的路程。

朋友，你还记得你一度闯入我们蜜蜂一般的生活圈里，不但不曾把你看作生客，还把你当作蜂王，当作长老的我们么？一个人小心翼翼的为了你抱了新缝的被衾而来，一个人诚诚恳恳的留着你抵足而眠么？那一个是你知道的祖英，也许经过了五年你早已把她忘记了。她是一直的和我在一起，她是一直的和我一样为生活而苦苦挣扎。她在上月二十五日傍晚已经死去了，她想挣扎再也不能挣扎的向生活永诀了。

想到那些日子，才是我们生活的日子，想到那些日子里有过你，我们生活的日子才仿佛有过记录。现在什么都完了；祖英一死，连那些生活里有过记录的日子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谈起了。

想到前年秋天她每天给我读一节你赠我们的《秋天里的春天》，我们每每随声对泣。爱巴达查尔师，又怨他。

谁还料到祖英死后我再对你提起这个书中人物呢?

祖英临死的时候还说:她死,我将是世界上一个飘泊的人。我飘泊到什么地方去,又为什么飘泊,她就没有给我接话,连我也不知道!

正因为我是一个平凡地想平凡生活下去的人,我想我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打扰你了,我想着祖英,想着你,想着我还有自由可想的人……我就这样地再可以生活下去了吗?你该应我一声!

我读着这封信的时候,另一个和你相熟的朋友[1]正坐在我旁边,他也是两年多没有得到你的信了。我把信拿给他看。我们默默相对,许久讲不出一句话。

我回想着那个红红脸的年轻主妇的面影,我暗暗地问自己:这不是梦么?为什么她这么年轻就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这一次我不能再沉默了。我立刻写了回信。我盼望着"明年的春风会给你煽起生命的烈焰,给你吹散痛苦的回忆",使你能够强健的活下去。

那个朋友也给你去了信,他当时正在上海编辑一份文艺月刊,要求你寄稿子来。你并没有寄过文章,可是我们间的通信却不曾间断过,并且一直继续到"八·一三"。

那个朋友在北平住得比较久。有一次我们谈起你,他才

---

① 这个朋友便是靳以。

告诉我，你在北平还有一个老家。你住在那个湖南人开的公寓里的时候，你家里人知道你在北平，却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后来你父亲去世，你的兄弟登报找你，你才回到家里去主持你父亲的丧事。那个朋友就是在你的老家里和你第一次见面的。

你始终没有对我谈到你的身世和你的家庭，我也始终不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过去。可是从那个朋友的口中知道你还有一个老家以后，我不久又读到你的一篇题作《棘人及其他》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早已写好，早已发表了的，可是这时我才读到它。读你的文章仿佛在听你谈话，亲切、温柔，还夹杂了一点点哀伤。

> 我这次回到家里，已经隔了好几个寒暑。到家的那天，距父亲的死已是六天之后了。倘使我六天之前归来，也许在父亲衰老的脸上还弛下一条笑纹，在将要模糊了的脑中添一个还存在着的儿之印象罢？……
>
> 几年前我离开这无母的家，几年后我又回到这没有父亲在的家了。……
>
> 父亲躺在漆黑了的棺里，弟弟被满头满身的缟素包裹着……
>
> 父亲生前到学校用的书包，还原封搁在他的房里，所有的父亲用的东西，也都统统锁在一起。……①

① 见《寄健康人》。

这文章写成的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一月”。离我们那次在北平的相聚不过三个月光景。三个月！这么短的时期，你的生活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却无法在你的信里找到一句与它有关的话。为什么保持沉默呢？虽然这文章告诉了我一些你没有对我讲过的事，可是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你为什么脱离家庭。这中间也许有一段痛心的故事。但你为什么不让做朋友的分担一点你的痛苦？

现在你抱着你的痛心的“秘密”到永恒里去了。那里有你的妻，你的母亲，你的父亲，希望你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个温暖、和睦的家罢。那么过去的就应该让它静静地过去了。

抗战的第二年，我在广州遇到左兄，从他那里打听到你的通信处。我寄了一封信到桂林去。不久你的回信来了。是一封短短的信。可是你告诉了我一些我愿意知道的消息：你活得相当强健，体力和精神都比从前好多了。你甚至兴奋地说起渴望看到抗战的胜利。

但是这封信带给我的快乐并没有继续多久。敌人在大亚湾登陆，接着广州沦陷，我和几个朋友沿着西江辗转到了桂林。

到桂林的第二天我就在一家北方饭馆里遇见了你。还是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苍白的面颜。你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可是我觉得你胖了些，气色好看些，精神也好了些。我的眼睛证实了你的话，我当然高兴。你还告诉我，你现在能吃能走，还可以陪我走很远的路，游遍桂林的山水。

这以后，你果然陪我玩了不少的地方。在这个古城里我们常有聚谈的机会。后来你决定离开广西时，为了等候便车，你曾搬到我的寄寓里，同我们过了好几天愉快的日子。我说“我们”，因为当时在一块儿聚谈的还有一个“害怕过桥的少女”，她同你还是在那个古城里第一次相见，可是她不久就对着拾来的炸弹片为你编织绒线背心了。在《希望者》①中你称她做“一个好心的孩子”。这些年来她一直没有把你忘记。现在她作了我的妻，也作了你一个永不相忘的友人。前天她还捧着《眷眷草》垂泪，她一定在追忆漓水边上的美丽的日子，那些连炸弹同大火都不能使它们褪色的光辉的日子罢。

一别又是两年。这中间我走过不少地方，你也走过不少地方。可是后来我们终于在一处碰到了。那是重庆—北碚—北温泉：这三个地方，现在都还保存着我们的脚迹罢。

这次你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或者你故意不让我看见你有什么改变。我相信你的健康在逐渐恢复，我相信我们还有够多的聚首的机会，我坚决地相信着未来，也相信着在“未来”里我们可以在一起过着比较理想的生活。在这时期我开给你的不兑现的支票更多了（在前一个时期我逼着你写文章，却只为你印过四本小书）。我给过你不少的希望，却终于看着它们一个一个地毁灭。我三次来重庆，三次和你在北碚见面同游北泉；都没有能够帮忙你减轻一点你心灵的痛苦的重压（我不

① 《希望者》：见缪崇群著散文集《眷眷草》的第五辑。

说“物质”，因为你的生活原是那么简单)。尤其是最近这一次——我动身来渝的前一天在贵阳先后遇见你的两位老友(左兄和云兄)。他们都同我谈到你。一个说你的身体还可以支持(他用了“拖”字)若干年；一个说你渐渐地逼近险境了。我说去渝后一定设法为你安排一个较好的生活。可是在北碚看见你，我给你的还是一个空的希望。你对朋友始终无所要求。每次同游北泉，都是你殷勤款待。你为朋友，可以舍去你最后的汗衫。我存在上海的行李中还有你在桂林送给我的一件毛衣(我从桂林穿到上海，就没有能带出来)，有一个时期它曾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够多的温暖。

如今你终于没有得到朋友的帮助，静悄悄地死了。活着你没有麻烦朋友，临死你也没有麻烦朋友。① 你病，我不知道；你死，我没有和你诀别。我未能到病床照料你的病，也未能送你的棺木入土。十四年的友情就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想起你去年八月十二日夜间写给我的信里的那一段话：

你说了我的话：我们几个朋友终于有一个时候可以

① 你病中不让人为你写信通知朋友，就是在你得不到适当的照料使病势加重时，你也保守缄默(听说有一次你叫了一夜口渴，到天明才得到一杯水喝)。后来左兄知道你的病状，坚持着送你进医院去，那时你已经没有充分的生命力，跟那压迫了你多年的疾病继续战斗了。据说你一直到死并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也没有留下一句告别的遗言。你死后脸上罩着和平的笑容，人看不见一点痛苦挣扎的痕迹。你好像是没有遗憾地安安静静死去的。你死后身边还留着可以偿付医药费的钱。并且你生前就已经把后事安排清楚，好像准备着随时随地死去，都不致烦累别人。

长久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的。战时我们分别或同住在帐篷里，战后我们更要建造一条船，一个小舢板也好，一齐在里面当作家，不只是家，恐怕还要渡过一面风不平浪不会静的大海，操作着，努力着，驶向我们真要向往的一个港湾，或一片处女地去。我的身体也许不会支持太久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

说这些话也许还渺茫，我也活得实在渺茫啊！

还有十一月十六日信里写的：

我现在希望着我的希望如同一坛酒，让它愈埋藏愈醇郁罢。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放我的这一颗心！你对我从没有说过一句怨愤的话，但是我能够宽恕我自己么？

你的善良的宽恕一切的心已经在土里得到安息了。可是我，活着的我是得不到安息的。我每想到我那些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每想到我那些骗了你几年的空的希望，我的心怎么能熬得住那长期的苦刑！

四

风静了。我的四周是一片死寂。夜凉得像水一样。黑暗中闪起一股灰白光。我知道寒夜快到了尽头。我的回忆也快到了尽头。在这短短的两三小时里我经历了十四年中的聚散和悲欢。现在这一切都得跟着寒夜逝去了。在那光秃的斜坡

上，在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松松的土块下，人们埋葬的不止是你的遗体和那些没有实现的希望，还有我过去十四年的岁月。那应该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日子。青春、热情、理想、勇气、快乐……那些编织幻梦的年龄……它们已经跟着可以为我印证的友人同逝了。……

想到这，我只有痛哭。

但是崇群兄，我不是在哀悼你，应该哀悼的倒是我自己。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的最好的一部分；我失去了一个爱我如手足的友人。那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了。

永别了，我纯洁善良的友人。听说你在病中说过，你不愿意死，不应该死。是的，你是不会死的。你给我们，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九本小书。[①] 那些洋溢着生命的呼声、充满着求生的意志、直接诉于人类善良的心灵的文字，那些有血有泪、有骨有肉、亲切而朴实的文章，都是你的心血的结晶，它们会随着明星长存，会伴着人类永生。

记得你说过：

> 惟有爱才是向荣的，正当的，幸福的。

又说：

> 我铭感着人间还有熏风，还有灵雨，还有同情，还有

---

① 《晞露集》(星云堂)、《寄健康人》(良友)、《归客与鸟》(正中)、《废墟集》(文生)、《夏虫集》(文生)、《石屏随笔》(文生)、《眷眷草》(文生)、《现代日本小品文》(翻译——中华)。还有一本散文集，我正在替他编辑，拟题作《碑下随笔》。

《碑下随笔》已收入《文学丛刊》第十集，一九四九年初出版。(一九五九年注)

自然的流露，还有爱。①

你说了真话。正因为这样，你的充满了爱的心便不是那不治的痼疾所能毁灭的了。

1945年4月在重庆。

① 见《石屏随笔》。

纪念我的哥哥*

我第二次回到上海来，坐在你从前常常坐的沙发上，望着油漆剥落的墙壁和尘封的书架，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梦醒了。我疲倦。我闭上眼睛。我想休息。可是你来了，你站在我的面前。我睁开眼睛，我觉得你坐在写字台前，背向着我，埋着头在写什么东西。我站起来，我想唤你，我要像从前那样地和你谈话。我先咳一声嗽。你的影子没有了。写字台前空空的没有人。屋子里这时候除了我，也没有别的人。我唤你，听不见回应。我提高声音再唤，那空虚的声音使我自己也吃惊。我用不着再骗自己了。我看见你病，我看见你躺在死床上，我看见你的棺木入土。我还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你呢？

我痛苦地、无可如何地叹了一口气。我又在沙发上坐下。我真应该休息了。我倦得很。我又闭上眼睛。可是我的脑子不肯静下来。它动得厉害。二十三年前的情景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文艺复兴》第一卷第六期。

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们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从住惯了的故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我们当时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可是近几年来在重庆和桂林，每当寒风震摇木造的楼房时，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儿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唯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中间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回去又送出来。每个星期里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你温和地微笑着，嘱咐我“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我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

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我不肯让你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情况，我不愿使你为我的苦恼分心。固然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况且你的心很细，你顾念别人常常多于顾念自己。以后不论在东吴或者燕京[①]，你都是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你还不得不做家庭教师，领一笔微小的薪金来缴纳学费。你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渐渐地跟你离远了，信函的往来也常常中断。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后一年的求学生活应该是怎样痛苦的挣扎啊。但是你终于带着孤寂的微笑熬过去了。

毕业改变了你的环境，也给你带来一线的希望，你可以"自食其力"了。你找到了职业：天津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员，——虽然待遇不好，但是这与你的兴趣相合。你借了债，做了两套可以穿上进课堂见学生的西服。你还为自己订下了一些未来的计划。可是打击来了。大哥突然服毒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家"需要我们。你毅然挑起这个担子，你按月寄款回去。你有限的收入变得更"有限"了。那些未实行的计划像空中楼阁似地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一块大石头压到你那刚刚昂起的头上，从此就没有看见你再抬起它来。像一只鸟折断了翅膀，你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了。

你默默地忍受一切。或者更可以说，你放弃了一切。你

---

① 指当时苏州的东吴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

在南开中学的宿舍里住了十年。你过得不算太苦，但也并不舒适。看电影是你唯一的娱乐。天真的年轻学生是你的朋友，他们给你的单调生活增加了色彩，他们敬爱你，你也喜欢他们。可是没有人知道你的内心。我到天津去看过你三次，最后一次却只住了一个夜晚。我看出你的疲倦、寂寞和衰老。我屡次想和你谈你自己的事，可是我始终无法打开你的心。你关心我倒多过关心你自己。有时我逼着问你，你总是拿"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来封我的嘴。讲话时你常常带着笑容，但你的微笑是寂寞的，疲倦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消磨尽了你的勇气和热情，你不诉苦，但是你也不再挣扎。你默默地过着这平凡而和平的生活。可是你的脸颊却渐渐地消瘦，身体也渐渐地坏下去。离开你时，我总担心是否还能够和你再见。第二次我来到你的身边，你还是带笑地说你过得很好。但是你真的过得"很好"么?

十年毕竟过去了。为了换取这漫长的岁月，你不知花了多大的代价。抗战后第二年秋天我从香港写信约你到上海，起初你还说打算再做一年教员，后来你改变了主意，离开大水中的天津来上海了。我比你早一个月回到上海，却一直没有得到你动身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在楼上听见了你的唤声，我从窗里伸出头去，你站在大门前也正仰起头来看我。是那样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差一点不认识你了。

我握着你的手，我对你说我要让你在上海过几年安静的生活，你默默地点点头。我们在一块儿住了十个月，你得到了休息，但是没法治好你心上的创伤。音乐和翻译工作做了你

排遣寂寞的工具。对工部局交响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你从没有缺过席,西洋古典音乐的唱片更是你分不开的伴侣(你尤其爱好声乐,自己也喜欢唱歌)。岗察洛夫的名著《悬崖》在这十个月中译成了,你又开始作翻译《奥布诺莫夫》的准备。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减轻你的寂寞,相反的它们还使它增多。你的生活圈子似乎变得更狭小了。

我在法国战败后一个月离开了上海。你把我送上直航海防的轮船。开船时,我立在甲板上对你挥手,在你旁边还站着后来被日本人捉去至今生死不明的友人陆圣泉。你在岸上对我微笑,圣泉也对我微笑。我当时哪里想到这便是映入我眼里的你们两人最后的笑容了!

一眨眼就是五年,这五年中间我们整整有二三十个月不曾通过一封信。日本兵占了上海租界,普遍的迫害开始了。圣泉遭了毒手。你小心,我也不愿给你招来意外的麻烦。在桂林我还接过你的短函,在重庆我却无法知道你的生活状况。路完全隔断了。后来我才听说你也在暗中打听我的消息。你也许担心我在湘桂大战中做了一件不值得的牺牲品。事实上我却很健壮地活在重庆。

"胜利"意外地来了。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我可以和留在上海的你们见面。我打了电报去上海。回电说你大病初愈,圣泉下落不明。你要我即刻去沪。可是交通工具全被"官"字号的人占去了,我们这类于抗战无功的人是没有资格"复员"的。我等待着。等了两个多月,我赶到上海,你已经躺在病床上了。据说你是在两天以前才病倒的。病势不重,就是体力太

差；上次的病是肋膜炎，还经过危险期，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靠着朋友一家人的照料，终于好了起来。

那个晚上我们睡在一间屋子里，你很兴奋，拉着我谈了许多话。我要你休息，劝你少讲话。你说你不累，你一定要跟我谈个痛快。你还说，每天谈几段，谈两个星期便可以把你想说的话谈光。我一定不让你多谈，我说有话等你病好了慢慢讲。

我在上海住下来，我过的仍旧是忙乱的生活。我还避免和你单独谈话的机会，我害怕多说话使你伤神。你说你的病不要紧，我也以为你的病不要紧，你需要的只是休息和营养。我相信你不久便可以好起来。并且看见你在朋友家里得着很周到的看护，我十分放心。每天大清早，我刚睁开眼睛就听见你在病床上自语："好多了，好多了。"那是你量过温度后用高兴的声调说的话。我也高兴，又蒙着头睡去了。我万想不到你这样骗了你自己，也骗了我。但我的疏忽是应该受指责的。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你病势的加重，后来还是一个朋友提醒了我，要我送你进医院去。我的劝告你不肯接受，我又无法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我向你谈过几次，都没有用。最后你回答我："过两天再说。"这样又拖了两天。终于你认输似地说了出来："那么还是早进医院罢，今天我觉得体力不成了，起床大便都感到吃力了。"

靠着另一位朋友的帮忙，第二天你便住进了医院。你喜欢静。病房外面便是一个幽静的小花园。透过玻璃窗你可以望见一片绿色。关上房门，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三哥，你满意吗？"有人问你。"满意，"你点头回答。我们预备让你在

这地方至少住两个月。谁也没有料到，你就只有七天的寿命。

在这七天中你似乎并没有痛苦。对于询问你病状的人，你总是回答："蛮好。"就在你临死的前两天，你还是觉得自己"蛮好"。没有呻吟，没有叫号，你安静地躺在床上，并不像一个垂危的病人。那个晚上，我在病房里陪了你一个整夜，你时眠时醒，好像要对我说什么话，却始终讲不出来，我听见的只是一些断续的字。你似乎有些激动。可是第二天你又得到了安静的睡眠，而且清醒地对我们讲话。看得出来你的精神更差了。我们虽然担心你的体力支持不下去，却没有想到你那么快就离开我们。你自己不相信你会死，我们也不相信你会死。可是死突然来把你抓走了。

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早晨我刚起床就得到医院里来的电话。"三哥完了，"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我没有流泪，站在电话机前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好。我把这个消息转告朋友的太太，她立刻哭起来。这个好心的女人，这些年来她一家人在最黑暗的时期中给了你友情的温暖。为了挽救你的生命，他们已经尽过力了。

我赶到医院。病房的门大开着，你静静地睡在床上，白色被单盖着你的身子，我揭开面纱，看你的脸。一夜的功夫，你变得这么瘦，这么黄，这么衰老！两眼紧闭，脸颊深陷，嘴微微张开。我站在床前，咬着嘴唇，我在心里讲了一句话，我等着你的回答。

你没有声音。朋友把面纱给你盖上。另一个友人带来两束鲜花放在你的身边。看护小姐要我们退出病房。我们站在

窗前阶上等候殡仪馆的柩车。这等待的时间是很痛苦的。我们谁都不愿讲一句话。我不平地问着自己：这就是死么？你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么？我不忍回答。死毁坏了一切。你原说过你等着我回来有许多话要对我讲，有一些梦要我帮忙你实现。现在这一切都成了一阵烟，一阵雾。你没有能讲出什么来，也不曾从我这里得着什么安慰。你默默地走了。据那个朋友说，你临死时只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下午两点钟你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中入殓。九天后我们把你葬在虹桥公墓。活着你是孤零零一个人，死了你也是孤零零一个人。你留下两部未完成的译稿（岗察洛夫的名著《奥布诺莫夫》和威尔斯的长篇小说《莫洛博士岛》），一部已译完待整理的中篇小说《女巫》（亚·库普林著），一本已付印的三幕剧《战争》，一本法国通俗小说《无名岛》，和十多篇零碎的短篇译文。此外便是朋友和学生对你的敬爱的纪念了。

从墓地回来，我非常疲倦。我已决定两天以后回重庆去。我坐在你住了五年的楼房里，回想着我这一个月来的上海生活。我来，我去，你病，你死，一切都是这么匆匆。我再想到在这短短的聚合中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那些事，我才明白你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一个人。可是在我多么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永远离开我去了。

"活了四十多年，没有做出什么事情，这是多可悲的事，"你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你死得并没有遗憾。你活着时没有害过谁，反而常常把你有限的收入分给别人。你做过十年的中学教员，不少的学生得过你的益处，他们常常带着敬爱谈

起你，但是你自己却喜欢谦逊的平凡生活，始终不让人把你看作青年的导师。你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你虽然没没无闻地过了一生，可是你并没有白活。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走了。你不愿意惊动别人，但是你却播下了爱的种子。再过四十年你的纪念也不会死的。……

我睁开眼睛，屋子里还是静静的。有人在二楼讲话，还有人在笑。在半点多钟的时间里我又经历了过去二十三年的悲欢。现在是你死后的第六个月了。我真疲倦，我想休息。我应该暂时把你的事忘掉了。我站起来。

可是在离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称你做“亲爱的爹爹”的女孩，我不能忘记她。那是我们大哥的女儿，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房”给你的。这个多情的孩子没有见过你，却十分爱你。她把许多梦寄托在你的身上。在八九岁的年纪，她就常常说：“我要到下面去找我的爹爹。”现在她已经做了两年小学教师，却始终得不到跟你见面的机会，而且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不愿伤害她的心，把你的死讯瞒着她。但是她那敏感的心已经猜到了一切。人告诉我，有好几个星期天，她回到家里不笑，也不讲话，最后她生母问她为什么不给她的“爹爹”写信，她哭着回答：“用不着了。”她知道她一切的梦全破了。为什么不让她和你见一面，住一个时候？为什么不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对你倾吐她的胸怀，叙说她的梦景？她喜欢音乐，像你一样；她热诚待人，像你一样；她正直，她无私心，也像你一样。你们在一块儿，应该是一对最理想的父女。为什么

她这个小小的要求也不能够得到满足？让她在这样的年纪就尝到永不磨灭的悲哀？

没有人来回答我这些不平的疑问。你已经和平地安息了。可是那个善良的孩子前面还有长远的岁月。她最近还来信诉说她的悲痛。我无法安慰她。我希望你的纪念能够给她勇气，使她好好地活下去，让她能够得到一般年轻人应当享受的人间幸福。可怜的孩子！

1946年5月在上海。

忆施居甫*

朋友居甫去世快四年了。四年中我只读到两篇短短的纪念文，是两位老友写的，文章都不错，但好像不曾得到人们的注意。居甫死得很寂寞，生前似乎也少有人看重他，何况死后。他富于热情，待人宽厚，对朋友很热心，学、识都不差。并且他还有理想，不是那种认为“人单是靠着吃米用钱活着”的人。可是他穷，又有不治之疾（肺病）。他老实，又不喜欢装模作样。所以他虽有一颗“黄金的心”，却不受那班喜欢赶热闹的人欢迎。他朋友亲戚中发财的，并非没有，可是他从不向他们求助。后来他的肺病到了第三期，他还支持着病躯，靠“舌耕”来养活自己一家人。临死，他只是一个平庸的中学教师。唯其平庸，他的真诚才能够感动年轻的心灵，在病中他教的一班学生自动地凑了一笔医药费送给他，使他得到几个月的休息。他一个人、一家人所需要的有限得很，可是连这一点点，他也没有得到。他是一个愿意为社会牺牲自己的人，而社会对他却非常残酷。我和两三个朋友曾经商量好一个帮助他养病的计划。但是这计划也不能救活他。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文艺知识连丛》第一集。发表时题为《忆居甫》。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伏在床上，脸压在枕上，屁股翘得高高的，样子非常痛苦，似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我第二天早晨便要离开成都，我是来向他辞行的。我和他太太谈话时，他忽然醒了起来，抬起头看我。

“你睡罢，我就要走的，”我说。“反正我明年还要回来。”我又加了一句，只是为了安慰他。

“好的，明年回来，我们可以多在一起谈谈，”他含笑说。“那时我身体该比现在好些了，”他也加了一句。

“一定的，一定的，”我微笑说。我怕引起他多谈话，会增加他的痛苦，便匆匆地告辞走了。他紧紧握着我的手，送我到房门口。

第二天，我动身去重庆。四个月后，我在桂林得着他病故的消息。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人提起他。他的死似乎不曾惊动别人，犹如他活着、他生病时也不曾惊扰过人们一样。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遗体葬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写信到他家里去问过。我原以为前年、去年我会回成都，至少可以在他的墓前停留片刻，我作过两次旅行的准备，结果我一步都没有走。最后我离开四川到上海来，跟他的家、他的墓离得更远了。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成都去。

我认识居甫，早在二十五年前，我们一块儿编印过一份刊物，我们常常在印刷所里见面，那时我还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似乎比我年长许多。可是我们处得好，谈得来。这些日子多么值得人怀念！但是后来刊物夭折，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

我们一别便是十八年。他并没有改变多少，除了身体差一点。其实他以前脸上就没有血色，现在也只多了一点病容。那次我只在故乡停留了一个多月。过一年，我再回去，又住了一百多天光景。这两次回乡，我和居甫聚谈的机会很多，并且谈得很痛快。他告诉我，他过去十八年间的工作与生活，也说了他未来的工作计划。他希望过几年安定的生活，不必为一家人的衣食奔走。那么他可以安静地做他的社会与经济两方面的调查工作，完成他计划中的几部著作，关于四川，特别是成都，他知道的实在不少。过去的掌故和现在的情况，无论关于哪一方面，你向他问起，他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详尽的答复。他肚子里装了不少的东西，他本身就是一部大书。"你快点写出来罢，"我和几个朋友常常这样催促他。"我会写的，"他笑着回答。

可是他怎么能从容地整理那一堆材料，从容地写出他那些著作呢，当他一家人必须活下去，他的孩子们必须进学校念书的时候？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住他瘦弱的肩头，压倒了他，甚至压死了他。他那些未写成的著作，也被它压毁了，最可惜的是他那颗"黄金的心"。

居甫是一个能够安贫的人，可是命运对他太坏了。我第一次回成都，听见他谈起他的大女儿的种种好处。她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孩子，能干，温厚，勤勉，和顺。她爱父亲而又了解父亲，她是他生活里最大的安慰，我庆幸他有了这样一位"千金"。她那一学期就要在高级师范学校里毕业了，她正计划着暑假后怎样分挑她父亲肩上的担子。但是一年后我再去他

家，他却含泪地对我叙说他那个女儿的死亡。这以后，朋友们就很难看见他展眉的时候，他终日悒郁，一直到死。

他是一个从不知道自私的人。他为别人，常常忘了自己。我两次在成都，得他帮助的地方很多，我欠了他一笔不小的友情的债。我知道这是出于他对友人的热诚，他不望报答，我也不敢对他说报答的话。在这些时候，我每次见到他那没有血色的消瘦的脸，听到他那空洞的声音，看见他那迟缓的脚步，我会惊奇地想：这个人，他受着社会的歧视、疾病的侵蚀，他的呼吸随时都会断绝，眼睛随时都会永闭，他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另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还有那么多的热情，那么多的友爱来慷慨地分给朋友！从他的温和善良的眼光里，我认识了一个美丽的精神。我感到惭愧，我受到鼓舞。

居甫颇像我的另一个朋友范予，一直到最后都在撒布生命。不同的是范予用笔写了不少的文章，影响较大；居甫用行为，替别人奔走，只有少数人对他感激。但是影响不论大小，辗转相传，永远有人受益，而且生命永在，撒布生命的人也可以不朽。

居甫"死"得寻常。但是我想他不应该有遗憾。而且生当"乱世"，凡有善行善言的人往往不得"善终"。居甫虽死得寂寞，但是他能够在妻儿陪伴中安然逝世，也算是幸运。他得到了解脱与休息，我没有理由为他悲。只是失去了这样一个好心的朋友，我更要感到寂寞了。

1946年7月28日。

怀陆圣泉*

六年前一个夏天的早晨我坐"怡生轮"去海防。圣泉赶到金利源码头来送行。开船时，他和我哥哥都立在岸上对我微笑。我对他们说，两年后再见。

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和圣泉的最后的一面。

我离开上海后第二年，在成都得到圣泉被捕的消息，那是从桂林传来的，后来又听说他已经出狱。但是我到了桂林才知道他入狱后下落不明。我各处打听，一直得不到确实消息。朋友们见面时，常常谈起圣泉，我们想念他，暗中祝他平安。有时在静夜，我们三四个友人对着一盏油灯围着一张破旧而有油垢的方桌寂寞地闲谈。桂林郊外的寒气从木板壁缝侵入。我们失去了热情。怀念和焦虑在折磨我们。我们的谈话变得没有生气了。我们便安慰自己："等到抗战胜利了，圣泉就会回到我们中间来的。"

四年来我们就用这个希望来安慰自己的焦虑的心。时光在木板壁缩裂时发出的清脆响声（那是我们静夜中的音乐）中匆匆逝去。抗战终于胜利，我们几个朋友也终于回到上海。可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大公报·文艺》。发表时题为《怀蠡兄》。

是圣泉一直没有消息。他就这样令人不能相信地失踪了。

我不愿相信他已经死亡，所以我不想写纪念他的文章。一个像他那样爱憎分明而且敢爱敢恨的人不能死得这么简单。他有着那么强烈的爱，绝不能不留下一点踪迹。我们固然不能相信他活，但是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死。只要希望未绝，我们愿意等待一生。

虽然他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但他为什么必须死呢？他与其说是被捕，不如说是自首。日本人找不到他，他自己走到捕房去，准备跟那些人讲道理，辩是非。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他相信敌人也会在正义面前低头。据说他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口供强硬，他对敌人说，汪精卫是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他可能为这几句真话送命。可是许多干地下工作的人都保全了生命，为什么敌人偏偏毒恨这个赤手空拳的书生，必欲置他于死地？有人揣测他受不了牢中苦楚，患病身亡。但他是一个身心两方面都健康的人，再大的磨炼他也必能忍受。

以上是议论、猜想、耽心。而事实却是他那时和两个朋友守着书店①，书店被抄去两卡车的书，他失去了踪迹。书店保全，他却不见了。

我和圣泉相知较晚。"一·二八"沪战后一年我在福建泉州看朋友，在一个私立中学里第一次看见他。可是我们没有谈过十句以上的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抗战前两年我参加了书店的编辑工作，第二年他也进来做一部

---

① 书店：指文化生活出版社。

分事情，我们才有了谈话的机会。抗战后，书店负责人相继离去，剩下我们三四个人维持这个小小的事业。我和他都去过内地，但都赶回来为书店做一点事情。共同的工作增加了友情，我们一天一天地相熟起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常常在书店见面。一个星期中至少有一次聚餐的机会，参加的人还有一位学生物学的朋友①。我们在书店的客厅里往往谈到夜深，后来忽然记起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我和那位生物学者才匆匆跑回家去。在那样的夜晚，从书店出来，马路上不用说是冷冷清清的。有时候等着我们的还是一个上海的寒夜，但我的心总是很暖和，我仿佛听完了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

我这种说法在那些不认识圣泉或者认识他而不深的人看来，一定是过分的夸张。圣泉生前貌不轩昂，语不惊人，服装简朴，不善交际，喜欢埋头做事，不求人知。他心地坦白，忠诚待人，不愿说好听的话，不肯做虚夸的事。他把朋友的意义解释得很严格，故交友不多。但是对他的朋友，他总是披肝沥胆地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有写作的才能，却不肯轻易发表文章。他的散文和翻译得到了读书界的重视，②他却不愿登龙文坛。他只是一个谦虚的工作者。但这谦虚中自有他的骄傲。他不是“文豪”、“巨匠”，甚至他虽然真正为“抗”敌牺牲，也没有人尊他为烈士。他默默地活，默默地死（假定他已死去）。然而他

---

① 即《蛋生人与人生蛋》等书的作者朱洗。

② 他用陆蠡的笔名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和三册翻译小说《罗亭》、《烟》（都是屠格涅夫的作品）和拉马丁的《葛莱齐拉》。

并不白活，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而且也有一些人得到他的好处。但是这一切和那喧嚣的尘世的荣誉怎么能联在一起呢？那些喜欢热闹，喜欢铺张，喜欢浮光的人自然不会了解他。

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生命、重视他人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

有了这样的朋友，我的生存才有了光彩，我的心才有了温暖。我们平日空谈理想，但和崇高的灵魂接触以后，我才看见了理想的光辉。所以当我和圣泉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充满快乐地想："我不是孤独的。我还有值得骄傲的朋友。"我相信要是我有危难，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给我援助。

我和他就是这样的朋友。我认识他的心灵，而且和它非常接近。我对人说我了解圣泉，我谈到他的刚直，他的侠义，他那优美的性格和黄金的心。然而要是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生平，他的家世，甚至他的年龄，我却无法回答，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我认识的只是他的人和心，此外便是他的文章。别的，他从未对我谈过，我也始终没有向他问起。胜利后回到上海，我才知道他台州的家里还有年老的双亲和他前妻留下的女儿。在上海我才见到他新婚的太太。听说他和她只过了一个半月的结婚生活。现在她已经空等了四年了。

朋友们登过报找寻他，又曾在各处打听他的下落。有一

个时期，我们还梦想第二天早晨他提着一只箱子在外面叩门。又有一个时期我们等待一封不识者的来信，告诉我们圣泉死在何时，埋骨何处。又有一个时期我们盼望着他从太平洋某岛上集中营里，寄来信函，向我们报告他还健在。

但是，这一切都成了一场空，我们又白白地等了一年了。自然我们还得等待下去。难道真要我们等待一生么？

一个崇高的心灵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这是可能的么？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我知道，万一他还活着，万一他能看到我这篇短文，他一定会责备我："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在受苦，你们为什么只关心到我一个？"

是的，在我们中国每天有千千万万人死亡，许多家庭残破，生命像骨头似地被随意抛掷。一个读书人的死活更不会有人关心。然而就在这样的中国，也有人爱理想，爱正义，恨罪恶，恨权势，要是他们有一天读到圣泉的书，知道圣泉的为人，明白他的爱和恨，那么他们会爱他敬他，他们会跟着我们呼唤他，呼唤他回来，呼唤那个昙花一现的崇高的心灵重回人间。

1946年11月在上海。

静夜的悲剧

《静夜的悲剧》，一九四八年九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无　　题*

在日本投降后一个半月，今天，说是修理锅炉，这里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傍晚天气骤然转寒，我踏着微湿的马路，到某街去访友。天空一片黑，两旁店铺里的灯光照不亮宽阔的人行道。我走在寥寥的行人中间；单薄的衣衫抵不住冷风的袭击，我接连打了两个寒噤。“秋天真的来了，”我低声说。我受不住这冷静，我想用人声来给这周围添一点温暖。没有用，我这微弱的声音冲不破眼前的静寂和阴暗。

我转到所谓“精神堡垒”，在那个广场上正摊开一片寒冷和荒凉。人们埋着头匆匆走过，我只看见一些黑影。他们显得多么瘦小，多么孤单。

我在一个街口站住了。我忽然想起，这里正是我一个半月前看人们狂欢时站的地方。不止一次，不止一天，人们围聚在这里，笑着，叫着，跳着，闹着，小孩跟着吉普车跑，大人举起手欢呼。我也曾跟着他们欢笑过。但是现在，今天，在这个停电的暗夜里，我找不到笑声了。那些人，那些欢笑到哪里去了呢？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少年读物》第二卷第一期复刊号。

"先生，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一个老太婆用痛苦的声音说，一只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来了。

我把手伸进长衫袋里去，一张钞票也没有。我只好坦白地摇摇头说："没有。"

"先生，我们是从桂林逃难出来的……"她仍旧伸着手，说着重复的话。我没法打发她走，我只好自己逃开了。

我看见了亮光，我听见了人声！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一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到我的鼻端来。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了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大肚皮的女人坐在矮凳上，用沉滞的目光望着她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你哪天走？"我旁边一个人在问他的朋友。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回答。

"想办法罢。当黄鱼行吗？"

"我有个亲戚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

"你还好，你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有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动，那就要饿饭了。想不到胜利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句话有点刺耳。我转过头去看那个说话的人。那是一张普通的面孔，高颧骨，小眼睛，脸色青白。我的眼光投到他的脸上，他吃了一惊，立刻把身子让开，站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我是在做梦么？才只一个半月！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一

切全变了？那些天我的心多么暖！今夜，我的身子在寒风中打颤了。

我到了友人家。男主人正在颤摇的烛光下向一位客人发议论。

“……胜利只是一个开始，它并不是结束。它并没有给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而且它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现在决不是应该欢笑的时候……”

我进门后便听到这样的话。

1945年9月30日在重庆。

月夜鬼哭*

孩子的哭声把我惊醒了。她的母亲坐起来打算给她喂奶。窗帷上映着一片月光，架上一排书的书脊也在发亮。远远地送来几声汽车喇叭叫。夜大概很迟了。我翻了一个身，又闭上了眼睛。可是过了好一阵，孩子已经睡着了，喂奶的母亲也已经睡着了，我仍然清醒。不知道怎样，我忽然烦躁起来，躺在床上，我浑身不舒服。我无法使自己安静，就索性下床，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孩子在梦中咳了一声嗽。我害怕惊醒孩子，就在窗前沙发上静静地坐了下来。

月光照亮了孩子的小床。孩子摊开两手，带着可笑的姿势睡熟了。她的脸上露出一种和平的微笑。这笑容吸引了我的眼光。我终于走到小床跟前。我俯下头看孩子的脸。我的手碰到小床的栏杆，孩子两手一举，现出受惊的样子。她睁开眼睛看了看我，马上又闭上了它们。她不再动一下。我在小床前立了片刻，便又走到窗前。我将两肘压在窗台上，埋下眼睛去看那个睡去了的弄堂。

一股凉风吹到我的头上来。四周真静，连汽车喇叭的叫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大公报·文艺》。发表时题为《月夜梦鬼哭》。

声也没有了。我仿佛听见“夜”轻轻地在我的身边走过，是那么轻微的脚步。“夜”似乎害怕惊动我。我也静悄悄地不出声。

我忽然听见一声轻脆的笑。我回过头看小床。月光正照在孩子的小脸上。孩子睡得很甜。也许她在梦中发笑罢。她的睡脸使我忘记了烦躁。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我又回过头去望窗外，我打算再看一次睡着了的弄堂，然后上床安睡。

但是就在我埋下眼睛去的那一刻，我的思想忽然活动起来。我想起六年前我快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也曾在窗前这样地站了半夜。是同样的月夜，是同样的弄堂。不同的只是我的心境。那个时候我虽然有一腔悲愤，可是我还看见“希望”在远处闪光。今天我有的却只是一种受骗以后的茫然的感觉。“希望”早已烟似地散了。六年前我立在这窗前看弄堂里的月色，纳粹的黑云遮蔽了大半个世界的天空，日本侵略者的魔手快要伸到了我的咽喉。今天在我们八年的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以后，我回到上海的旧居，我并没有喜悦。为什么呢？我那个希望逃到哪里去了？我想着……我不能回答。我的脑子痛起来了……

忽然在静寂中我听见了一声哀哭。

我的确听见了哭声，似熟悉又似陌生的哭声，声音细微，但又清晰，像男人的声音，又像是女人的。我一定是在做梦罢。刚才我还听见孩子在笑，现在又听见有人在哭。弄堂里静静地没有人，是谁在哭呢？

我掉过头再看孩子。孩子在梦中呼呼地吐气。月光跟她

的睡脸告别了。

但是好像有人在孩子的小床旁边哭。

我奇怪。我侧耳倾听。哭声一直没有停，仿佛哭得很伤心。是谁在哭？是那个逃走了没法回来的“希望”么？是我过去六年的岁月么？如果过去的岁月会哭，那么应当是八年的长岁月啊！

哭声仍然不止。夜渐渐地凉起来。我有点毛骨悚然了。现在不仅是小床旁边，连书架上，甚至窗前、屋角都响起了这同样伤心的哭声。

哭声并不高，可是整个屋子都好像在哭了。我一个人被这无所不在的哭声包围着。

“谁在哭？”我问道。没有人回答我。

“谁在哭？”我再问。仍然没有人回答。

“让我安静！”我又说。

这次我得到了答复：

“八年前，八年来你允许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拿给我们！”

“我允许过你们什么希望？你们是谁？”我惶惑地问道。

“你要我们相信未来……你要我们把一切贡献给抗战……你允许过我们独立与自由……你骗了我们……”

“你们是谁？我并不认识你们，”我惊恐地再问。

“冤枉！冤枉！”哭声不回答我，却用一种带怒的声音叫冤。

“冤枉的事多得很！为什么要找我？我并不认识你们！”我大声分辩。

“你对我们描写过光明和幸福的美景。可是我们只看见官僚发财，投机家得利，接收人员作威作福、欺压良民……洋房、金条、女人，应有尽有。还有汉奸摇身一变，升了——”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打断了他的话。

“坏人享乐，好人受苦。物资在仓库里腐烂，而多数人缺乏一切。胜利给我们的亲人带来饥饿、痛苦与贫困，而另一些人中间却充满着荒淫与无耻。我们粉身碎骨、肝脑涂地所换来的新秩序决不应是这样！”

“这不是我干的事，你们为什么问我？你们究竟是谁？”我激动地问，这段话把我的心扰乱了。“他们”的悲愤传染到我的身上来了。

“我们是谁？难道你忘记了我们？我们是断掉的手和腿，是给炸弹片撕掉的肉和皮；我们是瞎了的眼睛，是野狗吃掉的心肺；我们是被烧成了灰的骨头，是像水一样淌出来的血；我们是砍掉的头，是活埋了的尸首；我们是睡在异乡、荒冢里的枯骨！冤枉！冤枉！”

我浑身打颤。我受不了这些话。我的确认识他们。这八年来在许多地方我都见过他们。可是我早已把他们忘记了。我没法回答他们，也找不到反驳的话。我忍不住痛苦地、气愤地对他们说：

“你们向我叫冤有什么用？为什么你们不再活一次，把弄错了的事情重新安排一下？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到独立与自由、光明与幸福，却躲在黑暗里伤心哭泣？……”

雄鸡突然叫起来，声音洪亮。我吃了一惊。我掉头四顾。

屋子里没有哭声。我在和谁谈话，醒着的明明只有我一个？难道我刚才做了一场噩梦？不然我为什么觉得这么疲倦？

小床隐在阴暗里。孩子静静地睡着。我并不曾把她惊醒。

屋子里最后的一线月光也消失了，留下我睁大眼睛站在黑暗中间。我并没有睡意。

1946年7月在上海。

卢骚与罗伯斯庇尔*

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在那些多雨的日子里，在那个阴暗的古城中，我常常在傍晚走过巴黎国葬院的门前，我走过那一段冷清清的路，往往在一座像跟前停住脚步。我的手抚摩着冰冷的石座，我仰起头去看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的公民"，对着那个屹立的巨人我喃喃地说了许多话，我在诉说我的痛苦、我的绝望……

但是在那些时候只有冷雨打湿了我的头发，没有一个声音来打扰我。从卢骚那里我得不到一个回答。我生得太迟了。我已经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

是的，我生得太迟了。在那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常常羡慕那个年轻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我想象着他有过的那样幸福的时候。

卢骚那时候住在卜拉特列尔街一所房屋的五层楼上，罗伯斯庇尔常常走到那所房屋的门前。他站在门外，看见男男女女从那所房屋进出。这个卢骚的年轻的崇拜者用他的近视的但又是坚定的眼光把这一切看了许久，然后他带一点妒嫉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文汇报·世纪风》。发表时有副题《回忆之一》。

走回家去。他后来向朋友用忧郁的声音叙述他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脸上还浮着微笑。

罗伯斯庇尔，这个年轻的热心者，后来被许多资产阶级的历史家视作嗜血的暴君，他有他的另一面，他有他的灵魂的一隅。在法国作家亨利·伯洛的《我的朋友罗伯斯庇尔》①中，最使我感动的便是他和他所私淑的先生卢骚见面的故事。下面是他的"朋友"的叙述：

> 在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们在公园里散步。微风像一声长叹地吹动着颤抖的树叶。难道是这些影子和这清风唤起了同样一个傍晚的回忆？或者是这种大自然的温柔使他对我吐露了他的胸怀？我不知道。……他对我谈的还是关于卢骚的事。

年轻的罗伯斯庇尔终于有机会和那个"日内瓦的公民"见面了。对于他这是不小的幸福。时候是在一七七八年五月的末尾，他读到卢骚的一封私人通信，那是由一个背叛的友人印出来的。信函里的痛苦的字句说明了一个受着迫害、陷于贫苦境地的老人的求助的心情，把这个二十岁的青年深深地感动了。他压不住他的热情。他立刻跑到卢骚的家里去。

他到了卜拉特列尔街，卢骚已经在三天以前搬走了，卢骚现在住在爱尔麦龙微尔，他便赶到那个地方去。我再引用小

---

① 《我的朋友罗伯斯庇尔》：这是一本小说。

说中那个“朋友”的话：

人们允许他到哲学家的隐居处去。从一扇矮窗里透出来的微光在黄昏中给他引路。门关着。马克西米连敲门。并没有回应。他敲得稍微响一点。于是他听见一个声音。有人在问谁在外面，这个年轻的“香客”觉得他的脸色变成苍白了。他很感动，不得不把两只手紧紧按住胸腔。他说他是一个年轻人，要求和卢骚先生见面……门开了。

说到这里马克西米连突然闭了嘴。他的眼睛望着被晚风微微吹动的树枝。然后他好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似的，继续说道：“他（卢骚）把我留在爱尔麦龙微尔花园的浓荫里，一直到午夜。他心里充满着忧郁。……他是一个最敏感的人，然而那班造谣中伤者却把他形容做一个怪物。……朋友，听我说！我刚说两句恭维的话，他便阻止了我，他对我说，恭维不过是一种粗劣的假话，在那里面就藏着憎恨与陷害。他不是指我说的。他指那班虚伪的人。……不久他便现出他的好心与坦白……他教我怎样知道我自己。我还很年轻，他教我重视个性的尊严，他教我遵守社会秩序的伟大原理。……”

马克西米连又沉默了。我望着他。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出了一种惊人的、昂扬的表情。他平时是如此严肃、如此古板的，这时候完全改变了。他叫起来：“啊，你伟大的人。我在你的晚年看见了你。这个记忆对于我便是快乐的泉源。我仔细地看过你的可敬的面容，我看见人们的

罪恶在你脸上刻划的那些忧愁的痕迹。"

我们坐在公园的石凳上。马克西米连忽然站起来。我跟着他。我们默默地沿着那条小河一直走到兵营码头。一轮满月升起来，像一个银的铙钹①，它慢慢地爬上天空。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整个城市和它的钟楼与拱门都罩上了灿烂的真珠色。我们两人并肩地走着。马克西米连沉溺在梦想里面。我催促他讲完他的故事，这也没有用。然而最后他还是对我说出来，卢骚在他晚年垂死的时候也并不曾使他的年轻的崇拜者失望，他已经给了这个信徒一样最可宝贵的礼物：一个品德的定义。……

他说这些话时我们已经到了丹狄利埃街。他抓起我的手握了一下，便匆忙地走开，他推开他的房门，走进去了。

卢骚在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在他和罗伯斯庇尔会见后的四十天，我们假定小说中所写的是真事，那么，罗伯斯庇尔到爱尔麦龙微尔去的日期应该是五月二十三日。在他一生给与人类的种种贡献以外，作为《民约论》的著者，近代思想之父的卢骚还给了那个阴郁的青年一个无上的鼓舞和安慰。我想，这次的会面也许就是罗伯斯庇尔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罗伯斯庇尔被称为卢骚的弟子，他也得着"廉洁的人"的

---

① 铙钹：古代乐器。

称呼。但是他却走了更远的路程。他竟然做了恐怖时期的独裁者，想用断头台来实现他的先生的理想，结果把自己的生命也在断头台上牺牲了。从此反动势力占了胜利，造就了野心家拿破仑的光荣的前程。这不但是爱尔麦龙微尔的老哲学家想不到，连罗伯斯庇尔自己也不会料到的。

卢骚死于贫穷，临死他还是一个漂流的寄食者。他受到的社会的冷遇已经是够大的了。

罗伯斯庇尔的一生也不是快乐的。他是一个刻苦的工作者，永不休息的工作者。他想用权力来维护革命，拯救法国，但是终于悲惨地死去。革命跟着罗伯斯庇尔被缢杀了。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1]是反动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历史家把罗伯斯庇尔当作恶魔。美国电影编剧家特别憎恨罗伯斯庇尔，这自然是为了拥护阶级的利益。通俗小说家阿尔柴男爵夫人的英雄"红花侠"(她写了几本关于"红花侠"的通俗小说)，也正是英国绅士的理想中的救世主。所以那位"淑女"虽然创造了一个"皮面人"帮忙把比利时从西班牙的统治中救出来，却同时遣派了她的"红花侠"去援助反动派打倒罗伯斯庇尔：因为罗伯斯庇尔的理想正是绅士与淑女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必须把头颅献给共和国，"这样说着的罗伯斯庇尔，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他并没有辜负那个先生，他是以他的悲剧的死报答他的先生了。关于他的悲剧的死，我们还是看他的"朋友"的叙述：

---

① 热月政变：指法国在公历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政变。

罗伯斯庇尔被推往前面去。人群中起了一个吼声，时间是六点多钟，落日的霞光染红了树叶。赛纳河像一幅蓝缎子缓缓地流过。嗜血的大刀等待着。突然间一个刽子手站到马克西米连的后面去，一下就把那根绑着他受伤的颚骨的绷带拉掉。他的嘴大大地张开，一些牙齿落了下来(他是在被捕以前受伤的)。一头受伤垂死的野兽似的叫号响彻了这个广场。他的脸露出来了，那上面有一对疯狂的眼睛。……

在大刀落下以前，整个广场屏了呼吸地等待着。于是响起了绝大的叫声。每一个人，公民，女公民，“无套裤汉”和兵士，议员与警察，所有那些来看革命的死亡而自己却不懂的人一致地发出了欢呼，这呼声接连不断地起伏着。我像一个被追缉的人逃出广场的时候，那样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响着。

在那座寂寞的像前我看见了一百几十年前的悲剧。我看见了两个伟大的人的悲剧的一生。过去的景象折磨我的心灵。我悲惜那个巨大的损失。但是我更轻视我自己。我的痛苦太渺小了。在个人的琐碎的悲欢里苦苦地挣扎着的我有什么权利来向那个“日内瓦的公民”伸诉我的痛苦呢？

然而那个时候我毕竟找着我的“先生”了。这是巴尔托罗美·樊塞蒂，被美国小说家阿蒲顿·辛克莱称为“现代最优美的精神”的人。他就在那年(一九二七)八月被烧死在波士顿

查尔斯顿监狱内的电椅上。关于他我写过几篇文章[1]，而且以后我还要写的。

1939年春在上海。

① 指短篇小说《我底眼泪》和《电椅》。见《全集》第九卷。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还是十二年前的事。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和两个朋友去参观巴黎蜡像陈列馆。我在一个小房间里看见了马拉的死。这情景和 J. L. 大卫的名画差不多。马拉躺在浴盆里，半个身子被木板盖着，一只手压在木板上，另一只手松弛地垂下来，头无力地放在被单上，血红的眼睛闭了，虾蟆嘴也闭了。胸膛上插着一把匕首。血流着。那个永远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民的朋友"马拉就这样地走进了"永恒"。

在门口站着夏洛蒂·哥代，那个贵族少女。她昂然望着浴盆中的死者。他瘦得多么可怜！但是她没有一点怜悯的感情。她正在得意地想着：她拯救了法国。她以为她杀死这一个人便可以拯救十万人。她让人捉住了。

在这个小房间里我徘徊了许久，我看见落在地上的墨水瓶。马拉病得垂死了，还在为人民呼吁，还在保卫革命。我看看马拉，看看哥代。我的心隐隐地发痛。我的心为这个不可补偿的巨大损失痛着。这个损失直到一百几十年以后还在打击我这颗现代人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个戴诺曼底帽子的美丽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八四期。发表时有副题《回忆之一》。

的少女，反复地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阻止她，阻止她！"

然而现在太迟了。我带着忧郁走出这个房间。我仿佛听见一个铃子似的女音："疯子！嗜血的猛兽！"我走出蜡像陈列馆，我还听见这同样的声音。但是汽车声、脚步声、人声压倒了它。现在我走在二十世纪的巴黎街道上了。

春天的风吹动我的头发，珍贵的不常见的阳光涂抹在街上，树上一阵清香扑进我的鼻孔。道旁的菩提树已经开花了。

我仰起头看看天，看看四周。我愉快地呼吸，我觉得把一口一口的新鲜空气吸进了肺里。我感到身子像要飞起来似地轻快。但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清脆的女声。我回头去看蜡像陈列馆，一个年轻女子从门里出来，短的衫子下面穿高跟鞋的脚飞跑似地动着。她并不是哥代。然而我又听见一声咳嗽。我站住。于是马拉的影子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那病弱的身体，他那带着兴奋表情的面容，他居然支持着病体出来散步了。是的，他比任何人都需要阳光和空气。他工作得太辛苦了，甚至患着病躺在浴盆里他还不停地写东西。他是应该休息的。看见马拉休息，这是最令人快活的事。

我好像落到梦景里去了！我好像活到一百几十年前去了！我也是一个马拉的崇拜者。我仿佛跟着那一大群巴黎人为马拉欢呼。我注意地看他的面容。

马拉的血红的眼睛在发亮。泪珠从眼角滴下来。他哭了！是的，我知道他常常为了别人的痛苦流泪。这是真实的马拉，他被他的政敌称为"嗜血的猛兽"，他被资产阶级的历史家称

为“疯子”。然而在巴黎人民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个仁爱的人。我想起了 J. 米席勒的书。米席勒被历史家 A. 奥拉推崇为所有法国大革命史家的“先生”，他是一个不喜欢马拉的人，但是在他的《大革命史》中他也曾举出一些马拉救人的事实。一个少女为了救她的父亲愿意把身子献给马拉。马拉接到她的来信以后，研究了案情，知道她父亲的无辜，他到约定的地点去看那个女子。她含着眼泪等候他。他没有挨她的身体，却救出了她的父亲。这不过是许多事实中的一件。

我读过一些关于马拉的书，我好像认识一个熟朋友似地认识他。我跟着他经历了他那充满牺牲精神的生活。我看见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责罚绝食反抗的小孩，我看见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我看见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然后我看见那个孟德斯鸠与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革命家马拉出现了。《人民的朋友》的主笔，热情的煽动者，受迫害的革命家，他不得不时常躲在地窖里，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的生活中的高峰，成了被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我又看见这时候的马拉的面影了：一个病弱的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在哥德烈街阴暗房屋的最阴暗的一层里面，不休息地做他的工作。他的热情、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可是一直到最后，他没有一刻想到休息。他的确像德国历史家 W. 布洛斯所说，是“一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并且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

我用同情和崇敬的眼光跟随着一个伟大心灵的发展。但

是我的眼前一道亮光，一股血，一阵黑。我吃惊了。我仿佛听见呼唤帮助的声音。我看见那个年轻女子拿手打下去。我想叫："阻止她，阻止她！"然而我的喉咙好像被一只手扼住一般。马拉死在浴盆里面。那把匕首已经插在他的胸膛上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仓皇地从外面跑进房来。她扑过去，她悲痛地尖声叫着："凶手！"我知道她是西孟娜·爱弗拉尔，马拉的忠实的伴侣，深爱着他而又为他热爱的女人。马拉的妹妹亚伯丁娜称她为"神圣的女人"。她是他的好助手，她帮忙他把报纸维持下去，她为他牺牲了一切。但是如今太迟了。她不能把他从那个贵族少女的匕首下救出来了。

被称为凶手的夏洛蒂·哥代还站在房里，她不能逃走了。她骄傲地看着她的"受害者"。她以为她的匕首拯救了法国。她却不知道这是贵族、皇党和资产阶级的匕首。她自以为是贞德那样的女杰，她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她不过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热狂者，干了一件坏事。她说自己救了十万人，其实受了害的是整个法国。

马拉的墓碑上题着这样的话："这里安息着人民的朋友马拉，他是被人民的仇敌们谋杀了的。"实际上杀死马拉的正是人民的仇敌们。哥代不过做了一个工具。……

阳光在我的眼前淡下去，我已经进了那条窄巷。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来了，我走进我的充满着洋葱气味的房间。我的桌上正摊开一本《马拉传》。那本书上和别的许多书上都写得很明白，马拉的遗产只有一张二十五个"苏"的纸币，活着的时候他接连有九个月只喝清水吃白面包，而且有三年多他每天

不曾休息过一刻钟。他比当时的任何革命领袖都更爱人民，更忠于人民。他最受到人民的拥护。自然他也最为反革命势力所憎恨。如果我们把反革命势力比作一只嗜血的猛兽，那么，马拉倒是一个适当的牺牲者。他的死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为什么要轮到夏洛蒂·哥代来下手呢？……

哥代和马拉应该不是陌生的人。自然她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她在外省常常听见人们谈到马拉，从贵族和吉隆特党人的口中她听到的全是诬蔑中伤的谣言。这迷惑了她的心。她把马拉当作了一个恶魔。她要去掉他给多数人带来和平。

夏洛蒂，这个羞怯的痴心的少女。她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女儿。生活在一个衰微的步步下降的家庭中，她应该见到不少人世间的悲剧。母亲的死夺去了她的孤寂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她很寂寞。寂寞培养了她的幻想。她或许还渴望爱情。她追求理想中的“王子”。修道院的生活却如一沟死水，泛不起一点涟漪。平静的面容掩不住内心的苦闷。她等着机会把她的热情向另一方面放散。她热心地读着蒲鲁塔克的《伟人传》和卢骚的著作，那些激动了全法国良心的卢骚的著作。卢骚培养了她的心灵，正如卢骚构成了马拉的思想。这个美丽、幽静的少女和那个面貌丑陋的革命家一样，都是卢骚的“弟子”。书本煽旺了她的幻想。她把她的爱寄托在“英雄主义”上，她渴望一个与暴君作战的英雄，一个为祖国而死的英雄。马尔苦斯·布鲁塔斯成了她梦寐中的上帝。这个姓名变作了一个象征。她不断地在心里激情地呼唤这个名字。于是她找到了

她的“裘·该撒”。她要做一个十八世纪的“布鲁塔斯”了。有一天她含着眼泪对她的姑母说：“我哭，为法国哭，为我的父亲和家族哭，为你哭……只要马拉活着的时候，谁还能够安全地活下去呢？”所以她赶到巴黎，怀着匕首到马拉的家里。她杀害了一个伟大的生命。

我仿佛看见她把刀刺进他的胸腔。我听见那声音，血立刻从黄瘦的带毛的胸上喷出来。我吃惊地把头一动，我怕血溅到我的脸上。但是我惊醒了。我依旧坐在我的小房间里，桌子上堆了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我的思想落进书中去了。

卢骚的弟子杀死了卢骚的弟子。哥代除了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所崇拜的“女杰”外，并没有救活一个法国人。她反倒使十万人悲痛。她是吉隆特党的友人，她的匕首却促成了吉隆特党的败亡。所以在狱中的吉隆特党人威尔涅约听见哥代的行动，便叫起来：“她毁了我们；不过她教了我们怎样去死。”不错，夏洛蒂·哥代的确死得勇敢。

我记起了一个历史家的叙述：

> 这是下午七点钟……夏洛蒂一刻也不曾失去她的自制力，她走上了囚车。她站在车上，她昂着头，眼光很镇定。车子到了河边。天落起雨来，还打着雷，但是暴雨并不曾驱散群众。……沿途聚集着人群，他们包围着囚车，跟随着囚车。车子因此走得非常慢，花了两个钟点才走到协和广场。夏洛蒂始终立着，那些对她掷过来的侮辱

和叫骂并没有扰乱她的镇定。她从容地望着街中的无数的人头……

雨停止了，越过香·爱利塞大街的浓密的绿树看去，暴雨后的紫色落霞涂满了天空。空气一定很新鲜，很凉爽；还没有新流出来的血的气味。

断头台大概建立在和现在竖立方尖碑①的地点相差不远的地方。推勒里王宫的草坪上一定挤满了人。夏洛蒂不要别人扶持，迅速地走上断头台的阶梯。她到了台上，一个刽子手把她的披肩拉开了。她睡倒在木板上。机器动作起来。再过一会儿，人把她的头拿起来给台下的人们看，她的一对蓝眼睛还是半开着。……

夏洛蒂·哥代便这样地结束了她的二十五岁的年轻的生命。她那一对半开着的蓝眼睛仿佛就印在我的书上。我看不清楚她的眼珠。但是藏在那半闭的眼睛里的一个寂寞的年轻生命的悲剧震动了我的心灵。我恨她的行为。但是我觉得好像自己也立在推勒里王宫的草坪上，不瞬眼地望着那一把悬垂的大刀。我听见一个声音："不要落下来罢。"

怎么？难道我着魔了？我不能够说这样的话。我不是哥代的崇拜者。而且我甚至不能够宽恕她的行为。那一天站在人丛中不瞬眼地望着她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仿佛看见那个年轻的德国人疯狂地跟着囚车走了两个钟点。我仿佛看见他痴

① 方尖碑：即 Louksor 庙内的方尖碑，埃及酋长所送，一八三一年年尾运到巴黎，建立在协和广场。

迷地立在人丛中，两只眼睛永远盯在她的脸上，好像要把他的心掬给她看一般。这是亚当·鲁克斯，从马因斯派来的三个代表中的一人。他来巴黎只是为了向国民大会表示忠于革命，表示马因斯议决归并法兰西共和国。但是他却在做了反革命行动的哥代身上发见了他的梦景中的“女杰”。他忘掉他自己的存在了。他称颂她“比布鲁塔斯更伟大”，他以为“和她同死在断头台上是最美丽的事”。这个二十八岁的热狂者以前并不知道哥代的名字。然而他也是卢骚的弟子，蒲鲁塔克的读者，他和哥代一样也走入了迷途。他有着一颗更罗漫谛克的心，因此走得更远。他现在将共和国与革命抛在一边，却祈求着和刺杀马拉的少女同死。和他同来巴黎的一个代表福斯特尔说：“夏洛蒂·哥代使得这个善良的年轻人精神错乱了，他如今就以为除了为她，为吉隆特党而死以外，再没有别的幸福。”吉隆特党的议员巴巴霍说，鲁克斯爱上了哥代。还有一个近代历史家马丽·雪尔女士也说：“倘使她不曾有过罗漫谛克的恋爱的话，那么她至少在亚当·鲁克斯的灵魂中唤起了一种比死更强烈的激情了。”

映着落日的霞辉，那个“健康、美丽、纯洁、温雅、勇敢的面貌”占据了鲁克斯的罗漫谛克的心。他失掉自持的力量了。那时雷声还在巴黎的天空响着，灰黄色的天幕不时被闪电划上了纹路，落日的紫光在断头台的染红了的刀上发亮，鲁克斯像被鬼魂追赶着似地急急回到他寄宿的旅馆，他匆忙地埋下头，狂热地动着笔写他的题作《夏洛蒂·哥代》的文章。他忘了休息、忘了饮食地写着这本等于他的死刑判决书的小册子。他认

为那个诺曼底的处女比布鲁塔斯更伟大。他说："她是天上的人物，不宜于住在地上，她像电光一闪地过去了，却留下她的纪念在人间。"他还宣言他如今更爱她所身殉的法国。他如今唯一的工作便是跟着她登断头台。

在三个多月以后他的志愿终于实现了。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他甚至快乐地叫道："我现在到底要为夏洛蒂·哥代而死了。"

我现在引用一个同情他的英国历史家的叙述：

> 克尔勒和福斯特尔在人丛中跟着他，就像他从前跟着那辆把夏洛蒂·哥代载到同一目的地的囚车那样。在五点钟，白昼的最后的微光也消失了；断头台被火炬的光照亮着，火炬还投掷了摇曳的微光在群众的脸上，他们是来看那个为夏洛蒂·哥代而死的外国人的面貌的。一道暗褐色的雾从河上升起来，空气寒冷彻骨，但是亚当·鲁克斯走上断头台的窄梯，看见断头机的轮廓映在阴暗的天幕上时，他并不曾颤栗一下。
>
> 克尔勒说："他走上去，好像他是在登上讲坛去演说一般。……"
>
> 福斯特尔说："他奔赴死，他向着死跑去。"
>
> 他的冷静使得那些站在他旁边的人不相信；他很想拥抱刽子手，但是他的双手被缚着了；他对他的朋友们微笑，他抬起头看上面，好像在看隐在巴黎的雾外面的什么东西。……

这便是鲁克斯的最后了。人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穿过巴黎的雾，越过被德国军队封锁了的道路，在看马因斯的乡村里他的和平的小家庭罢，那里有他的年轻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年幼的女儿。她们会忠于他，珍贵地保留着他的纪念品。在告别的信上他对他的妻子说："我为自由而死，倘使有一天自由得到胜利，法国便不会忘记亚当·鲁克斯的妻子和女儿。"

但是事实上他并非为自由而死，法国也的确忘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全世界都忘记了她们。第三个女儿在父亲死去以后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鲁克斯的善良的妻子却多活了二十年。剩下的两姊妹中，姊姊马利亚·安娜又走上了她的父亲的路。这是一个热诚的、孤寂的、爱梦想的二十五岁的少女，她和她父亲崇拜的"女杰"同岁(也许还大一岁)，她有一天读到了J.P.利席特尔的赞美哥代和鲁克斯的诗，她的纯洁的少女的心受到极深的感动。她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给作者，信里充满着带神秘性的语句。没有回信到来，她便想自杀。她的妹妹劝阻了她。后来利席特尔来了两封信，给了她一点安慰。

妹妹出嫁了，马利亚·安娜更孤寂地留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利席特尔又来了信，要求和她见面。但是这个纯洁的"罗漫斯"是她的脆弱的心灵所受不了的，而且她已经决定了不做这个世界里的人。她和她的父亲一样要在死里寻求幸福。在一个五月的夜晚，她投莱茵河自杀。别人救活了她，她却坚决地说她看见永恒之光，听见天堂的音乐，她不愿意回到

地上来。

人们把她放在床上。她似乎睡熟了。人们离开了她。后来有人再进房里来时，她已经死了。

父亲害了女儿，他给了她这么一颗脆弱的罗漫谛克的心，把她引到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

现在已经不是罗漫谛克的时代了。我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四周怎么这样静？我的脑子里还充满着那些书中的人物。穿过深夜的凉爽的空气，圣母院的钟声从开着的窗户送进来。我痴呆似地数着。十一下。我惊讶了。我怎么在书本上花了这许多功夫？我今天还没有吃过晚饭呢！但是我也不想吃什么了。

我望着贴在墙上的一张肖像，这是从一本书上扯下来的卢骚的照片。那时他是在四十岁的壮年，正是构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的时期，他的眼光坚定，面容充满着勇毅的表情。我望着这个"近代思想之父"，日内瓦钟表匠的儿子。我觉得在这一天的功夫我活了一百几十年。或者我做了一场大梦。我刚刚见过了他的三个弟子，跟着他们过了三种充满浪潮似的生活：一个留学法国的瑞士医学生，一个在古罗马共和国中寻找她的"王子"的诺曼底贵族少女，一个以《热诚》这篇论文得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十九岁的马因斯青年。一个瑞士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卢骚把他们拉在一起，使他们走了许多路程。他们到巴黎来次第把生命献给共和国。每个人都昂然地接近死。没有惧怕，没有惋惜。病弱的马拉死在健康的哥代的匕首下，他睡倒在浴盆里。哥代在断头台上唤起了爱

情，她又把鲁克斯引进了永恒。鲁克斯又给他的年轻的女儿立了一个榜样。

我的心反抗起来。对这一百几十年前的可痛心的悲剧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不能挽救什么。我不能够拔出哥代的匕首，把马拉从浴盆里扶起来。我不能够劝阻哥代，说她的举动只会危害共和国。我不能够说服鲁克斯，使他明白他自己并没有了解革命。我让他们走入灭亡的道路，现在只有对着书本叹息。我太无用了。

但是我的正义感还是强烈的，我的判断力依旧不曾消失。对着那些不忠实的历史家的叙述我不能没有愤慨。A.拉马丁称哥代为“暗杀的天使”，L.马德楞称她为“女侠”。他们和哥代一样，是不懂得革命的，我不愿提起那些更坏的、更充满偏见的书的作者，譬如N.H.威伯斯脱夫人，她比哥代更恨马拉，这位淑女的恶毒的文章使人疑心她倒是一个嗜血的疯人，她的笔不会触到马拉的仁爱的心。只表现了自己阶级的无能。她和通俗小说家阿尔柴男爵夫人一样，想“把法律握在自己的手里”来拥护阶级的利益；阿尔柴男爵夫人将罗伯斯庇尔再判处一次死刑，威伯斯脱夫人也再一次暗杀了马拉。可是这样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阶级的没落。我跟着一些历史家称哥代与鲁克斯为卢骚的弟子，他们都热狂地读着卢骚的著述。然而实际上他们都不曾了解卢骚，撇开了被压迫、被虐待的阶级，杀害了人民的朋友，这样的人是不配称为卢骚的弟子的。了解卢骚的只有马拉，他生于贫穷，死于贫穷，他有一颗敏感的仁爱的心，坦白刚毅的性格。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

过光荣，却拒绝了物质的享受。全巴黎的人民为他的死悲哭。他的遗骸被移葬在国葬院中。但是在一七九五年人们又把他的遗体搬出来，葬在附近的墓场里。反动者还扎了他的刍像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天井中焚烧，然后把灰烬抛在蒙马特尔的阴沟里面。

"这太过火了！"我愤怒地叫起来，我不能忍受这侮辱。我站起来。一切幻景都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房间里还只有我一个人。桌子上堆着书。墙上贴着卢骚的像。他永远带着坚定的眼光看我。

这个"日内瓦的公民"至今还屹立在巴黎国葬院门前，他的遗体也安息在国葬院里面。在我的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不知道有若干次冒着微雨立在他的面前对他倾诉我的痛苦的胸怀。现在又轮着他来安慰我了。他将永远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1939年春在上海。

静夜的悲剧*

夜似乎很静。可是我从书本上抬起俯着的头闭上眼睛休息时，就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第一，是整日整夜都不停止的滴水声，这声音常常使我误认为窗外在落雨。不知道是哪一家的自来水龙头坏了，水一滴一滴地滴了几个月，也没有人来作过让这龙头休息片刻的尝试。声音并不大，但很单调，有时我午夜梦回，竟然觉得我在滴血或者我的生命跟着水在滴。这好像很荒谬，可是仔细一想也有道理。我的时间渐渐在缩短，我的精力也在我不知不觉中逐渐衰退，这是事实。想起来，叫我觉得可惜，又觉得可怕。这样零碎地消耗生命，的确是可惜而又可怕的事。

我的消耗生命的方法很多，读书自然也是其中的一种。我读书并非为了增加知识，我不过想多知道一点别人（从前的人和现在的人）怎样生活的故事。我是人类的一份子，我和别的人中间当然有关联，我关心别人的生活，不能算是多事。

窗外，水仍然在滴，在今夜与在昨夜并无不同。我听了几个月，还没有弄清楚，声音是从哪一家发出来的。以后我大约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中国作家》第一卷第一号。

也不会去管它。但是它今夜却像一连串的小石子投入我脑子里的小湖中，把那片水面上映出的一幅图画搅乱了。我感到疲倦。

我阖拢书，我把头朝后一仰，将背向椅背上一靠，我只想休息。可是我不能。滴水声折磨着我。那幅被搅乱了的图画仍然在我眼前。画中景物渐渐在变换。于是我仿佛看见血在流。一滴，一滴，果然是滴血声。一个人躺在浴盆里，露着身子，头仰垂到盆外，胸前插着一把匕首，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我痛苦地叫了一声。我认得这个人。他死在一七九三年。那是一百五十几年前的事了。他应该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我可以熟习地叫出他的名字：让·保罗·马拉。

我刚刚关上的书，书皮上也有着这样一个名字：让·保罗·马拉。那是列克-马勒采文著的历史小说。

我又在读关于马拉的书。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每当我无法排遣寂寞，或者闷得快透不过气的时候，我常常求助于一些人的传记，马拉也是我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马拉，一个"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W.布洛斯语)，"法国自由的忠实的看守者"(C.L.杰姆斯语)，"下层阶级的朋友，被压迫阶级的忠实诚挚的战士"(E.B.巴克士语)。他比当时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更爱人民。可是在当时的国会中没有一个马拉的党徒。有人说马拉的党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虽然他为无数的人民所热爱。……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是跟马拉的名字分不开的。朴实、热烈，而充满着牺牲精神，他常常渴望着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终于有一天死在一个贵族女

子的匕首之下。遗产除了破旧的家具外，只有一张二十五个“苏”的钞票。人说他活着时和临死时一样，都很贫苦……

夜帮助我思想、回忆。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个人身上。我的疲倦渐渐地消失了。我跟着一个人在生活：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罚绝食反抗的小孩，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成名的医生和学者。然后是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我的眼前更亮了。我看见热狂的煽动者，受着迫害的革命家，他创刊了《人民的朋友》，攻击腐败和罪恶。他时常在地窖中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生活中的高峰，成了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全法国贵族憎恨的“嗜血的魔王”。

我的眼光追随着他的生活：巴黎哥德烈街二十号，一所阴暗简陋的房屋，一个病弱的老人（才只五十岁，他的身体已经衰老了，那是被刻苦的生活、过度的工作和燃烧的热情摧毁了的）。房间里充满着霉气和臭味，到处凌乱地堆着东西。几张熟习的脸孔露一下又消失了。整个房间又落进一种窒息人的静寂里。然后响起了沉重的喘息声。病折磨着马拉，他接近垂死的状态了。但是他仍然坐在浴盆中写作，一双老虎眼里还燃着烈火，这对眼睛永远睁着，守护着人民的利益。他的笔没有停过，他的刊物也在继续刊行。体力在逐渐减退，心却一直在燃烧。最后他不能出去参加国民大会的会议了。他不得不靠热水浴来减轻痛苦，提起精神。他坐在澡盆里为他的刊物写文章，向国民大会建议，为人民的权利呼吁。一直到最后他还在攻击反革命的罪人，拯救无辜。

夜更静，水滴声也似乎在减低。我仿佛在旅行。我带着崇敬的眼光和感动的心情，跟随着一个伟大心灵的发展，但是忽然我听见一阵马蹄声和车辆声，我看见一辆破旧的马车在高低不平的街路上颠簸地滚动。车子向着哥德烈街走来，走进一个阴暗的院子停住了。那个院子的角落里有一口井，右边有一个拱廊，拱廊下露出一个楼梯口。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柔和的暮色笼罩着整个院子。从马车中走下来一个年轻的女人。一张聪明、沉静、美丽的脸，白色的衣衫，高高的软帽上系着三根浅绿丝带。她走上了楼梯。她上去做什么呢？我跟着她上楼。她伸出那只戴着漂亮手套的手去拉门铃。门开了。一个女佣人来开门，手里还拿着一只服药用的调羹。年轻的女客说是来求见马拉。

"啊！"我惊叫一声！这是夏洛蒂·哥代！一个痴心的少女，她要来干一件再傻没有了的事情。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就要发生了。"阻止她！"我想大声叫；"马拉，当心！"我想叫。可是太迟了！我生晚了一百五十多年。

结果这个美丽的贵族少女杀死了丑陋贫苦的病老人。马拉坐在浴盆里，听她简单地告诉一些背叛革命的议员的名字。他拿着笔在记录。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全。匕首的当胸一击便结束了他的殉道者的一生。时间是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三日。这个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日子。

马拉只发出一声短短的叫喊，他在呼唤他那个忠实的女人（她的名字是西孟娜·爱佛拉尔）。哥代略略带了点惊奇地望着他。她究竟在等着看他断气，还是在思索自己是否做了

一件可以比拟布鲁塔斯的事情？我不知道。一片红色遮了我的视线。浴盆里的水马上变红了。到处都是血。“人民的朋友”的血不停地在流。死已经确定了。

房间里一阵骚乱。人们忙着救护他们的亲爱的人，他们的悲痛和惊惶是很大的。在这个不干净而又有恶臭的小房间里，只有那个白衣少女安静地立在角落里望着这一切骚扰，她似乎忘记了她自己就是这骚扰的原因。只有她看见西孟娜哭得很伤心的时候，她才渐渐地变了脸色，她的嘴唇颤抖起来，她的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马拉居然这样地被人爱着，这倒是她在举起匕首以前绝没有想到的事！……

窗下响起了脚步声，一男一女的皮鞋底在水门汀的地上踏着。声音非常清晰。那是一对夫妇，住在我的隔壁，我始终没有机会看见他们的面貌，可是我却认识他们的声音。他们每夜总在十二点到一点的中间步行归来，常常低声笑着谈话。这应该是一对和睦的夫妇罢，而且应该属于有闲阶级的。在他们的生活中大概不会有那一切的骚扰罢。过去的悲剧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呢？我有点妒忌他们。因为我想休息，我想安静，我却得不到。我用手蒙住眼睛。我以为我可以不再看见过去的事情了。然而在我的眼前又现出了一幅图画：

那个美丽的少女悲戚地从狱窗里望出来，两只手握着窗格子，她似乎在倚窗沉思。这个没落贵族的女儿，她在想什么呢？她说过：“我杀一个人以救十万人，杀一个匪徒以救无辜的人。”那么她为什么又在悲戚地沉思呢？她应该看见在巴黎因为马拉的死悲哭的无数的平民罢，他们的数目至少也超过

了十万。她从修道院出来，是一个寂寞的孩子。卢骚的著作培养了她的心灵，他和马拉一样都是卢骚的“弟子”。她也读蒲鲁塔克的《伟人传》，她渴望一个与暴君作战的英雄。她把马·布鲁塔斯当作她的上帝。她的寂寞生活培养了她的热情，她无处发泄，只有把她的爱寄托在英雄主义上面。在苦难中的法国的命运吸引了她的整个心灵。她梦想着牺牲自己给法国带来幸福。她的生活环境使她有机会和温和的共和派吉隆特党人接近。激烈派的马拉正是贵族和吉隆特党所憎恨的敌人，她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不少诬蔑马拉的谣言。人们对她说马拉曾经主张(在一七九〇和一七九一年中间)牺牲大批贵族的头颅以完成革命，她却不知道马拉非常仁慈，他比谁都更爱人民。吉隆特党人宣传马拉过着奢侈生活，她却不知道马拉接连有九个月只喝清水吃面包，留着钱来维持报纸，并且有三年整天不能休息。马拉的影像折磨着她。她把他当成一个喝血嗜杀的恶魔，一切邪恶的根源和法国苦难的原因。在她那表面安静的疯狂中她只能够看见、听到、接触到一个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老虎眼虾蟆嘴的侏儒马拉。有一天她含着眼泪对她姑母说：“我哭，我为法国哭……只要马拉活着的时候，谁还能够安全地活下去呢?”所以她赶到巴黎，怀着匕首到马拉家里，她第一次见到马拉，没有谈上十句话，就轻易地一击杀死了他。

她被捕受审，她同情“马拉寡妇”的痛苦，但是她不承认自己是杀人的凶犯。四天后她在断头台上身殉她的愚蠢行为。她死得勇敢，可是在心深处她应该存着疑惑，抱着悔恨。这个

误入迷途的傻瓜，她没有救活一个人，她反而使巴黎人民失去热爱他们的良友；她没有挽回吉隆特党的命运，却只促成那些人的败亡。吉隆特党的一个领袖批评哥代的行为，说："她毁了我们。"他这句话是很有理由的。有名的罗兰夫人(吉隆特党的一个重要领袖)后于哥代三个月零二十天上断头台，我想是哥代的匕首加速了她的死亡。

革命并没有被哥代的匕首摧毁。人民仍然在往前走。另一个巨大的力量显露了。马拉所留下的人民领袖的空位有一个人下了决心来接替。他开始用坚定的脚步走向它。他相信用专政来完成革命。他使用各种手段来掌握权力，用流血来维护革命。这就是号称"廉洁的人"的罗伯斯庇尔。他也是一个刻苦的工作者，他甚至不惜使用恐怖手段来拯救法国，而结果却使自己在反动派的阴谋打击下悲惨地死去。到了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发生，反动派才得到了暂时的胜利。但这样的胜利一定不是夏洛蒂·哥代所梦想的那一种罢。"是不是，你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因为我的目光又落到那个在狱窗中沉思的少女的面颜上了。这是查理·路易·米勒的画，一本《法国革命史》中的插图，我刚巧摊开在案头。在另一本书中还有保罗·彼得利绘的《刺杀马拉后的哥代》：马拉倒在浴盆里，一只手挨着倒下的椅子，哥代的帽子落在地上，她似乎要开门出去。还有一幅 F.B. 绘的哥代受刑图。她正被刽子手牵上断头台。那个男人左手牵着绳子，右手指着断头机上的大刀。

刀光一亮！我仿佛听见"卡查"一声。于是鲜血四射。完

了。什么都完了。我无法抓回来哥代，向她问个明白。总之，大错已成，历史不能重写，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我叹一口气，阖上那两本有插图的书。我又感到疲倦，我想休息了。我打算站起来。我无意间低下头。我瞥见红布书面上的两行金字：让·保罗·马拉。我想起了我刚才还在读的那本小说。我细看小说作者的姓名：弗利兹·列克-马勒采文。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只读过他的这一本书。这不是一本好的历史小说。

列克-马勒采文应该是一个罗漫谛克的热情家罢。他似乎过于放纵他的想象力了。要是早生一百几十年，他说不定又是一个亚当·鲁克斯。他让马拉和哥代见面两次，而且有过长篇诚恳的谈话（事实上要是哥代和马拉有过恳谈的话，她绝不会刺杀他的）。在马拉被刺以后，他写着：

> 西孟娜没有来，夏洛蒂单独地同她所刺杀的人在一块儿。她用冷酷的眼光望着他说："马拉，这是你自己招来的。"
>
> 他喘叫说："我招来的，并且……"
>
> 她惊愕地问："并且？"
>
> "并且谢谢你。"
>
> "谢谢我？"
>
> "谢谢你。"这个感谢打击了她，她的女性被唤醒了。匕首从她手中落下来，脸埋藏在她的双手中。在这阴暗的屋子里只听见垂死人的喉鸣和这个少女的隐约的呜

咽。一只手来抓她的胳膊——一只用了最后的力气伸起来的手。"你看,"马拉轻轻地说,"你听。我谢谢你。死,并没有给我痛苦。并不像生活那样痛苦。谢谢你……"

"马拉,"她哭着说,"可怜的马拉……"

"吻我,……"

于是她俯下身子捧着那个可怜的仰着的头:"我吻你,我现在要吻去你额上的诅咒,我吻你,你这个丧失了和平的人,我现在要把和平吻印在你头上。我吻你,我现在要用这一吻求得你的宽恕,我吻你,就像上帝……"

"上帝,"马拉结结巴巴地说,他微笑了,他在这濒死的状态中变得非常年轻了。"上帝……"这是个烦人的老问题…… "马拉,"她低声说,"可怜的马拉,现在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你信不信上帝?"

马拉微笑着结结巴巴地说:"这要看究竟……"

"究竟?"

"究竟人在左边或是右边划十字。"屋子里非常静。他最后的呼吸是轻微而平和的。

她把他的头捧了许久,吻着那张沉默的嘴,现在他那带讥讽的微笑也消失了。

她站起来,理好衣服,拉开了门闩。

窗板上一个叩声使她吃了一惊,她看见一只小鸭坐在窗台上用嘴敲着玻璃。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窗前,她往下看,看见下面一群人,他们过了一个闷热的白天,现在在傍晚出来乘

凉了——放工的工人，憔悴的妇女，褴褛的平民，还有喁喁私语的情侣。“我，”她叫起来，“……你们下面的人……”

人们仰起头看。

“我杀死了马拉公民，”夏洛蒂大声说。……

我不像是在抄译德文小说，我在看一幕悲剧，我在做梦。我仿佛也听见了那一句话：“我杀死了马拉公民！”多骄傲的一句话，正像是哥代说的。可是西孟娜到哪里去了呢？她这个把一生奉献给马拉的善良的女人。

屋子里的确很静。也有平和的低微的呼吸声。但这是我的一岁零八个月的女孩在梦中吐气的声音。这间屋子是我的屋子。我坐在书桌前翻开一堆法国革命史做梦。十三年前我也写过关于马拉的小说。我也做过哥代捧着垂死的马拉的脸狂吻的梦。不同的是我让哥代“觉得她从没有看见过比这更温和、更仁爱、更美丽的脸”。我写着：

阴暗包围过来。她的身子差不多全埋葬在阴暗里，但是她依旧立着，好像生根在地上一般。她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忘记了在加恩听来的种种关于马拉的谣言。她只看见星一般的眼睛在闪耀。那一张似幻似真的脸在她的眼前荡漾着，仿佛一轮明月反映在万顷烟波的海上。她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她的心胸敞开了。她恍然地明白了一切。一个新的人格在她的脑子里现出来了。

“马拉万岁！”“人民的朋友万岁！”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些叫声，隐约地送进她的耳朵里。声音是那么有力，她完全不能够抗拒。

她不能自主地跪下去，捧着那张还有热气的脸狂吻。

她觉得他的手在动，在推她，好像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她的耳边说：“孩子……我是不要紧的……但是共和国……饥饿的人民……”

他的手又落了下去。他的眼睛闭了，泪珠留在眼角上。于是星光灭了。

“马拉！马拉！”一阵悲痛抓住了哥代，她充满了悔恨地捧着死人的头哭叫。

于是门开了，西孟娜慌张地拿了烛进来。

这样地结束了哥代的悲剧。大错铸成，纵然她勇敢地死在断头台上，也不能为自己赎罪了。在这时候，她不能再保持她那种傲慢态度了。只有像亚当·鲁克斯那样的大傻瓜，才会颂扬“她比布鲁塔斯还伟大”。这个年轻的热狂者竟然爱上了哥代。他愿意和她同死在断头台上。三个月以后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去断头台的时候，他快乐地叫着：“我现在到底要为夏洛蒂·哥代死了。”他也死得很勇敢。

在那个时代似乎人们常常把死看作净化心灵的试炼。每个人都愿意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谁都会勇敢地走上断头台。可是错误的理想并不曾因为得到那些生命的栽培就开了花。……

我背痛腰酸，真像经过了长途跋涉似的，我倦得厉害，为了明天的工作，我应该休息了。

我站起来仰着头长长地吐一口气。我好像用了最后的力气似地把堆在桌上的书全搬开了。我不愿意让那个悲剧再来扰乱我的心。我需要酣睡。

1947年在上海。

后　　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六篇短文①中，《月夜鬼哭》和《静夜的悲剧》两篇是"胜利"后的新作，其余的四篇则是从我的一本绝版已久的散文集《黑土》中抽出来的。

我不妨坦白地说，我自己很喜欢"第二辑"中的三篇文章。②它们不是历史（我倒想写一部《法国革命史》），也不是小说（我写过三篇所谓"历史小说"）。我并没有虚构史事。话都是有根据的，只除了罗伯斯庇尔和卢骚见面的那段谈话是出于一个法国小说家的想象，那是从亨利·伯洛的历史小说《我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中引来的。我至今还相信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不错，虽然我生迟了一百几十年，不能够亲身经历那次的革命，我的关于它的全部知识都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且对于那些记载着活人的勇敢的聪明的行动的书本，我感到了极大的兴趣。我特别提说聪明的行动，因为在当时也有至少愚蠢的行动。"聪明"和"愚蠢"的斗争也是一七八九——九三年中间的一个次要的"现象"。我在这里用了"次要的"这个

---

① 首篇《无题》是从《旅途杂记》中移来的，未包括在这里所说的"六篇"中。

② 指本集的后三篇。

形容词，也许可以免除一些“吹毛求疵者”的误解。谁都知道主要的斗争是为了“权力”、“权利”和“阶级的利益”。一部法国革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争自由的历史。

但是我不是在写论文，不是在写历史。我写的只是几个过去的人和几件过去的事。除了卢骚和他的弟子们(罗伯斯庇尔、马拉不用说，哥代和吕克斯也热狂地读着卢骚的书，有些历史家也称他们为卢骚的弟子)，我还想写龚多塞、罗兰夫妇、玛丽·昂多瓦勒特。……自然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写法。譬如关于玛丽·昂多瓦勒特，我部分地同意司特潘·兹外格的见解，她只是一个平庸的女人，要是她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她绝不会做出那许多事情来，更不会悲惨地死在断头台上。自然她并非死得无辜。可是除了替自己的行为负责外，还得代路易十六和他的祖先的行为还债，她成了多年来法国宫廷的淫乱的象征了。

我现在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写这样的文章。不过要是我真的写了，我想也许会有人骂我在替“王后”辩护。记得我的《静夜的悲剧》发表以后，就有人在成都某报的副刊上骂我在替“贵族”辩护，这倒是从未见过的“文章新读法”了。这样的骂对我也许还有好处，它至少使我知道自己还是在用理智判断事情。

巴　金 1948年7月。